

TWENTY YEARS AT HULL-HOUSE

赫尔大厦二十年

简·亚当斯◎著

苏秋军 吕伊冷 董航 蒋荒野 薛佳◎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序言

我猜想序言都是在写完书后才写的，现在这本书我已经写完，那我该说说可能会让读者产生阅读障碍的一些地方，如果是在看完本书后才看序言的话，那么就另当别论了。

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很多次我都觉得赫尔大厦这个事业开始得太快了。50岁是生命旅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人在50岁的时候会静下心来写自己的所做所想，然而那些与我相处已久的人们已经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不能用简单的赞扬或批评来描述他们，对于我还在参与的一些社会活动与事业，我对它们是那么投入与热爱，虽然其中一些遭遇了挫折与失败，难以言表。

该选取哪些事件和经历去说确实难以抉择，对于每个孤立的事件，我想我应该已经做了准确无误的描述了，但也可能会因为选材而在总体上让人有误导之感。由于这些及其它种种原因我很难（第8页）对1889秋天之后发生的事情做忠实的记录，因为当时还没有主导的社会理论与经济观点，而我从那时候开始在芝加哥的一个工业区内居住。

如果有读者想要知道，为什么在重重困难之下，本书还是写成了，我可以列举两个目的性作为答复。其一是有组织性的慈善活动，这个是“有价值”的目的。因为安置点在美国很容易开展起来，我希望能通过参照先前的例子，包括之前经历过的种种压力与斗争，可以对后者有所帮助，从而消除人们对此所持的表面的认识。另一个目的则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希望自己不要深陷在先前写的两部自传的影响中，其中一部我已经拿到大纲了，而写这本书令我觉得在安置点开展工作是那么顺利，那么富有吸引力。

前面几个章节详细叙述了各种外界影响和个人动机，很清楚地表明二十年间发生在芝加哥的各种社会与工业活动对人们性格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读者还是不能清楚这些，那么我真的不能饶恕自己了。我没有把自己的个人经历与赫尔大厦的历史分离开来，因为那些年里，我“深深投入到处理有关生命与生活的暴风雨中”，在各种事件及经历所带来的压力下，我的性格变得坚韧不拔，我与赫尔大厦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与主题保持一致，很遗憾我没有把事件按先后顺序来排列（第9页），因为在赫尔大厦刚刚成立的前几年里，所处理的事件非常有限，后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记不清楚最早的那些事件了。

书中三分之一以上的材料都在《美国人》杂志上刊登过，书中的一个章节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刊登过，有关安置点动机的早期宣言在几年前已经出版，它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写的，因为要再现当时的热情澎湃已经是不可能的。

我非常感激同样在赫尔大厦工作的诺拉·汉密尔顿小姐，为本书作了插图，本书的封面是由赫尔大厦的另一位居民弗兰克·哈森普夫卢格所设计的。同样感谢克莱拉·兰兹伯格小姐为本书作了索引及其它很多工作，克莱拉小姐也是赫尔大厦一员。

我在赫尔大厦的二十年间曾陆续出版了几本书，如果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那么我只能自圆其说，之前的几本书是以我的经历来支持论点的，那么那几本书所得到的反响，使我能够在本书中完整地阐述我的经历。

第一章 最初的印象

理论上讲内心真挚的源动力是与幼年的经历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喜恶一直可以追溯到“无人地带”，性格在那里是无形的，但却对未来的发展定下了明确的基线。我的记录就从我童年的一些印象开始。

所有的印象都与我父亲直接相关，尽管我也会回想起很多除我父亲之外的事情。我是大家庭里年轻一辈的其中一员，对乡村生活充满了渴望。但由于父亲有绝对的影响力，且要把一个人早期的印象和盘托出实属不易，那看来把旧时的回忆放到一条单一的主线上来叙述会容易很多。而且，这条线非但紧紧拴住我至真的情感，还把我带入对人生道德观的思考，并为我之后想要理解这个谜团时提供了线索。

我想起年幼时自己因为说谎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那些“可怕的夜晚”。我被悲惨的死亡气氛牢牢抓住，这是一种双重的恐惧，一是我自己会因为我犯下的罪行直接堕入燃烧的地狱，家里人从没这么说过，是我从别的孩子那儿听来的；二是我的父亲会在我没来得及告诉他之前死去，他在我心目中就代表了全部成人世界，而我卑鄙地欺骗了他。唯一能让我解脱的方法就是跑到楼下父亲的房间，老老实实交代一切。坚毅的决心会把我推下床，带我下楼，没有一丝怯意。但到了楼下，我不仅得硬着头皮经过父亲未上锁的房间前门（房门不上锁是他作为教友派^[1]信徒的习惯），还得穿过宽阔而幽暗的客厅才能到他的房门口。我总是靠在楼梯立柱上冥思当前的种种危险，内心纠结于是否该把我的光脚丫踩到门口那块几寸宽却横亘在眼前的油布上。最终，我还是心情忐忑的站在父亲床前向他坦白我的过错，最后他常常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要是一个小女孩说谎后，她会为此不安得睡不着觉，我会感到很宽慰。”我既没要求，也没有得到任何赦免，但显然这种将我的罪恶感

向人倾诉，或是在严肃告诫下所暗藏的那份慈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因为谈话后我总是如小狮子一般大胆地回床睡觉，即使不是因为公正，至少也是因为心理上的慰藉。

我现在回想起的这件事一定发生在我7岁之前，因为父亲当天谈生意所在的作坊是在1867年关闭的。作坊坐落在邻镇，与贫民区相毗邻。在此之前，我一直用一个乡下孩子的羡慕眼光来看待这座约有一万人口的小城，而我从来没想到过小城的街道并不会像其他有光鲜亮丽的玩具店和糖果铺的街道那样令人着迷。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贫穷以及它所隐含的肮脏，并体会到了乡村的极度贫困和一个小城市即便是它最破旧的街道上所表现出的贫困之间的微妙区别。我记得问了父亲一个恰如其分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住在这些挤在一块又可怕的小房子里？他向我解释了以后我言之凿凿地宣称，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有一所大房子，但它不是建在其他的大房子中间，而是建在这些可怜的小房子里。

因为“老人充斥着童年生活”，小孩子总是表现出想要延续世事的奇怪责任感，我记得自己就有过这样的荒唐表现。我一宿一宿地做梦，梦到全世界的人除了我以外都死了，而我背负着制作马车轮子的责任。村子里的街道一如平常，铁匠铺就在“那儿”，锻铁炉上冒着熊熊火焰，铁砧还在门旁的老地方，可一个人都不见。他们都去了山上的乡村公墓，而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在这荒芜的世界活着。我总是站在铁匠铺里一个固定的位置，默默地想着要怎么开始，尽管我知道要让世界重新继续运转必须至少做好一个轮子并启动一些东西，可我一次也没有成功。我想，每一个恶梦的受害者都被过度的责任感和担心不能尽自己所能完成工作的恐惧感所压垮；也许在我这些不断重复的梦境中的确需要“一个世界守护者”，这无疑是一个由儿童版《鲁滨逊漂流记》和村里那些基督再临论者的末世预言组合而成的产物。第二天早上总能看到我这样一个柔弱的六岁小女孩，因脊柱弯曲佝偻着身子，站在村里铁匠铺的门口，紧张地看着健壮的，穿着红汗衫的人干活。我会尽力观察，把如何做轮子

的每个细节记在脑子里，有时候我还会鼓起勇气多问一些。我会问：“一定要把铁放到水里这么‘嘶嘶’的么？”同时想着这么做得多吓人啊。和蔼的铁匠回答：“当然，这样能使铁变得坚硬。”我重重地叹口气走开，尽力担负起我的责任，当然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儿，因为“梦中吹来的风”所带来的负担太过神秘无法与人交流，尽管与此同时一个人单独承受这个负担还是过于沉重了。

我对父亲的无比崇拜和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总以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两三年间的数个礼拜日，总有几个陌生人会到村里的主日学会造访。有些“陌生人”在孩子圈之外，但他们的近距离接触总能令孩子们感到兴奋。父亲站在教堂左手边靠近讲坛旁的角落里给一大拨人讲圣经，他穿着周日用的双排扣大衣，漂亮的脑袋从人群中高高抬起，他是主日会上最威风一个人，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我想象那些陌生人一定会对这样一位高贵的人充满敬意，我也由衷祈祷那个相貌难看、走路内八字，头因驼背而不得不歪向一边的小女孩绝对不要被认出是这位美男子的女儿。为了使这种联系建立的可能性降低，即便和父亲每周日一同行走意义非凡，我也没有与他走在一起，而是紧紧靠在我的叔叔詹姆斯·亚当斯身旁，希望别人误以为我是他的孩子，或至少通过这种疏离，让别人无法找到我这只丑小鸭和她仪表堂堂的亲人之间的联系。我叔叔自己有许多孩子，他一定会对这少有的关注感到有些惊讶，但他只是亲切的看着我说：“‘今天’又跟我一块儿走？”“是的，詹姆斯叔叔，求你了。”我恭谦极了。很幸运，他从来不探求我的初衷，我记得父亲也从没有，所以直到这一刻为止我的计谋还可能从未被识破过。

想要对儿童崇拜感情的表现形式作出解释是很难的，它们非常感性，又不合常理，与想象中的事情交织在一起无法辨明。我一想到“陌生人”要是知道了英俊的父亲有这么一个平凡的女儿就感到无法忍受。但即便我有骑士般的愿望想要维护父亲的形象，我还是会因让叔叔做出这般牺牲感到不安，尽管当我想到这种对比并不强烈，且他自己的小女

儿也“没那么漂亮”时心头会宽慰一些。我不知道我常常会想着自己的外貌，除非它极不协调地闯入我父亲的生活，而且尽管反复表明与之相反，还是会有那些可怕的时刻，我会推测他是不是也同样不在意我的外貌。所幸这个幽灵在长成心头病态的常态之前被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抚平了。有一天我碰到我父亲从邻近的城市一条大街上的银行走出来，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社会和商业的大漩涡。带着点俏皮的夸张，他把那顶高大闪亮的丝质帽子高高举起并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如果他不做这个动作，那么一大群“陌生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完全没必要这样来表明身份。而这种高调的公开相认，一下子使我感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可笑。可能在当时看来还没有它实际上表现的那么荒谬，但至少看起来已经足够把这个想法摧垮，或者被丢进遗忘幽灵的地域边境里去。

我还用其他几乎一样奇怪的做法来表达我像小狗般忠诚的感情。村口那栋房子是我出生的地方，在搬去赫尔大厦之前，那里一直是我的家；童年时，房子对面有两个父亲的作坊，只需穿过马路和一小片草坪就能到；其中一个面粉作坊，附近的农民会把各种谷物带来加工，另一个是锯木场，天然的木料被锯成可用的木方。在锯木场里，你可以坐在一根木头上兴奋的看着它缓缓靠近嗡嗡作响的锯片，一下子被锯成木板，然后在最后那一刻赶紧逃离以免遭受同样的下场。但面粉作坊更惹人喜爱。里面到处都是我们所迷恋的那些昏暗而充满粉尘的地方，四处都散落着罐子，可以给我们玩过家家的游戏；那还有一个地下室，里面有成堆的麸皮和磨的细如沙粒的麸粉，只要作坊工人同意，我们就用磨坊引水槽的浇水壶把边上一圈麸粉弄湿，这样就可以像沙子一样在里面玩耍了。

作坊与父亲活动的联系更增添了这种梦幻色彩，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无疑全神贯注以他为中心，模仿他的行为举止。通常来说小女孩应该学习母亲的行事方法和习惯，可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父亲直到

我八岁那年才再婚。

当时我特别想有一个作坊工人那样的拇指，然后心满意足地坐着，在小麦被拿去放在一长串神秘的木桶做成面粉之前，用拇指和其他手指摩搓着从磨石间掉落到地上的小麦，我觉得自那时起再没有比让自己的右拇指变得和父亲的一样更令我渴求的了，他的拇指因早年的作坊生活而变得粗糙不已。有时，我被这个结构性变化的缓慢进程弄得有些灰心丧气，就会采取一些极端方法确保手背上出现磨石工人手上都会有的紫红色小斑点。父亲手上的印记变得模糊了，但仔细找还是可以看得见，我对这些印记渴望之极，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获得。即使在房子或院子里玩耍，我还是可以分辨磨石滚动的声音，作坊发出隆隆声，然后停下来。我会立刻放下几乎所有玩乐，马上冲向作坊，把小手伸到磨石附近，希望作坊工人手里的凿子弹出的坚硬火石能在手上留下那渴望已久的记号。我曾有些生气的责怪我那德国的作坊工人朋友费迪南德，因为他“尽量不伤到我的手。”但他轻蔑地回答说就算他想也不会去弄伤我的手，更何况这双小手在作坊里根本没什么用。我讨厌他的玩笑，但我也从没勇气坦白我的真实目的。

这种礼赞一般由爱而生的真心模仿，我希望后来是以较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在此之前全都是发自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毫无保留地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白手起家之人毫无保留的敬仰之情。我着迷似的为父亲很久以前还是作坊学徒时候的艰辛岁月感到担忧。我知道他现在依然每天三点准时起床，因为在之前的许多年里，他在作坊一直是临晨当班。如果碰巧我也在这个时候醒来——很奇怪地，我经常在这个时候醒来——我会想象他在清晨的微光中，在叔叔的旧作坊里一本一本，从《独立宣言》签署者的传记开始，遍览村图书馆的藏书。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也就那么几本用牛皮做封面装订起来相同的书，我下定决心自己也要把它们全部读一遍，试着像父亲一样去理解生活。事实上我后来开始在晨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阅读，但我只是被那些书中编年体的有趣

观点和早期传奇的表现手法所吸引。即便读了教皇翻译的《伊利亚特》，和之后屈莱顿^[2]翻译的《维吉尔》，也没有带给我带来所期待的智慧。我最终放弃了它们，用一本厚厚的《世界历史》来寻求快速和简单的学习途径。

尽管我总是不断地向父亲告解我的错误和困惑，我记得只有那么几次得到了他明确的建议或忠告；但毫无疑问，我真的忘了一点，和许多寻求建议的人一样，我总是乐此不疲地陈述完自己的境遇，却根本无暇顾及别人提出的建议。但我的确记得其中一次忠告。当时我八岁，穿了一件比从前所有衣服都华丽的新斗篷，站在父亲面前希望得到他的肯定。但他的评价让我感到十分失望，他说这的确是一件漂亮的斗篷，但比主日学会里其他小女孩穿的漂亮太多了，所以他建议我穿那件旧的，这样一来可以保暖，二来也不会使别的小女孩感到不舒服。我遵从了父亲的要求但担心自己内心并不认同，自我牺牲让我一点都不舒服，我在父亲身边闷闷不乐地走过乡间小路。然而我脑子里却转个不停，被人类永恒的不公平问题所占据。直到教堂门口我才鼓起勇气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父亲说，人们不可能像衣服那样解决不公平的问题，但人们可以在比衣服重要得多的事情上得到公正待遇，比如我们去学校接受教育，去教堂获得信仰，以在教堂里衣着光鲜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这会让教堂都难得公平。

之后不久我和父亲就宿命论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我幼小的心灵。我把遇到的困惑摆在他面前，然后抱怨自己搞不懂，可我的好朋友却“完全了解”，我专心致志的听他怎么论证解析，相信他一定可以把这事儿分析得透彻明白。出乎我的意外，他说他怕我和他都没有那么聪明的脑子可以很好地理解宿命论，还建议我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这倒让我很欣喜，因为对我和父亲在思想上能平等对话真的可以让我很兴奋。他接下来又说到了另外一些东西却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印记，他说是不是能理解宿命论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一定不能不

懂装懂，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在内心对自己诚实。也许总体来说这次短短的对话就成了宝贵的一课。

这次关于信仰的对话使我又想起随后几年我在寄宿学校中受到福音派^[3]的压力的时候同样会求助于父亲，然后我又一次会听到他支持“心智健全高于一切”的训诫。

一次我和父亲驾着马车经过一片树林，那里冬天会有很多伐木工人的身影。我们两个聊得异常投入，他突然勒住马缰绳，竟认不出这是在哪儿。我们两个都被这件事逗乐了，我觉得父亲居然会在“自己的林子里迷路”，各种各样的木材瞒过了他久经历练的双眼，而他则沉浸翻涌澎湃的思绪之中。我们兴致盎然的从到处都是嫩绿树叶的春日林子里驶入布满日光的一片开阔地，当返回大路后我斩钉截铁地问他：

“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别人问起你会怎么说呢？”

他眼神微微一亮，严肃地答道：

“我是一个教友派信徒。”

“但这也太笼统了”，我继续追问。

“好吧”，他说，“对那些追求细节的人来说，比如我眼前这位，我会说我是美国教友派信徒”；关于这个严肃的话题，我再没从他那儿问出什么来了。

早年的这些回忆铺陈在一幅乡村美景的幕布之上，至少在伊利诺伊州这是不多见的。围绕着村子周围的草原外是一座座小山，其中一座小山上种满了松木，那是我父亲用满满一袋红松的种子在1844年播种长成的，那年他刚来伊利诺伊，这大概也说明了即使是最具活力的开拓者偶尔也会考虑到美。流过作坊的小溪旁，岸堤蜿蜒而上形成十分陡峭的悬

崖，没有点技巧绝对爬不上去。山上还有很多山洞，其中一个漆黑一片，必须借助蜡烛才能进洞探险。还有一个废弃的石灰窑，我脑子里就把它和霍桑的“石灰焚烧者”那不可饶恕的罪行联系在了一起。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和我一起一周接一周地游玩探险，甚至玩过了一个又一个夏天，只有地域开阔的农村孩子才可以这么玩。相对而言，城市孩子这方面就比较可怜了，好象我在赫尔大厦附近看到的，他们在马路边的玩耍总是会受到干扰，所以他们的玩耍没有连续性，他们精心谋划的“计划和愿景”或是“梦里人生的片段”必定被身旁的车流给无情地摧毁了。尽管他们一遍遍地重头再来，但到最后即便是再有活力的小孩也会精疲力尽，于是他们只好被动地在很小的范围里胡闹，这渐渐成了城市孩子的特点。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钟爱的地方，树木，鸟儿和花朵。想要复制孩子和自然之间建立起的联系确实非常困难，但要把这种无意识和模仿放到美学或其他任何一个类别的范畴又有些过分。当人们说紫色的风之花——银链花瓣“看起来像是由风孕育的”时，我们似乎更在意它们是在风中孕育的而不太关注它们是不是漂亮：彩虹柔和的光芒会让我们立刻高兴地拍起手来，但这快乐来源于我们半信半疑地以为在彩虹的远端会有一罐金子；在黄昏的暮色中，我们听到北美夜鹰时就会有淡淡的思愁，他有时会让我们想念，虽然不是很明确，却是认真的，而那可绝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声音好听。

我们在小溪旁搭了一个祭坛，有好几年我们把远足途中杀死的蛇放在里面，不辞辛劳——有时路途太远，我们不得不把柔软的蛇放在两根棍子中间荡来荡去带回来。我依稀记得有一年秋天我们在祭坛上的仪式，我们把精心挑选的黑核桃拿出来，再倒上满满一罐刚从仓库那边作坊里酿好的新鲜苹果酒。整个过程是那么肃穆，这大概是源于小孩心里感觉一种对仪式的使命感，仿佛想要表达人类属于遥远过去亲族的一种认同。

在我和弟弟到村里学校开始学习拉丁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从一本拉丁文圣经中学习了用拉丁文写的“主的祷告”，每天晚上我们阴沉地以难听的发音背诵它，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更多的是宗教思想而不是“普通的英语”。

然而当我真正祈祷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最最令人吃惊的画面，那是主日学会歌本里的一幅插图，图画里上帝坐在他的御座之上，被一圈圈的圣者和天使包围着，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片淡黄之中。我愧于说起直至何时，这些画面才不再浮现在我的眼前，尤其是害怕和恐惧迫使我像上天寻求保护的时候。

我记得十分清楚，第一次直面死亡是在我15岁时：波莉是一个年迈的护士，她曾照顾我母亲，之后跟着母亲来到伊利诺伊州的边境帮她照看下一代。她一直住在我们家，但每年会去北边几英里的农场探望她的表亲。一个周日晚上，在她去探望表亲之后，传来了波莉快死了的消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我可以去看她。我不得不从明亮而温暖的家中穿越令人迷失的暴风雨赶到四英里外，本已很高的雪堆不断加厚，我怀着重大的使命感上了路。我到那儿一个小时以后，波莉表亲一家都下楼吃晚饭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照看她。孤零零的农场，屋子里的房间方方正正，样式老旧，里面又冷又静，只有外面的暴风雨声呼呼作响。突然，那巨大的变化发生了。我听见一声微弱的呼喊，“莎拉”，那是我母亲的名字，波莉垂死的眼睛看着我，紧跟着传来一阵奇怪的呼吸声，那张我幼年熟悉的，总伴随着操持家务形象的脸被枕边陌生而庄严的形象所取代，她看起来十分坚毅，已经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完全脱离出来了。我感到异常孤独，在无情的世界面前无所依靠，小孩在自然力量前的胆怯，15岁时还远未成熟的心智把我死死钉在那儿，好一会儿我才走下狭窄的楼梯去叫楼下的人。

当我在冬日的暴风雨里被送回家时，树林间的风仿佛满载着路过的

灵魂，生死之谜重重地压在心头；年轻，变老，死去，世间万物都是如此，然后开始一段未知的神秘之旅。她会介意一个人远行吗？那段旅程会像尘世间的生老病死般终结吗？在连夜赶路时，这些想法被深深的担忧所渗透，我有一种背信弃义的感觉，因为她很久以前向我倾诉说她希望神父如何在葬礼上的布道致辞，而我把它忘记了。像往常一样，我从父亲那儿得到了安慰，他告诉我什么是最本质的，人在这种时刻往往无能为力。当他在死亡主题上聪明得有些武断的时候，我却感受到了一种与父亲之间全新的友谊，因为我和他能一同讨论如此深刻的话题。

或许我该写下人们时常尽可能不让孩子和年轻人受到死亡和悲伤的侵袭，并假设当生命中的不幸即将降临时，他们依然可以享有幸福快乐时光的那种不满。年轻人也会将这态度反馈给长辈；他们感到被晾在一边，微不足道地被拒在寻常人的感情经历之外。年轻人也想要经历人生的坎坷，也渴望以泪洗面，他们想象着如果可以亲历这些重大的事件，悲伤时刻那压在他们心头关于人存在的问题也会变得容易解决一点。

在此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依旧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可辨，那是伟大的道德和庄严事业给我带来的启示。1872年的一天早上，还未满12岁的我跑到父亲的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报纸坐在火炉，神情肃穆；在我的不断追问下，他告诉我约瑟夫·马志尼^[4]去世了。我以前从未听过马志尼的名字，在了解了这个人之后我便心生猜想，我确信父亲并不认识他，因为他不是美国人，于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为他感到难过。我想不起来我那些站不住脚的推论在对话中是怎么被彻底击溃的，但最终我得到了视之如宝的东西，那是一种真实的纽带关系，它可以存在于拥有共同希望和理想的人之间，它不分国籍，无关语言，跨越信仰；而这些东西在想要废除美国奴隶制的人和推翻意大利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人之间是毫无意义的。不管怎么说，我真为我对爱国主义的无知感到羞愧，我跑出房间，为能真切感受到客观且跨越国境的联系并非说说而已而感到无比兴奋。我父亲与远隔重洋的伟人有精神交流，并为发生在他身上事

的感到悲伤或快乐，我为我父亲感到骄傲。我再也记不起与父亲早年的谈话，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但勃朗宁^[5]夫人（英国诗人）的一行女儿描述其与父亲关系的诗句在我脑中浮现：

“他用他宽大的男式马甲^[6]把我包裹起来，也不管它合不合适。”

注释：

^[1]教友派（Quaker）：又称公谊会或者贵格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

^[2]约翰·屈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17世纪英国杰出诗人，英国古典主义奠基人之一。

^[3]福音派（evangelical）：基督新教的一个派别。

^[4]约瑟夫·马志尼（Joseph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作家、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重要人物。

^[5]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Mrs. Browning, 1806-1861），又称勃朗宁夫人或白朗宁夫人，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

^[6]马甲（Doublet）：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男子穿的紧身上衣（或背心、马甲），有时带短小摆。

第二章 林肯的影响

我想内战时期出生的孩子对童年的回忆肯定与现在的孩子截然不同。尽管林肯去世的时候我只有四岁半，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天我们家两根白色门柱上的美国国旗旁边有黑色旗子为伴。我急切得想要跑回去问它们为什么“会在那儿”，在粗糙的砾石路上还拌了一跤。我惊讶地发现父亲满脸泪水，这在以前我可从没见过，而且像大多数小孩一样，我认为大人是不会哭鼻子的。那两面旗子和父亲的眼泪，还有他对这世上最伟大人物离世所说的那番感人至深的话，一起构成了对我的启蒙和洗礼，使我对家门外的世界产生了令人激动而又庄严的兴趣。孩子们接触内战的方式多种多样：我记得有一本雕刻的花名册，抬头处印着“亚当斯卫队”的字样，美国的鹰徽呈拱形布列在上方，老鹰紧抓着许多旗帜，这本名册一直挂在客厅里。小时候我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上面的名字。我们要搬个凳子，然后放上家里的《圣经》，上面还要再叠几本字典才能站上去看到名册上镌刻的字。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字典垫在上面，以免我们的脚会亵渎到它，但站在《圣经》上总会让我们产生对上帝敬畏的紧张情绪。当我们的手终于可以碰到名册时（幸好名册是上釉的），我们把“战死沙场”和“凯旋而归”的名字挑出来，又从后者挑出哪些人的小孩是和我们在一个学校的。如果要出去，我们会说：“让我们来领路”，这样我们就会路过一个战士曾经生活过的农场；如果要赠送花园里的鲜花，我们就会把花儿送给在“亚当斯卫队”名录里所记录英雄的母亲们。要是客人对墙上的名册感兴趣，他立刻会被热心的孩子们带到对面窗户旁边的一幅戴维斯上校的小画像跟前，领略这位骁勇上校的风采。对这位独臂军人画像的介绍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严肃的仪式，客人们听一会就有点厌倦了，但我们还会接着诉说这位当地英雄直到牺牲前都一直冲在部队最前头的事迹。我们非常喜欢跟一位和

蔼的老太太说话，她住在北边一英里小镇的农场房子里。她是村里英雄汤米的母亲，她时常告诉我们她在1862年春天里她所经历的漫长焦虑；告诉我们她如何日复一日得等待儿子能从医院里回来，她每天都把雪白的粗布床单晒干，把狭小的卧室悉心准备，随时准备她儿子回来。那是道格拉斯要塞之战之后，汤米负伤被带到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医院；他父亲到那去照顾他，由于情况每周都在恶化，一直这么下去他肯定将不治身亡；但部队繁文缛节实在太多，事情搞得很复杂，没法获准遣返回家。最后医院的外科医生私下劝他父亲应该悄悄地把他带走，都伤成这样了，应该没关系。当他们告诉汤米这件事的时候，虚弱之极的他眼中竟闪出了光芒，他说：“不，长官。如果我不能从前门出去，我宁愿死在这里。”这之后所有医院里的人都去为这件事奔忙，两周后汤米终于光荣退伍了。当他回到家时，母亲看到自己的儿子面容如此苍白且变化极大而感到无比心碎。她告诉我们他儿子回来以后漫长安静的日子里，她会开着窗子让垂死的儿子可以从果园的斜坡上看到草场，他的弟弟们在那儿收割早熟的干草。她说那段日子里他儿子学会的朋友们都会成群结伴来看他，他们是公认的头儿，他们挤在小房间里言辞激烈得热切讨论着爱国主义，三个月后学会基本荒废了，一群新的伙伴在秋天行军而去，带走了汤米的第三个弟弟作为鼓手，当时他只有17岁，还没到可以作为正规军的年龄。她回忆起那之后更加黑暗的日子，欢快的鼓手被投入了安德森维尔监狱，于是她一点点地学会顺从接受，至少汤米在家中的安详平静的墓地里是安全的。

不管我们谈论多少次战争英雄，当我们靠近一座只住了两位老人的偏僻农舍时总会安静下来。他们的五个儿子在内战中应征入伍，只有最小的儿子在1865年春天活着回来了。而就在那年秋天，当他到小农场里一片高低不平的沼泽地里打鸭子时，却遭遇了意外的枪击而亡。于是只剩下两个老人艰难地生活，尽力用已荒废近半的土地养活自己。当我们路过这充满绝望的小农场，我们总是会把响亮的童音压低，好奇地小声议论这意外怎么就发生在了活下来的这个儿子身上，他可在战场上躲过

了那么多劫难啊！我们幼小的心里第一次涌起了对瓦尔特·佩特^[1]所谓的“人生无法解释的缺陷或不幸”的不服；虽然我们也隐约联系到了人类本身的错误行径，也为此难过，但我们更为事物本身的悲痛感到心情无比沉重。

生活这么早就让我体会到它最顽固、最难解的迷，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我尤其需要建立起一种普遍联系，它能引领我去认识难以理解的不公正及由此我们所有人都得去被迫承当的重负，而对此我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我儿时对林肯的崇拜与一次对战鹰的造访密不可分，大多数小孩子都知道被称作“老艾伯”的战鹰在威斯康星州首府，距离我们家以北才65英里，这点距离一只老鹰可以轻松飞越。老艾伯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跟随威斯康星第八军团，如今他独自在州府大楼里安享光荣退役后的岁月。

许多次我们站在距离神秘的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分界线仅12英里的果园北端尽头，急切地扫视着深邃的天空，希望能看到老艾伯越过我们的苹果树梢向南飞去，因为他肯定随时会从他的守卫的眼皮底下逃脱，守卫虽然以前是哨兵战士，但总会有睡着的时候，我们兴奋的在纯净的天空中寻找着一个又一个小斑点。虽然他从没有飞来看我们，但一件更不可思议事情发生了，我们居然要去看他了。

我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出发了，两个快乐的小孩跟父母一起坐家里的马车去，同行的还有一个大姐姐，她刚从寄宿学校回来，有什么想知道的我们都会去找她。车子一路向北行进了好几个小时，经过一片片收割后的麦田，麦茬泛着古铜色和金色的光，饱满的麦穗被一捆捆扎起来随意地放在田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威斯康星州首府，这片山湖环抱美丽地方。

但尽管安详端坐在高处的老艾伯像极了一枚被高悬起来的罗马鹰徽

章，尽管他曾经的守卫穿着旧军装准备回答我们所有问题并给我讲述老艾伯在三十六场大小战役中毫发无伤的故事；这趟旅行真正给我感受最深的时刻却直到后来才出现，这也再次说明当孩子无法理解与之相关的真实事物时，他们总能很快的理解象征含义。

去造访这只久经沙场的战鹰本身就象征了对萦绕于年轻人心里的英雄主义和完美主义的探寻。当我站在老艾伯所处庄严大厦的巨大白色穹顶之下，有一瞬间我感到这次探寻得到了回报。我隐约觉察到自古以来人们付出艰辛所想要传达的东西——将空间设置在如此神圣的外形之下，让人向往忠诚、怀揣希望。我所看到的第一个穹顶环形边缘的确给我带来了战士们为自由而战的强烈感受，英勇的开拓者们向西部进发在一个个独立国里建立自治政府。以前只有雄伟的圣彼得圆顶才能如现在这条朴实的弧线一样紧紧抓住我的心，它从无限的空间凝缩到缩小我的脑袋里，我尚不能理解的勇气和坚韧不拔在“空虚无为空间”中迷失，流入苍穹。在我全部生动的感悟中，走廊下的老鹰的形象，还有林肯本人都作为伟大和正义的象征贯穿始终。我隐约感受到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总统所承载的国民道德良知，正如同战鹰所代表的威斯康星军队的英勇无畏一样。

35年后，当我站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的山坡上，俯瞰城市对面相隔一英里的州府大楼时，又一次看到了童年让我振奋的圆顶。此刻威斯康星大学迎来她的十五华诞，我也顺利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在完成学业并斩获快乐之时，穹顶又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它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抱负和教育承载的伟大使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的孩子听到大人对勇敢者牺牲生命或许能使奴隶得到解放的描述，都以孩子般的纯真感受到了不朽的英雄主义观念。长辈们的对话随时都会转到这些英雄事迹上；遇到礼拜日，某位将军或是伊利诺伊州孩子都知晓的“迪克叔叔”——奥格列斯比来拜

访我父亲时，大家就会坐在前院的松树下聊上一整天。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感受到和外部伟大世界的联系；这一联系如此崇高，其意义远比我们过往一直深陷其中的乡村生活。我父亲在1854年到1870年的16年间担任州参议员，即便我只是个孩子也隐约感受到了他为公共事业来往于州首府间的庄严步伐。

他忙得都没有时间去怀旧，但我记得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他和一个访客谈论起战前激动人心的日子，那时联邦政府的立法者们也无法确定能获得足够多的选票使伊利诺伊州得以独立。我饶有兴趣的屏住呼吸听父亲对那次行程的描述——立法者们制造了圣路易斯的“黑暗一日”，由于法定人数不够而无法进行表决，重大问题未能通过投票得以确定，这样便使得联邦政府的立法者重新赢得主动。

父亲总是谈及有牺牲精神的林肯总统，我每次听到这个伟大的名字都会激动万分。我记得那相对闲暇的一天，大概是个礼拜日，父亲在我的央求下从桌子里拿出一个写着“林肯先生信件”的小包裹，简短却无可辩驳地承载着伟人不凡的品格。信的开头写着：“我亲爱的名字里有两个D的亚当斯”（一般拼写的是Adams，而这里是Addams），信里询问了对方是否会在当时一项立法决议里投票支持某个决定，并表示他肯定知道这位亚当斯“会按他的良心投票”，但他请求能知道这良心“所指的方向”。我父亲合上信之后，我凝神期盼，当然希望他能继续回忆这位他可能并不太熟悉的伟人，或者说点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辩论的精彩故事就更好了。父亲的房间里至少挂着两幅林肯的画像，楼上旧式的会客厅里也有一幅，画的是林肯和小泰德。由此种种，我总是会把林肯和我对父亲最温暖的思念联系在一起。

我想起1894年夏天的一段大动乱时期，当时芝加哥到处都是联邦政府总统派来的军队，州政府对此十分反感。由于声援罢工路上都没什么车，我拖着疲惫的步伐从赫尔大厦走到林肯公园，想去看一眼建成已久

但最近才安放在公园入口处令人惊叹的圣高登斯雕像；如果可以的话，也想籍此从雕像获得一些宽慰的忠告。林肯的一些不朽名言被镌刻进雕像脚下的石头里，当时那些处于混乱中的城市没有哪一个比芝加哥更如此迫切的需要“世人心存宽厚”的救治，以及抱有仁爱之士对“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克制。

1881年我父亲去世那个悲伤的八月里有许多描述父亲生前事迹的文章，其中我最在意的是他一位从政的朋友写的，当时他在一家有名的芝加哥日报担任编辑。他写道，许多历经了重大战时协议和战后令人沮丧的重建岁月的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人员毫无疑问没有接受过任何贿赂，他希望对自己所了解的事实能加以证明，而其中这个人从未向他行贿因为坏人们打心底里怕他。

现在当我回想起这番陈述觉得十分懊恼。那时为确保伊利诺伊州通过第一部工厂条例，赫尔大厦也付出努力参与其中。一些来自非正式行业协会代表告诉我，只要赫尔大厦的居民放弃对血汗工厂法案的支持（对此他们一无所知），有一部分商人就愿意在两年内出5万美元用于社区的慈善事业。很显然这是对我的行贿，记忆中的这段话将我的羞耻感放得无比巨大。作为父亲的女儿，到底是什么使得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清醒得认识到这是我自身的软弱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所以我没有对这两个向我行贿的人表现出从前那样的愤慨，而是尽可能温和的表示我们没有将赫尔大厦建成“西部最大的公共机构”的雄心，相反我们更关心赫尔大厦的同胞能否免受苛刻的工作环境之苦。然后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英勇气概，我表示如果必须要破坏赫尔大厦才能取得成功，我们必定会愉快得在她的废墟上高唱赞歌。这时那位邀请我去联合俱乐部见他这两个想要商谈血汗工厂法案的朋友过来打圆场，我们快速跳过谈论这令人厌恶的道德问题以此来避免尴尬，这类问题似乎对社交是一种束缚。

我刚到赫尔大厦的头几天有许多父亲的朋友来看望我，其中我最喜欢莱曼·特朗布尔，我常告诉青年公民俱乐部的成员就是他一直保存着《解放奴隶宣言》直到他的朋友林肯总统宣告那一刻为止。我记起某次他在赫尔大厦提前庆祝林肯诞辰的活动上的讲话，他断言林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普通人”需要付出努力才能理解他的伟大，好比林肯经过痛苦而长期努力才懂得了人民的伟大一样。有些东西是值得林肯同代人所敬仰的，或至少是那些认识他的人所敬仰的，这种敬仰与之前所形成的最真挚的崇拜或是虔诚的理解都完全不同。首先，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经历，一同开拓了西部荒野，促成了运河及铁路的建造，使得牧场原作物可以运往市场；他们也同样意识到如果这最后一次宏伟的自治试验在这里失败，将会使几个世纪愿望的落空，而要依靠他们的力量在州、郡和镇组织建立自治政府的功过则须由历史来裁决。他们和林肯一样，知道如果这宏伟的实验要开花结果，必须由人民自发投入，没有别的资本可以运用。我记得十五岁那年发生过一件事，自那次事件之后我确信了只有人民自己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父亲在一次“斯蒂芬森郡旧住民”的会议上做了一次关于回忆的演说，这个会议每年夏天在作坊旁的小树林召开，演说结合了他发起该郡农民订购西北铁路公司的股票的经历，这在郡里史无前例，也由此与芝加哥的五大湖区域建立了联系。许多宾夕法尼亚州的德裔农民对这种“全新的业务”持怀疑态度，他们觉得根本用不上铁路，更不要说建造铁路还要他们拿辛苦挣来的积蓄冒险。父亲讲述了他在一个被偏见所主导的农民社区所感受到的绝望，人们一开始根本不听他解释，但最后被一位活力十足的德国主妇的热情所感动，她愿意从购买“黄油和鸡蛋”的钱里拿出一部分入股。正当父亲在表达对那位主妇的敬意的时候，听众中传来一名老太太尖锐的声音：“我今天也在这里，亚当斯先生，如果你现在问我，我还是会这么做的。”七十年的辛劳压弯了她的背脊，虚弱的老太太被带到台前，父亲庄严得称她是“具有社会精神的开拓者，她英雄般的刚毅是这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感激的。”我被深深打动了。当时我正满怀热情阅读卡莱

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但“旧住民日”那天晚上，我惊讶地发现读不下去了。赞颂英雄“可以做到一切”，那响亮的句子突然变得不可信。之前我已经在我的摘句簿里下定决心要给25个我熟识的高尚年轻人赠送此书。也许写在本章中比较合适，我们到赫尔大厦的头一个圣诞节，尽管我还要从干瘪的钱包里留出糖果和鞋子钱，我还是给俱乐部里的男孩们25本崭新的卡尔·舒尔茨写的《品评亚伯拉罕·林肯》。

在赫尔大厦的早期实践中时候，我们充分运用了林肯的思想，倾尽全力去帮助街坊邻里。我们常常会为有的小孩感到担忧，他们跟随父母移民而来却对自己以前的穷苦生活背景感到羞耻，拒绝用长辈的母语，也不遵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并认为他们能遗忘过去是一种成功。所以每次我提到林肯作为最伟大的美国人引得他们崇拜的时候，我总是会指出他保持并运用过去经验的神奇力量；搬到城里去以后他也从不曾忘记普通桑格蒙郡人的想法和感受；这个习惯是他非凡成长能力的基石；在华盛顿他倍感困惑的那几年，使他清醒的认识到除了不能让美国人民否定自身之外，向人民靠拢才是目标所在。我有时候也大胆地补充道，没有努力和付出就不能深谙认知和理解之道，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使任何事业在具有凝聚力的美国社会获得成功。

林肯对我的激励和启示于多年前当我在英格兰时得以体现。我曾在牛津待过两天，陪同我的是阿诺德·汤恩比^[2]的一位老朋友，来自圣约翰大学的西德尼·波尔，他与我们在社区睦邻运动开始期间所熟知的学者团体联系紧密。在这里很容易能汲取托马斯·希尔·格林的哲学思想，了解罗斯金的筑路事件，获知在东端由弗雷德里克·莫里斯所作的生活试验，还有爱德华·丹尼森开办的伦敦工人学院，这些都是大学里的能人志士为以后建立汤恩比服务所^[3]打下的基础。我自然对运动早期“回归人民”的标语很感兴趣，睦邻中心毫无疑问是它的一个象征。然而在我看来原本可以从东伦敦居住穷人身上极易获得结论的过程，却如此繁复和曲折。不管对于阶级敏感的英国人来说这些过程如何无法避免，这

看起来都像是对美国西部的一次效仿，那里的社会从乡村社区而来，早年的开拓者生活不可能产生社会阶级的区分。我总担心美国的社区睦邻运动会变成对英国的重复和模仿，我只赞同从英国社会运动的阅读中所了解到的那部分认识，而大部分则以美国乡村旁观者的身份给予点评。

作为美国人我为什么要对一群牛津的学生感到崇拜呢？只是因为他们修了废弃的路，在罗斯金的教导指引下去建立更美好的生活？自尊自重的美国公民每年春天都会整修所有的乡村道路，他们还运用民主政治所产生的简单理念来修建公路。即使我不安地想起某次春天我被融化的积雪淤泥困在美国人民所建的公路上，我也没有在这情绪高昂的时刻为此感到好笑。我一直摸索着想要找到一个两者的综合体，但没有成功，最终我发现自己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这感觉令人不舒服。在牛津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几乎在是双重意识的引导下去参观了贝利奥尔大师^[4]的画室。我在一两年前曾读过爱德华·凯尔德的《宗教革命》，它不可言喻地帮助我区分了伦理教育和宗教教义的不同，这在我们拥有很多移民的社区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当时非常想要亲自问问作者，想要让形形色色的人有相同的道德品质和相似的行为准则得报以多大的期待才算合理。我小心翼翼的想要把他的研究方法应用到那些挤在陌生廉价公寓里的思乡移民身上，我似乎从他们身上察觉出一种现实的信仰，或者说是在许多紧急情况下所产生的广泛的人道主义；就好比一户人家的孩子，由于母亲已经去世，出于突然的需要他们会别扭的行使各种职责，笨拙的互相安慰，可幸福家庭的孩子是绝不会想到需要这么做的。也许凯尔德可以告诉我在这互相依靠的命运中间，在这绝望地方流浪者的忠诚里是否有信仰的存在。

下午茶结束后我终于有机会和主人谈话，我突然毫无来由的只记起了凯尔德先生两年前一次讲座中对林肯的精彩分析。

对林肯的记忆，他的名字，如草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我原本

并不十分情愿深入的学术思考。这位哲人说，伟大的美国人民“挖掘了乡村生活可以遵循的道德河道便心满意足了”，我慢慢找到了牛津的学术与道德观点的自然联系，后者确保了能够发现新方法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在此起彼伏，永不停息的正义和压迫之间，我们必须尽力挖出这条道德河道，让它在潮起时能浇灌人生的贫瘠。

渐渐的，一种具有治愈感的幸福包围了我，我对我的视而不见感到有些小小的懊悔，因为我意识到即使林肯身边的乡村人民对他伟大的理解都不如这位牛津学者来得深刻，每一次为人类平等所做的有效尝试背后都蕴含了洞察力，智慧和崇高的动机；我想起了另一位贝利奥尔的大师，乔伊特^[5]本人曾说过，每个时代能有几个思想家是社会之福，比如阿诺德·汤恩比，“时刻为人类明显的不平等感到忧虑”。英美两国的社区睦邻运动肯定会在这些忧国忧民的思想中汇合。

这次对牛津大学的访问在我回来后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反映在了我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学院所写的论文里。开头这样写道：

“定居”一词是从伦敦引入的，很恰如其分得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毕竟不久之前美国人也刚克服周遭的重重困难开拓了一片新的疆域并定居下来。这个词也表示从生活的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而正是这引起了美国居民的警惕。他们不愿意承认美国被分为两个国家，就好象总理曾对英格兰那样。我们公然表示不愿意去假设美国公民被分成不同阶级，即使这种假设的前提是上层阶级对此等阶级负有义务。我们的民主制度依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反对一切对它的损害，即便打着慈善的旗号。

不正是林肯为我们指明了民主的方向吗？他一劳永逸地建立了平凡的民主政府，将它与普通人的错误缺点紧紧联系在一起，至今仍是美国对世界道德生活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注释：

[1]瓦尔特·佩特（Walter Peter, 1839-1894）：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思潮代表理论家。

[2]阿诺尔德·汤恩比（Arnold Toynbee, 1852-1883）：英国19世纪的著名经济史学家。

[3]汤恩比服务所（Toynbee Hall）：社区早期型态之一，由巴纳特（Samuel Barnett）于1884年所创立。之所以取名汤恩比，是为纪念献身社区运动而英年早逝的牛津大学讲师汤恩比（Toynbee, Arnold）。该服务所主要的内容是解决工业化以及社会化所产生的新兴问题，特别是贫穷问题。

[4]贝利奥尔（Balliol）：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是牛津大学最著名、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以活跃的政治氛围著称，曾经培养出了多位英国首相和其他英国政界的重要人物。

[5]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 1817-1893）：英国学者，古典学家和神学家。19世纪不列颠最伟大的教育家。

第三章 寄宿学校时期的理想

由于我的三位姐姐在我17岁时已经在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读书了，父亲又是那边的理事，所以我自然也就去了那里读书，而此前我只在乡村学校学过点少得可怜的拉丁文和代数。尽管我很清楚父亲对我的教育理念是尽可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念书，但我还是非常向往能去上史密斯大学，然后出国留学，而不考虑去东部学校就读的可能。刚在欧洲呆了一年之后回国的姐姐对我触动特别大，而此刻我也对枯燥乏味的罗克福德开始感到十分失望。但想家的几周过去后，我就变得非常享受寄宿制学校为学生所营造的小小世界。

1877年，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还没更名为大学，尽管当时大多数有大学学历的教员和女校友都期待能更名，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她们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该校从一开始就被称为“西部的曼荷莲女子学院”。

这所先驱学校不但体现其卓越的传教精神，而且早期毕业生当中也和曼荷莲女子学院一样出了很多传教士。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早期西部学校的创立者和荒野疆土的开拓者，而且早期的学生会有一种英雄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并对时间加倍珍惜。这样便不可避免的形成一种紧张氛围，一股由此而产生的狂热筹划热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终止；而后来的女孩子们在建学校和其他设施时也接受了这种方式，除此之外她们别无选择。

此外，在学校里总是有大大小小的女孩团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坚持尽力完成它所赋予的使命。我们早年的学习似乎受到了博斯威尔^[1]在《约翰逊传》里引用了亚里士多德一句话的影响。我们还把这句话高挂在象棋俱乐部的墙上好几个月，希望仅是出于对这两个重要名字的敬

意；至少基于我对人类天性的足够信心，我敢说我们从没有真正相信过这段话，它说“有知识的和没有知识的区别就好像生与死的差别一样巨大。”我们也喜欢引用卡莱尔^[2]的话，大意是“亚当最穷苦的子民内心所期盼的并非是贪图安逸，而是要去做崇高且实在的事情。”

当我通过阅读大量典籍，试图以此重建自己小组的精神时，我发现没有什么能比感叹生活的无望更有趣的了，或多或少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内心的写照。至少写出来，如果没有什么启发意义，也可以博君一笑：“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准备，做常规工作，睡觉，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经验。”但我们没有乖乖接受对某个事物的看法，因为我们想尽办法来冲破愚钝。

有一段时间我们五个人想要以更为呼应的方式来理解德·昆西^[3]奇妙的“梦”，于是我们通过服用麻醉剂来麻醉自己。整个悠长的假日里我们时不时都吸食一点这些白色的粉末，可惜“心理的重新定向”并未出现，而焦躁和兴奋却让我们毫无睡意。在某个怪诞的午后四点，一位我们视为知己的年轻教师对整个事件产生了警觉，她带走了我们的“德·昆西”和余下的毒品，给我们五个想要同情和理解整个人类体验的学生灌下了催吐剂，把我们关入禁闭室，并用只在晚餐后家庭礼拜时才用的严厉话语训问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

我们只要有就会拿宏大的主题来写作，通常与希腊人有关，因为他们是最能激发想象力的。我在青年展演上的希腊语演说稿撰写让我无比痛苦，写完我还把它拿给贝洛伊特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去看以确定没有什么错误，后来这篇稿子获得了罗克福德大学的老师和镇里众多博学教士的一致认可。这个关于柏勒罗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科林斯国王格劳科斯的儿子）和他战胜喀迈拉（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的演说认为社会弊端只有用高于它的理想主义才能得以战胜，正如柏勒罗丰骑上带有飞翼的珀伽索斯（希腊神话中生有双翼的神马）才能杀死地上

的恶龙一样。

女子大学里根本没有开设经济学，至少在三十年前那些依然处于雏形的学校里这样的，尽管我们也煞费苦心学习了“精神”和“道德”哲学。虽然这些在课堂里的学习根本无法满足我们，但我们会在课外进行热烈讨论，这也为我们兴致勃勃的在那小小的大学图书馆里查找书籍打开了通道。我们读了许多罗斯金和勃朗宁的著作，也最喜欢其中深奥的部分；但如同那些名人在谈论他们并不熟知的散文一样，我们也从没想过把这些理论和我们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我最大的兴趣是历史，一部分是因为教授历史的老师非常出色，另一部分是因为我的父亲。他通过经济奖励的方法让我坚持学一点历史，如果我能向他机敏地说出每个普鲁塔克英雄的“一生”，他就给我5美分，而说出每一卷欧文^[4]的《华盛顿传》则有25美分。

悠长的假期开始时，我们五人小组发誓在夏天读完莫特利^[5]的整部《荷兰共和国》，或者更有雄心的话就读完吉本^[6]的整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收假后，我们中的三个人声称读完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每个人都对另外两个持怀疑态度。我们互相以毫无规律的测试来检查对方，结果不相上下；但彼此再也没有了怀疑，我们每个人都真的读过了。我们用以前撒克逊民族描述女士的“面包给予者”作为班上的箴言，班级的幸运色是罂粟花的深红色，因为罂粟花长在小麦中间，仿佛大自然知道有饥饿的地方就一定伴随着痛苦。我们肯定是从某本书中发现这个观点的，我们反复使用，最后好像成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都没去过欧洲，而大自然也只书写下了这唯一的信息。

这群充满斗志的女孩子们在烈日下满怀热情地讨论各种话题，而且她们并不止于谈论，更付诸于行动；一个嫁给了传教士的同学在日本创办的一所学校极其成功，它为居住在当地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孩子提供学习场所；另一个作为医疗传教士去了朝鲜，因为她成功治愈了皇后，

被封为了御医，这件事在当时的外交界和传教界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还有一个成了一位具有非凡能力的盲人教师；更有一位自由主义的先锋，很早就参与了“将书送到人民手中”的运动。

这些早年的友谊让我明白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活动背后其本质是相似的，更为奇怪的是，教会学校里的实际工作与许多在外国人居住的区域所开展的社区运动活动并没有太多不同。在赫尔大厦的访客中最具同情心和善解人意的肯定是归国的传教士。其中有两位老太太，她们在印度多年，倦鸟思巢，回来后却又极不适应，她们说在赫尔大厦的两周是回到美国以后最快乐的时光，也最令她们有亲切感。

当然，在此氛围之下像我这样稍微有些古板的女孩是不会避开让我进入“传教界”的压力的。四年里，福音派的宣传不可避免得伸向了在学校里相对较少的那么几个“未改变信仰”的小姑娘。每天小礼堂的祷告练习以及每周的祷告会议，我们都是其中的主要对象，每次都必须到场。

尽管“静默时刻”当一个老师离我很近时我会有种说不出的尴尬，但我对所有的感化形式都无动于衷。每个晚上在这个时刻我们都需要观察体会，且从来不会被打断，即使是教职人员也不行，除非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时候我偶尔会和一个相对比较认真的年轻教师进行面谈，我非常喜欢他，有点不由自主，在大四一年里这位最具热情的教职人员和我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期间还表露了去土耳其传教的渴望，这同样让我十分心动。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对这些影响保持一定距离，一部分归功于父亲，他在所有教堂都不领圣餐，我无比崇拜他严谨的品德，还有他对个人和公共行为准则的荣誉感。另外就是我在所在的小团体所具备的理性主义，这无疑是建立在早期对爱默生^[7]作品的阅读上。因为有了这层联系，当布朗森·奥尔科特^[8]来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们都争相为他服务，因为他曾是爱默生的朋友。年轻学生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是《小妇人》作者的父亲，这点让我们感到很可笑。我记得一次我怀着无比狂喜

和无限激情帮他把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沾到厚布鞋面的泥土给弄干净了。

但我认为自己对福音派布道的消极情绪另有原因。我在中世纪历史中读到的一些有趣东西似乎让我特别着迷，那是种将学习，虔诚的行为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理想，波尔罗亚尔信徒^[9]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我想大概唯一能让我隐约体验到“神圣之美”的时刻是每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那会我会走进一间极其整洁的屋子里跟希腊语老师一同从一段希腊圣约开始朗读。我们每周日的朗读坚持了两年。这不能算是一堂课，因为我从不准备，当我被语法难住的时候，我可以自由翻译，而这在第二天早上读荷马的课上可不行。我们也不讨论教义，尽管也就是这个老师在大三时候教保罗给希伯来人的书信，将它铭记于心、反复分析并简化成教义融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决不允许这种练习的影子在可贵的周日早读中出现。大概还没有读到有关保罗的争论，因为我们总是从福音书开始读起。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在19世纪70年代时管理制度还很简单。学生自己生火做饭，整理房间。星期天早上是大扫除日，要把周围环境彻底弄整洁，干净的亚麻布，仿佛与纯洁的良知一样，在我脑海里与早年的阅读交织在了一起。我一生都充满了一气呵成通读整部福音书的激情，一点也不喜欢把它分章节片段，也讨厌有时候听到对美妙“生命”的引用，因为那会显得这只是一段毫无生气的记录。

我自己的那本希腊语版圣约是我们希腊语老师的兄弟给我的，他叫布雷斯代，是贝洛伊特大学的教授，一位真正的“基督伦理学”学者，这和他所在的部门同名。我记得在我大学毕业后的某年夏天——那时父亲过世的阴影正笼罩着我，这位友善的学者给我带来安慰，还询问我是否从他很久以前给我的那本小书中找到了慰藉。我突然想起我出生的村子，尖塔和屋顶看起来就像我们一同谈话时候从山顶上看下去的一样，熟悉的细节缓缓浮现，逐渐变大形成宇宙，在那一刻淹没了我的悲伤，

或者至少减轻了一点，我意识到这不过是“尘世间伤心痛苦和害怕洪流”中的小小一滴。意识到悲伤是一种常态，死亡是宇宙中普遍的经历，这是我受伤心灵收到的最初的安慰。我对基督教义里“顺从”感到难以忍受，他回答说这表示我只看到了悲伤对我产生的作用，而忘记了造成悲伤的感情本身。我记得他悄悄转变了措辞，说有时候柏拉图的话更能带给我们安慰。这几乎是我第一次听到柏拉图经久不衰的醒世名言。

在布雷斯代教授返回学校之前，他留给了我一本小小的《克里托篇》^[10]。其中的希腊文对我来说比较难，于是我很快就去看了乔伊特的译作。尽管给热情的年轻人推荐自己喜爱的书籍这种旧俗有时可能会退化成可笑的“朋友间的馈赠”，但它依旧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有时它代表的是馈赠者从文学清泉中汲取的疗伤和激励之水。

在学校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强烈地感受到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即将要成为大学的持续变化。母校将要成为真正的女子大学使我们无比振奋，这项新兴而光荣的事业也成为本科生们心中共同的强烈志向。我们坚定地认为在学校获准颁发学士学位的第一时间，一部分学生必须做好接受的准备。于是我们两个人选修了数学，这比学校之前开设的课程都超前，教我们的是那群早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中的一位，她只是临时在罗克福德教书，稍后或许会在莱比锡进一步学习数学。

和我一道艰苦奋斗的伙伴在为女性争取权利这件事情上比我们其他任何人都付出得更多，因为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而我在这一点上或多或少受了父亲影响。就这件事情从旧式思想来看，我想要引用我这位同伴的事业成就来说明高等数学对女性的重要性。她以非凡的才能来说服即便是最愚笨的立法官：必须明确自己选区的合法权利，就算这帮蠢货用无比枯燥的州宪法或者城市宪章来反驳她也一样无效。

政策规定女子大学和州里的其他大学享有同等地位，于是我们参加

了伊利诺伊州大学辩论竞赛，并成功的让罗克福德成为第一所女子大学。当我最终被选为辩论选手时，却感到有点沮丧。这次参赛不仅代表学校，更代表整个女子大学，当一群热血沸腾的人直截了当对我的辩论资格进行讨论时我却无法辩驳，这群人不允许以个人情感阻碍进程，更不别说是妇女事业的进程了。他们告诉我，我有一个不可容忍的习惯，我在句子的末尾降低自己的声音，以非常女性化，像是带有歉意，甚至请求宽恕般的态度说话，这可能会使女子大学冠军不保。

当然女孩子没有获得第一名，而是第五名，处于中间，但这不光彩的名次并不全是态度不好的错，因为前面的名次是给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他不仅以意料中的优异演说打动了所有评审，并且还带有诚挚的道德感，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方面只有女辩手才会有。

我完全赞同竞赛裁判的决定，确实是我的满不在乎影响到了队友，把冠军宝座让给了其他大学，转而去访问了几所州立的公共机构，一所是为盲人设立的，而另一所是为聋哑人设立的。吉列博士是聋哑人机构的主管；他对教学方法的学术诠释，对职责的关心，以及这次州政府对最不幸的人给予关怀的快速展示，使我深切地思索到辩论比赛第一名，第五名乃至第九名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这次我们从“滑铁卢战场”到回学校之前的短暂停留让事情变得非常不走运，因为我们发现那群热情的人不仅因过早准备迎接学校成功辩手的回归而被耗尽了精力，而且当我们看到那些花环凄惨地垂在装满了水的桶里或者碗里时自然也就感到不悦。她们清楚地让我认识到是我对女子进步事业的遭受了打击，使得女性事业步履蹒跚，而在金色的“年轻勋带”面前，她们完全不屑于接受我对第五名的解释，这种死板真是可笑之极。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随着毕业临近，宗教事业的压力愈发巨大。然而奇怪的是，在思想成长路上，后来有几次经历使我觉得我内心这种被

动的抵触，及对个人信念的坚守，是我在罗克福德大学时期接受到的最好的思想训练。在赫尔大厦的第一个十年，多元社会理论的宣传者觉得新的社区运动会成为一个优势，从中可以宣传社会理念，而初期工作会使创建者的初衷发生转变；因此每次我都要花几个小时去理论，我记得至少有三次后来几乎都变成了恳求。起初，一个老实巴交、支持对土地实行单一税费的说教者居然跪在我的面前。他以一个祷告者的口吻祈求道：“修女或许会看到这个政策给蜗居在这所大厦周围的穷人带来的善果。”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用各种方法来攻击我，他们最喜欢声明说我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些声明当然有时候是真实的，但他们“没胆子说出来”。我记得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总喜欢在街头巷角进行生动演讲，他总习惯把我作为一个他社会主义同伴中的一个可恶的例子，说我是“最终被资本主义捕获的”一员。他最后总是要重申一下他说的都是实话，因为他是赫尔大厦男子俱乐部的一员。一次我斗胆跟他说道：并不是成千上万属于同一阶层或是赫尔大厦俱乐部的人都能知晓我的看法。当我平静地问他是怎么得出他的结论的时候，他不无炫耀地说我有一次曾对他承认说读过桑巴特^[11]和洛利亚^[12]的理论，于是只要思路正常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无可辩驳的伟大推论。

不光这两本书，还有近百倍这样的例子，但几乎没有东西帮助我站稳脚跟从粗鲁武断中选择合适的理性。在我早年的真挚热情与深情忧虑中，有许多都并不是我所能全盘接受的真理。

我并不想把年轻时的拙作看得太重，但我还是想重复我在一次辩论竞赛中的不成熟的实用主义言论，这无疑是情绪化而非知性的，但我至今仍同意它，只希望那夸张的风格仅仅存留在过去：“有些人认为正义只是人们内心潜在的一种渴望，狂热者认为它会像千禧年一样出现，有些人则认为它是由英雄的铁腕所建立，他们都没有理解人生浩瀚的真

理。实际上正义必然来自于训练有素的智力，对人生路上的男男女女怀有宽广的同情心；每一个组成的叠加才能建立起这足够崇高的概念，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用武之地。”

这条女学生的秘诀在后来很多经历中都得到了验证，其中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是我被一家制造公司叫去作三个仲裁人之一，协调他们内部难缠的纠纷，对立双方是一组贸易工会人员和一个非工会的员工。引发这次问题的是非工会的那个人，他在十年前的一次罢工中站在雇方一边与工会苦苦斗争。他那时受了重伤，随后虽然在医院经过数月的治疗，他也无法再正常工作，他的雇主对他的忠诚表示认可，十年来依然正常付他工资。十年后曾被打败的工会现在变强了，要求提供工会商店，尽管公司讨厌这个安排，他们还是和工会达成了很和谐的关系，唯一的问题就是要贸易工会能够接纳这个残障员工成为工会的一员，而他最终也妥协并愿意为能在工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过去的敌人站在一起。

但是工会的人拒绝接受一个“背叛者”，而公司也断然拒绝解聘如此衷心的员工，工作繁忙的时候全得依仗他们，于是相关人员最终同意不管结果如何都听从仲裁者的决定。我们这个小仲裁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官，他很快说明不可能获得十年前事件的可靠证据，而这恰恰是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于是我们很快就停止对互相矛盾的证人的访谈；委员会的第二名成员坚持嘱咐大家要记得，最古老的希伯来权威不会宽恕哪怕仅仅怀有七年多的怨恨，最后我们决定用不知疲倦的努力来确保相关人员内心的赞同，这成了梅特林克所说的“神秘正义”唯一的依靠。我不确定最后我们是否主持了正义，但肯定的是，雇主、工会以及仲裁者们都确信正义一定是建立在工业事务上的，它依托共同的关心和耐心，这是几世纪来人们建立公民关系所必需的，即使那位法官指出对正义的探寻一定不能过多的依赖前人的帮助指导。我依然确信，不管在我们这个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的全新关系中建立公正需要多长时间，要达到稳定必须获得当前境况下最遭受压迫的人的认可。

四年学习的尾声，我们就未来争论了许多，而在学校生活结束之前很久，我就下定决心要学医并且要“同穷苦的人一起生活。”自然有很多原因促成了这个决定，也许概括在了我关于“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人物）以及她悲剧命运的毕业论文之中，她“总预言正确，却总是无人相信，遭人拒绝。”

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猜到，这个论文可以作为女性心灵特质的一个例子，直觉，“它是一种精确的对真理和正义的感知，无需外界干预，不证自明，也可以通过组织既有的知识来精炼。”论文继续写道——我必须承认，对此我深信不疑——女性要“变得更准确和智慧，必须至少精学一门自然学科，只有拥有一双永远探求真理的双眼，她才能察觉所有自身的自欺欺人和藏在脑子里的幻想，才能不那么武断地表达自己。”论文的第一部分大致就是这样。“获得了精确的感知力，女性就能把这个力量带到道德和正义中去，她才能从积极的努力中发现伴随着不断提升的洞察力而产生的激励和鼓舞。”我相当肯定，只要认真沿着这个方向努力，最终当代女性会发现她们具备“从科学学习中获得的明辨是非，判断准确的能力，她们的双手也得以放在迷人的人性枷锁之上。”

我毕业论文中对科学的崇拜无疑是来自于课本中所说的理论进化，这是自三十年前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被普遍接受以来对知识探索的一次接触。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然科学老师已经接受了这个理论，但我们非常怀疑教授巴特勒《类别学》的老师未必接受。我们学校图书馆在这方面的书少得令人气愤，我总是向我的姐夫借书放在包里带回去，他曾在德国学医所以思想比较自由，不受习俗限制。离开学校那年，我拥有了自己的小房产，我送给罗克福德大学的第一份礼物就是捐赠给图书馆一千美元，但规定只能用于购买科学书籍。在假期里我制作植物和鸟类标本，采集岩石，模糊中似乎相信自己正接近获得新方法，而我的继弟，他正在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领着我感受可能是最外围

边缘的研究方法，这立刻证明了我并不具备这种天分，无法聪明得像达尔文那般细心观察蚯蚓那样观察事物。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得坦白如果没有我这位十分热心同伴的悉心帮助我是完成不了的，他除了一个显微镜和一大群蚯蚓以外，更拥有不知疲倦的机智，成熟稳重代替了逐渐消退的热情。

随着寄宿学校的日子临近尾声，即将离别的我们发誓永远效忠“最初的理想”，并互相保证“没有正当理由绝不抛弃它们”，而我们也在相互告诫“自成一派有风险”。

在崇高的自我幻想中，我们相信生活的困难纯粹源于丢失了宝贵的理想，没有沿着既定的远大目标和自我牺牲的方向前进，我们对昏暗的坚忍之路，对公正所需作出的让步，以及自我批评都没有概念，如果我们更放开思路，也许可以从中领略一些生活真谛的神秘与复杂。

毕业后一年我和一个同学回去拿企盼已久的毕业证书。两个毕业班也准备就绪，在一片喧闹的猜测声中，我们四个人就在罗克福德女子神学院被宣布为大学的那一天获得了学士学位。学校外的这一年，徘徊在模糊的希望与明确的成就之间，我对学位的渴望已经变得十分冷静，并且已经慢慢走出那团包裹了年轻人对未来一厢情愿梦想的红色迷雾。

不管自成一派的危险性是什么，我都没有回避。经过了整整八年——从1881年夏天我离开罗克福德到1889年秋天赫尔大厦成立——我才勉强能够清楚表达我的信念，这比将其简化为行动计划要长得多。其中大部分时间我完全感到茫然，无法考虑任何道德的初衷，只能牢牢依附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愿望，并拒绝对虚无的智慧或是其审美反映表示满足。

注释：

[1]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国传记作家。

[2]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

[3]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英国散文家。

[4]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美国作家。

[5]约翰·莫特利（John Motley, 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

[6]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7]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

[8]布朗森·奥尔科特（Bronson Alcott）：美国教师，哲学家，改良者。

[9]波尔罗亚尔信徒（the Port Royalists）：17世纪法国天主教詹森派教徒，活动中心在巴黎附近的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

[10]《克里托篇》（The Crito）：柏拉图的早期对话著作，是对“对苏格拉底最后日子以及其去世的解释”。

[11]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

[12]阿契利·洛利亚（1857-1942）：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

第四章 准备的误区

离开学校后我在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度过了第一个冬天，但童年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我的脊椎问题进一步严重了，这迫使我在次年晚春时不得不去威尔·米切尔大夫的医院里就诊，随后的冬天我在我姐姐家的床上躺了足足有六个月之久。虽然乏味，漫长的冬日却也有其平静，没过几周我就能以闲暇的心态阅读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我记得翻开卡莱尔《腓特烈大帝传》的第一卷，心里着实有些庆幸这不是格雷的《解剖学》，我发现读这类有关普通文化的书比专业学习要容易太多了。持续的疾病自然耽搁了我的医学课程，尽管我已经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获得了所需的学分，我还是非常高兴获得医生的批示可以不去诊所和解剖室，而是遵照他的医嘱去欧洲休养两年。

在回美国前，我发现还有别的真实原因需要和劳苦大众一起生活，这比医治他们要好得多，至于我的医科学习便就此终止了。

长时间的疾病困扰，让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而又筋疲力尽的状态，这到1889年赫尔大厦成立之后很久还有迹可寻。疾病只给我留下了有限的精力，因此本章无疑会记录面对令人沮丧的抑郁时所做出的心灵抗争。然而，这也不能全怪到我的健康问题头上，如我那什么都有的小记事本上清晰地写着：“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奋斗，不然道德法则将和一个人的现实生活相脱离而不复存在。”

要不是这些完全相近的笔记本，我肯定不会记得这样的奋斗是否真的发生过，我再也没有记录下坚毅的决心，而是记录了被失败感压垮的深切沮丧，这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经历中最深刻的一次发生在一个周六晚上，那时我们刚到大西

洋对面没几个月，我对伦敦东部脏乱差的悲惨场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第一次在午夜看到了这座城市最人满为患的区域。我们一小队游客在市里传教士的引领下到城市东头来见证周六晚上贩卖腐败蔬菜水果的场景，由于伦敦的周日法规，小贩的蔬菜瓜果只有到周一才能继续出售，加之没有妥善的保存方法，他们只能被迫在周日来临前加紧处理。在迈尔安德路，一辆游览车暂时停靠在只有零星汽油灯照亮的肮脏街道尽头，我们站在上面往下看，有两群病怏怏的人围着两个小贩的运货马车大吵大嚷。他们手里握着少得可怜的钱在和与小贩们讨价还价，小贩最终不无鄙夷地把手里的蔬菜抛给出价高的人，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嫌菜卖的便宜了。在那短暂的停留中，只有一个男子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买到了一个卷心菜，当菜抛到他手上之后，他立刻坐在路边，对着卷心菜一阵撕啃，不一会就风卷残云般把一个没洗过，当然更不可能煮过的卷心菜吃个精光。传教士向导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人便是“社会的最底层”，对于这个当时的新名词传教士说出来时还有点自鸣得意，他补充道，除了周六晚的贩卖，几乎不太可能看到这么多这样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显然对廉价食物的渴望能够同时驱动他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破烂不堪，衣着褴褛，如此粗糙的服饰只有在伦敦东部才可以看到。他们苍白的脸上充满了人类最讨厌的表情，那是一种买不到蔬菜就将面临挨饿的淘便宜货的人身上所特有的狡猾和精明的表情，然而最终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破乱艳俗的衣服，也不是苦难落魄气色不好的脸，而是那无数双空洞、可怜、无力、因工作而粗糙的手，这些手在摇曳的街灯下如此惨白，却向前伸着企图抓住即使已无法食用的食物。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人类的双手更富有重要意味的了，人们用这古老的工具摆脱了蛮荒时代，一路向前探索。自那以后每次我看到一些手向前举起，即使是做柔软体操练习时有节奏的挥动，或者一群可爱的小孩积极挥动小手回答老师的问题，这段记忆都会在我脑中复苏，揪心的回忆起那时令人窒息的绝望和愤恨。

接下来的几周我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在伦敦四处走走，不敢往狭长小路和弄堂里看，唯恐人类需求和痛苦的可怕场面再一次展现在我面前。几天后我们第一次回到那条曾充满悲伤和死亡的街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让我惊讶了好多天；我们对整个世界运转如常感到迷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是内心的剧痛，还是外部的表象。有时整个庞大的伦敦城除了东部的贫民区外看起来都那么不真实。接下来在欧洲的两年，无论在哪个城市我都不可抗拒地被那里的贫穷区所吸引，但无论是身处意大利南部的乞讨者之中或是奥地利盐场矿工堆里，都没有像在伦敦东区街上的一瞥那样使我对人类的悲惨深信不疑。当然这只是伦敦东部贫困生活场景中最零碎、最可怕的一幕，而且可能相当不公平。我应该看到要么少一些要么更多一点，我走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成百上千男男女女将自己的命运勇敢地与那些两手空空的人联系在一起，还有在教堂，礼拜堂，“解救工作组织”和慈善组织的人们，至少他们也在努力改善情况。

我们是1883年11月去的伦敦，那年《蓓尔美尔街报》开始曝光“被伦敦遗弃者的苦难呼声”，英国人的良知前所未有地被首都东部这毫无乐趣的区域所激发。那时，人们就在讨论许多充满活力的激进计划，一项精彩绝伦的市政改革方案初见雏形。然而对于这些，我只听到些模糊的传闻。

那时没有任何事情让我感到欣慰，而痛苦的感受却在与日俱增，因为在游览车上向下看伦敦东部街道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清晰而又痛苦地想起德·昆西在一个夏日夜晚驾着邮车驶过英格兰郊外时所遇见的“突然死亡的景象”。一对沉浸在爱中的恋人突然出现在狭窄茂密的灌木小道上，那正是邮车行进的方向，他们一定会被撞死的。德·昆西想要大声警告他们，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因为他的脑子无可救药地想要回想起《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警告所有亚细亚好战分子的那句话。当他回想起来的时候，他才从短暂的麻痹中缓过神来发出警告，随后他行驶在充满芳香的夜晚，庆幸躲过了一场灾难，但他也同时意识到自己学习古典

文学花了太多的时间——当现实生活在生死攸关时刻需要快速决断的时候，他居然只能从文学中寻求并给出答案。

我们全都在这样做，期望从著作里缓缓寻找答案，而这只能更蒙蔽了发生在我们眼前真正重要的境况。我感到异常荒谬，因为在我对伦敦东部可怕场景的第一次观察中我应该想起德·昆西那段想要从文学中寻找答案而麻痹他思路的文学描述。让我厌恶的是这形成了一个可憎的恶性循环，即便是自诩为一流鉴赏家的人也承认，现代的伟大人物中还没有一个人如此清晰的说过：“是行为占据了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而不是文化。”

两年间由于身处对贫困者的同情之中，使我产生了“厌世情绪”，这种情绪混杂了徒劳感和顿挫感，让人觉得追求教化并不能带来安慰或是解脱。我开始逐渐相信第一代女大学生过快的投入了学习，而脱离了她们祖母、曾祖母所延续下来的积极而富有情感的生活；当代教育使年轻女性只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而没有对上一代人加以继承；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她们失去了纯真和应对人类诉求的该有的本能回应，失去了在苦难和无助出现时用实际行动帮助他人的那种传统却有益的反应。她们被过分呵护纵容，连作出“伟大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25年前，在德国和法国领取抚恤金的队伍里充斥着许多从美国远渡重洋来寻求文化的母女，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与自己生活切实联系的母亲，她能用很少但极其流利的德语与德国主妇闲话家常，到附近的幼儿园和市场里闲逛，并尽力在家里和街上营造快乐诚挚的氛围。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对自己的语言才能要求苛刻，迟疑不决，只有到了艺术展或歌剧院那样具有包容性的地方她才能放松下来。在那里她左右摇摆，乘着音乐翩翩起舞，并对音乐的力量和魅力充满感激之情，她能了解传奇和诗歌的情节，她总能找到让自己得到训练和成长的力量，这似乎和她坐在课堂那个熟悉的环境里一样，有种“接受教育”之感，这是如此的

美好和浪漫。

我想起一个忙碌却快乐的母亲，她对女儿每天花四个小时学习音乐知识感到很满意，她放下手上的毛线抬起头说：“要是我年轻时候有你这样的机会，亲爱的，我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姑娘。我有音乐天赋，但全被那些简单愚蠢的歌曲和华尔兹舞蹈训练给毁了，我每天练习的时间还不到半小时。”

这位母亲肯定不会想到她造成的伤害，敏感的女儿当然知道现在良好机会来之不易，但她也知道除去硬件设施和足够的教学，自己并没有真的音乐天赋，永远无法满足朋友们对她的期望。她不无羡慕地回想母亲的少女时代，因为那时充满快乐，加之各种阻碍，更没有什么机会，从而使她母亲相信自己的天赋与众不同。女孩忧郁地看着母亲，却没有勇气吐露心声：“如果我不知道什么是优美的音乐，我可能也会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天赋；我会喜欢那半小时的练习如果此后的时间能让我忙碌并快乐的话。你不知道当所有生活中的困难都被解决之后那意味着什么。我对现在的优越感到厌恶，仿佛要窒息。这就好像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吃甜点。”

这就是症结所在：早餐时的甜点，臆想她所能受到的保护，似乎让受过教育的女孩与穷苦和社会失调不产生丝毫联系；可终究这一切又无法藏匿，它会像一阵热浪一般冲破诗歌和文学的束缚向她倾泻；让女孩目睹背负重物的市井女人和街边的廉价劳力正嘲笑着自己的无能。

记得在萨克森·科堡一个下雪的清晨，我透过小旅馆的窗户望着小镇广场，我看到一排妇女背着沉重的半圆形木罐来回穿梭于广场中间。她们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把某一环节酿造中的啤酒装到罐里带去远处的冷却室。妇女们向前弯着腰，不光是因为负重，罐子也很高，这使她们无法抬头。她们的脸和手都在早晨冷冽的空气中被冻得红肿，这就更凸显了早先被烫伤的白色疤痕，哪怕在路上有一丁点颠簸失足，罐中滚烫的

液体就会溅出来。年轻人有时会为触目惊心的残酷条件所激怒，被一股莫名的精神刺激行动起来，于是我穿过广场，在主人的陪同下，与冷漠的酿造厂老板进行了面谈，他以令人愤慨的漠不关心态度接待了我们，或者说只接待了我，因为旅馆老板在镇上大财主开口说话的时候就偷偷溜走了。我回去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胃口，就像前一天晚上读到格雷的《阿尔伯特亲王传》和他神奇的导师斯托克马尔男爵一样；我对这本书失去兴趣是因为看到作者虽深切感到必须让他笔下的亲王拥有高贵的思想时，却让一个好人无视谦卑的劳苦大众所处的生活环境。那年冬天我们在德累斯顿住了两个月，读了许多《艺术史》，而自这次经历之后我总是对狂热的文化探索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反感。无疑在这种情绪下我开始崇拜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但我却以最异端的方式将他的画作仅当作人类记录。他不愿接受温和有教养的观点来看待生活，我主要就是被他这点所吸引，在他的画作中他尽力刻画挫折与痛苦，甚至是丑恶的形态，使我们对人类的想象变得黑暗，却又不放过任何人类的复杂性。我相信他的画布描绘了随后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宗教和社会变化以及农民战争，画面充斥着对被践踏者的怜悯，伤心的骑士严峻地坚守着，渴望避免流血，但当人们忘记了生活的复杂而坚持要将它简化为逻辑教条时，流血无可避免。

在欧洲我花的最大一笔钱就是想要买到丢勒的版画“圣休伯特”，据说其背板源自丢勒原始的雕版。几乎可以肯定这块背板以及上面的字都是“后期加上去的”，但花了这笔钱至少表明我当时热情高涨。

此后，意大利的奇妙和美丽让我对艺术知识积累所产生的倦怠感有所缓和，而这种倦怠感源于艺术知识所激发的灵感与对其最终验证行为的分离。对于历史所带来的平静祥和之感同样激起了我曾有的激情，尽管某些形式可能要到事后回想起来才比较容易表现出来，譬如会心一笑。我想，对我们同行的有几个人来说可没什么值得微笑的，我号召他们在烈日下步行三英里走到罗马城周围的一片平原地带，这样我们就能

像几个世纪以来朝圣者那样穿过罗马城中的人民广场，徒步进入永恒之城（罗马）。其实我们前一天晚上就进入了罗马，但火车站和旅馆在别处，于是我们早饭后就赶到城墙外，从朝圣者说出“看！罗马”的那个地点开始步行，从这个地方他们刚好可以看到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这种进入，或是假装进入罗马的戏剧性方式仅仅是我对罗马魅力着迷的开始。两年后我重返欧洲，一是为了过冬，其次是我饶有兴趣的想要系统研究基督教徒地下墓穴。尽管我对所谓“裨益”的信任感还未完全得以找回，但我还是想要从中得到更多。

我再次回到欧洲之前的两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家庭组合的关系，这两年间的冬天有三、四个月我是在巴尔的摩度过的，在那里我精神的抑郁和不适应感使我陷入了最低谷。尽管那时有来自罗马的兰奇亚尼所授精彩课程令我很着迷，还有一位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所教授的对“统一意大利运动”条理清晰的阅读课。后者自然使我接触到了马志尼，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即便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他关于意大利工人所提出的伦理和哲学诉求就直接冲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课堂上，可当时我已经非常肯定，用知识去追求道德建设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夏天则是在伊利诺伊北部的旧居度过的，在一个周末我接受了洗礼成为村里长老会教堂的一员。当时我的这个决定自然不是因为有什么外界压力，25岁的人通常也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慰藉。我虽然没有感到有任何情感上的“转变”，但对宗教生活的外部表达上我还是真心实意，十分虔诚的。我的确“对自己感到厌烦，讨厌问自己‘我是谁’，‘我该怎么办’”。各种珍贵的自我保护意识，宣称要靠自己的坚强意志，在可怜的失败中被砸得粉碎。但这肯定给了我如此一个结论，“由衷的放弃幻想，放弃希望凭借自身力量成为好人的愿望，是更深层次接触世界的唯一途径。”也许年轻的牧师把这当作是对基督徒性情的测试，不管怎么说他不需要我对教义和奇迹的赞同，并向我保证虽然教堂的行政部

门和相关人员必须对教义了如指掌，但对刚入会者的要求却非常简单。我自知幼年对福音书的接受并没有改变，但此刻我内心有一股力量说服我需要一种参加团体的外部象征，一种联结着平静的纽带，一个神佑的地方，团结的精神在那里用正确的方法克服所有困难。在我心里还有一股逐渐增长的热情，要为民主理想而奉献自己。当渔民和奴隶的命运被无耻的阻挡在公认的道德信仰之外，少数特权的舒适生活可能正是建立在对多数的无知与牺牲上，在整个历史中，这个民主理想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被如此振奋的表达过？我是谁？和着我那人间博爱的梦想，我并未从这一信仰的称述中找到自我，正如在我出生的小村子里所宣扬的那样，若是没有得到周围每个基督教徒小村庄的承认，这个信念很容易倒退成教义选择和贵族统治。

在两次欧洲旅行中间的一个夏天，我去了西部的一个州，我曾在那里抵押贷款中正式投资过一笔钱。我对那里农民的恶劣生活条件感到惊骇，这是长期干旱造成的结果，一幅绝望的画面自然而然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几头饿得发慌的猪围在敞开的栏子里等待被抵押，它们的背像骆驼一样奇怪的凸起，正在吞食其中的一个同伴，它可能刚饿死，或至少饿得无力对抗同伴那贪婪的饥饿。农夫的妻子对此见怪不怪，她绝望地站在一贫如洗的房子门口，无法阻止身后不断探出头来张望的两个小孩，他们的脸上满是粗糙和被晒枯的头发，他们小光脚丫又黑又硬，脚上的龟裂处挤满了脏东西，就像是动物被磨平的蹄子。当然我无法将他们比做快乐的萨蒂尔（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兽），但他们确实不成人样。在我看来要贷款给这样随时可能遭受恶劣生活条件的农户几乎不可能获得收益，虽然对我的代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无疑对等待贷款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回了我的投资。但总要有个法子处理这笔钱，因为担心那边还有我没有目睹的恐怖事情，我在自己村子附近买了一个农场和一群温顺的绵羊。我的搭档没打算长期牧羊，在我们的事业中期他打算尽快完成大学学业。这个田园事业从我现在看来也非常可靠，经济上和道德上都是，但可能一方过于顾虑她动机的纯洁

性，另一方更想要学习而不是嘴里叼着稻草躺在羊圈里过放牧生活，毫无疑问，这次创业很快变盛大落幕了，却比起想象中的结果好一些。看到两百头四蹄腐烂的绵羊是不能让谋求经济利益稳定的人安心的。所幸通过一系列交易，卖掉羊肉、羊毛和农场之后，我和搭档都没有损失，于是我们各奔前程，一个去大学读书，另一个了去欧洲，这对我来说也许不算是更好的选择，但这次经历还是令我有些伤感。

在第二次去欧洲的旅行中，我参加了伦敦火柴工厂女工的一次会议，她们正在举行罢工，每天都在伦敦知名的工人领导下举行会议。会上将通报最低工资，跟大家讲一讲并展示磷毒性颌骨坏死症的危害，奇怪的是看着这些女孩，我却无法将她们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也不清楚伦敦贸易工会成员的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我本身对他们也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是人类悲惨的印象还是令我更加感到无法容忍。我想那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像威尔斯所描述的年轻人物一样，认为在教堂或国家中有一群极具权威的人，他们一旦意识到问题就会立刻纠正。这样的年轻人深信在痛苦，罪恶和需求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宽宏的补偿力量。他可能认为世界是悲剧和糟糕的，但他从来没有哪怕一刻认为世界是卑鄙，污秽和自私自利的。显然我把贸易工会成员的努力看作类似于弗雷德里克·哈里森^[2]和其他实证主义者^[3]一样，后者是我在第二个周日在牛顿大楼听说的，它们象征着“对人性的忠诚”以及推动其发展的行动。在欧洲的几年我对实证主义者极其感兴趣；我觉得他们对人类宗教发展的哲学概念涵盖了人们长久以来为痛苦而挣扎，自我激励的所有表现形式。当我站在巨石阵中，在雅典卫城上，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里，我茫然地希望感受到这普世的礼仪。但在温彻斯特，巴黎圣母院和亚眠的大教堂里我的渴望达到了顶峰。有一个冬天我从慕尼黑到乌尔姆去旅行，我想象着艺术书中所描述教堂，在里面藏有中世纪实证主义最后的精华，在心中预想着他们“至高人性”的概念。

我并没有完全失望。乌尔姆教堂里唱诗班长椅上刻下的宗教历史包

括古希腊哲学家和希伯来先知的作品，在门徒和圣者之中也伫立着发现音乐的人以及异教徒庙宇的建造者。我震惊地发现一块画着卢瑟的窗，画上他正在将他的论文粘到维滕贝格的城门上，在画着圣徒和符号的更古老的玻璃中间闪闪发光，清晰可见，当时我完全忘记了在德国南部正发生着的宗教革命。

我整洁的记事本上记录道：这都是“具有高尚行为的圣者”的确凿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表达出了我对“大教堂人性”的希望，这“足以容纳志同道合的伙伴”，也“美丽得能劝服人们对人类团结深信不疑。”在此我几乎不可能重现当时在乌尔姆的感受，除非再引用笔记本里好几页的内容，当时我花了大半夜写作，对孔德的短语虽未理解透彻却有着一股狂热。这毫无疑问也折射出古老天主教徒的一种信仰，我最近在斯图加特就遇到过一群可爱的人，我在对社区早期的愿望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的心境，那就是需要在行动上联合成一个团体，不去区分宗教信仰。

1887年初我们三个人在罗马找到一处别致的住所，过了一段学生般的日子。但我对基督教徒地下墓地的研究在两周后突然停止了，因为严重的坐骨神经风湿使我在罗马待了好几周，还请了一位专业的护士护理，后来我被送去里维埃拉，再一次开始过病人的生活。尽管我对基督教徒地下墓地的知识只能无奈地停留在表面，但这似乎足够我开设一个六堂讲座的课程，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冬天怀着羞怯的心情在牧师女助手培训学校里教授过。在这个简单范围内，对基督教早期的诠释应该是针对穷人的，它强调原始的教堂就是由穷人组成的，也正是他们给罗马的富人带去了好消息。开明的校长愉快得接受了我的课程，并安排每年春天给国内外传教毕业班讲课，到第三年末她还邀请我成为学校的董事。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参加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但也就只参加了那一次，因为一些年长的成员反对我的董事资格，理由是“赫尔大厦里没有提供宗教指导”。我对校长当时所处的尴尬境地感到很同情，但如果我需要安慰的话，在回家路上一位意大利劳工倒是给了我一些，他帮我付

了电车费，这是我们简单邻里关系的惯例。当我对他的好意提出询问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说：“一群外国人在一起我一个都认不出来，但肯定的是，任何人都会帮你付钱的，就像对修女一样。”

很难说是不是就在那时在我脑中开始形成粗略的计划，后来发展成了社区睦邻运动，那也可能是在我第二次去欧洲之前，但我开始确信在城市里租一座大厦是不错的主意，在那里能找到原始和实际的需求，那些过于专注于学习的女性可以重新找回传统事物和向生活学习的支点；在那她们也可以去实践自己的所学并将真理放到“它所意旨和启发的事物中去最终验证”。直到1888年4月到了马德里时，我才向别人提起过这个计划。

我们曾去看过最华丽的西班牙式斗牛，我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有些恐惧，我带着相对冷淡的心情看到五头牛和许多匹马死了。我感到这是竞技场仅存的荣耀，幻想着坐在盛装马匹上的骑手曾是比武联赛的骑士，或者装备简陋的斗牛士们将在斗牛场直面死亡，还有其他所有模糊却栩栩如生的历史痕迹，让我比同行其他人更能忍受这残酷的场面。我最后在门厅跟他们碰头，他们脸色苍白，对我近乎残忍的忍耐力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似乎还没有完全从刚才景象带给他们的晕眩和恶心中恢复过来。除了表示我并没有过多考虑杀戮以外，我对他们的指责没有说什么；但到了晚上，自然不可避免的反应还是出现了，在深深的愤懑中我感到疲惫并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谴责，不仅因为这是令人恶心的经历，更是这个过程中所揭示的道德情境。我突然非常清楚，我是用空想家的诡计哄骗着我的良心，学历文凭的深造成了持续碌碌无为的借口，而我利用它作为无限期学习和旅游的理由。推迟目标，让诺言永远无法在未来实现，这些都会很快使人变蠢，我陷入了最低劣的自我欺骗，竟使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日后为大事所作的准备。斗牛之后的心理反应使我意识到，在仁慈之火战车的感召下，我被彻底拴在了寻找自我的牛车尾部。

第二天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我要开始执行我的计划，至少要开始跟人谈论此事。我清晰记得我支支吾吾又带着许多不肯定地向斯塔爾小姐訴說我的計劃，她是我學校時候的老朋友，也是一同去歐洲旅行的伙伴。我甚至奢望她也能加入進來一同付諸我的計劃，但我說的時候還是擔心令人沮喪的事情會發生，它必定會摧毀我們寶貴的計劃，可能是當它最終宣布的時候，或者當我們突然對此感到無話可說的時，然後金色的夢想從指縫中溜走留下我們黯然神傷，自艾自憐。然而斯塔爾小姐陪伴所帶來的安慰，還有她的活力和熱情，都從談論計劃的發展和可行性中表現了出來，所以當我們到達迷人的阿爾罕布拉宮時，整個計劃變得具有說服力，仿佛觸手可及，盡管在操作細節上還毫無頭緒。

一個月後我們在巴黎分開，斯塔爾小姐回了意大利，我則去了倫敦；我想到那些早就聽說過的嚮往之地，如湯恩比服務所和人民宮殿去尽可能多的听取建议以确保计划能顺利实施。所以1888年6月，在我第一次造訪倫敦東部的5年之後，我又一次來到了湯恩比服務所，手中除了有一封卡農·弗里曼爾特的介紹信以外，心裡還怀揣了一種很高的期望和信念，不管窮人的生活狀況如何使我感到困惑，令我氣餒，我至少可以得到一些第一手的信息，在每天的活動中尋求慰藉。我自信即使生活可能存在許多困難，僅僅是被动接受知識的階段也到了該結束的時候，哪怕準備得十分糟糕，我終於完成了沒完沒了的“為生活所做的準備工作”。

好多年以後我才讀到托爾斯泰的“準備的誤區”，他堅稱這是年輕人的必經之路，在這人生的特殊階段年輕人肯定會無可救藥地無所事事，期望把整個世界建成他們自己理想中的樣子。

注釋：

[1]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德國中世紀

末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及艺术理论家。

[2]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k Harrison, 1831-1923）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3]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一种以“实际验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求知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狭义而言，实证主义则指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的哲学，认为对现实之认识只有靠特定科学及对寻常事物的观察才能获得。书中指的是后者。

第五章 赫尔大厦最初的日子

次年一月我和斯塔尔小姐到了芝加哥，想要找一个社区来实施我们的计划。我们热切地希望能有新伙伴加入到我们的事业，所以利用每一次机会去陈述类似汤恩比服务所那种睦邻中心的意义，尽管那段日子我们并没有想要去筹款，只靠自己微薄的资金来启动计划。计划初期受到了礼节性的关注，还有不少议论，虽然大多是带有怀疑态度，但总体是非常友好的。斯维教授在晚报的专栏上写了评论文章，我们早期的演说被多次报导，这大大地超出了其实际价值。我想起在威尔玛斯女士家一个热情洋溢的夜晚，知名学者托马斯·戴维森在场，还有一位年轻的英国人，他是当时费边社^[1]的一员，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因为整个夏天他都在阿迪朗达克山脉中与高尚的哲学家们一同露营研修学术。我们小小的新计划收到了戴维森先生的批评，更不用说他的反对了，我记得他好像说这计划是“一种想要通过集体生活来理解生活真谛的反常尝试”。

我们坚称集体生活并不是这个计划的主旨，我们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个人花销，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将社区里的住户分散到独自的公寓房里。戴维森先生争论道，愿意来住的人大多还是因为对社区的集体生活感到着迷。他的论点无可辩驳。正如汤恩比服务所的理念，住户们总是倾向于“在友谊的洞穴中迷失自我”，但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正是这友谊，同僚之间的给予和获取，能帮助睦邻中心正常运作，能让他们接触“世界的真实”。我很高兴我们从没有怨恨这个以及其他各种反对意见，15年后戴维森教授慷慨地承认集体的优势大大超过他以前所指出的劣势。他后来在纽约东部与一群年轻人分享他成熟的哲学理论，并且被他们的聪明智慧，浓厚兴趣以及忘我的投入所深深打动。我想时间证明了我们之前的争论，一座作为落脚点的大厦，轻松入住，有足够空间，

热情包容，建造在较大的外国移民区之中，这些移民区在美国城市中很容易被孤立起来，这本身在芝加哥就是一项有用的东西。我不敢肯定在“使社会活动表现出渐强的社会经济整体性，以及为民主事业增加社会力量”的努力上我们是否取得了成功。但赫尔大厦是严格地建立在“社会阶级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这一理论上的；社会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相互依存的，赫尔大厦则是这一特殊含义的表现形式。

和我们一起在附近找房子的，有同义务教育部门的人，有市内传教士，也有报纸记者，我记得派来的记者看上去普遍要比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老一些，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项任务不切实际，所以只派了几个老家伙和我们一道。一个晚冬的周日下午，一个记者带我去看一所所谓无政府主义的周日学校，在城市西北一带有好几所这样的学校。负责人长得像德国学生，正带领孩子们一脸激情的吟诵一首科恩纳的诗。那个记者不懂德文，问我他们到底在吟诵什么，我把这几句简单的词翻译了一下，但他似乎不满意，还晦涩得暗示说歌词肯定是“非常深奥的”，也许是我被“骗”了。我回答说科恩纳是一个热心的德国诗人，他的诗歌鼓舞了同胞起来反抗拿破仑的侵略，他诗篇的集册可以在许多大图书馆里找到。他非常怀疑地看着我，自此我得到了如何对待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芝加哥人的第一个提示，就像对待其他所有公民的一样，坦然面对深深的怀疑。

还有一次，在早春的一个周日下午，我们乘坐波希米亚教堂其中一个缔造者的马车去参观该处，路上途经一座精美的老式大厦，远离马路，三面都环绕着宽阔的广场，整座房子用木头柱子支撑，呈现极致完美的科林斯式设计和比例。我被它完全吸引了，第二天就出去想要去看一下，但当天以及后来几天我都找了好久，却没有找到，最后我只得万分不情愿地放弃了。

三周后，在包括芝加哥前市长梅森上校（他从一开始就对我们的计

划非常热心)在内的几个芝加哥老居民的建议下，我们决定把地方定在蓝岛大街，郝斯特街和哈里森街的交会处附近。头一天在寻找住所的时候，居然让我遇见了那所环境舒适的老式大厦，这个我刚放弃寻找的地方意外出现令我惊讶不已，高兴万分。那所房子当然已经被出租了，它的低楼层部分被用作办公室和储藏间，与房子后面的工厂连接在一起。然而，经过一番周旋之后，一楼的一间曾经的大画室和整个二楼可能可以转租给我们。

这座大厦自1856年建立以来经历了许多变化，当时它是芝加哥最早的公民之一查尔斯·J·赫尔的宅地，尽管岁月兴衰使大厦破旧不堪，但基本上还是完好的。在被工厂租下之前，这里曾经有一个二手家具店，也一度被“安贫姐妹会”用作养老院。这里有一个阁楼据说经常闹鬼，对此虽然将信将疑，但二楼的人总是在阁楼楼梯上放一大罐子水。他们对这一习俗的解释毫无逻辑，但我猜这起源于相信鬼是无法跨过流淌的水的，但我的这个解释也可能只是出于我渴望从民间传说找到答案的结果。

这所精致的旧大厦整修得非常好，它宽敞的大厅和敞开的壁炉都透露出它的优雅舒适。慷慨的房东海伦·卡尔弗小姐在次年春天把整栋大厦都免费租给了我们。她的好意一直延续到总共13座大楼建成，那些大楼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物业，它们大部分建造在她以赫尔先生的名义拿出来供社区使用的土地上。当时大厦处于一个殡仪公司和一个酒吧中间，“骑士，死亡和恶魔”，一个芝加哥的智者这么称呼它们。把睦邻中心比作骑士招来了的对我们豪言壮语的嘲笑，但这些都在附近居民对我们展现的真挚善意和热情的欢迎中迅速瓦解。

我们将大厦当成城市的其他部分而不是工业区来布置，用从欧洲收集来的照片和其他什物装饰，还有几件家里的红木家具。尽管新买的家具很耐用，我们还是精心地使它们融入到了老式居所的环境中。大概从

没有年轻主妇像我们第一次布置赫尔大厦那样愉快得布置过自己的房子。我们相信这些装饰和配件一定会对睦邻中心有所帮助的，因为有教养的人会通过它们看到过去最美好的生活。

1889年9月18日，我和斯塔尔小姐搬进了大厦，一同入住的还有玛丽·凯泽尔小姐，她是帮忙做家务的，但她很快成了附近一带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跟她在家务中的地位一样，五年后当她去世的时候，有上百邻居发自内心地为她哀悼。

由于心中充满了“搬家入住”的热情，我们头一个晚上不光没有锁门，甚至忘记关掉一扇朝着波克大街的边门，第二天一早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一夜是完美展现了我们的新邻居们所拥有的诚实与善良。

我们的第一个客人是住在隔壁公寓一个有趣的年轻女子，她守寡的母亲每晚到市区的剧院做清洁工帮忙维持这个家庭。这位母亲出生在英国，家境优越教育良好，但却像许多初到美国大城市的人一样痛苦地挣扎着，人们发现，这儿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你可以维持多高的生活标准。我们的客人很早以前就和一个上进的年轻律师结了婚，他现在在东部某个城市经营自己的事业。她记得那一个月的经历充满了乐趣，接连不断来到新睦邻中心的访客们总是详细地问她“这些人”的生活，丝毫不怀疑她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从这件小事上我至少得出了一个经验，以后每次对芝加哥的听众作有关睦邻中心和它周围地区的演讲时一定会带上一个住在附近的居民，在一个比我更熟悉了解情况的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才及时制止自己作出草率的概括和总结。

居住在大厦的二十年使我对郝斯特街无比熟悉，很难回忆起它逐步的变化，相对富裕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从街上搬走，逐渐被俄国犹太人、意大利人以及希腊人所取代。我在早期几次演讲中对这条大街的描述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我依然赞同它的正确性。

赫斯特大街长32英里，是芝加哥的主干道之一，波克大街从中跨过，南边是牲畜围场，北边是造船厂，靠近芝加哥河的北部支流。在这两个行业中间六英里的马路上布满了肉铺和杂货铺，昏暗华丽的酒吧，还有招摇炫目的成衣店。波克大街从赫斯特大街向西而去，迅速变得更加繁华，而向东到斯蒂特大街则条件越来越差，并且穿过了在克拉克大街和第五大道街角那块堕落罪恶的区域。赫尔大厦的位置以前属于近郊，但随着城市周边不断扩大，现在大厦已经处在三、四个外国移民区之间了。在H街和芝加哥河之间住着约1万意大利人，包括那不勒斯人、西西里岛人、克拉布里亚人、以及少数伦巴第和威尼斯人。南边的第十二街有许多德国人，而附近街道则基本上被波兰人和俄国犹太人占据。再往南，犹太移民区融入到了巨大的波希米亚移民区，致使芝加哥被评为全世界第三大波希米亚城市。西北方向则住了许多加拿大籍的法国人，他们久居美国但依然排外，北面是爱尔兰人和第一代美国人。正西面的街上和更往北的地方住着说英语的小康家庭，其中许多都有自己的房子，在这儿已经住了好多年了；有一个男子至今仍住在他的老农场房子里。公共职能部门的政策从来没有主动性，总是等到别人来催促他们办事，这在完全没有自主积极性的公民所在的地区显然是具有毁灭性的。在这个区域里自我管理的理念支离破碎。这里的街道脏得没法用语言形容，既没有足够的学校，相关的卫生法案也无法得到推行，路灯都是坏的，铺路的石板一塌糊涂，小巷和小路则根本没有铺路，污秽的牛棚也根本无法形容。上百间房子没有连通马路的下水道。相对富有的老居民似乎对此感到十分不安，一旦有能力就想尽快搬离这里。他们离开后给新移民腾出了地方，后者完全无视社会公德。该地区南边和东边的工厂企业里也完成了这样的新旧交替。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为大服装厂做最后处理工作，这曾经是美国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做的，他们拒绝为剥削体制给他们的继任者开出的极其低廉的报酬继续工作。按照剥削体制的设计，需要尽可能消除制作衣服地方的租金，“外围工作”从衣服离开裁衣工手里开始。对一个无耻的承包商来说，没有过于昏暗的地下

室，不存在过分污秽的阁楼，每个房后的棚屋都可以长久使用，任何小公寓房都足够容纳他的车间，因为条件恶劣就意味着租金低廉。因此这些在最糟糕的外国移民区里的废弃商铺中，剥削主们能轻易得找到便宜的地下室以及加工工人。这个区域里的房子大多是木头做的，原先是给一户家庭建造的，现在则住着好几户，它们代替了二十多年前在更贫穷的郊区里不方便的农舍。很多房子还伫立在建造时的地方，其他则被滚轴机器搬到了远处，原来的地方让位给了工厂。少数几栋砖造的三、四层公寓楼相对比较新，此外基本上没有更大的公寓楼了。小木屋有一种临时性，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芝加哥完全没有公寓管理方面的法规。屋后的租户蓬勃发展，许多屋子除了后院的水龙头没有其他水源，也没有火警逃生通道，垃圾和灰尘被放在木箱子里堆到街上。现存租屋系统最令人气馁的一点是许多房子的房东是利欲熏心，蒙昧无知的移民。富有代表着能力，钱财终究会带来学识和雅致，这种理论在这里一败涂地。意大利移民房东的小孩也许会在街上炫耀他“闪闪发光”的鞋子，而他的妻子则可能会从街上下水道去拾破布，在肮脏的院子里费力将它们整理好。财富也许可以让她感到自信和满足，但对于她的舒适，她孩子的成长，以及所有人都在意的干净整洁都完全没有帮助。另一个阻碍芝加哥拥有更好的住房的因素是地产商犹豫不决的态度。许多令人生厌的生活条件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而如此持续下去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与此同时，糟糕恶劣的生活条件将至少持续困扰了两代出生成长在这里的孩子。由于租金比较低廉，每个穷人居住的社区都可以被聚合起来当作一个元素，尽管每个个人可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人从前有过教育和机会，珍藏在心里的雄心和梦想，然而现在他们只是讽刺得说自己注定是“责怪世人的空洞幽灵”。许多生命在人生中某刻丢掉了活力，失去了力量。有教养，文雅的男男女女因为没有能力赚钱，因为健康欠佳，因为一次不幸的婚姻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原因而搬到便宜的街坊，但这全都不代表他们有什么罪过或愚蠢。其中也有人在困难的环境下依然保持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邻居会说他们“痴迷图书”。对

这些人来说，我们的社区可能真的是一个避风港。

在搬进大厦的头一个星期斯塔尔小姐就举办了一次关于乔治·埃利奥特《罗莫拉》的读书会，有一群年轻女子参加并以不懈的兴趣听完了这个美丽的故事。每周的读书会就在我们楼上的小客厅举行，每次都有两个俱乐部会员跟我们一同晚餐，他们不光是我们的客人，吃完饭还帮我们洗盘子，把桌子腾出来放成堆的佛罗伦萨的照片。

我们的“第一居民”是一位有魅力的老太太，这个昵称是她打趣给自己冠上的，她为最具有欣赏力的听众连续读了五篇霍桑的作品，期间还不时欢快地用扑朔迷离又令人着迷的作者轶事来点缀作者神奇的故事。很多年前她住在布鲁克农场，是雷普利司的学生，她过来跟我们住十天是因为她想要重温“理想主义高飞”的氛围。于是我们找到了一种课堂形式，多年来一直最受欢迎，那就是社交气氛和严谨学习相结合。

志愿加入新事业的人很快就来了，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在画室搞了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准时从城市北边的家里大老远赶过来。有一块纪念她的写字板已经在赫尔大厦壁炉架上放了五年了，我们还是能联想到与孩子们活跃地玩耍，一开始在幼儿园，后来在她自己开办的托儿所里，她真的把屋子装饰成了维克托·雨果所说的天堂——“一个让家长永远感到年轻，孩子永远保持童年的地方”。她在头两年里每天的出现使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对辛苦的日常事务保持严肃和自觉，她的欢声笑语，活泼开朗令人难以抗拒，她总是热切得分享她在街坊里的生活，我们每次都不得不倾听，即使要坚持听到最后是一场考验。一天午餐上，她愉快地诉说着她劝说意大利母亲戒酒的无用尝试，她五岁的女儿被送回家里，因为小女孩被送到幼儿园时是一副“可怕的醉醺醺”的样子，原因就是早饭吃了被酒浸湿的面包。带着南部意大利人普遍的礼节，她母亲礼貌地听着幼儿园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样一个不成熟的酒鬼将会面临怎样的不测。但在说教远没有结束之前，母亲完全不顾尴尬，热情地用她

最好的酒招待她的客人，一头雾水的客人一次次拒绝后，她离开了一会，又很快用深色杯子倒了威士忌回来，安慰地保证道：“看，我给你带来了地道的美国酒。”这个故事在沉重却又滑稽的失望中结束，她最后苦笑着说：“我最终在她那不灵光的脑子里造成的印象就是，美国的风俗就是给孩子早餐用威士忌浸泡而不是低度意大利酒。”

第一所幼儿园对我们而言一直都是教育的源泉。我们惊讶地发现社会差异在很小的时候就存在，尽管其纯洁的表现形式令我们感到有趣。一个高傲的意大利小男孩不肯坐在笨拙的安吉丽娜旁边，因为“我们这么吃意大利通心粉”，他一边说一边模仿叉子送到嘴巴里的动作，而“她这么吃”，同时把手举得老高，甩过头顶，这样张大的嘴巴就会碰到想象中的滴下来的酱汁。安吉丽娜沉默地点了点头，对这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差异表示赞同。他们民主的老师是这样评价的：“小小的饭桌礼仪居然能带来这么大的差异，这难道不令人震惊么？”另一件事也过早地发生了，女孩拒绝此事与死亡扯上关系。这个年轻的女孩，组织了我们第一个成功的男孩俱乐部，她想用戏剧中生动而古老的骑士故事紧紧抓住男孩们的心，便禁止所有俱乐部的孩子在男孩日玩棋牌和挑棒游戏，这样他们就能围成一圈，倾听“年轻英雄们”的故事了。

我曾遇到过男孩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他飞奔出大厦，充满了感性男孩强忍哭泣的愤怒。“再也不用来这儿了，罗兰德王子死了。”我们路过时他生硬地解释道。我们鼓励男孩子们参加各种比赛和戏剧活动，我们自信地认为早期对冒险家和开拓者有兴趣的男孩后来也会想要了解当代政治家和发明家的生活。不用说，男孩们很快便积极响应了这个计划，唯一的困难就是找一个能将其落到实处的领导人。从发展壮大男孩俱乐部到现在这些年，这个困难依然没有解决，男孩俱乐部现在有了五层大楼，有极好的装备商店，有创新和学习的房间，这个团体本身就是成功的，唯缺一个足智多谋，乐于奉献的领导人。

最初来到赫尔大厦的几十个孩子被分成好几组，并不算是班级，也不能算是俱乐部。这些小组的价值完全在于激发他们更高的想象力，并给他们学校中无法得到的自主积极性以及独立的社会关系。当时的公共学校几乎没有手工课，我们给他们的指导自然就是往这个补缺的方向努力。但这就要求持续的努力来保证贫穷本身所带来的压力不会影响教学目标。在缝纫班的意大利女孩们不能往家里带衣服的时候就会认为这天算是白干了，对那些没衣服穿的人来说要她们把衣服做得优美似乎过于文雅而脱离实际了。

这些俱乐部在这二十年持续发展，形式多样的手工课很快以新颖的教学形式使孩子们愉快得学习；但它们依然保持其社会特性的本质，还是会面向大量到14岁就离开学校，投入到无休止的工作中的孩子。我们认为必须有一个大厦给这些孩子提供永久的归属感，让他们和学校的伙伴一起有课上，有俱乐部可以参加，让他们可以以最轻松的方式从学校生活融入到工作生活中去，让这些困惑的孩子能找到并学会工作技能。那些因犯错而被带到芝加哥青少年法庭的男孩子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家中的长子，他们的收入对家里很重要。据记录，他们离开学校的年级低得可怜，远没有到教授第一堂手工训练的七、八年级，更没有什么长期的兴趣可言。

尽管在赫尔大厦早期就建立的少年俱乐部发展蓬勃，而事实上我们第一个组织的事业就是一所幼儿园，但我们也非常坚持睦邻中心不单只针对孩子，如果认为成年人会忽视受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那真是太荒唐了。我们热情的幼儿园教师自己与一位九十岁的老太太就是例子，那位老太太的女儿去饭店烧菜的时候留她一个人呆在家，她逐渐养成了一个固执的习惯，喜欢把墙上的泥灰剥落下来，于是一个接一个的房东把她赶了出来。仅仅几个星期我们就教会了老太太做大纸链，慢慢地她能够一整天心满意足得做这件事，到最后做纸链变得几乎和她以前破坏墙面一样令她喜爱，给她带来乐趣。所幸房东从没听说过对基础建筑的暴

露比华而不实的装饰更令人满意的美学规律。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这位老太太会说盖尔语，当有一两位刻板的教授来看她的时候，街坊里都为有这么一位奇人生活在他们之中而倍感自豪。能为一位九十岁的老妇人减轻生活的痛苦彻底反驳了睦邻中心是为年轻人服务的说法。

在赫尔大厦的第一个元旦，我们邀请了住在附近的老人，派马车接送体弱多病的人，对所有人宣布我们要组织一个“老年居民派对”。

自那以后的每个元旦，数量不等的老年人会聚集到赫尔大厦来诉说过去的艰辛，回忆早期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所赋予他们的一切。许多人曾住在附近，有钱以后搬去了更好的地段，他们也会回来参加聚会，并互相坦承再没有比以前的芝加哥更亲切的地方了，那时候所有的公民聚到一起共同开事业。许多开拓者正如我童年时候只要有他们在就会让我感到舒适的人们，他们与“外来人”完全相反，他们对街坊财物的损坏折旧，口碑的持续下降感到义不容辞。有时我们则有机会得到拥护；我记得有一个老人，一个刚猛的美国人，他指责我们墙上挂了太多“外国风景”，我尽力告诉他我们这么做是希望移民来的人能在一片全新和陌生之海中找到一座熟悉的岛屿。他放下防备心态，回答道：“我明白，他们的感受就像我们从新英格兰看到美国佬的概念一样。”这里他在开拓者与移民之间构成了模糊的相似性，两者都“与全新发展的巨浪搏斗着”。这位老先生与他的孩子们多年来一直对我们社区改善的各项事业提供真心的帮助，从他们以前艰苦岁月的记忆中，提出精明的建议来减轻最开始困难条件下的艰辛经营。

在刚开始的日子里总有人问我们，既然有钱住到别处，为什么搬到赫斯特街来。我记得一位男士经常摇着头说这是“他这辈子碰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但最后他还是被说服了，这“非但不奇怪，而且很自然”。随着时间推移，睦邻中心的选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给饥饿以食物，或者给病痛者以照顾是自然的事情，那么给年轻人

以快乐，给年长者以安慰，给所有人内心所渴望的社交活动当然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不论谁这么做了都会有所回报，如果不是以感激之情，也至少是自发的，极其重要的回报，但不会收到那种往往只带来负担、令人讨厌的巨大利益。

除了对收容和课程感兴趣的邻居们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受压迫的人非常穷困潦倒，根本无暇关心大厦的这些东西。而对剩下的这些人，对提供最低限度服务的人道政府部门的感情也会使升华成为与这些部门之间一种友谊的纽带。

从一开始大家似乎都认为我们能提供最朴实的社区服务。有人叫我们给新生儿洗澡，帮死者准备火葬，照顾病人还要“管教孩子”。

有时候这些社区机构会意外地揭示出人性的丑恶。我们将三个卧室中的一个用来收留一个术后的孤苦伶仃的婴儿达六周之久，他生下来就有兔唇，这是连他母亲都不能接受的，他被送回家一周后因无人照顾死去了，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可怕了；一个很小的十五岁意大利新娘在十一月的一个晚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求庇护，她的丈夫一周以来每晚下班回家就打她，因为她弄丢了她的结婚戒指；因为医生迟到，我们两个人只好自己给一个私生的小孩接生，而所有老实的爱尔兰主妇都“不愿意碰这样的孩子”；我们在一个年轻男子的临终前充当了牧师一职，在他长期患有肺结核生病期间他好心的朋友们他错喝下太多威士忌，日积月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处于狂喜的兴奋状态，而他也死在了狂喜之中。

我们也很早就对许多移民中奇怪的与世隔绝现象感到印象深刻；一个意大利妇女一次表达出她看到我们接待处放着的红色玫瑰的愉悦之情，对“这些花能从意大利带过来还这么新鲜”感到惊讶。她绝对不会相信这些花是在美国生长的。她说她在芝加哥六年了，从没有看到过玫瑰，而在意大利每年夏天都能看到她们绽放。当然在这六年期间，她的

住所离花店才十条马路远，顶多花5美分坐车就能到一个公园；但她从没想过要走那么远，也没有人带她去过。她对美国的概念就是房子周围的肮脏街道，而她通过长久努力才适应了这种“美国”方式。

尽管有许多麻烦的经历，我们还总是被一致的善意和礼遇所打动。也许正是早期的这些日子为我们长期生活在穷人之中打下了坚实质朴的人文基础：首先，比起其他地方，工业区绝对是首选，因为那里很有趣，最能反映出人们的诉求；其次是信念，用卡农·巴涅特的话说，使人们相似的事物一定比分离他们的更加高尚美好，在适当强调下，这种相似能轻易地超越相对不重要的人种、语言、信仰和传统的差异。

也许即使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也开始往那个目标努力，这在后面的文章中会提到，那就是：“要为更高层次公民和社交生活建立一个中心；创立和维护教育和慈善事业，通过调研提高芝加哥工业区的生活条件。”

注释：

[1]费边社：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派别，起源于19世纪末，由一群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发起，其奉行的意识形态被称为费边主义（Fabianism），又称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费边社的传统重在务实的社会建设，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主张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主义方式来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透过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革命，并强调通过教育的途径让权力回到知识精英的手中。

第六章 开设睦邻中心的主观必然性

1892年，伦理文化协会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开设暑期班，邀请到了几位当时新睦邻运动的代表人士，共同讨论关于慈善事业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主要议题。

在这里我将大胆地引用我在普利茅斯发表过的部分讲话，一是由于我发现现在很难再找到当时那种抱有目标和追求的新鲜感，二是由于那年夏天与其他文章一起发表时，它得到了睦邻中心居民的欣然接受。

我记得在暑期班期间，那些迷人的夏日午后，我们几个经常聚在普利茅斯几英里外的一片松树林中的小湖边上，一起讨论新睦邻运动。罗伯特·A·伍德，当时刚从伦敦的汤恩比服务所回来，准备在波士顿开设安多弗服务所，并且出版了《英国社会运动》一书，在该书中他详尽阐述了英国社会在睦邻中心成立前后做出的种种努力，罗伯特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领导者。另外还有来自学院睦邻社团的维达·D·斯库德小姐和海伦娜·达德丽小姐，来自赫尔大厦的朱莉娅·C·莱斯罗普小姐和我自己。我们中有些人已年近三十，所以我们尽量避免那些孩童之见的话题，因而我坚信那年夏天整个大陆上再也找不到一群人像我们一样，如此纯粹地关注社会发展，如此真诚地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一种方式，去了解那些拥挤城市中的状况，去充当社会改良运动的媒介。

我们都尽量不去表明这将成为我们奋斗一生的事业，或许是因为人们天生就害怕把过多精力放在永恒的誓约上，不过可以看到，在之后的18年里，我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满腔热忱的人们，即便他们已经成为了外界运动的政府官员或宣传员，依然每年都或长或短地居住在睦邻中心里，继续着这项事业。他们虽然早就发现了睦邻中心本身并不能代表任

何社会运动，可是它在社会问题调研上的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其实预示了未来，而“开设睦邻中心的主观必然性”这篇文章的意义则不言自明，现在再去修改这一生硬的标题好像也没有必要了。

这一章的主旨是，不仅仅依存于信念，而且在更真实的情感层面上解析那些社会运动的成因；无论在哪里接受教育，年轻人都在寻找一种能表达他们对四海同胞情感的方式，正是这种最优秀的精神将人们的情感转化成了动力。其实这些年轻人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甚少，并且担心自己会变成过分敏感、一无是处的人。他们不能一起从事那些能使他们身心健康的劳动；他们渴望理论和生活的结合，却缺少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年轻人把人类情谊看得有多重，以及他们是多么热切地想要表达出自己的民主理想。这些少男少女们，被日积月累的希望所指引，渴望着实现他们的民主。他们认为，在民主国家里，没有广大人民什么也无法实现，任何政治生涯的树立都要以人民的希冀为基础；认为没有公共往来城市的高度文明就得不到发展；认为我们拥有幸拥有的精致高雅的生活若想持久就必须在全民中普及；认为我们为自己守护的幸福是虚无缥缈的，只有为人民大众共同守护的才是真正的幸福。直接列出这些希望要比把它们总结为目标容易得多，我觉得正是这些希望构成了开设睦邻中心的主观压力。这些压力虽然有些原始，但我要大胆地说这是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愿望。我们身上都有着长期以来人类与饥饿抗争的痕迹，即使在当代仍有半数的人类继承了先人的记忆和感觉，做着同样的抗争。没有什么比忽视这些人的斗争，让他们远离帮助更加让人绝望。让一个人与这些事实隔绝就相当于让他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隔绝，相当于我们仅用一半的人性和能力活着。我们都愿意倾其所有去塑造更完整的人生，这些年轻人的愿望对“不朽的预示”做出了实质的补充，却至今没有人来歌颂。也许除了诗人之外，任谁也无法对此给出恰当的描述。

如果曾有过在清晨到达某个陌生城市的经历，你应该会记得那种偶

尔被失落感侵扰的感觉：旅馆的玻璃窗外，工人们如一阵洪流出现在视野中；那些勤劳的人们正承受肩上的重负，加之那喧哗的马车声，心灵顿时坠入无能为力的深渊。身后的房门打开，是服务生送来了早餐，你简单的问好，而后在餐前祈祷不要失去现有的一切。若是更有诗意的人则会为人类的母亲祈祷，她承受过分娩的痛苦，给予过我们朴实的关怀，祈祷她永远不要远离我们。你转向旅馆的服务生，却又觉得想从他身上找到你渴望的同情有些可笑，现代文明已经把你们隔开，你忽然对自己的惺惺作态感到了厌恶。文学作品中对这些感觉有着详尽的描述：那些遇到海难后坐上竹筏的人们，在危险面前，在那种被激情感动的时刻，克服了人与人之间难以协调的差别。这种情况不应该仅限于此，我们应该养成互相倾诉的习惯，就像小孩子之间讲故事一样，坐在绿草地上讲述自己曾多少次想起前世的样子。如果这些概念模糊的童话也能振奋人心，那么我们传承力量的努力自然不会白费。

“事实上，除去疾病、贫穷和负罪感的困扰，生命中没有什么比才尽其用更为重要。”我见过一些女孩在刚毕业的几年里因生活失去活力而痛苦。我们曾试着多关怀一个女孩，想给她带来一些愉快和自由，但仍然无法改变她可怜的境遇。她觉得生活与她的期待相差甚远，于是沉醉在那些天真的理想里，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无是处，为什么她悉心准备，却根本没有工作可做。年轻人继承了高尚的责任感并希望继续保持下去。他们渴望行动，渴望纠正错误，渴望减轻每日萦绕在身边的痛苦。社会只能宽容地接纳这一切却不能帮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错误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遏制了孩子们要做好事的愿望，告诉他们必须等到自己更成熟更有准备的时候再去做。我们认为履行社会义务应该从某一个特定的日期开始，却忘记了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顾最好的教育学家洛克^[1]和裴斯泰洛齐^[2]的反对，让手臂强健的孩子们多用他们的腿，却让每天锻炼双腿的孩子们利用他们的手，结果孩子们不被锻炼的那些方面没有退化就算是幸运了。当然也有例外，一些念过书的女孩早就忘了童年时期她们想要帮助别人，想和没有玩具的贫

穷孩子一起玩的愿望。家长们也是自相矛盾，有时尽可能地让女儿去了解世界的危难；有时让她们去听传教士关于印度和中国饥荒的演讲；有时带她们去听关于西伯利亚苦难的讲话；有时一起讨论伦敦东部那片被遗忘的地区。不仅如此，从幼年时期起女孩们就不断被灌输利他主义思想、忘我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在考虑自己之前要顾全大局。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和文化带来的结果是，她们从学校毕业，却发现自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努力全是没有道理而且不明智的，她们仍要表现出满足的样子，竭力维护家庭的要求。为了不让家人生气难过，减轻耻辱感，她们的努力只好被看作是家庭对宗教信仰的热衷。可是当这种热情也不复存在的时候，结果则更加令人困惑。我们有时会勉强地接受这样一条定律：任何行为最后的回报都会落到实干家头上。事实上，行为是独立和谨慎的，回报则不是，它会落到充满了慷慨无私想法的年轻人身上。女孩遗失了一些她被授予的很重要的东西，她不开心自己受到限制，可她的长辈们却仍没有意识到这些条件足以促成一个悲剧。

在美国，像这样没有用武之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清楚这是社会的失衡所造成的，却没有能力改变，只能让无力感沉重地压着自己。赫胥黎^[3]宣称这种无力感是人类所能承受的最为严峻的考验，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会造成身体机能的衰退。这些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去过欧洲、学过经济，却承受着这样的刺激。他们会讲很多大道理，他们说让我们趋同的事物比让我们不同的那些更为强大；他们说把人们聚在一起的力量要比任何将他们分离对立的事物都更持久和有力；在艺术方面，他们说道德衰退造成了艺术表达的没落，任何将人类兴趣从宏观人性中剥离的艺术都是自我毁灭。他们对长辈们讽刺自己的青春，如果他们想在商界、政界或者任何伟大的事业上获得成功，就必须先考虑到人性，必须清楚人们想要什么，以及怎样去争取。然而只有那些内心强大的年轻人才懂得这些，另一些人则只是挥霍着青春，还有一些不满足于现状，回到学校继续攻读第二个学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学习，

而是因为他们习惯做有把握的事，并朝着使自己心智趋于健全的方向努力。许多人就这样迷失在积累智慧的道路上，变得更加不安，前途暗淡。沃尔特·贝森特^[4]认为他们有着彼得^[5]的视角，能看得到天堂，那里并不是黑白分明。他说这才是人性，远比什么慈善事业更加广博充实。

这种在情感和表达上都如此真挚，却得不到引导的青年生活，在我看来与那些穷困的生命同样可悲。既然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那么制定一些交流模式则很有必要。伦敦东区汤恩比服务所的创始人巴奈特先生发现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青年们的需要，希望他的睦邻中心可以帮助学生们交流。睦邻运动在英国的兴起是必然的，那里的教育更受约束，等级制度也更加鲜明。而在美国，我们也越来越感觉到睦邻中心的重要。我们的年轻人对于把理论应用到实践还感到胆怯，所以很快就对睦邻中心这种形式有了回应。

开设睦邻中心的另一个动力源自于基督教派的复兴。基督教徒有着与穷人们分担困苦的冲动和为社会服务的愿望，不考虑宣传因素，基督教所传达的这些精神与教派本身一样源远流长。早期的罗马教徒秉承了一种怪异的艺术，他们热衷于在墓室的墙壁上作画以记录他们所获得的“佳音”，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把这一切当作一种宗教行为。事实上，耶稣没有一套被贴上宗教标签的真理。相反，在他的教义中，真理只有一个，并且可以被自由支配。他不会把他的教义从真理和实践的结合中区分开来，他说生命本身就是我们的启示。这些早期的罗马教徒受到福音的指引，带着淳朴的愉悦去爱所有的人。基督耶稣的形象远比希腊神话中温顺的牧羊人更加欢快活泼，公鹿不再渴慕溪水，而是径直冲到小河边。上。^[6]基督徒们长久以来都在寻求启示，但他们也相信耶稣所说：启示必须付诸实践才能被获取；实践是人类接近真理的唯一途径；教义必须通过信念为人所知。

基督教的形象化和具体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人类的实践就存

在于他们与同伴相处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对同伴的深厚感情就是实践的动力。这个过程把人类同时作为启示的载体和目标，发掘出人们内心的热情，带来了真挚的友谊，也实现了早期教会中真正的民主。那时的基督徒相信爱为万物之本，以反对暴力著称；平静的教会中没有对传统的反抗，没有人抨击或拆毁寺院，也没有人宣扬世界末日。教徒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不论强大还是弱小，他们从不把其他人看作敌人或异类。基督徒的博爱为罗马史上最为惊人的景象。他们愿意为老人和孩子等弱势群体牺牲自己；愿意把自己当成奴隶，不去躲避瘟疫；而且渴望与大众分享他们得到的启示。基督徒给人类的财富添上了浓重的一笔，那是一种在当时还不被人们所理解的快乐，是深知耶稣无处不在的难以形容的快乐。从英雄主义到田园牧歌，他们被幸福包围着；只要生命还有新的内涵有待发掘，新的计划需要实践，他们就掌握着主的启示。

我相信少男少女们对这些启示的接受度有着一个明显的转变。他们讨厌基督教只是一系列有关宗教意识的思想这一说法，坚信这种启示如果远离了现实生活根本无法存在，它必须在真实社会中以一个简单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当时主要发展于英国的睦邻运动便是基督教界广泛的人道主义运动的一个代表，因其致力于在整个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教派中。

我相信这种转变，这种早期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复兴，将会在美国芝加哥延续。我们不需要制定方针的领袖，不需要冠冕堂皇的演说，仅仅需要将基督精神付诸实践、服务大众的意愿。睦邻运动体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在确保任何社会运动的成功之前，这种力量必须被唤醒并且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要不顾一切地相信生命之所以高尚是在于人与人都是相同的，睦邻中心不断地让不同的人们聚到一起，我们要强化他们的相似点，减少他们的差异。实证主义者坚称，一个人对宗教的热情可以转变为他对整个民族的热爱，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可以从反复的实践中获得满足。保罗^[7]说我们应该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基督，因为我

们都有与他相似之处，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简单的方式。

一千个人齐唱亨德尔的《弥赛亚》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你可能听得出主唱的声音，可是歌者们不同的声线以及受过的不同训练却融合在了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努力的意志中。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睦邻中心的宗旨可能还不够充分。可是在某种程度上，睦邻中心要做的就是把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聚集到一起，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目标，让他们接受同样的训练，最后作为回报，它会听到所有这些不同的声音组成强壮有力的合唱。我很难说明赫尔大厦成立的主观原因在多大程度上综合了以上提及的三个趋势：一、从社会角度解读民主；二、人们对推进民族进步的深切愿望；三、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运动。你没有办法完美地分析一件正在进行中的事情，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动力可以与这三个趋势结合，比如追求一些人想象中那美好的新型社会形态，只承认大公无私的爱所带来的喜悦；亦或是对赞美的渴望，即使那些纤细的手掌击出三倍的掌声也不能满足，人们仍希望听到粗糙的手掌发出的低音来与之融合。

睦邻中心是一项实验，帮助解决现代城市生活中涌现出的社会和工业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局限在城市的某个部分。它还可以减轻两极分化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和教育特权方面体现出的强烈的分化感。本质上讲它并不能代表任何政治和社会宣传机构，但它必须欢迎这些机构的到来，也许他们之中就会出现一位天使。睦邻中心唯一让人担心的是它不够灵活，它需要有快速的适应能力，好根据环境需要随时做出改变。它必须殷勤好客，并以最大限度容忍罪恶，为社会实验做好准备。它应该在居民们的耐心等待中逐渐积累起事实与情感。它必须依附于以人类团结为基础的哲学理论，这个理论不会因为人类中存在酗酒的女人和低能的孩子而动摇。它的居民们要摒弃自己的自负和任性，学会鼓励和解读邻居们的想法。他们必须满足于一起安静的生活，必须克服将他们隔开的不同种族和语言，直到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和共同的喜好。他们

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邻居们的需要看作一个整体，为立法提供依据，并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保护它。简单地说，为了更好的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激发出工业化进程带给每个人的社会能量，人们要带着自我奉献的精神，把整个城市看作一个有机体，尽一切努力去同化它，克服它的过度差异化。

通常我们会将所有的哲学观点归属于道德层面，将历史的修正解释为不寻常的传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智慧的哲学理论可以促进人类团结。高等道德学家教导我们，没有社会的整体进步，个人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均无法得到改善。这种必然性正符合我们开设睦邻中心的主观意愿，帮助我们完成对自我和整个社会的救赎。

注释：

[1]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

[2]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

[3]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因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称。

[4]沃尔特·贝森特（Walter Besant，1836-1901）：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

[5]圣彼得：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天主教视为首位教宗。

[6]在圣经里，耶稣把自己比作牧羊人，把信徒比作羊。公鹿对溪水的渴慕则代表人心对上帝的向往。

[7]圣保罗：是神所拣选，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使徒，是对早期教会

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

第七章 赫尔大厦的早期工作

美国最早成立的睦邻中心坚持每一项新工作的开展都要以事实为依据，可以说这代表了慈善活动的一个稍显严苛的标准，而赫尔大厦也执行了这一标准，我们新咖啡馆的设立就是从一个公共厨房开始的。一项对糖果店的调查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缝纫女工在工作繁忙的季节疏于照顾家人，因为她们必须一整天不间断地工作，做出十几条裤子，即便如此，一天也只能赚到不足十美分的微薄报酬。她们只能从附近商店买一些速食罐头食品，或者给孩子们点零钱，让他们买些糖果当作午餐。

有个居民在美国农业部的建议下做了一项关于不同国家移民日常饮食中营养量表的调查，另外一个居民为劳工部做了一项关于意大利移民饮食的调查，以验证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会直接影响到生活成本”的推测。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意大利人在我们吃晚餐时来到赫尔大厦，讶异于美国人的食物种类竟如此丰富，他一直以为我们的餐桌上只有土豆和啤酒。经过问询我们了解到，原来他住在一个爱尔兰酒馆隔壁，每天除了来回运送的土豆和啤酒没见过别的。

新英格兰式厨房那时刚刚在波士顿兴起，作为主要负责人，理查德夫人希望便宜的日常菜蔬经过细心烹饪也能变成美味佳肴，同时，它们的营养价值也能满足那些要求苛刻的人。这类烹饪可以在科学训练和细心监管下的公共厨房里很好地实现。赫尔大厦的一个居民到波士顿向理查德夫人学习，在她的指导下，我们对公共厨房能为邻居们提供改良的食物有了更高的期望。但我们没有想到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口味差别会如此之大，即便在几年时间里我们卖出了越来越多精心烹制的食物之后，仍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一个直率的女人道出了他们的想法：这些食物固然有营养，可是她并不喜欢营养食品，更倾向于想吃什么就吃什

么。

如果说人们对营养食物的接受较为缓慢，那么在同一栋楼里的咖啡馆和健身中心的社会价值却是很快就体现了出来。酒馆则是周围唯一能供移民组织社交活动的场所，他们在那里举行婚礼和洗礼等合法的庆祝活动。

这些场所的租金都非常便宜，更多的钱则被投入到了“吧台”上，如果不理解这其中的内涵，只能说宾客或主人是吝啬的。可是有些老练的主人却利用自己的社交能力来做交易并谋取利益，导致许多聚会都办得虎头蛇尾。于是我们的健身中心一开始就受到了欢迎，因为这里最适合让年轻人的俱乐部举办舞会了，而且楼下还有糕点供应。我们还试验了每一种已知的软饮料，从昂贵的苏打水到瓶装的葡萄汁，但是我们并没有也没想过成为酒馆的竞争对手。我记得一个男人四处打量了这个温馨的小屋后说：“如果有酒卖，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呆上一整天了。”但是咖啡馆逐渐有了它自己的定位，它成了街坊间的社区中心，或者说一项便利设施。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包括附近工厂的员工和公立学校的老师。在某种程度上，赫尔大厦的学生们和俱乐部成员们都和城里其他的团体一样，他们共进晚餐，筹办聚会和社交晚宴。咖啡馆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告诉邻居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要随时调整我们的工作，以适应他们的需求。

另外，更好的食物无疑是必须的，可是为社交聚会所用的安全舒适的场所也很重要，当时的人们恐怕只能追求其中之一。我们完全无法想象15年后芝加哥会建成有独立舞池和餐厅的娱乐场所，让年轻人对快乐和社交组织的渴望得到了彻底的满足。即便在当时，一位赫尔大厦俱乐部的成员被委任为道格拉斯公园的负责人后，也因为开放了第一个公共游泳池而让俱乐部的同伴们骄傲不已。

赫尔大厦成员早期的工作热忱其实与艺术家有些相似，他们把内心

的想法通过特定的媒介转化为外在的表现形式。我们对经济斗争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混乱保持高度清醒，始终觉得这些斗争本身就是力量的源泉。母亲为孩子的无私奉献，男人唯恐不能养家糊口的恐惧，在我们看来也是一种力量的累积，这些感觉和热情在无形中供养着我们的社会，保护着我们的世界。我们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可以从悲剧中找到一个共同的觉悟来将它治愈，从不幸中提取一个团结的力量来与之抗衡。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知道我们和邻里之间存在着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就算居住和环境最为恶劣的地方，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也一样存在，面对疾病和衰老我们都希望生活有所保障，而穷人正是因为缺少这些保障而饱受折磨。难道我们就不能不顾这些差别，付出一点点努力，让团体的力量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吗？

我们带着这种隐约的希望建立起赫尔大厦煤炭合作社，雇佣了一位来自英国有过类似经验的工人阶级作为领导人，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合作社吸引了很多社员，蓬勃发展了三年的时间。其间一些会议的议题甚至涉及到了生命的意义，人们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对火和温暖的最原始的依赖。合伙人们深知在贫困时期生下孩子，然后看着这些小生命奋力生存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叙述一针见血，自古以来，拼尽一切生存下去的信念一定会战胜贫穷和痛苦。然而这种对逆境的熟知和怜悯却几乎导致了这项事业的破败，他们投票通过了买五赠一的提议，并且每作成五笔交易就把收益分给煤炭主人，而不是股东。“因为不忍心让他们一直等着分红，”保守的大买家们总是这样说。无论如何，到了第三年的冬末，尽管赫尔大厦街区的东南角还有着大片的煤场，每天的总收入也达到了300到400美元，可是如果这种慈善政策一直持续下去，合作社就会愈发入不敷出。最终合伙人们都撤出了股份，终止了这项实验。

我们的下一项实验，大概由于是自发的，则做得更加成功一些。

一些在制鞋厂上班的女孩在罢工期间聚集到赫尔大厦，她们互相讨

论，得出的结论就是，像他们这样在工厂寄膳，唯恐落后而被解雇的女孩，往往是最容易被吓到，最先妥协的罢工者。经过对这些异常困难的处境的叙述后，有人说道：“我们难道不能自己成立一个膳食俱乐部吗？这样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团结起来了。”这件事进行得飞快，我们在一起大声朗读毕翠克丝·波特^[1]的有关“齐心协力”的童话故事，一起讨论这项工作的魅力和困难所在，然后于1891年5月1日在赫尔大厦附近租下了两栋舒适的寓所，帮她们付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并将房子装饰妥当，之后就完全交由她们自己管理了。法国人认为这项工作就像行军，全靠自己摸索着前进。困难固然存在，却不是无法逾越的，美国劳工部长在俱乐部成立两周年之际到访，他在当天的讲话中说，他的部下考察过很多合作性质的俱乐部，这是第一个由女性建立和管理并获得了成功的。到第三年末，俱乐部已经包括了六栋寓所以及本来就居住在里面的50名成员。

然而我们逐渐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对邻居们习惯性的热心回应，另一方面却无法¹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为了提供更多帮助，我们为珍妮俱乐部找了一栋房子，虽然环境多少有些不够舒适，但我们觉得俱乐部的成功才是对一栋房子价值的判定。

直到那时，我们的生活一直像早期的教堂一样宁静，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最慷慨的诠释。诚然，许多人仍对睦邻中心这个概念持中立态度，还有一些人了解到我们的付出之后用假装宽容甚至调侃的态度来开我们玩笑。不过这些都是遥远和不真实的，我相信就算这些批评影响到了睦邻中心成员们的生活，他们也会理解的。

这种情况在普尔曼大罢工^[2]之后明显不同了，后来我们为了争取工厂立法所做的努力引来了大量的猜忌和怀疑。在那之前我们一直被看成是一个带着理想主义光环的新式慈善机构。但是严峻的考验到来了，首先就是事关珍妮俱乐部的新址。一天，一位赫尔大厦的托管人为我们带

来了个好消息，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打算捐赠2万美元建设新的会所。可是当得知这位慷慨的朋友的身份时我们才发现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商人，克扣女孩们的工资，甚至与一些交恶势力有染。我们不可能用他的钱为打工的女孩们建俱乐部，所以当即拒绝了。托管人于是处在了极其尴尬的境地，毕竟是不容易才劝说他来捐钱的，本以为我们会兴高采烈地接受，现在却不得不带着一个即便不算羞辱，却也足够令人恼怒的理由把钱退回去，因为这钱不合适。

在接下来长时间的讨论中，我们发现这样的拒绝只有向公众舆论公开才有价值，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些人赚钱的手段，可是这件事实际上是赫尔大厦的代表先引起的，鉴于这个性质它还不能被公开。但是我们的托管人已经明白了事情的本质，就是我们绝不能接受这样的金钱。当时我们进行了很多关于“肮脏的钱”的讨论，这件事表明处理这类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不知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责怪某一个做这种事的人，毕竟他的同事和竞争对手都认为这是合法的。但同时，我们相信只有那些认识到社会环境中不正当一面的人们才能够推动社会改革，他们心中对那些财富的累积所抱有的疑虑是进行道德考量的唯一契机。

后来，新的会所是由赫尔大厦的一位老朋友建立的，他非常关心这些女孩，并在之后的12年里见证了珍妮俱乐部的成功运营。不过我仍对之前拒绝捐款的事有些耿耿于怀，后来有机会到布里斯托尔与大教堂教士，汤恩比服务所的创始人见面，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为了举例他带我参观了一个美丽的小教堂，建造这座教堂的是布里斯托尔最后一个贩卖奴隶的人，他一直被人们痛恨，所以希望用这些非法收入建造一座高雅的哥德式建筑，通过这个转变得到上帝和世人的认可。这个动力可能是源于他自己良心发现，也可能是源于周围人良知的苏醒，意识到古老的非法奴隶交易终于走到了尽头。废奴主义者也许会把这个美丽的建筑看成是真心忏悔的成果，亦或者会在道德层面上蔑视说这是在混淆视听，是在对一个奴隶贩子的善行的夸大。

巴奈特教士没有对这件事进行评判，但他却明确指出必须尽快通过立法来实现工业进程中更高的道德标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试图控制法律的个体必须受到严厉审判。这个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针对“肮脏的钱”的激烈讨论，我一直没有想通问题的本质。我收到了很多邀请，希望我针对这个议题写一些文章或者做一些演讲。也有很多学校的激进分子来信表达他们的反对观点，作为新芝加哥大学的一员，他们挑战我就像是在挑战这所大学的正义性。

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看到了许多长辈对宗教传播和道德提升这二者的困惑。一天早上，我收到一个纽约市睦邻中心的负责人的来信，信上说他的托管人向一个以做生意不择手段而闻名的商人募捐。我的一个代表却因此递交了辞呈，因为他希望自由地表达自己对这种严肃的道德问题的看法，而负责人们也随时可能因为他对捐赠人攻击性的言辞而接受他的辞职。就在那个早上，当我正被这封信搞得一头雾水的时候，我接到了信里提到的那个商人的女儿的电话。她刚好在芝加哥，希望我给她提供一些能证明睦邻中心不是宗教组织的证据，帮助他父亲驳倒那些指控。她说：“你看，是睦邻中心向他募捐的，他也很乐意这么做。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如果没有良知，他一定会因为他们没有说出宗教方面的理由而拒绝捐出这笔钱。”

我记得后来和华盛顿·格拉顿^[3]也讨论过这件事，因为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现在关于这个“肮脏的钱”的话题应该告一段落了，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一个目前还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关系到纯粹的道德观，但我们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的情绪会如此强烈。

睦邻运动中也有一些让人们气馁的时刻，19世纪初期在芝加哥开展的很多合作社都没有成功，比如在范伯伦街上的一个木匠铺，一群失业人员组织起来的职业介绍所，看起来都合情合理；以及最后终于在田纳西州的拉斯金取得了成功的有关移民区的非常有抱负的计划。不谈那些

失败的例子，那些满腔热忱的人们仍以势不可挡的乐观开展着合作社的计划。我记得在一年夏天的世博会上，我在赫尔大厦组织的一次合作社会议上认识了亨利·D·劳埃德先生。就像其他人收集硬币和图画一样，他狂热地收集各种合作实验的记录，在会议之前他向我们展示了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在这项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他还将这些写进了后来出版的《合作关系》一书里。会议上一个资深的合作社成员指责现代的合作方式更像一个残酷的交易，声称他自己更喜欢那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却依然像地心引力一样稳固的情操。虽然劳埃德先生和我都同意这位激昂的老人所描述奉献精神已经逐渐消失，但我们愿意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好好地珍藏起来。

人们应该把生产力集中起来而不是在竞争上浪费精力，这个梦想传遍了整个世界。五年后同样是在赫尔大厦举办的合作社会议上，一位意大利参议员向他的同胞观众们展示了意大利北部成功的合作银行的系统，这种合作方式带来了每年上百万法郎的收入。再后来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4]阐述了爱尔兰信用社取得的卓越成功。

有一次我在达利奇与英国的合作社成员见面，他们对这项事业的热衷让我非常感动，事实上我很少被这样的热情所感染。另外一次是我在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做评审的时候，在整个社会经济展馆中，合作工会独立完成的建筑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一个人看到其他人的理想能够实现的时候，他自己的信念也会愈发坚定。至少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合作社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我还记得我在印第安纳州新哈莫尼做的一次激情洋溢的演讲，在之前我就对罗伯特·欧文^[5]的故事感到惊讶，他多年前在这里做过关于合作社的实验，这里的每个年轻人都对社会改革非常关注。我非常高兴地看见经过这么多年他所传达的精神依然在这个小镇得以保留，一位年长的合作社成员多年来一直期待与赫尔大厦建立友谊，虽说这只是因为他听说过我

们对煤炭合作社的尝试，我仍觉得自己对这个理想的坚持因此而更加坚定了。

那些年的很多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却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启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长期地影响了我们对所谓犯罪和恶行的判断。我还记得那一次我带着一个意大利囚犯的妻子、孩子和教父去州立监狱看他那天所发生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当我们到达监狱，看到那高耸的围墙和武装的哨兵，教父突然像发了狂一样把帽子扔到地上用力踩踏，一边扯着自己的头发一边用怪异的意大利语大声咒骂，直到一个保卫看到他的行为后问我们为什么老人会火冒三丈。而当我们终于看见了罪犯，我极其困窘地发现他的妻子除了谈论他穿的囚服之外什么都没说，直到那个可怜的男人开始懊恼地哭泣。在我们回芝加哥的路上，他们八岁的儿子给了我两个橙子，当我因此深深的沉浸在“每一代人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想法中时，列车员在我的嘴里发现丢失了的水果，并威胁说要把孩子抓起来。其实更加让人不解的是，在整件事里，男人、他的妻子和教父，都不认为他是一个罪犯，他只是在玩牌的时候一时冲动拿刀刺向了对手。“为什么一个运气不好的人要永远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呢？”他们不停地问。

我记得还有一些“误入歧途”的女孩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扰，这些年少无助的十五、六岁的孩子们，甚至还没有树立起成熟的道德观。有一次警察带来一个女孩，希望我们收留她直到她能作为证人，其间女孩一直紧抱着一个陪着她度过了六个月噩梦般生活的旧娃娃。另外两个早熟的孩子直接从库克郡医院的产房来到这里寻求庇护，每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只是因为她们害怕回家会挨打，对她们来说生活里从来就没有过闲适和安逸。第一次有年长一些的女人来找我们，是为了她即将从德国过来的妹妹，她希望我们能帮她找一份得体的工作，过上像样的生活。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也多少有些习惯了她像谈公事一样谈论自己生活的口吻，便鼓起勇气打听她的经历。简言之，她来自德国，在一个美国

人家里做音乐老师，后来与男主人有染。两年后她逃到了芝加哥，生下一个孩子但不久就夭折了，于是她无家可归，陷入了如今的处境。看到她对家庭的渴望，我们说服她在妹妹来之前搬到了一处像样的寓所，后来她凭着精美的刺绣手艺养活自己度过了艰苦的一年。但最后她终于放弃了挣扎，因为她那已经在大服装厂里站稳脚跟的妹妹，对她之前的生活产生了怀疑。

比起处理这些失足少女的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后来几年里我们面对逐渐兴起的白奴交易，面对受害者和他们的父母时，则更加觉得沮丧不已。在最近披露的事件中，我们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束手无策了，尤其是针对犹太女孩兴起的白奴交易，使她们失去了几代人固守的贞操。我们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帮助这些女人甚至孩子从痛苦中恢复，融入到这个伤害过她们的社会中来。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们直接从一家维吉尼亚州的卷烟厂中解救出来的两名女孩，她们在刚刚抵达的那个晚上正在寻找住所的时候被诱骗到一栋破烂的房子中。虽然及时获救，她们身上却留下了污名。我们没办法让她们加入赫尔馆大厦的任何社交俱乐部，不是怕她们曾经的污点，而是因为俱乐部成员的家长们坚决抵制她们的到来。我们的一个托管人成功说服一个真心悔过的14岁女孩搬到城市的其他地方重新开始，把她送到了芝加哥一座大教堂的主日学校。托管人希望与善良女孩的接触以及学校的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不幸的是教堂的负责人听说了她的过去，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其他的女孩，拒绝她加入学校。回来以后她愤慨和沮丧地向我们讲述这一切。如果不是考虑到我们自己俱乐部的经历，我们很可能会对这个“像糖果铺橱窗一样的主日学校”表达同样的愤怒。

也许这些辛酸的回忆多多少少使我们在赫尔大厦第一年的生活被疲惫扰乱了，但是作为一个需要长期面对来来往往的人们的睦邻中心来说，我们当然会慢慢习惯那些无休止的事件带来的困扰。早上来到幼儿

园的孩子，下午来到俱乐部的少年们，以及每个晚上占据了每个房间的教育和社会组织的成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需要做出调整，任何学生想自己坐在壁炉边上读书都是不允许的。

因此，与我们面对这个混乱城市里从事生产的人们所遇到的难题，以及它所带来的困惑相比，放弃“个人喜好和享受”仅仅是一件小事。生活在很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趣的是，在我们曾经因为生活的严峻而沮丧，因为缺少地方法规而压抑的时候，为赫尔大厦建起的第一栋房子其实本应该是一个美术馆，在一楼有阅览室，楼上有画室，但二楼最大的空间是为艺术展览而精心设计的，意在带给人们精神上的享受，而不是用来维持生计。重要的是一位芝加哥的商人喜欢上了这里的画作，回应了这种新型的，当然也是复杂的，所谓睦邻中心的事业。

后来情况变得有些复杂，这栋房子建成于1891年，而我们对那块土地的免费使用权只能延续到1895年。最后房子的捐赠人帮我们解决了难题，此后每年又捐赠给我们1000美金。但我们还是需要将建筑限制到最简单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我都清楚地记得房子建成时那振奋人心的一天，我找出自己在欧洲时记录了我在乌尔姆经历的笔记本，希望找到一段关于我那时认为的“博爱的教堂”的合适描述。这段描述是：“普通但是广为流传，有着代表与上帝沟通的老式的尖顶和螺旋，好像能容下相关团体的所有人”。恐怕这对我们的建筑主旨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多年来一直与我们很要好的建筑师还是让人惊叹地用最少的钱满足了最繁复的需要。在那些本已让我们困惑不已，赫尔大厦还被称为反宗教之所的日子里，这些少女情怀的文字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这第一栋建筑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之后一栋又一栋加入赫尔大厦阵营的楼房更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和荣誉。它们都以砖块和水泥建造，让全世界看见了我们在做什么，它们向芝加哥证明教育和娱乐设施应该在移民区得到发展。很多男孩来到我们由酒馆改造的临时健身中

心，一直吵嚷着需要更大的地方，于是很自然的，一位热爱运动的芝加哥人决定为他们建一栋新楼。

我不想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因为负担不起而经常低声下气地讨钱，甚至放弃一个又一个绝佳的计划。事实上，我们不会过多考虑这些困境，照旧每天煮饭、读书、打扫，一旦存够了钱，就会开展一项被大家所热切盼望的工作。

尽管经费紧缺，我一直相信一旦我们将睦邻中心这个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资金自然不会成为问题。我根据睦邻中心理论总结出一套不抵抗或称为全民行善的理论，虽然此后经常被粗鲁地搅乱，但不把这些记录下来，这一章就不能算完整。那时我开始相信如果赫尔大厦的活动遭人误解，要么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解释时间，要么就是我们的动机不够单纯，我确信无私的行为就像真理或者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透明并且充满感召力。

很显然，比任何理解或者回应更加让人欣慰的是，在赫尔大厦聚集起来的这些越来越多的人们，是凭藉自己的觉悟建立起了最稳固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了追求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这些居民们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发自内心地关注社会环境，而睦邻中心则是他们能参与进来的有效方式。后来街对面一栋供男性居住的房子也加入了我们，赫尔大厦在成立的第五年末已经涵盖了共15栋住房，其中大部分仍然被人们看作是睦邻中心的一部分。

即使在最初的几年，我们也隐约地发现有些社会情绪，作为“人口持续增长的产物”，在睦邻生活这块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就像更高的目标只能建立在交流和友谊上一样。

有时我觉得受邀参加一些典礼可以帮助我们表现和推进社会运动。但我也一直的因为收到的邀请过多而困扰，有人请我做葬礼主持人，还

有陌生人想找我做古怪的忏悔。有时我会接受前者，甚至有一次糟糕的经历是应太平绅士的要求在婚礼上读诗。不久我就学会了坚定地拒绝这些事务，尽管我能理解对许多没有所属教堂的人来说，睦邻中心所代表的这种模糊的人道主义是他们表达宗教情感最适合的方式。

一年夏天我在英格兰郊外与约翰·特雷弗^[6]讨论他尝试建设的工人教堂，以及他想把工人生活中的辛劳和危险转变为普遍友谊关系的愿望，那时我第一次觉得睦邻中心对于当代人的精神意义变得清晰了。就在那一年，一张埃及的莎草纸被带到大英博物馆，上面写着耶稣的名言：“搬起石头，你就能找到我；劈开丛林，我就在那里，”对英国人来说这是证明工人阶级和基督教义之间的关联的有力提示。

在赫尔大厦最初的几年里，我们没有在投机事业或者神秘主义的迷宫里迷失自己，但我从一个来自苏格兰的邻居那里得到的夸奖却有着敏锐的穿透力。他路过波尔克街的时候我正站在我们新建的健身中心的地基边上，他友好地说：“赫尔大厦还在扩大呢。”我回答说：“也许我们扩大得太快了。”“哦，不是的，”他继续说，“你负担得起，就算在泥土里也建得起来，”说着他看了一眼还没有铺设好的泥土路面，让这个夸奖有了一个本质上的转变。波尔克街的这些情形让后来到赫尔大厦参观的比利时王储也颇有微辞，他摇着头默默地评价说：“在整个比利时也绝对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街道。”

在赫尔大厦成立的第五年年末，一些第一手材料以及我们的感想被收录在一本叫作《赫尔大厦的地图和文献》的书里。地图是一位居民为美国劳工部做的一项关于“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的调查时收集的，文献以真诚和直率的关切论述了许多邻里间的事宜。第一版印刷经过两年才卖完，波士顿出版商显然觉得没有再版的必要了。

注释：

[1]毕翠克丝·波特（Helen Beatrix Potter, 1866-1943）：英国童书作家与插画家，彼得兔是她的创作中最知名的角色。

[2]普尔曼大罢工：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发端于普尔曼铁路公司，席卷了几乎整个美国的各条铁路。这次罢工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3]华盛顿·格拉顿（Washington Gladden, 1836-1918）：美国公理会和社会福音运动的领军人物。

[4]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Sir Horace Plunkett, 1854-1932）：英裔爱尔兰人，农业改革家，政治家，作家。在爱尔兰开创了农业合作社的先河。

[5]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因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而闻名。

[6]约翰·特雷弗（John Trevor, 1855-1930）：工人教堂的创始人。

第八章 贫穷问题

在赫尔大厦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就惋惜地发现，一个试图与邻居们分担贫穷压力的睦邻中心往往要对那些曾被忽视了的凄凉过往予以重视。一天，一个十岁的男孩带来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妇人，他说，老人六个星期以来一直睡在他们厨房炉子边的临时床铺上，他们谁都没有见过她，但她说她的儿子曾和帕在一起工作，所以儿子去世时，无家可归的她就来到了这里。男孩最后说，我们的房子比他们的大很多，他觉得我们应该有地方收留老人。老人始终一言不发，但她审视四周的眼神里却透露出对济贫院令人揪心的恐惧，这一点实在让人痛心，那些居住在郡医院的人们和仍在反抗它的人们几乎同样悲惨，而这位老人正是这悲惨命运的活生生的体现。

接下来的几天里，老人的眼神几乎让我难以承受，直到我被几个受了惊吓的女人们叫到一个德国老妇人的家里，来自地方政府的两个男人正试图把她送到郡医院去。可怜的老人紧抓着一个破烂的小抽屉柜趴在上面，她抓得太紧了，好像不把柜子扯下一块来就无法把她移开。她没有哭，没有呻吟，简直没有发出任何人类的声音，只是在断断续续的喘息之间发出骇人的尖叫，像一只掉进陷阱里受了惊的动物。几个女人和孩子站在门口，惊呆地看着这一幕，黑暗和恐惧总是笼罩着这些没有劳动力的穷人，而这一切更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愈演愈烈。我和邻居们马上做出了种种保证，表示愿意赡养老人，地方官员正巴不得摆脱这个包袱，便把她交给了我们。人们对济贫院的恐惧，作为颇具威慑力的济贫法^[4]实施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产物，在我看来并非无据可依。那年夏天我因库克郡医院的老妇人们身上那种不该有的孤独和无助让自己陷入了长期的痛苦，早些年我认识她们中的许多人的时候，劳作还是必须的，她们忙忙碌碌，觉得自己仍有用武之地。因此，从这样一个一生忙于料

理家事的妇人身边夺走那些看似愚蠢，但对她来说却是习以为常，赖以生存的财产，便是夺去了她辛勤劳作的全部动力，甚至她的生命。老人在她的碗橱里装满了宝藏，渴望工作的时候可以用到它们，追忆往昔的时候可以让思绪驻足，而没有了这一切，仅仅给她一张床，一把椅子，无异于把她的生活压迫到了无法忍受的境地。

可怜的老人如此绝望地用双手将抽屉柜抱在胸前，俨然是抓住正常生活最后一丝希望。那之后的很多年每到夏天我都会从济贫院邀请五、六个老妇人来这儿度过为期两周的假期，她们都欣然接受我的邀请。郡养老院的老头子们每年夏天都有机会离开那里去寻找住所和食物，而后又精神饱满的回来。妇人们想这样做却必须有来自外界的帮助，而且她们能为假期花费的钱也是少之又少。她们会花一点零钱坐车来到城里，与老朋友一起住在每星期1美元的住处，赫尔大厦的咖啡馆每天为她们提供两餐以及不限量的茶水，她们会对老朋友们说自己是“出来找点乐子”，但是还没有决定“到了冬天还会不会再来”。于是她们充分享受这两周的假期，回去之后给其他可怜的老人们讲述她们的奇闻轶事，作为漫漫冬日里对其他那些人的福利。

这些老妇人的回忆和她们对生活敏锐的觉察，常常令伙伴心驰神往，她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终于可以自由地坦白自己的心声。我还记得我的一个访客，她有许多孩子分散在各地，在她惨淡的一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他儿子麦克的婚礼，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婚宴上供应的简直就是上帝的美酒和佳肴。临行前，我们晚餐一起吃了鸡肉派，结果她很失望，因为那味道“和麦克婚礼上鸡肉派根本没法比”。

有时死亡也无法给那些日渐衰老的人们带来安静平和。我仍记得一个苏格兰老妇人临终前的长久挣扎，为了保持体面反而让自己更加痛苦，到了最后仍在嘲笑奚落那些想要服侍她的人们。“今天早上你们倒是自己来了，昨天不是还只会送东西过来吗？我猜你们都知道医生来过

了吧。别用别的东西暖我的脚，我只要我儿子的那件旧夹克，他30年前是在海里淹死了，但那衣服上还有他的温度，比你们那些该死的免费热水瓶暖和多了。”忽然间她急促的喘息声就停止了，而我只能惊恐颤抖地等着医生过来。

赫尔大厦的人们认为，早期地方立法的不足既造成了城市中的慈善事业无法充分开展，又使人们盲目乐观地认为我们身边并没有贫穷问题。二十年前芝加哥没有任何慈善组织，访视护士协会也没有开始它行善的工作，自发的救济团体虽然已经成立，却在范围和方式上都有诸多缺陷。

当社会改革家们不再讨论普遍原则，穷人们只能认为是贫穷本身毁了他们的生活。我认识一位叫做莫兰的夫人，在一个雨天从地方政府办公室回来，怀里抱着装满豆子和面粉的纸袋，那是带给她挨饿的孩子们的。她没有钱，但为了保护食物不被雨浇坏她还是登上了一辆电车，可是因为装得满满登登的纸袋里的“面粉撒到了一位女士的裙子上”，“豆子掉得到处都是”，售票员狠狠地训斥了她，并且在发现她没钱买票的时候更加恼火。他在赫尔大厦附近把她赶下车，正像她希望的那样。她告诉我们当她发现找不到自己的物品时心情是如何复杂，并承认她顾不得礼节做了些诅咒，但奇怪的是，她的诅咒不是针对那天的雨，也不是售票员，更不是她被关进监狱的那没用的丈夫，而是针对当时芝加哥的社会风气，说这才是所有的事情以及这“受了诅咒了贫穷”的根源。

那年冬天世博会闭幕之后，经济危机席卷了全国，芝加哥的失业人数大为增加，慈善事业中这种普遍存在的风气和缺少组织的现状终于显露了出来。天气刚开始转冷的那天，警察局和市政厅的走廊上挤满了住不起房子的人们，他们在湖边举行了大型的示威，规模堪比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那次集会。

在斯戴德先生写书控诉芝加哥政府的那年冬天，我清楚地记得他每

次来到赫尔大厦的情形，有时甚至在夜里十一、二点。有时他结束对码头附近的调查后，又累又饿地回来，坐在壁炉旁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讲述他奇特的经历。他不穿外衣在户外招工点排队两个小时，才有机会找到一份扫马路的工作；而后在街上遇到的小混混把他当成同类，带去了一个地下赌场。斯戴德先生显然对鱼龙混杂的芝加哥印象深刻，高层人士缺乏正义感，底层的人们却互相关心。在《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一书出版之前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努力想团结起这城市里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还成立了一个临时组织，即后来发展而成的芝加哥市民同盟会。作为五名委员之一，我负责贯彻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建议，而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委任一名委员去解决失业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被满意地解决过吗？市里的很多地方都设立起救济站和临时住房，赫尔大厦也收留了一些实在没有地方去的妇女们，就业中心让女人们做缝纫活，男人们则去扫马路。这种值得褒奖的做法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可接下来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持续下降的收入水平又开始困扰着我。于是我坚持让每个人工作半天赚得75美分，而不是一整天赚1美元，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两天时间赚3美元而不是三天。为了让其他委员充分理解这一点，我辞去了扫马路负责人一职，因为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不是扫马路，而是帮助失业人员，我们必须理智地处理目前的状况，帮助人们今后能顺利地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上。我们的讨论开辟了新局面，把我带到了我从未曾学到过的经济领域中。

慈善事业部当时也开始落成，办事处由一个住在赫尔大厦的波士顿年轻人负责。不过在一开始很难找出科学的方法，而在这个冬天当我尽力去遵照指导行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我认识很久的一位码头运务员刚刚失业，就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有四、五次他来到赫尔大厦救济站寻求帮助。一天我告诉他有一个在排水渠工作的机会并且暗示他，只要还有任何工作能力，他就应该在寻求帮助之前先尝试自食其力。这个人回应说他一直从事室内工作，无法忍受在冬天做户外工作。我只记得我虽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严厉的指责。他果

然没有再来救济站，到排水渠上工作了两天，结果却得了肺炎，两周后就去世了。此后我一直照顾他留下的两个孩子，尽管面对他们我常常会谴责自己，但是他们让我明白生活不能被明确的规则所支配，没有对一个人的生活和习惯的充分了解就无法帮他解决任何困难，抛开这些只考虑独立的事件无疑是愚蠢的。

同样是那年冬天，我一直被穷人之间的情谊深深地感染着；住在楼上的女人很乐意与楼下的家庭分享早餐，因为她知道他们手头很紧；冬天在那里寄宿的男人会帮他们付一个月的房租，因为他知道他们家里的爸爸在外工作；街对面的面包师傅就快被城里的同行们逼至绝境了，但看见孩子们渴望地看着他的橱窗还是会给他们几个干面包，因为他知道他们饿坏了。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还有一些家庭被迫要从当局或者慈善机构寻求帮助，但又害怕自己也被当成那些穷人，他们的确毫无共同之处。查尔斯·布斯^[2]在他关于失业问题的文章中说，工人阶级不应该与没有工作能力的闲散人员同等对待，他们虽然住在一条街上，但把他们混为一谈只能造成各自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那年冬天还有另外一个家庭，父亲在外工作，家里大部分家具已经被典当，孩子们因为没钱买新鞋子而不能去上学，母亲生病在身，几乎负担不起生活用品和药品。两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她邀请我去他们完全恢复了原样的小屋吃晚餐，而她邀请我的原因竟是不希望我记得他们那年冬天的样子，她坚持说在她12年的婚姻生活中那绝对是一次例外。她说就好像她当时看见的我也不是正常的我，而是一个风湿病人，或是因为神经痛而面部扭曲的人；她说人们评价穷人的方式是不公平的。她对待救济站对穷人、以及睦邻中心对邻里们的分别的阐述可能有些不合理智，其实后者是希望去了解人们生活的每一面，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就算经济恢复繁荣之后也不会停止这种交流，而是会不考虑经济干扰，把它变成更自由的社交关系。

睦邻中心也尽量做了同样的努力，以维系它在拥挤的市中心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中的地位。那次经济危机过后的春天，我为了商讨授课合约的事到了加州，惊讶于我们每天经过的连绵的旷野和繁荣的城市，好像已经忘了世上还有这样的光景。

1895年的夏末，我开始在芝加哥市长委任的一个委员会供职，负责调查郡济贫院的事宜。公众把注意力放到了这里，因为某个悲伤的故事夸大了公共事业中的错误，并揭露了那里需要被改进的环境。为了保证改革的管理，公开性是必须的，但是此类的曝光又有可能被利用到政治目的，整件事让人非常费神，这样一种对人的精神上的撕裂恐怕是谁也无法承受的。在调查期间每次我回到赫尔大厦都有二、三十人在等我，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就住在那些涉嫌的机构，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痛苦，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被严刑拷打的受害者。一般他们会说明除了济贫院之外他们没有地方安置那些病患，但是如果真的查出了什么，那么该做的也必须得做。许多病人被带出去没两天、至多几周时间就会回来，他们的监护人表现出的冷漠敌意令他们丧失了自信，变得胆小和惊慌。

赫尔大厦刚落成的那6个月里，我们认识了一个来自德国乡下的农妇，她早年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穷人们是多么可怜地依赖着公职人员的亲善。在美国的四年里她的工作是每天耐心地把水从两个阶梯上抬上抬下，还有就是为铸铁工人清洗厚重的法兰绒制服，而她做这些工作每天得到的平均报酬只有35美分。她的三个女儿都是这个城市里罪恶的受害者。她想不通这一切，只是感到沮丧和迷茫。我们劝说她的一个女儿和背叛她的那个男人结了婚，通过繁琐的法律程序帮她的另一个女儿得到了孩子的赡养费，而对她的第三个女儿我们则实在无能为力了。农妇目前和她的家人住在距市区17英里外的一栋小房子里。她已经买了两块地，并成为了大家的榜样，她养的牛在铁轨附近徘徊，收入来自她10英亩的耕地。她擅长做艰苦的工作，不需要别人的援助，可她却希望联邦检察院能完善立法以保护像她的女儿一样的女孩们。

起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帮助那些遭到抛弃的妇女，为不知所措的她们提供保险，抚慰她们感情的创伤，帮她们布置房屋。那时的医院、郡政府和收容所总是将最需要它们的人拒之门外，而睦邻中心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信息和调解中心，持续活动于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需要它们的市民之间。睦邻中心对邻居们来说就像操场上的大哥哥一样，仅仅是存在就可以保护弱小的孩子们不被人欺负。

我们还认识一些处境困难的妈妈们，她们每天在外工作，有时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有时直接把他们锁在家里。我们遇见过三个残疾孩子，都是在妈妈出去上班时受伤的：一个从三楼的窗户掉了下来，另一个被烧伤，还有一个是脊柱弯曲，因为连续三年的时间里他总是在白天被捆在餐桌腿上，只是当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哥哥中午赶回家把自己的午饭分给他吃的时候才把他松开。天气变热的时候焦躁不安的孩子们无法忍受屋里的闷热，可是开着门的话又怕家里招来小偷，他们又只好整天被锁在外面。赫尔大厦建成后的第一个夏天便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小家伙来到我们的走廊上乘凉。我们让他们呆在那儿，中午给他们些吃的，有时作为回报我们会收到一个在手里攥得热乎乎的硬币，“这是早上妈妈走时留下让我们买午餐的。”在幼儿园休息的时间里我们会找一些自愿照看这些小家伙的邻居们过来帮忙，不过不久我们就把他们搬到了一栋单独的寓所，开始了更加系统的看管。

就这样赫尔大厦成立了一个日间托儿所并在此后一直经营了16年，刚开始在小巷里的一个小屋，后来我们专门为它设计了一栋房子，并命名为“儿童之家”。它目前被芝加哥联合慈善基金接管，在我们街区一栋设施齐全的房子里，照顾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如何在美国生存。早期的日托中心自然增进了我们和那些最为穷困的女人们的联系，她们都背负着家庭的重担，照顾放荡无能的丈夫和她们的孩子。她们中一些人的表现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经受过被忽视、虐待和犯罪等等永远也无法从她们心中抹去的影响，留下的只有煎熬和痛苦。“你丈夫回来了

吗？”所有认识S.夫人八年了的人都会这样问她。以前她每天早上都把三个孩子送到日托中心来，过度操劳的她被上班赚钱和照顾孩子的双重压力累弯了腰。终于等到年长的两个孩子到了年纪开始出去工作，她才奢侈的每周给自己放两天假在家休息。现在她没用的丈夫回来了，那个“绅士的赌鬼”，他无论何时出现在人前都穿着白衬衫带着金表，实际上却过着闲散堕落、挥霍无度的日子。你不敢想象他的存在会给这个家庭增加多少经济负担，事实上你知道他一直在远处等待着直到他确定了孩子们已经可以赚钱养家。S.夫人没有假装开心他能回来，但她会简单严肃的回答：“你知道我对他的感觉从没有变过。你可能觉得我很傻，可是我一直以他的外表和他表现出来的素养所骄傲。在过去的八年里孩子们还小需要照顾，我一直很孤单很想家，但我无法让自己责怪他，事实上我常常祈求上帝把他完好无损的带回我们身边，现在他回来了，我很感恩。”她沉着地传达这个好像已经让她有了安全感的信息。

另外一个处境相似的女人，独自抚养她的三个孩子，五年里她自甘堕落的丈夫只知道从家里拿钱买酒，一直让她担惊受怕。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离家多日之后衣衫褴褛的回来，凄惨地表现出一副真心悔改的模样。可怜的妻子接受了回头的浪子，相信了他的悔过之心可以持久，相信如果和孩子们一起在复活节那天带他去教堂，就可以让他在神父面前发誓，这样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经过很长时间紧张的准备，花光了她全部的积蓄，他终于在复活节的早上坐在了家门前的台阶上，洗漱干净，换了一套新衣服。她让他自己坐在那慵懒的春光里，回头去帮孩子们穿衣打扮。当她和三个衣冠整洁的孩子终于打开房门准备出发的时候，回头的浪子早已不见了踪影。直到午夜他才烂醉如泥般回来，早上穿的衣服已经当掉了，身上又穿得破烂肮脏。她什么也没说就让他进了家门，开始了另一次的恶性循环。类似这样道德败坏甚至犯了罪的丈夫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在七年的时间里从未错过一次到监狱里看望她的丈夫的探视机会，他们的孩子在日托中心骄傲地讲述他爸爸说过的话，就和他妈妈表现出来的义气一样，一点也不因为他感

到丢脸。

当一个人对这些能干的女人们充满崇敬之情，他应该也对他们的丈夫有些话说，这些可悲的男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败给了生活的考验。有时这种失败纯粹是经济上的，男人们应当给他们的孩子以最好的关怀、指导和教育，但他们却没有这个能力。仅仅一个月前，我还在街上遇到了一位之前一直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的母亲，这五年里她一直住在城市的另一边，我问她五个孩子生活得怎么样，她难过地回答说：“谢谢你的关心，除了玛丽之外，其他的孩子都曾经被捕过。”我一直以为她的丈夫把孩子们看管得很好，但她突然说：“问题就在这。我厌倦了整天照顾他，也不相信他说的他那么懒惰只是因为健康问题，所以我离开了他，说我今后只会养育孩子们不会再管他了。从那时起四个儿子的问题就都来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经过多番努力我终于为杰克和双胞胎们付了学费，让他们上学。乔则直接去工作了，带着他不光彩的记录。我现在真的不敢说，一个女人能赚钱就意味着她可以既当爸爸又当妈妈。”

遇见她之后我不停地想一个问题，一个女人是应该以工作来评价一个男人的价值，因为他没有收入能力就离开他呢，还是不放弃那个可怜的幻想，同时照顾他和孩子们呢？到底哪一种想法更傻？

后来一个异常凄惨的故事告诉我对后者的尝试一定是徒劳的，“小傻瓜”是一个男孩的昵称，他经常被裹在他妈妈的围巾里送来日托中心，头发里总是掺杂着来自他妈妈工作的毛刷工厂的羽毛或者小绒毛。一个三月的早晨，妈妈上班之前在屋顶平台上晾晒衣物，五岁的男孩拿着衣夹在她脚边跑来跑去，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小傻瓜”从屋顶掉到了小巷地面上。他摔断了脖子，可怜地躺在一堆冰冷的垃圾上，失去了知觉。然而过度劳累的妈妈们的从来不认为他们的孩子会受伤，他的妈妈甚至还在开心地叫他“快爬起来”。葬礼之后，可怜的妈妈坐在日托中心，

久久不愿回到自己得房子中，虽然知道没用，但我还是尽量安抚地问她能为她做些什么。疲惫不堪的她看着我说：“如果你能付我明天的工钱，我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我要在家抱着孩子，小傻瓜总是让我抱着他，可是我没有时间。”这句话也许代表了很多来到日托中心的妈妈们的心声，作为最穷困潦倒的妈妈，她们不得不放弃本应属于她们的幸福和快乐。为了赚钱养育孩子她们必须长时间的在工厂做工，却给不了可怜的孩子最为渴望的温暖和关怀。

现代社会为培养教育年轻人做出了莫大的努力，却让他们的妈妈一直从事下等的工作，这是多么愚蠢！是我们一直允许着对这些高贵的母亲们的糟蹋，极其矛盾地把重心放在了下一代身上，放在了他们被延长的童年上，却忽视了他们的母亲。回忆起另一位母亲的经历，我感到更加愤慨。一次我在教育部的办公楼里开会到很晚，当我11点钟走出来的时候，在14层的走廊上遇到一个我认识的女人，她正跪在地上擦洗大理石地面。她站起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发现她从头到脚都湿透了，赶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回答说她每天晚上5点出门，之后6个小时都不能喂孩子。她的母乳于是和擦地板的水混杂在一起，直到午夜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才能用剩下的母乳喂养她哭喊的孩子。

以上这些故事仅仅来自于睦邻中心所接触到的最贫困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

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我必须提到我认识的另外一群勇敢的人，他们对饥饿似乎漠不关心，把精力都放在了更高的理想上。这些富有远见满腔热忱的人们中有不成功的艺术家、作家和改革家等等。我们曾在赫尔大厦认识一位很有教养的德国女士，她完全沉迷于用颜色去表达音阶和旋律。由于矮小丑陋，她每天晚上都躲在自己的车厢里，睡在一个像吊床一样栓在四个角落的帆布上，吃的都是些粗茶淡饭。即便如此，一旦有访客在她的桌子上留一些钱，她就会去买些器械和轻柔的彩色丝棉，

继续追求那些美妙的尝试。另一位可怜的残疾老妇人，她是一个船长的遗孀，把麦乳精片当成一种廉价的即食食品，几乎完全靠它过活，却经常热情洋溢地谈论她年轻时作为插画画家的时候，在旅途中完成的那些精美图画的原稿。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妇人是一个顽固的发明家。虽然年轻时在英国见过世面，但我们认识她时，她基本上依赖百货公司演示柜台发放的食物样品过活，她住在一个公寓地下室的密室里，靠煤炉把食物煮熟。她的发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可是很多专家看到她的作品后却评价说它们非常有创意，颇具启发性。一次我看见她如此庄重和威严地把代表那些褒奖的丝带缝到外衣上，才发现对于她经济状况担忧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这是我认识的很多不屈不挠的灵魂中的三个例子，事实证明他们在生活质量上是残缺的，有时甚至跟生活本身开了个玩笑，不愿意去想自己是否拥有所谓的庸俗的物质财产。

注释：

[1]济贫法：16世纪圈地运动以后，因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英国王室颁布的社会救济的法律。然而受救济者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需要从事苦役的劳动，因此当时的济贫院让贫民望而却步。

[2]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 1840-1916）：英国著名慈善家，社会学者。

第九章 长达十年的经济讨论

人们热衷于对芝加哥二十年前的局势进行频繁地讨论，这一点常常让赫尔大厦的居民感到不解。虽然那时居住在睦邻中心的年轻人大都意识到了社会的失衡，因而只能从慈善事业和民间活动提供的“乏味工作”中找到解脱，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早期这些经历而加入激进分子的队伍。从1890到1900这十年间，芝加哥处于一个宣扬反对积极的社会工作的时期；一个高举旗帜前进、为树立基本原则做出表率时期；而不是通过揭露事实本质、提供法律准则和建立民间组织等措施使新的社会希望得到认可的时期。

1889年赫尔大厦成立时，干草市场暴乱^[1]已经持续了两年，但那段时间芝加哥显然已经度过了压制措施的第一阶段。到了1889年末的冬天，在公民代表的建议和积极参与下，这个城市终于认识到解决社会动荡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言论自由，是对反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异议进行公开讨论。盛大的公开会议每周日晚上在新礼堂的演奏厅举行，由莱曼·盖齐^[2]这样的公民代表主持，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一个经常在会上发言的男士从前总是被陌生人认出是被逮捕和审讯过的无政府主义罪犯的一员，因为密尔沃基爆炸案发生的时候他恰好出现在那里。人们无法想象今天的芝加哥能举办这样的会议，更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男人竟然可以在由杰出银行家主持的公共集会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很难判断自己的哲学观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使得这些民众相信，如果早点举办这些会议，就可以避免干草市场暴乱以及它轰动一时的影响了。

无论如何，我们好像还需要一些小规模的俱乐部，让人们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在社会理论上的分歧，让各个经济学院的代表可以互相改

进，或者至少可以学会接受各种无益的尝试，以便让全世界相信一个观点的真实性。一个人的狂热只有当他找不到否定自己的理论，当他相信宇宙万物都是一个观点的例证时才会形成。1890年春天，“劳动人民社会科学俱乐部”由一位英国工人阶级在赫尔大厦创立。此后的七年里，俱乐部在每周三晚上8点举行例会，秘书会召集40到100人参加，每次会议的主席由选举产生，一位主讲人先讲话到9点，然后大家就他的讲题展开讨论，随后进行现场辩论，直至10点钟会议结束。这个俱乐部的热情从不会减弱，人们对公开讨论的兴致从不会停止，任何将它转变为学习或者阅读俱乐部的尝试都会遭到会员们的极力反对。

每周在赫尔大厦画室进行的讨论中，每件事都要被剖析到最基本的原理，任何不能“深入到事物本质”的话题都会作为不值得、不彻底的议案被不耐烦地放弃。我记得一天晚上，俱乐部的一个恼羞成怒的会员说：“B.先生相信社会主义可以治疗牙痛。”B.先生立即起身说那是当然的，如果每个孩子的牙齿从一开始就能受到系统的照料，牙痛就会像黑死病从中世纪的隔离制度中消失一样，从地球上的竞争规则中消失。“但是，”他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讨论牙痛这种琐事呢？它们会在重大的社会改革发生之时被自动修正。”即使那个风趣的人也沉浸在集会的庄严氛围里，也许就是在这里，在这些热烈的经济讨论中，社会主义者超越了其他每一个人。他们一般是德国或者俄国人，开始使用逻辑性的演示说明他们在资本集中和垄断增长中看到了不可避免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他们指出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现象增加了反抗资本家力量的人数，并大大简化了公众对这一现象的接受；而垄断“一旦终结就迎来了社会主义”。在每次讨论中与他们对立的则是个人主义者，或被社会主义者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他们坚称除非有平等的机会，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每个人的自由，这样也许任何人都可以找出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

那是亨利·乔治^[3]在纽约竞选那三年里的第一个冬天，当时他的支持者正在全国进行大力宣传。当亨利·乔治本人在一个星期天下午来到赫尔大厦时，健身中心已经挤满了正在听亨廷顿神父^[4]关于“为什么一个自由的思想家应该相信基督”的讲话，人们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欢迎了这位伟大领袖，就像他所有的演讲一样，他那富有高度精神热诚和人道主义热情的激动人心的讲话一度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在世博会期间举办的那些备受瞩目的会议中，由单一税率的倡导者们组织的会议在热烈程度上可谓独树一帜。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的所有讨论都必须由不同派别的党人组织，而部门委员会本身则是由包括我在内的芝加哥市民组成，不过成员每周都在变化，因为委员们会因为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应该的认可”而感到不快。另外，来自东部和西部的信奉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们也会在同一栋楼里亲切友好地会面。这是不是表明比起以社会经验为依据的演讲，他们更喜欢用传统和镇静的方式去展示生活中那些永恒的问题呢？还是说明新型社会科学还不能算是一门科学，而仅仅是作为掩饰我们对工业环境中那些复杂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名词呢？的确，当时社会学还没有定义出它的研究领域这一事实没能显著减少委员会面临的困难，而芝加哥大学也仅仅是在世博会召开的前一年才成为第一个设立社会学院的伟大学府。

与此同时，凭藉多位到访世博会的杰出人士的推荐，赫尔大厦社会科学俱乐部的会员也在逐渐增多，热情也是愈发高涨。我记得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国女士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竟然读过叔本华^[5]的作品而感到惊讶不已。另外一个会员的讲话则给她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当他看见一个资本家，甚至根本不再是一个企业家，坐在马车里穿过街道的时候，他非常确定这个人已经时日无多了，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只会加速他的灭亡，就和同一条街上的那个摇摇晃晃的酒鬼没什么两样。

无论如何，俱乐部使居民们相信，没有人能像这些最底层的人们一

样，如此痛心地认识到社会结构中的不足，因为他们与这些不足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因此也承受着最大的痛苦。我记得一个水手对每个国家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所作出的尖锐评价，比如一个在西伯利亚服役的俄国人，还有一个自称无神论者的爱尔兰老人，他总是在激动的时候抱怨上帝一定是“仰卧着的”，所以看不见如此纷乱可怕的世界。

毋庸置疑，赫尔大厦因为这个俱乐部在激进主义者中取得了最初的声望。访客们无从分辨哪些是俱乐部成员在激烈的讨论中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哪些是赫尔大厦居民自己的想法。那时在芝加哥，激进分子的一切言论都是激烈和固执的，他们是不能容忍人类进步的缓慢进程的，是明确知道“乌托邦存在于世界的哪一角落”的一群人。

在这十年中，芝加哥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阶级，一是那些坚持“在商言商”，因而对社会监管制度感到不满的人们，二是声称除了社会重新整改，否则做什么也不能改善当前工业环境的激进分子。

总的来说，睦邻中心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吸引了那些追求平等快乐和机会的人们。但这种思想经常会让商业机构的领导者感到不快，对他们来说现实世界一向井井有条，所以即便他们有能力也不会决定改革。那种满腔热血的人们在他看来只是代表着麻烦和挑衅，他们不愿意听他讲话，甚至觉得他自身也是“不安全的”。这样一个商业人士一般会站在一个抽象的立场上承认，社会允许修正，人类的所有习俗也都意味着渐进的发展，但同时他却对那些努力改变当前社会环境的人深表怀疑。这种怀疑其实很好理解，改革者们公然反抗社会现状，往往不是因为社会系统中存在什么大体的缺陷，而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渴望受到了束缚。当这样一个反对派摆出改革家的架势，他的缺点会暴露在世人们面前，他的没落会被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为那些拒绝敬仰“上帝创造的万物”的人敲响警钟。

我所记得的这些俱乐部会员里，不论他们是最理性还是最感性的，

在我看来其实一直非常友好和“安全”。他们之中最为强硬的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很早就皈依了佛教，其教义教导他只吃一点食物并对一切行为表示怀疑，他变成了从前的自己的鬼魂，却仍然带着友善的笑容。

在对这些主题的讨论中，赫尔大厦自然要承受来自各方的质疑。一天晚上我在南霍尔斯特德街和麦迪逊街角一个世俗论者的俱乐部讲话，一个长相凶狠的男人喊道：“你说得倒好听，但记着我的话，当有钱人给你注资的时候你就不敢这么讲话了。”我向来都是敏锐地为言论自由辩护，马上回应说我从没打算接受任何资助，也不会被劳动人民所威吓，我只想表明我最诚实的想法，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出人意料的是，激进派观众们对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讨论随之转向了若要民主制度持久，则必须随时随地反抗专制行为。可是人们想成为社会公义的独立见证人的愿望却经常导致一种难以持久的妥协，很多次我都觉得我们注定要疏远每个人。那时我已经非常欣慰地接受了社会主义信条，也通过和同志们一起阅读和讨论认真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发现我很容易对一些热门问题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你看不到吗？就像人工轧机创造了一个封建统治的社会，蒸汽机就创造了一个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针对这种社会关系产生于制定原则之前的理论给出一个肯定的回应则没那么简单，毕竟想法和分类都不过是历史过度的产物。

我一直谨慎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不希望赋予它过多的敏感性，比如不承认个人享乐，不承认个人的发展可以让一个人忽视周围的人的不幸，不承认随着信念愈发坚定，社会安置可以通过人们的意识和不懈努力而变化。这样的定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俄国人认可的，那时他们主导了芝加哥的社会主义党派，在他们看来经得起忠诚度的考验才是对阶级斗争最纯粹的释义。

在霍尔斯特德街那最初的几年里，没有什么比认识到温顺的人性正被现实社会无情地压制这一事实更加让人痛心。比起那些社会主义

者，我看到更多的是普通的人们不遗余力地去理解和释放那种沉重的压力，我庆幸自己与这样一群勇敢的人们为伍，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这种友谊关系需要建立在一致的信仰上。他们不接受把共同的理想和社会关怀作为标准，认为那样太过模糊不够坚定，认为这种含糊其辞的社会主义使很多人只能通过哲学甚至宗教来体现自己对世界的希望和对疾苦大众的保护。

有时我也渴望一个明确的社会信仰带来的宽慰，它应当能解释社会的混乱，以及给出通往更好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步骤。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在社会主义者的推动下，我需要去保护那些穷人，这让我开始有了一种被夸大的责任感。那时的处境导致了后期我对宿命的怀疑，因为我不得不去维护自由的意愿，作为社会教条的替代品，所碰撞出的混乱。另一个难点则存在于对经济决定论这一纯粹依赖阶级意识的理论的接受过程中，我在一些小城镇授课的时候，人们开始有机会读到一些关于富人和那些像我的邻居们一样涌进大城市的人们的故事。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美国的任何一个阶级，但移民们的阶级意识很快就被影响了，因为他们也需要与工业生活创建起前所未有的联系。

同时，虽然有着不同思想的人们不断来到我们的会议，我们仍惊奇地发现了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无法掩饰的善良本性。激进分子习惯于热烈的讨论和鲜明的意见分歧，并把这种心态应用到了日常工作中。赫尔大厦社会科学俱乐部的部长在俱乐部成立17周年纪念日上讲到，就他所能记得的，他只见过两次演讲者当场情绪失控的例子，两个人都是那种“不习惯被反驳的”大学教授。

他还说只有一次，所有的俱乐部成员一起为一位演讲者鼓掌，那是塞缪尔·琼斯^[6]，后来托莱多市的“恕道”市长。他忽视了这些人的教义分歧，参照资助学者小组做调研的方式，为一批劳动人民提供了厂房和资金，计划以此作为工作时间和薪水的实验。

整个九十年代，芝加哥花了很多时间在经济讨论上，始终保持着年轻的活力。我记得有位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为了避免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讨论给教派带来麻烦，从教堂搬到了一个附近的会堂。会众和其他一些人也追随他到了那里，后来他又搬到了街角，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找到最为落魄的一群人。赫罗恩教授^[7]每天中午的讲话让一个市区会堂门庭若市，他用一系列题为“在凯撒和耶稣之间”的讲话试图把福音教义应用到现代的商业环境中来。一些用能力但更多是热情编纂而成的出版物全部发了出去，但也许是因为它们代表的是宣传手册而不是新闻出版物，所以环境改变的时候自然就不复存在了，不过他们的作者还是因为自己所代表的立场而在批判和贫穷中煎熬。

穆勒^[8]把所有对生活本身不满，因此被界定为激进分子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为终极目标，另一种则追求“即刻生效、实际可得”的办法。工会成员就属于后者，因为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在那些经济讨论中并不突出，但他们仍然为了给混乱的工业环境带来秩序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我们社会科学俱乐部的会议则是由第一种人继续开展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持有强烈的宗教偏见，时不时地与教堂竞争去拯救那些在“阴暗时期的混乱中”被撕裂和折磨的灵魂。这些人对宗教友谊的需求非常真诚，一些年轻的教士也已经准备好回应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在赫尔大厦安排了很多次会面，不同于讨论的初衷，而是以祈祷和冥想的方式考虑社会问题。这些教士勇敢地引导他们的教堂正式参与到工人状况的探讨中来，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许多基督教派的教堂都组织起了工人委员会。不过那时没有什么能超越“为了探讨工人问题”而成立的英格兰教会^[9]。

那十年中，即便在那个先驱教会全身心的投入下也没能成功地将改善社会环境的热切愿望转化成除了较具说服力的书面表达之外的任何实

质性进展。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在赫尔大厦举办美国分支的年会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描述，认为许多当代的宗教群体都是被迫生存在“时代的转折点”。我记得我在参加一个由英格兰教会的教士组织的会议时，他们对教堂和工人的关系的讨论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人们很快指出教堂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教士则问他们觉得教堂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们立刻回答说任何新兴社会秩序都会理所当然地保留美丽的历史建筑，也许他们会撤销主教和牧师，但难保会留下一、两个门徒作为看管人和向导。“然后呢？”牧师冷静地问。“我们能让它民主化，”他们回答。但想要对民主事业做一个更加详尽的描述的时候，所有的论点都被一一击破了。虽然敏锐的智慧给出了启发甚至提示，但当城市里的人们拆毁了主教宫殿的时候，他们拆毁的其实是本世纪初期在饥饿暴动中体现出来的膨胀繁荣的标志。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仍承认他们与教堂的亲密关系，好借此获得更多的帮助，就像儿子从给他一块石头的爸爸那里不断地索要粮食一样。我记得印刷厂工会组织的一次罢工在芝加哥持续了整整一天，八个小时。那次罢工以非常井然有序的方式进行，工会的人也使法官信服了他们的委屈，因为芝加哥的一个宗教出版社总是针对他们。派别里一些对罢工者很友善的年轻牧师来到赫尔大厦吃午餐，在这里他们与对方代表讨论了相关情况。牧师们听了一位劳工部官员讲述自己寻找兄弟会关系的故事之后也开始关心起了他提到的理想主义，他说他14岁时就参加了一个教会，希望在那里找到兄弟会。后来他逐渐成为很多兄弟会组织和互助社团的成员，尽管对他们的礼节印象深刻，实际上他却倍感失望。因为他最终发现，那些组织没能给工人人们的，也就是没能让他们团结起来的原因，就是一个不顾一切去努力的机会。

就这样芝加哥花了十年时间讨论存在于当今工业组织中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虽然反对蛮横的干扰和忽视却不排斥审慎的冒犯，就像前途大好的青年到达成功的彼岸之前穿过了一片充满希望的玫瑰色迷雾，在

那里他变得非常愚钝且缺乏想象力。但当我匆匆地回顾这十年过后的芝加哥，我发现早期那些愿望得以实现主要是依赖那些实干家，绝不是空谈者。整个十年的讨论作为一个惊人的事例被人们比作哈姆雷特那换掉的剑，理论派在宣传过程中的热情不可避免地逐渐减退，实干家们则始终应对着日常事务，终于使抽象的概念变成了现实。

我记得弗雷德里克·哈里森^[10]访问赫尔大厦的时候，我非常失望地发现在英国的社会运动中，实证主义者没能把他们追求人性的热情化为更强有力的动力；而当约翰·莫莱^[11]来访的时候我则惊讶地发现他似乎代表了那些反动浪潮中的民主倡导者，他们的政治生涯似乎也已经偏离了年轻时的理想。我的观察也许并没有实际意义，此二人在社会改革的哲学和理论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早就制定了自己的原则，而正在另一套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新英国工党，注定会终结这段反动的时期。当然在这些持续了十年的激烈讨论中，有时候没有什么比正确的理论更为重要，我是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意识到这一点的，那晚在赫尔大厦，畅销书《社会的进化》的作者本杰明·基德^[12]与来自密尔沃基的维克托·伯格^[13]进行了争论，后者在当时被认为是社会党的一名新星。

总之，赫尔大厦的居民发现，贫穷的影响促使他们加入了关于社会理论的讨论阵营，对邻居们的无私帮助又使他们加入了不受信仰约束的大众运动的阵营。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些有组织的阵营中我们的努力只能促成广为需要的进步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如果那些热情的理论家没能激起公共良知和群众的敏感度，那么所有这些团体组织的工作将无法继续进行。

当我想起那些工人们留给我的最初印象，想起他们在城里最荒凉的地区居住，在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厂里上班，我才意识到那些格外艰辛的境遇就是平民百姓生活的典型，而且，且不说减少慈善和劳工立法，托尔斯泰30年前对莫斯科的控诉至今仍适用于美国的各个城市：“不论

我们住在哪里，如果在我们周围以10万、1000、甚至10英里为半径画一个圈，看看生活在这个圈里的人们，有吃不饱饭的孩子、老人、孕妇、病患和弱者，他们做着超强度的工作，没有食物也不得休息，很多人因为这样过早离世；而另外有些健全人，也因为从事危险和有害的工作而受伤甚至不必要地丢了性命。”

当美国城市的自我意识逐渐苏醒，它缓慢地察觉到了工业环境在城市中的重要性，也许芝加哥是最先尝试去把大城市中不受限制的人口激增与以惊人速度发展起来的工业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芝加哥最先开展起来的那些讨论，为志趣相投的人建立了平台，为不同志向的人作出了协调。我记得一位精明的英国访问者，受邀到过很多美国城市，他很难理解他在各地不断遇到的骄傲情绪；且不说那些在西部、东部和南部城镇的精英市民身上的自负情绪，在他看来所有的美国城市都一样，而这正是缺乏全面周到的立法，疏于管理的工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英国社会运动的全部热情被带到了美国，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全面的讨论对早期的睦邻中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社会改革理论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显然困难重重，不过，虽然赫尔大厦的居民经常被社会科学俱乐部里的激进主义和来自外界的批评所干扰，我们却一直相信这样的讨论不应该停止。如果睦邻中心想通过社会活动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必须充分了解单纯的社会动乱和精神鼓舞之间的区别。

到了第十年末，赫尔大厦的居民活动小组已经达到25个，它们在社会信仰上大相径庭。一个乡下女孩来到赫尔大厦的时候认为所有的社会动乱都是单纯的无政府状态，后来她在苏黎世学习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很早时就翻译了德文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不过那时俄国人和德国人并不承认她是社会党，她则总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因为消极主义者觉得她流利的英文很可疑。因此虽然社会信

仰大有不同，居民们却通过彼此在工业领域中的经历稳固地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共同相信社会需要合理的监管和立法的保护，同时那些初期争论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1890到1900这十年间的讨论与今天的芝加哥精神偏离甚远。所以我对这一时期的重塑也反映出了任何事都有它的临时性；“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人生中至高无上的真理，让我们在感到绝望的同时，对未来又充满了期待。

注释：

[1]干草市场暴乱（Haymarket Riot）：始于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的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两人，事态扩大，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由于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最终警察开枪导致屠杀发生，先后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国际劳动节就是由此而来。

[2]莱曼·盖齐（Lyman Gage, 1836-1927）：美国金融家，内阁成员。

[3]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美国作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现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

[4]詹姆士·亨廷顿（James Otis Sargent Huntington, 1854-1935）：美国圣公会牧师，圣十字组织创始人。

[5]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国著名哲学家。

[6]塞缪尔·琼斯（Samuel M. Jones, 1846-1904）：1897至1904年任

俄亥俄州托莱多市长，被人们成为“恕道琼斯”。

[7]乔治·赫罗恩（George D.Herron, 1862-1925）：美国牧师，教授，作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8]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9]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又称英国国教会，“圣公宗”的教会之一。

[10]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k Harrison, 1831-1923）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11]约翰·莫莱（John Morley, 1838-1923）：第一代布莱克本的莫莱子爵，曾任记者、报刊编辑和国会议员，最高职务任至印度事务大臣、枢密院议长。

[12]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英国社会学家。

[13]维克托·伯格（Victor L.Berger, 1860-1929）：美国社会党创始人之一。

第十章 伊利诺伊州率先制定的劳动法

在赫尔大厦迎来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还不了解关于童工的情况，一群小女孩拒绝了我们为圣诞大餐准备的糖果，简单地解释说她们“在一个糖果工厂工作，实在不想再看到糖果的样子。”我们这才知道整整六个星期里，她们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筋疲力尽却吃了一肚子糖果。在这样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季节里，对这种严峻的经济状况的突然醒悟让我们倍感沉痛。

同年冬天，赫尔大厦一个俱乐部的三个男孩在附近一间工厂被一台机器所伤，只因为工厂舍不得花几美金雇一个保安。后来一个男孩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我们都以为工厂老板会和我们一样感到恐惧和自责，以为他们会竭尽所能地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们居然什么也没做，而我也第一次听说了那些孩子们的父母曾经签署过一些可憎的协议，承诺他们不会因为“不小心”造成的后果要求任何赔偿。

在长期对邻居们的探访中我们发现，在血汗工厂做缝纫活的女人通常都有年龄非常小的孩子做助手。我记得有四个女孩中的一个，坐在她波西米亚妈妈脚边的小凳子上，连续几小时不停地抽出假缝里的细线，简直是一幅人类苦难的缩影。那时这一切都不受法律约束，伊利诺伊州唯一具有强制执行条款的童工法案，是由煤矿工人工会仅针对在煤矿上工作的童工而实行的。

我们开始了解到在很多家庭，是这些孩子们在赚钱养活他们的父母，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英文说得比年长的移民要好，并且自愿赚取很少的工钱，更是因为长辈们逐渐发现靠他们的收入生活很轻松。一个来自

意大利南部的农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农场摘橄榄、装橙子，来到芝加哥之后，他无法马上意识到他在一年四季做过的那些健康的户外工作，和他的孩子在工厂里做的长时间的单调工作有什么不同。后来一个意大利的父亲极度悲痛地来找我们，他12岁的长女刚刚去世，生前她可以说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真情悲悯之余，她的父亲仍不忘说这样的话：“她是我最大的孩子，现在我必须要回去工作了，一直到下一个孩子长大能照顾我。”他只有33岁，却已经想要退休了，或者至少在冬天的时候能够休息。没有工头愿意雇佣这个没有经验的愚笨男人。与其给他一个搬运生铁的活计，还不如让他那聪明的会说英文的小女儿去给盒子上贴标签。没有人用心想过这一切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在不寻常的工作环境中，她只能过早地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另一个13岁的俄国犹太女孩受雇于一间洗衣房，每天做着超负荷的工作，后来因为还不起她向同伴借的3美元而自杀了，她不敢向父母坦白然后用一星期的工资去还钱，因为她不知道那一个星期她的家人要靠什么生活！她幼小的心灵当然无法做出权衡，只好用石炭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了解到更多类似的悲剧事件，血汗制度中的童工和重压下的受害者在短暂的繁忙季节里赚的钱根本不够他们在一年中的闲暇时间里养活自己。事实证明，在目前对周围情况大体印象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小心地收集更多详细的信息，以便将来发挥出它们的真正价值。

那时在芝加哥还没有针对工业情况的统计信息，赫尔大厦的一个老居民弗罗伦斯·凯莉夫人向伊利诺伊州劳工部建议由我们自己来调查芝加哥血汗制度中的童工情况。部长接受了凯莉夫人的建议，委托她负责这次调查。收到调查报告之后，伊利诺伊州议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芝加哥的工业环境。我清楚地记得委员会成员在一个星期天来到赫尔大厦用餐，我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并且相信邻居们遭受到的糟糕待遇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通过这次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推荐了一些条款，后来即成为了伊利诺伊州推行的第一套劳动法，法律对血汗工厂的卫生条件进行了监管，并规定不得雇佣14岁以下的儿童。这项立法得以通过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们曾组织了几个人在连续三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举办公开会议，与会人士均来自工会、教会、互助团体和社会俱乐部。其中工会给予了我们最深刻的理解和最有力的帮助。那时的劳工联合会，作为芝加哥首要的劳工团体，已经预先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在深入调查血汗制度。委员会由来自工会和外界的各五名代表组成，后者包括两位赫尔大厦居民。他们还一起进行了精心组织的游说活动，直到伊利诺伊州第一部劳动法案终于顺利地通过了，而这部被热心公益的市民们逐渐建立起来的法案，也使得伊利诺伊州，至少在保护儿童方面，在全国处在了领先地位。那年冬天，赫尔大厦居民第一次体验到了游说活动。我记得我非常不喜欢“游说”这个词，更不要说这种形式了，我们坚持认为为了劳动法的实施，一些有名望的芝加哥妇女应该陪同这几个睦邻中心的代表和工会成员一起搬到州议会大厦。其实女士俱乐部的全国联合会仅成立于劳动法通过的前一年，后来因为担心新成员感到害怕，在所有立法方面均表现得极为谨慎，不过它的第二任会长亨诺廷夫人仍不遗余力地守护着这项立法。

确立一个条款将妇女在工厂或者作坊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8小时，或每周48小时的主张似乎还不够成熟，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应该被加入到劳动法案中。虽然我们在推动这项立法的时候才在赫尔大厦住了三年，但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因为上夜班而疲惫不堪的年轻女孩；无论男人们如何替夜班工作辩护，几乎没有女人能坚持下来。男人下了夜班之后仍然可以在白天有规律地睡觉，女人则不可能对堆积在身边的家务活置之不理，而有责任心的女儿更是无法看着妈妈在床边几英尺的地方洗洗涮涮而安然入眠。还有一些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女孩在最初那几年里给我们留下了最为痛心的回忆，那时她们在附近一间每天夜里开工的工厂上班，而每天清晨她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的时候，都面临

着另外的危险，因为那个时间沙龙的舞厅里的舞会还没有结束，而一杯酒和一支舞恰好能让她们振作起来。我们后来就听说了一个叫做克罗伊的柔弱迷人的女孩，在她用疲累的双脚走一大段路回家之前，很想喝点东西驱除一身的倦意，于是她被引诱到一个沙龙，喝点汽水之后就喝下了被人掺了“蒙汗药”的酒，之后她在一个破烂不堪的房间醒来，感到极度的害怕和羞耻，不敢回家面对妈妈。

因此，面对那个精神和物质相互依存的古老难题，我们越来越坚信长时间过度劳累的工作必然会激起人们对世俗享乐的欲望，也会自然而然地击破人们身体里对这种欲望的抵抗。那项关于8小时工作时长提案在议会遭到的反对要比预期少得多，并且在伊利诺伊州宣告它违反宪法之前实施了一年。在它得以实施的那平静的几个月里，一些妇女成立了一个规模壮大、热情洋溢的“八小时俱乐部”，她们一起在赫尔大厦阅读相关主题的文学作品，以各种方式充实自己，努力地使公众情绪与她们站在同一阵线。然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精心考察之后，议会却非常令人失望地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这个过程让我无法再相信任何未经过全面讨论和理解的立法。一个不成熟的议案经由司法机关通过合法手段有效地执行了，却仍不具力度不够成熟。另一方面，对高等法律的管理竟然搞得像一次全民公投。公民可以用两年时间观察这项举措的影响，如果他们决定在下次议会召开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则要以经验和信念为依据来论述，这一切都让法律的执行展现出了狭义的“全民公投”的职能。

建立在这种不安的基础上，我始终认为童工法案在执行初期将会频频受阻。于是我尽可能多地召集劳动妇女中的母亲们参加会议和俱乐部，向她们解释这项立法实则是面相她们，最终会使她们和孩子们从中收益。我高兴地记得那些勤劳的单亲妈妈对此都非常理解，她们之中许多富裕的人也非常能言善辩。这些单亲妈妈们会说：“为什么？因为我努力争取的就是给孩子们一个机会，希望他们将来受的教育比我

多。”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美国，我不想因为他爸爸的死而毁了他的前程。”还有人说：“美国是不同的，没受过教育的男孩会被落下。”就算是最贫穷的妇女也会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为了她们的孩子日夜操劳。

对童工法案最强烈的反对是来自那些大的玻璃厂，他们已经习惯了雇佣童工，以至于确信没有童工玻璃就没办法生产了。

15年前的伊利诺伊州和芝加哥展现出了许多先进国家的特征，比如备受赞扬的不受限制的能源和一个“较早的起步”都被看作是成功的关键。虽然第一套劳动法的出台也把伊利诺伊带到了现代工业世界的阵营，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不得不对工人们提供援助，却不屑去保护那些柔弱困难的女人和孩子，”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有悖于天性和传统，有悖于这个国家自力更生的生产者的宗教信仰。

另外有一些思想激进的商人也参与到了伊利诺伊州对有效的劳动法的尝试中来，因为这项立法是在奥尔特盖尔德州长^[1]的任期内通过并开始实施的。从起源和精神上看，劳动法的确立和“无政府状态”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当时伊利诺伊的第一劳动法案仍远远落后于马萨诸塞和纽约，而奥尔特盖尔德州长赦免了那些因为干草市场暴乱被监禁在州立监狱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事实，却给了这项合理立法的反对者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去与之抗衡，而这次特赦的官方文件又给了这些狭隘的批评以另一个机会，因为私人恩怨毁掉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行为，暴露出那高尚品质的脆弱的一面。由于这些缘故，加之这些无法无天的激进工业领导者的步步紧逼，法案的第一次修正很难在没有戏剧性的插曲和反抗之下进行。立法的实施也与赫尔大厦息息相关，事实上它的职能中心就设在这里，所以我们免不了因为承担起这项事业而遭到来自多方的憎恨。凯利夫人被指派为第一个工厂监察员，与一个代理人和其他12个监察员一起监管法律的实施情况。凯利夫人和助手史蒂芬夫人都住在赫尔大厦，

她们的办公室就在波尔克街对面，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代理人就是珍妮俱乐部的主席。另外，一个很早就住在这里的男性居民，因为是一所公立学院的教导主任，担任了检察官一职，负责处理违反劳动法的案件。

多年以来，芝加哥对法律的管理是出了名的松散，大生产厂商的领导人，乃至从前血汗工厂的受害者，后来有了自己生意的人，都对新法规的实施非常不满。不过，不论雇主们对立法的态度如何，工会已经以最大的热情接受了它。事实上，从劳动法案最初被工会提出，到它得以实施的这几年里，赫尔大厦居民的经历可以用一位英国政治家的话来总结：“针对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通用标准可以由立法来规定，但它只有通过工会活动才能得以维持。”

赫尔大厦居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工会的这种特殊价值就是在血汗制度中。早期我们发现在缝纫行业中的妇女迫切需要帮助。这个行业非常混乱，俄国和波兰的裁缝与会讲英文的裁缝竞争，不专业的波西米亚和意大利妇女也都参与着竞争。后来专业缝纫工人的工会逐渐强大起来，对妇女们进行了认证，主张制造商应该把工作交给那些持有工会认证卡片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服装制造业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工会在邻近地区组织了600名意大利妇女，她们以前只能在家里做衣服赚取微薄的报酬。当然，那些最愚昧的妇女只知道“除非有认证卡，否则你不能再从那些付钱最多的地方接到活了，”但新的伙伴为大部分妇女注入了新生力量，工友们相互扶持着为彼此带来了一丝慰藉。

在赫尔大厦居住的第四年里我们举办了大量的会议，强烈主张通过一项叫做苏泽尔议案的联邦法案。即便在我们与罪恶的血汗制度做斗争的短暂时间里，将工作的重心转向华盛顿也不足为奇，因为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除非每个州每个城市都能推行一个相对一致的法规，否则由市级官员对血汗工厂进行的卫生监管，以及由工厂监察员对劳动法的谨

慎执行都无法真正奏效。虽然最后苏泽尔议案没能被州际贸易法所采用，可它却让很多国会议员意识到，只有联邦法律才能保护偏远地区的选民不被纽约和芝加哥流行的传染病所侵袭，因为经许多地方医生证明，城郊社区间猩红热的蔓延都是由于孩子们穿上棉衣和外套之后被送到血汗工厂工作时感染了疫情。

随着我们对血汗制度的努力修正，赫尔大厦居民逐渐将注意力放到了消费者联盟取得的成果上，一直以来，这个组织都在从消费者基本责任的角度上探究着缝纫女工薪水过低的问题。联盟对血汗工厂的情况做出的说明看起来非常合理，它在法律准则缓慢建立起来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的广泛宣传也十分有效，这些工作充分地保护着人们远离了血汗制度的威胁。

消费者联盟似乎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方式去保护那些在百货公司工作的女孩。我记得几个在附近一间“大商场”上班的女孩想申请在每隔一周的周日来参加赫尔大厦的舞会。面对我们的异议她们解释说她们不仅每天工作到很晚，而且每个人每周只有两个晚上外加周日上午可以休息，而每隔一周的周日下午她们还要去“整理货品”。职员工会和其他相关人士一次又一次地在赫尔大厦举行会议，反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时长。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过我们居住在那里的20年间，位于波西米亚街区的一间大商场每个周日都歇业，另外很多商家每周也有三个晚上歇业。不过尽管周日不休息，女孩们仍很喜欢在市郊的百货公司上班，比起城里的商业区，她们能与顾客有更多的交流，她们和经理之间的关系更为友善和平等，更重要的是，她们会自然地受到来自朋友和邻居的保护，不像在商业区那样，经常与共事的女孩们互相猜忌。

赫尔大厦刚成立的那几年里，在女性劳动者中还没有任何工会。那时我想，如果只有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同盟要在芝加哥成立的话，她们应该是装订工。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这个先锋组织的领导人接受

了我们的邀请来到赫尔大厦用餐。她带着抗拒的情绪过来，知道会受到我们的拥戴，却对其中的动机深表怀疑，因为就在几周前她被我们作为“局外人”竭力帮助劳动女性的诚意所打动，为了深入了解我们才接受了赫尔大厦的邀请。后来她一直与赫尔大厦保持着高度共识，直到她成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搬到了波士顿，她衷心的合作更是有了保证。

制作女士衬衫和披风的女工，以及多卡斯联邦工会，先后由一位劳动妇女和一位居民在赫尔大厦成立。联邦工会每月一次在我们的画室会面，它由市里所有涉及女性成员的工会代表，以及一些支持工会活动的女性组成。它接受市里主要劳动群体的建议，后与更多人一起成立了女子工会商标联盟。我们认为这个将各界组织联合起来的事业非常值得赞扬，所以一个领先的女子俱乐部主席也提出了加入联盟的申请。我们很确定她能通过选举，在大家为她投票的时候她就站在画室的门外，或者说在工会的大门外。结果让我们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那些女孩们小心地解释说，不是因为她们不喜欢她，而是她“看起来不像是站在她们这边”。所幸这位宽容的女性坦然地接受了投票结果，不过她对于劳动妇女的关注是如此纯粹，之后不到十年她就被推选为全国女子工会联盟的主席。这个小事件以及它的后续记录了芝加哥向工人运动转变的过程，这不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是一次关乎社会所有人的大型社会运动。

工人运动中涌现出的公众预期是由几次引人注目的罢工活动带到芝加哥的，至少劳动法已经被宣布了两次，因为公众对它的需要非常明了。普尔曼大罢工之后，社会各界人士出乎意料地聚集到了一起，冷静地商议和校订在罢工中被揭露出的法律结构中的薄弱环节。这些市民在芝加哥安排了一次关于工业调解和仲裁的代表大会。我作为新市民联合会的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大会的进行，并且对此抱有很大希望，因为经过民众的鼓动，伊利诺伊州通过了一项建立调解与仲裁委员会的法令。但

即便是这个委员会也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 持，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气馁，因为我们预见到了可能存在的工业骚动会使芝加哥蒙羞。这项针对工业纠纷的仲裁法令包含了当时现行法律中最为有力的条款。但事实上那时仲裁一词还有待普及，许多芝加哥市民还是相信公然反抗社会力量是危险和徒劳的，相信在工业关系中寻求公正和公义是无比困难的。

普尔曼罢工给了芝加哥市民很多启发。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一次大罢工可以在短时间内揭露出如此明显的社会分歧。当然，在普尔曼罢工的那些日子里，阶级仇恨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睦邻中心让双方保持交流的手段也毫无作用，反而使不同阶级间的分裂和仇恨更为明显。我认识普尔曼先生，知道他从精心建立起来的模范城镇中感受到了自豪和快乐。当时我代表“市民仲裁委员会”去参加他们最初在隔壁村庄肯星顿举办的会议，并受邀到展示房屋参加了一次正式的晚宴，在那里我与很多普尔曼的雇员进行了交谈。雇员们期待迅速的和解，大家都相信他们对“没用的老板”的所有不满都能很快被消除，相信在善意中建立起来的模范城镇不会让他们失望。他们确定那些“没用的老板”误导了当前的形势，因为刚刚觉醒的阶级意识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了盛行于模范城镇中的一方的妄自菲薄与另一方的自命不凡。整个罢工行动表明，一次意义深远的工业骚乱的结果往往取决于雇主的个人意愿或者罢工领导人的脾气。那些熟悉罢工行动的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承受多少因素的影响，比如尖锐的国内形势、少数领导者的不良居心、遭受痛苦的妇女和儿童、斗争带来的高度兴奋、被严厉压制乃至立场非常不坚定的宗教顾虑，以及我们难以理解的群众的模糊心理。所有这些因素也对公众造成了影响，促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普尔曼大罢工刚开始那几天，一次当我参加完仲裁委员会毫无进展的会议，从礼堂宾馆的电梯下来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非常生气地说：“罢工者们都应该被枪毙。”我甚至没有听过愤怒的资本家和绝望的人们说出这样残忍的话，所以想知道是什么事把他气成了这样。后来我知道了他从12岁工作到30岁才辛辛苦苦存起来的1万美元在罢工中不见了，他一再强调说知道自

已在说什么，说“谁也别指望他会赞同那些罢工者和他们的所作所为。”

在我个人来说，一段私密的个人经历显露出我对于敌意蔓延的长久担忧。我的姐姐长期患病，一直在芝加哥附近的一间医院疗养，当罢工事件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时，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了。我立即跑去看她，可她远在另一个州的丈夫和孩子却因为种种延误和受阻的交通系统没能来到她身边。她的情况越来越差，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她的询问，告诉她家人还没有来，我被深深的不安包围着，生怕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因为那些使得交通瘫痪的人们动怒，生怕她最后的渴望被苦涩所取代。她一定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后来每次听到我的坏消息时都安慰我说：“我谁也不怪，不会指责他们。”我感到轻松的同时也非常沉重，这片大陆究竟还要承受多少这样艰难和孤独的生离死别，究竟还要经历多少悲哀的故事，才能证明人们的伪善已经使宽恕的精神几乎消失殆尽了。

当我从安静的市郊返回芝加哥，我看见政府军队在邮局扎营；霍尔斯特德街上的人们几乎都带着一条白色丝带，代表他们站在罢工者这边；赫尔大厦的居民也因为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分成了两派；没有人能确定到底是哪边的人烧了汽车。普尔曼罢工之后，我试着写一篇名为《现代李尔王》的论文，来分析为什么普尔曼先生为雇员制定的规划必然会遭到反抗，为什么在他看来这种反抗却是忘恩负义的。行善的雇主，以及他对民主化工业管理的期待，这一切的失败让我觉得有必要去收集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这篇论文无疑描述了一定的“过度参与”，优先引用了查尔斯·兰姆^[2]温和的格言，以及普尔曼先生自己的强烈言辞。我记忆颇深的一幕是三年前的一天，普尔曼罢工的一个领导来拜访我。虽然自罢工以来一直没怎么工作，但他曾用假名在一家电车公司的修理厂清静地工作了六个月，直到后来被发现后开除了。他曾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英国工人，现在却只能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认为自己已经上了黑名单，不会再有人雇佣他；她的妻子最近也因为严重的精神疾病

去世，沉重的痛苦让他意识到他再也无法保持住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次罢工所带来的可悲的人类废物的缩影。我迫切地希望新的仲裁法可以在芝加哥禁止这类解决工业争端的野蛮却无效的方式。但即便早在1896年，我们也知道要对成衣工人举行的罢工行使仲裁法非常困难，尽管它最后还是通过一系列大型会议得到了贯彻。通过另一次裁衣者的长时间罢工，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这一方式去获得合理的需求是粗暴和无益的。他们不仅为他们自己受到的侵害抗议，也为那些受雇于订制厂商的裁缝们抗议，因为他们不得不自己设立工作室，负担起本该由雇主缴纳的房屋租金。我认识其中一个罢工领导人很多年了，他冷静、勤劳、并且非常聪明，我看着他在整个过程中一步步瓦解，直至最后遭受了精神崩溃。

这个人来自一个敏感的组织，像每个罢工期间的领导者一样，以强烈的情绪日复一日地对同样的人群发表讲话，呼吁他们反抗自己受到的侵害。不论在白天还是晚上他都需要接待来访的客人，需要对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庭每天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必须用他日渐衰弱的意志去面对他自己家庭里越来越多的困难，还要有所觉悟，因为失败随时可能到来。他习惯了原本单一的工作，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表现出了很多精神疲劳的迹象，直至最终崩溃。罢工之后他就消失了，后来我有十年没见过他，可是他一回来就反复谈起那些旧时的抱怨，也许他真的没有别的可说。同样的精神症状在一个失败的演说家身上也很容易看到，他必须依靠宣传自己过去的经历才能活下去。事实上他讲的故事里有一个非常可悲。在繁忙季节的一个周日下午，他的雇主在林肯公园看到他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还生着病。雇主随即责骂他浪费时间，粗鲁地问他为什么不多拿点活回家做好让自己忙起来。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赫尔大厦居民知道很多工人都是在忙碌的季节被无情地逼迫，而后又在很多个星期里闲散在家。于是我们逐渐意识到，不论是对工厂还是家庭，周期性的闲散和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与血汗工厂、超负荷的妇女，以及雇佣童工等经济问题一样，应当予以重视。

然而在所有这些社会惨状中，没有什么比失业更令人伤心，我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着很多失业问题，因为附近租金低廉的房子吸引的都是些收入微薄的工人和新移民们，他们刚刚结伴被雇佣去修筑铁路或者类似的工作。急着找工作的强健农民要么就成了工头们在分配工作或者供应食物时无情欺负的对象，要么就成了不择手段的职业介绍所的消遣工具。赫尔大厦对附近的工头和职业中介都做过调查，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于是我们迫切地想要开展一些活动，去落实在政府监管下的就业服务机构，直到1899年，伊利诺伊州议会通过法律认可了这种机构并赋予他们管理权，去监管私营的职业介绍所。这些机构的形成表明我们应该开始把颁布法律本身当作一个成功，无需深入探究它的管理和成果，因为十年后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移民们仍旧被无耻地捉弄着。一些保加利亚人被送到阿肯色州却发现那里并不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只能徒步走回芝加哥，因为下一项工作是在俄克拉荷马州，他们必须把钱省下来去买到那里的火车票以及缴另一笔中介费。这些不被阿肯色州需要的人们除非回到芝加哥，不然没办法知道俄克拉荷马有一份工作，但他们更没办法知道将来是不是也要从俄克拉荷马走回来，因为芝加哥的中介已经送出去太多工人了。

对于芝加哥就业资源的调查由保护移民的联盟展开，赫尔大厦也与其合作，提供了一切针对我们附近的移民区进行调查所需的信息，就像最近在芝加哥希腊移民区完成的调查一样。这个联盟的主管人格蕾丝·阿伯特小姐也是赫尔大厦的居民，我们为移民争取公正的待遇和机会的所有尝试都通过联盟取得了成效。后来我们在华盛顿面对国会委员会做出关于芝加哥的移民需求的讲话时，既代表了联盟同时也代表了我们身边的邻居们。

这与那些新来的移民刚到工厂工作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在适应芝加哥所遭遇的严重工业动荡过程中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不无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罢工行为都属于一般的社会运动，而不是产业冲

突，因为罢工本身只是那些身处困境、呼吁工会出面组织协调的无组织工人的轻率之举而已。这与那些由代表非技术工人的工会而发起的罢工类似。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仓促之中形成的联盟都会在振奋人心的时刻趋于平淡之后解散，而其最具价值的成就就是传播了工人间的团结意识。1905年爆发的芝加哥堆场罢工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场罢工是代表移民劳工而爆发的，并且尽管有两万两千名员工在整个夏天无所事事地在街上走动，但却令人瞩目地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那年夏天，在堆场区域发生的逮捕案例要远少于其他时候。然而，有关此次罢工的故事并不应该由赫尔大厦来讲述，而应由芝加哥移民安置大学来讲述，在该校任职的玛丽·麦克道尔小姐在这个夏天的运动中所做的公共服务及其具有代表性。搞清楚此次非技术工人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尝试导致了多少对相关状况的后续跟踪关注和政府对于这一大型产业的控制意图，应该是因为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当特定的产业冲突以罢工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时，其所吸引的公众关注程度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的。罢工是现代生活中最令人振奋的桥段之一，因为这种方式对事情的性质进行了假设，整个城市的居民都被分成了两派。在这种时刻，应该成为裁判的公正的民众几乎完全消失。任何试图保持中立态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的人都会很快地被冲突双方同时质疑。至少芝加哥市长所委派的一群市民的遭遇确实如此，这些人受任对1905年爆发的卡车司机大罢工进行仲裁。我们在市政厅里的市长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周日的下午，分别与工人和资本家团体进行商谈。整个过程是非常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事实上都被新“产业阴谋”给骗了，这个发生在芝加哥的阴谋是在煤业卡车司机工会与煤矿业主联盟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的促进下取得成功的，这份协议在已饱受垄断之苦的公众身上成为一种新的垄断。

重卡司机的罢工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给制衣工人助威，但事实上却具有十分阴险且不光彩的目的，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无法启齿向公众解释，而这次罢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芝加哥通过行业工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高

潮，在此期间，腐败风气盛行，其严重程度甚至与此前市政厅内所发生的不相上下。这种腐败状况常常会效仿纽约的塞缪尔·帕克的做法，以贪污的形式出现；有时，是以“工人投票”的政治交易形式进行的；有时，是以资本与劳动双管齐下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些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内，与许多美国城市反政治腐败的一般性改革运动不同，行业工会以崭新的形式强硬的态度站到了这种腐败的对立面，并通过工人运动为消除这种腐败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此次芝加哥劳工联合会所进行的改革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殉道者，其中不止一人曾差点儿在强大的腐化分子的“重创”之下献出生命。但是，尽管出现了这许多事情，很多成员依旧对传统的兄弟义气崇敬有加，腐败并没有将这种忠诚磨灭。市中心办公大楼里的清洁女工曾组织自己的工会，并与电梯工人和门卫结成联盟。尽管工会在煤业卡车司机抗议市中心的建筑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仅仅是充当了斗争的武器，但是工会却也让广大女性们体会到了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的好处，这对于由没有技术、无人扶持的工人所组成的工会来说可称得上是一份大礼。我还记得一个周日的下午在赫尔大厦召开的一次会议，一个“地方”清洁女工的主席站起来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首先讲述了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觉得对于丢掉工作的恐惧和摇摆不定的工资比艰辛的工作本身还要让人难以忍受，而且她总是将所有其他在同一栋建筑里工作女工仅仅看做是竞争对手，并对悲惨境况十分恐惧，因为她们的工资越来越少，而愈来愈沉重的债务却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随后，她又讲述了当电梯工人，甚至是平时趾高气昂的门卫找到她们，商讨建立组织的事情，并表示他们必须站在同一阵营中之后所发生变化。她表示，现在她逐渐地稳定了工作并能够按时获得工资，她甚至还开始计划买房子的事情，因为她能够“算出来”之后到底“能挣多少钱”。但是，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其他成员都没有料想到，同一个将清洁女工联合到工会中的组织会随后在为他们各自利益而进行的罢工中将其摧毁。

将安置点牵扯到城市的劳工问题之中看起来似乎与其初衷毫无关系，但只有那些没有意识到迄今为止现有的产业系统在社会权利和社会

秩序等方面都阻挠我们满足自己的民族个性需求的人才会这样认为，安置点应努力去理解并尽全力去缓和这一问题。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安置点应该与当地工会组织共同努力。这种目标的明确性很显然在公众的印象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同感，即安置点承诺履行所有工会所实际应具备的信仰和应完成的工作。这种有共同利益的团体组织在很久以前就已表明了相似的信念，即安置点的宗旨通常与工会所遵循的政策大相径庭，并明确地指出，这种差异在认同感方面并不会对公众理念造成任何改变。这种情况在工业产业动荡时期尤为突出，尽管正是在这一时期，工会本身会对所有“非我族类”疑心重重。正是在各次罢工之间的长时间平静期中，安置点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才在劳动法规和类似承诺的煽动中寻得较为满意的平衡点。尽管芝加哥妇女工会联盟的首批官员未能在联盟随后所推动的伊利诺伊州妇女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以及其他类似的成就中作出直接贡献，但这些人却都是来自安置点的居民。

然而，芝加哥安置点中的居民对罢工的反应却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有趣的研究素材。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定义，无论赫尔大厦是否支持罢工，都无关痛痒。但“工人”蒙受耻辱的时候，我们总是被认为是归属到这一类中的，并同样被人所不齿。在经历了卧铺车工人大罢工的公众激情后，赫尔大厦失去了很多朋友；随后的卡车司机大罢工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尽管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尽职地指派一位仲裁员而已。

但是，在我经常遇到的一种假设中，还是有着些许安慰的，无论何时，只要一个人在某种状况下的判断是公正的，就可以理解为这个人的怜悯之情并未被不道德的行为所异化，并且这种怜悯之情也取决于每个人对他人遭遇感同身受的程度。我记起在芝加哥大罢工动乱期间的一次让我倍感欣慰的事件。那天我受邀参加一场午宴，一名我并不认识的女侍向午宴女主人说，她认为我不应该出席。在问及原因的时候，她答道，她曾在早报上读到罢工者杀害了一名“破坏罢工的人”，而她确信我

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参加社交活动。尽管这件事情很令人困惑，但很显然她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对于罢工中发生的暴力事件十分绝望，好像有人明确地告诉了她一样。或许，这种对于对立双方相互解读的尝试和感同身受将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安置点的职能之一，尽管相较于其他常见的功能来说，更无法令人满意，也更为艰难。

逐渐地，芝加哥的各安置点之间在相似经历所形成的相似态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热情的友谊，就好像是共同的相关利益和努力在居民和安置点之间形成的持久关系。在困难时期和非技术工人在反抗那些甚至比他们在欧洲的生活境遇还不如的状况而进行的罢工中的困惑面前，这种同志般的情谊前所未有地强烈。在这些时期，不同安置点的居民受到驱使对生活标准进行了讨论，并且这种讨论的方式是以一种整个国家依赖其居民特性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减少了国家的管制权利。尽管由于布兰代斯在俄勒冈州最低工时数案件陈述中精湛的论辩，这种争论早已被美国高级法院定性为睿智的政治风范，但是即使是在堆场罢工的时候，仍被谴责为“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社区中的居民逐渐地了解到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与国家运动、甚至是国际化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芝加哥安置点的居民们在成为了劳工立法国际联盟美国分支的先锋成员，因为他们所居住的环境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对保护性立法的需求。凭借来自欧洲各工业国家的热心成员，凭借关于欧洲六国废除妇女夜班制度的振奋人心的报告，凭借对雇员责任立法和保护机器的运动结果的细致研究，这一联盟逐渐发展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极具重要性且影响广泛的一场运动。

注释：

[1]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John Peter Altgeld, 1847-1902）：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成员，1893至1897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

[2]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55-1834）：英国著名作家。

第十一章 移民及其子女

从我们在赫尔大厦中度过的第一个月里，我们发现相对于第二代或是第三代移民来说，第一代移民更好相处一些，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更为自然，生活方式更为简单。住在芝加哥的意大利和波希米亚农民依旧会在周日换上他们鲜艳的假日服饰，去表兄弟家串门。他们漫步时，至少会想起曾经耕种过的土地与曾经呼吸过的乡土气息。而城市中的贫民二代却大都没有艳丽的假日服饰，并常常认为有这样的亲戚是“命不好”。我曾听过一个醉汉不无伤感地低喃着他善良的农村妈妈，幻想他自己赶着牛群回家，而我却同时也知道对着他大声嘲笑的他的小儿子可能会很早就步入酗酒的行列，而且他的酒后狂言中也永远不会具有任何田园气息。外国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好客，尽管这一特点被隐藏在了美国穷人的虚假骄傲背后。在保持移民的兴致方面，有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保留珍存他们过去生活的价值，并同时向他们展示美国人生活中更好的一面。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隔壁的意大利家庭每周六都会全家一起到我们家来做客。这些种傍晚间的相互拜访我们在赫尔大厦居住的第一个冬天里十分流行。许多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都会给予我们帮助，这个大厦都十分喜欢意大利人，并与他们一起度过各种法定假日。他们会与我们商讨各种事情，从小额诉讼案，到令人伤心的世仇文物；从他们屡教不改的孩子，到他们的医院病历；从他们对美国服饰的渴望，到他们对口译员的需求。

意大利一家报纸的编辑如实地报道了我们与意大利殖民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仅是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这些相互毗邻的地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他们那些散布在城市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同胞们，这位编辑甚至提及了在南部阿拉巴马州开拓农业殖民地的意大利人，这也正是赫尔大厦与之衷心合作的安置点之一。

在所有的移民群体当中，南部的意大利人可能是最能体现那些涌进城市公寓大楼的农民身上所带有的令人怜悯的愚笨的人的特质了；当我们成功地劝说了三十户农民家庭，搬到他们熟知如何去耕种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尽管这些移民以每英亩两美元的低价购得了土地，这一聚集区的建立仍是一个极为昂贵的项目；因为他们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未开发的土地，尽管我们可以筹得一些资金来帮助他们度过前两年最困难的日子，但是我们打心眼儿里认为要想将这类事情做得恰到好处，只能由英国那种已经成型了的殖民社会来进行，或者更理想的，通过扩大联邦移民局的职能来实现。

在第一年里，我们比照为意大利人所做的模式，为德国人也组织了相应的活动。多亏了我们这些日耳曼客人所受到的高水平教育，以及一位端庄文雅的德国女性的睿智领导，这些活动充分展现出了这一民族完美的温馨社交氛围。我们的客人们尽情地欢唱着，时而是低吟温柔的德国民歌，时而是高昂奋进的莱茵精神，随后，他们缓慢但执着地探索德国历史与文学，寻求那些他们早已与其他美好事物一同摒弃了的诗歌与浪漫。我们发现，在这些德国移民与其说英文的子女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羁绊，但是他们的乐趣所在却不尽相同，他们也很少一起出门。也许对于他们来说，睦邻运动所具有的最大价值是使其能够在那些又大又漂亮的房间内放满俯首可拾的乐器、重拾他们久已忘怀的热情。我曾见过许多移民子女在见到自己的母亲用织针轻柔地为自己正唱着的歌打拍子时，或是在一首德国诗歌朗诵结束后用传统方式向其鼓掌致敬时那沧桑的面庞上所散发出的红润时，感到十分意外的神情。不难想象，子女对于母亲的尊重将由此而日益增长，也会赋予德国文学及整个家庭的乡思之情更为强烈的热情，从而将旧生活与新生活融合在一起，对过去的教养心生敬畏，而并不仅仅是固执地认为新的就是最好的。

老一代移民在失掉其欧洲生活礼仪的同时却没有接受美国的风格，这种倾向常会被母国精明的观察员所谴责。来自布拉格的马索莱克教授

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讲座课程的时候，常常为波希米亚人所信奉的唯物主义而感到痛心疾首。早期移民为能拥有自己房产的机会而激动不已，而这也可能是斯拉夫的渴望拥有土地的人把他们的精神头全都投入到了挣钱的行当中，而把其他所有的利益都被抛至脑后得主要原因。但是，我忆起了与马索莱克教授在赫尔大厦做的一次演讲相关的感人事件，教授在演讲中呼吁他的同胞们不要随波逐流，降低自己的故国文明程度；同时也不要忘记那种在泛斯拉夫运动^[1]中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伟大精神。一位靠洗盘子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的波希米亚孀妇急匆匆地让自己最小的孩子去买了一束红玫瑰送给教授，感谢他见证了精神主义的现实意义，尽管买花所花费的二十五美分是他们明天一天的生活费。

向移民后代展现其父母们的谦卑这种强烈的愿望促成了展室的建立，这个展示后来被称做赫尔大厦工人博物馆。这个想法最初是在初春时见到了一位意大利老妇人后进入我的脑海的，她手中的纺锤与她思乡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这位老妇人在耐心地用简单的线轴纺纱，彼时彼景能勾起所有南欧人对故乡的记忆。我当时正沿着波尔克街往下走，情感无法平复，因为与意大利女性成为亲密的朋友是如此的不易，还因为他们是多么的容易失去与自己美国化的孩子们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赫尔大厦应该能够激发出一些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欧美经历之间架起一座智慧的桥梁，让双方都更具内涵，并建立起一种关联感。我不禁沉思，或许，相较于其他地方，一座城市中的移民区内更需要有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的缺失，使得欧洲移民与其子女之间，以及与其美国邻居之间产生了无数的误解；我又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种分裂了两代人的分歧在这些困惑的移民之间变得如此残酷且不可逾越？这时我抬头看到了拿着纺锤的老妇人，坐在廉租房充满阳光的台阶上。她就像是米开朗基罗的命运雕塑一样坐着，但当我经过时，她的脸生动起来；她举着纺锤让我看，冲我喊道，只要再纺出一点儿纱就可以给她的教女^[2]织一双长袜了。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如果我们鼓励那些在附近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参与到

这些古老的工业形式当中，以便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来认识到他们日常生活所做的事情蕴含着怎样巨大的资源传承。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够意识到工厂里那些精密仪器是由这些简单的工具演变而来的，他们很可能就开始了杜威博士所推崇的“经验的持续重现”式教育。他们也能够开始逐步建立起对过去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正是歌德所宣称的所有良性发展的基础。

我在波尔克街上令人激动的散步之后，我与杜威博士以及另一位在博士的学校中任教的大厦居民进行了多次谈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就布置好了一个房间，我们将邀请那些具有传统手艺并十分希望使用这些技能的邻居过来进行展示。

我们在近邻中很容易的就找到了四种以上不同的最原始的纺织方式，以及其他三种截然不同的纺织方式，虽然使用了同样的纺锤，但却与轮轴相连接。这七种纺织方式可以轻易地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排列，并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其与现代工厂纺织技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如法炮制地对编织工艺也进行了展示，每周六晚上都会以纺织工业中的各种不同工种为主题举办小型展览。在同一间房屋内，来自叙利亚、希腊、意大利、俄罗斯和爱尔兰的女性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让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参观者也能意识到，如果从工业角度看问题，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没有断层的有序发展过程；工业的发展在不同国家的工人之中年复一年地、平淡却又极为相似地发展着，跨越了语言、宗教和政治形态的差异。

随后，我们变得干劲儿十足，组织了各种关于工业历史的演讲。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场关于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当时北方编织区遭遇了恶劣环境，从而导致大批编织工迅速涌入新城镇等问题的精彩演讲之后，听众中一名俄国裁缝受到感动，起身发言。他认为，尽管时间的流转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编织工业在由手工作业向蒸气动力作业转型初期

所遭遇的困难，但是在对蒸气动力的实际应用中，我们仍处于早期启蒙阶段，那些靠手工针线活为生的妇女，在自己家中孤立无援直至饥饿致死，就是很鲜活的例证，而大多数的编织工都有着类似的命运。

这种史料的对比似乎可以为裁缝带来一丝安慰，正如墙上挂着的显示蒸气动力在制造业流程中的极少量时间与几个世纪的手工业时间之间的对比图所带来的效果一样。人类的发展进程是极为缓慢的，并且没有工业先进性所具有的那种残酷，但是，这一发展并不是由那些因为知晓了历史长河中还有其他与自身相似的时代的存在、了解了明智的行动可缩短并减轻所经历的转型困苦而感到安慰的工人所推动的；这些人又是否有资格从对这种现实的艺术写照中寻得慰藉？我始终记得举行了关于裁缝这一行业的演讲的那晚我所感受到的深深的自责，没有任何使人或艺术家能够像乔治·艾略特^[3]让我们爱戴西拉斯·马南^[4]一样，让我们对那些编织工产生任何热爱之情。这间纺织博物馆与赫尔大厦内部所一直教授的编篮、缝纫、缝女帽、刺绣和做女装等课程直接联系起来，并尽量与其他教育内容相贯通；我们已经收集了一系列相关产品，有早期所使用的工具，也有蕴含深意的照片。但是与其所产生的直接教育意义相比，我们更看重的是这种活动所带来的间接影响，在活动中，移民们通常会很自然地处在教授者的位置，我们相信从被所有美国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子女们，习惯性地监管保护的位置上掉转出来可以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我想起了在赫尔大厦附近一家缝纫车间工作的一群俄国妇女，她们听说大厦在圣诞期间要举办一场聚会，并且她们也可以参加。于是她们在一个下午赶到了大厦，但我们却很遗憾地没有在那天举办任何聚会；尽管大厦的居民通过即兴的音乐表演和小点心来尽全力地招待她们，但是很显然她们还是十分失望。最后，有人提议请他们来工人博物馆进行展示，自此，这三十名鲜有表情、疲惫不堪的妇女才被我们所感染。她们熟悉如何使用纺锤，并且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找到俄式纺丝机。她们中有很多人此前从未见过纺车，因为这种工具在俄国的某些地区并未普及，因此她们将此看做是一种新式且神奇的发明。她们撩起自

己罩裙来展示自己手工纺制的衬裙；她们尝试使用纺机；她们向众人讲解老式图案的难点；总之一句话，她们已经从被动地接受招待转变成了主动去招待别人。由于能够直接地展示其已具有的经验，这些移民客人能够在这种古老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工艺面前，指导他们的美国主人，而这些能力也确实与他们的年纪和经验之间毫无违和感。

在运作工人博物馆及相关商店时，有人指出了个赫尔大厦几乎还未涉足的领域，即文化是对于历史悠久的职业、人类的思想，以及从中寻求对于疲劳的慰藉的理解，以及对此进行展示的可能性。家庭艺术具有人类早期的神圣性和深远意义，而当一天晚上我受邀与一户犹太邻居共度逾越节^[5]时，我对于恢复这种艺术形式的渴望变得尤为强烈；在这家人当中，女性日常活动在传统和宗教上的重要性仍旧得以留存。犹太母亲向家庭成员所分发的犹太食品是根据传统习俗所准备的，并且在餐具的使用上也极为谨慎；在她的肩上，承担着将所有的一切准备妥当的重任，因为根据摩西教律，宗教历史中的大灾难很可能将由她的丈夫与儿子来承担。除了仪式所体现出的重大宗教意义之外，我的头脑充斥着多年来各地旅行所见到的各种妇女劳作的场景：印度妇女在屋舍外边磨稻谷边歌唱颂歌赞美太阳和雨水、一群头裹白布的摩尔妇女在丹吉尔的一口水井旁排队打水、南部意大利妇女在溪边跪成一排用力敲打平滑的白石头上湿漉漉的衣服，还有挤奶的妇女、做园艺的妇女、在数千座村庄市集上的妇女，都是家庭生活的最基本的关怀与亲情的直接体现。

有很多人都表示，工人博物馆展示出了妇女的原始活动所蕴含的魅力。我还记得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儿每周六晚上都来上烹饪课，而她的母亲就在同一栋大楼的工人博物馆内展出自己的纺纱技术；但是这个名叫安吉丽娜的女孩每次都将母亲送到大门后独自绕到边门进出，因为她不想让烹饪课上的其他人看到她与这名戴着头巾、穿着笨拙的靴子、套着短衬裙的意大利妇女走得太近。但是有一天晚上，安吉丽娜看到自己的母亲被一群来自教育学院的客人围在中间，这群访客十分羡慕她母亲的

纺织技术，她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自己的母亲是“美国最好的棒针纺织工”。当她向我询问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时，我借机向她描述了她母亲所生活的意大利村庄，她母亲所曾经拥有过的自由生活，以及如何因缘际会，她的母亲和其他村子里的妇女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纺锤，即使她们在附近的城镇中纺织技术最好。我在一定程度上着重强调了那种生活中的自由与完美——凸显了用这种生活来换取只有两间屋子的公寓、用美丽的手工头巾换来难看的商场工作帽是一件多么艰难的决定。我暗示这个女孩子，仅凭这些表面上的事情来判断她的母亲是不公平的，并且，当她的母亲必须依靠自己的女儿来接触新事物时，她同样有权利期望自己的女儿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

而另一种事实却是我不能向孩子讲述但却又始终占据着我的脑海的：她母亲的一生都生活在一个极为僻静的地方，严格遵守着传统习俗和当地习惯，直至她在宗教方面变得极为依赖当地的宗教场所——她在神前祈祷的神龛、低穹顶教堂的地面和围墙——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突然全都被夺走，她母亲则被迫出海背井离乡，远离她十分熟悉的宗教与家庭生活，而现在，她的母亲胆怯地走在一个陌生而又奇特的国度，却又无法忘怀心中的辛酸之情。

显而易见，自己的母亲还拥有除了这间公寓以外的其他生活背景这件事对于安吉丽娜来说是极为陌生的，但是这次谈话至少改变了两件事情：她允许母亲将放着漂亮的家纺手工衣服的大箱子从床底拖出来了，而之前，这些衣服曾被她看作是十分粗陋的；还有就是她开始公开地与自己的母亲由同一扇大门走进工人博物馆了，并且至少为大家所羡慕的母亲所掌握的手艺而感到自豪。

一群此前在赫尔大厦聚会的商人俱乐部成员曾对他们的上司改善他们想法的方式十分愤慨。俱乐部主席曾表示，她“不会参加令人昏昏欲睡的课程”，她出席俱乐部活动“是为了找些乐子”，对于她来说，在一

天的辛勤工作之后，渴望娱乐活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天晚上，我看到整个俱乐部的成员都在工人博物馆内听一场挺沉闷的课程，想到这位主席曾发表过的惊世骇俗的评论，我对于她十分享受这场演讲感到十分诧异。对此，她是这样解释的，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课程演讲，而是“了解一下每天工作所用到的东西”。这可能是我们所收到的对于取得成就的最诚挚的敬意了。

随着从菲尔德博物馆借来的精细纺织品展品的到来，以及随后来自菲律宾的编织品精选样品，工人博物馆对空间的要求不断地增加。商店最终请到了三四位女性来共同打理，她们分别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丹麦，这几位女性也成为了通过销售手工编织产品实现自给自足的纺织部门的全职员工。

这些妇女以及一些凭借自身在陶器、金属和木材等方面的欧洲手工艺来到博物馆的男人充分证明了，如果他们的才华能够得到足够且明智的重视和发展，这些移民聚集区可以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价值。有一个意大利人用他给那不勒斯教堂的祭坛后壁雕刻的手艺装饰了自己住的公寓的门柱，却被他的房东以破坏财产的名义“驱逐”出去。他的情感受到了伤害，而其中被赶出家门并不是他伤心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不被人欣赏；他表示，在意大利，人们外出旅游时总是喜欢欣赏木雕，而在美国，“他们满脑袋想的都是怎么从你身上挣到钱”。

有时，这种对手工艺本能的抑制会导致更多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波希米亚人的女儿曾经到赫尔大厦参加过学习，而他在一次经常性的酗酒之后，差点儿掐死自己的女儿，后来这个人在一次酒精中毒引起的癫痫性谵妄中自杀身亡。她可怜的妻子在这次悲剧发生之后曾在赫尔大厦小住过一周，直至给她安排好新的住处。一天，她向我展示了她丈夫在他们订婚时为她打的金戒指。这个戒指做工无比的精致，她说，尽管在他们的国家里他是一名金匠，但是在美国他却是一家大制造厂的锅炉房内

铲了二十年的煤；每次当他举起“愤怒的拳头”，预示他喝多了要“耍酒疯”的时候，如果她能找到一小块儿金属，并劝说他呆在家里摆弄这块儿金属，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故事让死者的纠结挣扎、让摧垮他的愚蠢的社会失调无所遁形。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为什么我们对女儿出众音乐才华的欣赏蒙蔽了我们发现父亲身上所具有的艺术特质的眼睛？我们遗忘了道德生活的基础是由一个个历史悠久的职业所组成的，我们忽视了一个人借以慰藉辛劳困苦的艺术也可能是他暴躁情绪的救赎。

还有许多已经成人的孩子对他们的移民父母表达孝顺之情的感人故事：有个年轻人日复一日地参加各种他已经不再信奉的宗教仪式，尽管徒劳无功却希望能够借此引起他从俄国移民过来的犹太父亲对社会问题产生些许兴趣；一位作速记员的女儿，如果能够从周一早上一直做到周六晚上的话，能够挣到很多的钱，但是她仍旧安静且顺从地为低收入的人们制作领带，因为这样的话她可以避免在周六上班，以讨自己父亲的欢心；这些年轻人，都如可怜的玛姬·杜黎弗一样，在遭受了许多痛苦的经历之后了解到，怜悯、回忆和忠诚是最具重要性的自然纽带。

然而，这种忠诚有时却被一些渴望金钱、习惯了农民家庭中的父权至上信念的移民父母无情地加诸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将自己的孩子严厉地束缚在自己身边，要求他们上缴所有的工资，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时间和金钱去娱乐。

由于这种父母的严厉束缚而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十七岁的波兰男孩一天来到赫尔大厦，“为一个曾参加过赫尔俱乐部的男孩的葬礼花束”募集五十美分。只消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弄清这件事情是编造的，后来这个男孩儿承认自己撒谎，虽妥协却稍带挑衅的说他要钱是想给妹妹和他自己买两张二十五美分的《慈善社交双人舞》的舞

蹈剧门票；他还告诉我们尽管他在铸铜厂工作了三年，并获得了两次升迁，但他自己还是没有一分钱，因为他总是不得不把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父亲；“看看他都给我买的什么衣服吧”，他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或许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近期对二百位女工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只有百分之五的女孩能够使用自己的工资，有百分六十二的受访者将所有挣得的钱一分不剩地交给了自己的母亲。正是在这次小规模调查中，我们认识了玛塞拉，一个年复一年地帮助她寡居母亲支撑起弟妹生活的可爱的德国女孩儿。对于生活，她还是比较满意的，只除了她母亲的关于裙子的老旧思想，母亲只分给她工资的一小部分钱用来买衣服，而她本人对于穿着又比较讲究，因为她在附近商场的丝绸专柜上班。曾有位年轻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吸引她的注意，而她母亲也同意玛塞拉接受男孩的邀请参加舞会，却打算给她一分钱去买一件新礼服来替换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破旧不堪的旧礼服。玛塞拉难过得一夜没睡，哭得十分伤心，尽管她心里清楚孩子们得猩红热时欠下的药费还没付清。第二天，当她裁下三码崭新的粉色丝绸时，她就想，这些料子足够她做一条精致的新腰裙去参加舞会了。她一直用渴望的目光盯着这块布料被叠进包装纸内，并漫不经心地将包好的布料塞进顾客的皮手笼，突然，装着布料的包裹掉到了地上。周围没有人看见，女孩儿像一条灵活的小鱼一样捡起布料塞进自己的裙子里。这起偷窃案后来被冷酷无情的商场保安发现，并且“为了以儆效尤”，坚持将女孩儿告到法庭上。女孩儿可怜的母亲为了她“虔诚的女孩”的堕落而伤心哭泣，却没有人去告诉她自己的无知。

我还认识了一个波兰男孩，他的收入尽数交给了他的父亲，但父亲却总是粗暴地拒绝他想要一点儿零花钱的要求。在一个圣诞节，他的小妹妹们被他们的母亲告知因为家里太穷，没有钱给他们买礼物，这些小女孩们就转而向家中唯一挣钱的大哥哥提出请求。他因着这种请求而受宠若惊，但却同时囊中羞涩；在圣诞前夜，他状似漫不经心地走过临近

的一家商场，为一个小妹妹偷了一套美甲工具，为另一个妹妹偷了一串珠子。他在出门的时候被商场保安当场捕获，他并不是当地商场所抓住的唯一一个偷窃的孩子，在圣诞即将到来的几周内，商场平均每天都能抓住八至二十个这样的孩子。这些罪犯中年纪比较小的孩子通常不会被送到法庭上，大都在给予严厉警告之后放回家，或者通知未成年人保护协会的官员。这些未成年的犯法者大多是为了获得美式的服装，也有一些仅仅是为了一些玩具而已。他们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迷惑，他们的道德意识也为美国的极端自由主义所困惑。

这些由父母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与另一些经常被抓的孩子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区别，这些孩子因为十分渴望能够将一些食物和燃料拿回家，以缓解父母常挂在嘴边的家庭生存压力和生活需求，而经常被发现做出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货车上的煤炭、杂货铺前摆放的蔬菜、街道上松动的木块.....对于那些想为家里做些贡献的孩子来说都是对其意志力的极大挑战。一个从青少年法庭的拘留处被假释出来的波西米亚男孩曾给女舍监拿回来五只偷来的鸡，作为孩子们周日的晚餐，他说他知道委员会“要养活这些孩子很困难，希望这些鸡能够帮上一点忙”。忠厚老实的移民父母对于美国法律和地方法规完全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他们常常会让孩子到铁路边去捡拾掉落的煤块，或者在凌晨三点站在餐馆后门等着餐馆丢弃的变质食物，或是在电梯及抛锚的汽车下面捡拾稻谷来喂鸡。而最后一种情况中常常会发生男孩们因为剪破运粮车的封条而被抓捕的事情。因此，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个收破烂的要求他从货场偷点儿铁条出来就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提议了。最近有四个男孩就接受了这种提议，卖给一个收破烂的人足有两吨的铁。

在芝加哥，被告到青少年法庭上的孩子中有五分之四都是外来移民的子女。其中德国人占的比例最大，其次是波兰人。这些孩子是否都曾由于他们渴望拥有房子和其他东西的父母身上那些“多余的美德”而挣扎过？在法庭上，那些已深受美国影响的孩子悲愤异常的神情在他们的农

民父母看来依旧可怜得像是当初在船舱中远渡重洋而来的惊恐的小男孩，而每每至此，这些贪婪的父母都会失声痛哭。

这些孩子之所以会犯下这些错误，很多是由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无知的放纵，由于他们迫不及待地摒弃异国生活方式而逃脱了父母的管控。十来岁的男孩子会拒绝晚上在家过夜，相对于他们父母所要求的顺从，他们更喜欢废弃啤酒厂地下室和空仓库所带来的自由；而这些男孩儿整日靠着早上送奶工走后，从别人门廊上偷取的牛奶和面包过活。这些孩子会抱怨，家里是多么的“无趣”。一个从城市园艺协会得到了一块空地的小伙子坚持要在上面种爆米花，并试图向赫尔大厦推销他的作物，“在聚会上使用”，还规定“每场聚会都必须邀请他”。还有一群花天酒地的年轻人，他们最自豪的事情就是骗吃骗喝，不用工作就能生活下去，他们也最瞧不起自己的移民父母们诚实忠厚、脚踏实地的生活方式。他们即刻便成为了社会的威胁、道德败坏的例子。很自然地，这些不懂英文、被城市所忽略、子女几天甚至几周不知所踪的手足无措的父母们便经常到赫尔大厦来，倾诉那种骨髓抽离般的痛苦，好像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受难形式，却没有等来熟悉的悲伤平复。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主动出现，他们好像就不知道应该如何找到他们。或许在这种状况中最可悲的一点是反映出了年长且睿智的一代人对年少并幼稚的一代人的不成熟的依赖；这种状况本身往往是造成一切的原因，因为这种状况使得孩子们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并给予他们一种可以照顾自己的虚假安全感。

而另一方面，一个在公立学校学习烹饪的意大利女孩却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母亲，让整个家庭适应美国食物和家庭生活习惯。她的母亲之前在意大利从来没有烤过面包——只是在家把面粉搅拌好，再拿到村子的烤炉中去——而现在从她女儿那儿掌握了炉灶复杂的用法。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一个在公立学校学习缝纫的女孩儿身上，而对于另一名接受婴儿看护培训的女孩来说更是如此，她所学到的这些简单的知识是每个大

厦公寓中的婴儿生存下来所必需的。我还清楚地记得这类课程的教授所达到的效果，我听到一个年轻女子在向她的意大利母亲解释，之所以意大利的婴儿都十分健康而芝加哥的婴儿却总是病怏怏的，并不是因为她母亲所一直坚持的原因——意大利宝宝喝羊奶而芝加哥宝宝喝牛奶，而真正的原因是意大利的奶制品比芝加哥的要干净。她解释道，自己清楚在自家门前挤出的羊奶一定是干净的，但是从杂货店买回来的奶却不敢保证，谁也不知道在从乡下运过来的这数英里路程中都发生了什么；每人能够保证这些奶适合喂给婴儿喝，直到市政厅派人一路跟踪探查，保证没事之后。

因此，通过公立学校的公民教育，这位意大利妇女慢慢地变得更加城市化，不仅仅是指居住在城市，还如她的拉丁裔祖先在“城市化”这个词中所体现的一般，在思维方式上也发生了改变，进而她的整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移民聚集区里的公立学校作为对移民进行美国化教育的机构，它们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同时，试行的暑期学校所开设的种类繁多的课程将对这些家庭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这一点也毋庸置疑。

很难形容那些年长且具有异域面孔的移民与其他人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推着水果车的意大利人很容易感到沮丧，因为别人嘲笑他是“意大利佬”；常有俄国小贩被砸死或受重伤，因为对于帮派中的男孩儿来说，这是表达他们的不屑与嘲笑的一种光荣的行为。赫尔大厦组织的一个犹太商贩保护协会的成员们将每天中老人所遭受的不敬汇总在一起，以德报怨，甚至有位听众在李尔王的字里行间找到了激情所在，用老生常谈的论调讲述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振奋我们的精神，而这种效果是其他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所无法达到的。希腊人受到语言歧视时的愤怒之情却是极为惊人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面对自己的种族问题，这些难题在美国可以被降至最少，同时这些来自地中海的移民可给予我们极具价值的帮助。当然，他们对于肤色的差异没有那

些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么敏感，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与迦太基和埃及走得比较近的缘故。他们充满敬意与激情地领听着杜·博尔斯博士在林肯诞辰纪念日那天在赫尔大厦所举办的演讲，很显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肤色的差异在种族矛盾中所占据的地位，而当我参加完各场为宣传“有色人种的优越性”而举办的会议回来后，已经有多位来自城市的邻居与我进行了多场富有启发性的谈话。

庆祝民族性节日始终是一个在相邻几个移民聚集区内相互提高认知度、增进彼此间联系的有效方式，不仅仅是对他们的美国邻居的认知与联系，还包括他们本身与自己的子女间的感情。我们早期所举办的意大利活动之一就是为加里波第^[6]的诞辰举行祭祷，而当晚所展出的加里波第的半身像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大厦前厅内的主要装饰。这一行为引发了意大利同胞们的极大热情，而拉斯金称，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普通的意大利人”，他们是能够迅速传递同情的“同道中人”。

赫尔大厦举办的另一场希腊聚会展现了古典时期名声卓越的学者用希腊文和英文所留下的著作，这些成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希腊邻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活动中，芝加哥市长就坐在希腊教堂的端庄的高级祭司右手边，并且分别接受了美国和希腊国歌的致意，在场之人都存了赋予崭新的、未经雕琢的芝加哥一些来自雅典的传统这种新奇之感，并且，这些市民的心中对此无比珍惜。

希腊人确实十分看重他们的传统，将其看作是最珍贵的财产；而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希腊人聚集区所组织的针对马其顿地区内激进的保加利亚人的抗议，他们在抗议中称，保加利亚人之所以企图建立保护区，不仅仅是因为所能获得的既得利益，也是由于那些保加利亚人能够因此将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纳入到这个“野蛮的国家”的囊中。据说，在这个保护区的基础上，保加利亚人已然在他们的学校中教授“亚历山大大帝是保加利亚人”的结论，不久之后他们就该说亚里士多德也是保加利亚

人了。希腊人决不会对这种侮辱忍气吞声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马志尼^[7]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是有着极大的兴趣的。遍布全球的信奉“统一的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在这一天走到一起。他们回顾这位伟人的希冀，他虽然将所有的忠诚都献给了自己的国家，但却更执著于全人类；他为意大利的工人阶级穷尽一生，他的诉求是那么的充满哲学意义、充满着对正义的渴求，以至于跨越了国界，最终汇成《论人的责任》一书^[8]。这份伟大文献的影印件在马志尼百年诞辰纪念日被分发至意大利每位公立学校的学生手中，而当意大利青年协会的芝加哥分会迈入我们最大的一个大厅，并向整个赫尔大厦展示马志尼这位英雄的半身像时，我意识到自己虔诚地希望这些将未来交付给美国的意大利青年们能够真正成为“国家间传递友好与和平的使者”，希望美国能够在不破坏这些历史长河中存留下来的基石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注释：

^[1]泛斯拉夫主义（the Pan-Slavic Movement）：产生于19世纪初，最早出现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的知识分子中。泛斯拉夫主义有意识地将寻求种族血亲和文化同源引向对斯拉夫民族的集体认同，既是对19世纪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民族意识不断成熟和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反应，也是斯拉夫人民政治心理发展的需要，因此以种族和文化相亲为起源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后期即转入了民族政治运动。

^[2]教女（goddaughter）：在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中，由父母外的其他长者担任其担保人的女童。

^[3]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4]西拉斯·马南（Silas Marner）：艾略特早期小说《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中主角，以纺织为生。

[5]逾越节（Passover Feast）：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民族的四大节日之一。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晚餐称为Seder（家宴），有复杂而具象征义的程序。

[6]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和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的马志尼）。

[7]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撒丁王国的首相加富尔和号称“两个世界的英雄”加里波第）。

[8]《论人的责任》（The Duties of Man）：于1860年著成，是马志尼的代表作。

第十二章 托尔斯泰主义

在世博会之后的那个冬天，对芝加哥的慈善机构进行必要的管理还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努力照顾数以千计被困在市内的穷人的临时救济组织获得了大笔的捐款，但我们的工作还是充满了绝望和不知所措，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做到完美。

那个冬天我在经济公寓和临时住所内做了多次救济访问，而我常常感到一丝自责，因为我本应该适应这种遭遇。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往往违背了我所参加的各种教学与慈善活动。在面对饥荒者及需要帮助的人们时，这些举动往往都是徒劳而肤浅的。芝加哥的那个寒冬让许多人开始思考这些严峻的问题。我们的一位年轻朋友每天都来赫尔大厦给我讲在她父亲的纸仓里与其它波兰女孩儿一起整理废纸的事情；还有一个女孩儿在一家血汗工厂里做了一个月工，她总是简单顺从地做自己的活儿，以至于老板对于她为什么会到那儿工作从来都没有概念；还有两个人是在一家鞋厂工作——所有的这些的发生都好似为了给大家提供素材一般。直到第二年的冬天，沃尔特·威科夫在芝加哥徒劳无功的求职举动才显现出其先驱作用，迫使即便是最苛刻的商人也不得不收回之前所说过的“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够找到工作”的言论。

也许是由于每天都要直接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使得我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始终都怀着一种感想，而这种感想最终促使我转向托尔斯泰求助——毕竟，只要居民们并不是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并缺衣少食的话，安置点，或赫尔大厦本身就仅仅是对“与贫穷为伴”这种简单冲动的掩饰与嘲笑。

各种亲身经历给我带来的心思状态与拜读过托尔斯泰的《我们应当做什么？》之后毫无二致，这篇著作描述了作者在1881年冬季的莫斯科城内，徒劳地试图释放那种无法言表的压力与欲望和必然的说服力——他认为只有他这个真真正正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过住处及食物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曾经帮助过别人。

毫无疑问，与充满相互依存的现代工业化城市相比，在俄国农村更能体会《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本书的内涵，在这里，辛勤劳动的农民与无所事事的贵族之间的差距与矛盾被放大到了极致。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那些有良知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一片土地上，托尔斯泰清晰的论调都更具价值，这些人不仅仅认为公正行事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甚至寻得正确的方式也是极为困苦的。

自从我大学刚毕业首次读到托尔斯泰的《我的信仰是什么？》之后，我就成了托尔斯泰坚定的读者。这本书清楚地指出人类拼尽微薄之力以求公平正途的行为大多是由对丧失自我的恐惧而导致的；进而我相信，如果真的能够出现新的社会制度的话，也是由这种制度本身聚集所有可悲的人类努力来实现的，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就暗示了整个发展前进的方向。但是，我最想知道的却是托尔斯泰称大多数劳动者所承担的“劳动量与其体能发展极为不平衡”，那么他对于其在这世间日夜从事体力劳动的领悟曾否给他带来过平静！

1895年的夏天，当我从伤寒的病痛之中转好，进入漫长的恢复期的时候，我有足够的时间仔细地反复思考许多事情。疾病拖得时间极长，以至于我在进入冬天的时候健康状况仍极为令人担忧，因此在隔年五月份，我出国去了朋友史密斯小姐那儿，希望能够得到全面的康复。

对于见到托尔斯泰的期望使我充满了为城市贫困这个纠结的问题寻得一丝解决之道的希望。我只不过是我们那代人中转向这位俄国人寻求各种答案的数千人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并没有将他看作是先知——他所

表达的信息过于混乱且自相矛盾，不是先知所为，我们将他看作了是一个有能力将自身生活抽离至良心层次、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人。

在英格兰居住的最初几周是极为令人振奋的。几年前的伦敦仍旧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蓬勃发展带来的新热忱对于这个国家的振奋作用”，但是，这座城市所具有的更多的仍是对于严谨调查和自我审查极为重视的英式风范，这种辛勤的工作是社会改革领域内所有成功实验所必须进行的。在我多年的生活中曾接触到过各式各样的群体组织和个人，他们的建议我大多记得，但是回想起来，可能记得最清的是新伦敦郡议会的成员们，他们为改善伦敦境况所制定的意义深远的计划无不可谓是燎原之火。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表述，充分描绘出了用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喜悦衍生出的精致与愉悦来取代富人的精致与愉悦的努力，描绘出了在这一特定的时刻，人们对于泰晤士河上市政游船的喜爱并不亚于为贫困人民所指定的广泛的市政廉租房计划。被誉为“坐在公爵身旁的码头工人”的时任市议员的本·帝勒特先生^[1]陪我乘坐划艇从泰晤士河一路驶向他位于格林威治的家，每当我们经过一座码头，都有几百名码头工人向他欢呼致敬；约翰·伯恩斯在巴特斯向我们展示了他卓越的市政成就，在那里水泥路面的两边栽满了各式植物、技校培训男孩子们成为合格的瓦工和管道工、公共浴室允许寄宿学校的孩子们来上游泳课——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至少十五年之后才能在芝加哥所取得的成就。而注定要经过二十年才能发展成儿童宪章的新《教育法案》也成为了下议院争论的焦点。史密斯小姐与我很荣幸地被这一法案的起草人约翰·戈斯特爵士^[2]邀请至议会喝茶，尽管我们对于在那儿听到的关于教会学校与牧师之间的争论令我们困惑不解。

我们还曾在坎宁镇的广场上聆听凯尔·哈迪^[3]向大群工人阶级听众宣传当时刚刚成立的工党承诺为工人阶级所争取到的权益，随后，我们加入了歌唱颂歌的庞大队伍。

您何时才会拯救您的子民。

哦，慈悲的主，要等至何时！

很难相信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政治集会。看起来英国的土壤比我们的更适合民主意识生根发芽。罗伯特·布拉奇福特^[4]言辞激烈的小册子几乎人手一份；而卡尔·马克思的女儿艾威灵夫人在李卜克内西^[5]返回德国为其在国会大厦冒犯君主的演讲服刑前，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为我们掀开了这个老式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神秘面纱，这位社会主义者甚至还为开始对萧伯纳^[6]进行尖酸的嘲笑，尽管那晚他在群众当中燃起了一把火。

奥克塔维娅·希尔女士^[7]和蔼地向我们展示了秉承着她的理念而建成的根基稳固的租赁业务；并十分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红十字广场，广场两边的小屋风景如画、居住舒适，而坐落在广场第三面上的是供所有住户使用的公共大厅和公用画室；沃尔特·克雷恩学校的学生以墓室壁画的形式对画室的内部进行了装饰，体现出了现代工人阶级生活中的英雄主义。

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都是具有人性的温暖的，不仅如此，我们还有机会目睹了一些从经济学的角度透析社会问题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正在撰写《产业民主》一书的韦布夫妇^[8]，以及宣讲现代资本主义演变的约翰·霍布森先生^[9]。

我们还曾旁观过工厂巡检员的工作，他的严格且训练有素是公共服务得以实现的前提。当巡查至安置点的时候，我们至少对他们没有落入千篇一律的俗套而感到欣慰。时任伦敦主教的凯农·英格拉姆担任了牛津大厦的负责人，由神职人员来担任负责人也是让我感到十分愉快的经历之一。牛津大厦租下了所有场次的音乐演奏——后来我们在芝加哥称之为杂耍表演——每周六晚上在贝斯纳尔·格林地区举办。大厦的居民

负责对节目进行审查，他们精心地进行准备以确保节目受到欢迎，而每一个在周六晚上来到贝斯纳尔·格林参加活动的工人——每次都有数千人之多——都会因为这些努力而听到更好的曲目。

在大学大厦，刚从意大利回来的汉弗莱·沃德夫人向我们讲述了意大利盐税所产生的影响，而这次演讲很明显地是一系列关于对穷人影响最大的经济问题的系列讲座之一；在布朗宁大厦，他们同时也在表彰他们的贩夫走卒邻居，这些人能够拿得出被照顾得最好的驴子，他们的负责人赫伯特·斯特德也因着在这个人口增长最为稠密的地方所轻易即能获得的友好而展现出了对自己有名的兄弟赞誉；在柏蒙西安置点，居民们正快乐地庆祝大学推广计划中的学生成功地通过了伦敦大学的考核。那次我在英格兰所收获的关于研究、关于学术、关于有组织的公共精神的印象与我在1900年第二次故地重游的所见所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第二次访问英格兰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热忱都被南非战争消耗殆尽，而来自“帝国最核心处”的不公行为则被完全忽视。

比较来看，伦敦与俄国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俄国的社会情况非黑即白毫无中间地带，就像一首中国古诗中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似乎将我们领至了文明的边缘之处，如此的遥远却又充满东方韵味，商人们从骆驼背上或是其他在伏尔加河两岸行走的奇怪的运输工具上取下新奇的货物。但是即使是在这儿，我们所写的关于小说家科罗连珂^[10]的简介将我们带回了交融着遥远的过去和当前俄国人人都追求的自我意识的现实之中。这种对比还体现在朝圣者为寺庙、墓地和圣地本身虔诚的服务，不惜衣履阑珊荆棘裹足，而另一方面，革命家们早在此时就已开始主张共和，不仅在政治方面，同时也在工业领域内提出共和理念。

我们还有关于莫斯科的艾尔默·莫德夫妇^[11]的简介，他们因翻译了

《复活》和其他托尔斯泰晚期作品而闻名，当时，夫妻二人正打算离开俄国去到英格兰南部建立一处农业聚居地，并依靠双手劳作而生。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莫德先生的邀请，去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12]参观，并向我们引荐了托尔斯泰伯爵。没有哪个门徒对这位大师的寻访之旅比我们这次更具激情的了。当莫德先生真正将我和斯密斯小姐引荐给托尔斯泰伯爵时，考虑到这位大师对于慈善事业的态度，莫德先生尽力使赫尔大厦听起来比我敢于去吹捧的更为高贵和独特。

托尔斯泰先生穿着他的乡村长袍站在旁边，严肃地听着莫德先生的介绍，但却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当时显得极为不恰当的外出长袍的袖子，他抓起我一只袖子的边缘，将其调整至合适的宽度，静静的说，“袖子大得都能给个小姑娘做一件长袍了”，并直接向我问道，我是否认为“这种裙子”是“人与人之间的屏障”。我当时心思完全不在这个上面，没能给出一个清楚的解释，尽管我试图表达的是尽管我的袖子大得吓人，但是与芝加哥做工女孩的衣服在大小上根本没有可比性，区分我与“人民”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这种没有任何装饰的贴身棉布长裙；即使我有心模仿他并“穿的像个农民”，模仿三十六个民族中的哪类农民也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幸运的是，伯爵夫人的出现拯救了我，反复说她之前是如何试图用自己的裙裾和其他质量上乘的长袍上的多余部分的布料来为庭院里她假想出来的女孩子们穿上衣服，直至有人迫使她站着静止不动，现在她也建议我这样做。但是随后，当我被问到是谁“养育”了我，以及我是如何“居有定所”的时候，无论是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还是其他朋友都没能将我从这一窘境之中拯救出来。当我答道，是一个距芝加哥一百英里远的农场为我提供生存的必需品的时候，我都预料到了接下来要问的另一个尖刻的问题：“所以，你是一个外居地主喽？你认为通过生活在城市的人群中能比耕种自己的土地更好地帮助别人吗？”这种新的关于耕种自己土地的挫败感在托尔斯泰的二女儿五点钟准时出现在树下的下午茶桌旁时变得更为强烈了，托尔斯泰小姐是直接从庄稼地里回来的，她从早上五点起就在那儿与一群农民共同劳作了，她并不是在地里

装模作样地劳动，而是切切实实地顶替了一位脚受伤无法下地的农妇的日常劳作。她工作得筋疲力尽，但她并未期望也确实没有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对她表示同情，因为大家都已经对这种即使不舒服或十分疲劳也要秉承自己信念的做法习以为常了。但是，承受这种不适感很明显要比另一种殉道感要来得简单得多，即使有不速之客的到访，托尔斯泰伯爵也会将这种殉道感附加在其每天在这栋传统住宅地下室中的学习之中——这间地下室中的低矮书架上摆满了破旧的书籍，镰刀与铁锹则靠在墙上——这种殉道感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这种嘲笑来体现的，从而成为了最难以忍受的形式。

那天晚上，我们与一群从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地游历到这个偏远的俄国村庄，以求更好地了解这位伟人的访问者们一同坐在花园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会问自己，为什么如此坚定地将这个人认作是智者、是圣人，以至于这样的人民集会每一天都在重复发生着？当时在我来看，我们是被这种真理的宣讲而吸引，因为托尔斯泰做出了至高无上的个人努力，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个人努力，使自己与最卑微的人民，那些为他耕种土地、擦扫靴子、清洗马厩的人，建立起了正确的关系。毫无疑问地，我们同时代的人身上最沉重的负担就是意识到了我们关于所有工人阶级都有享有社会知识资源的权利的民主主义理论，与数以千计的工人每天被永无止境的工作累得不堪重负，从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充实心灵与思想的残酷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相信这一理论却又同时表现得不相信，并始终承受着由此而带来的压力和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的折磨，而这个人在却在多年前就已尝试“从农民的背上下来”，简化了至少是他自己的生活，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并成为了同时代中大多数人争相效仿的典范。

毫无疑问，那晚坐在托尔斯泰家花园里所有的访客，都有足够的借口不去实践信仰中所要求的辛勤劳动，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正以其他方式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我们这代人当中，没人能够像托尔斯泰本

人那样强烈地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同时，也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轻易地凭借自己的天分和对世界在知识领域内的贡献而免去自己艰辛的劳作。但是直至现在，考虑到他的时间过于宝贵，无法浪费在田间劳作或是做鞋这种事情上，我们伟大的东道主由于太想了解生活，以至于不愿放弃这种对共同劳作的喜爱。人们本能地寻找着关于为什么俄国人比我们其他人更容易做出上述结论的原因；俄国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劳动是爱的居所”，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没有任何两个人或是一群人能够在不进行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亲密关系，并且当俄国人谈及劳动时，他们指的是农田里的劳作，用农民邦德拉夫的话说，是“面包劳作”。这些教条般的习惯在农业劳作中逐渐形成，这些在布鲁克农场和其他农场曾尝试过的哲学性实验也验证了同样的道路。托尔斯泰本人曾记录过自己在这方向上的理念和多次尝试，或许这比关于雷文凯早上田间劳作的描述更具说服力，在那里他甩掉了自己的不满和孤独的情形，当他有节奏地挥舞着的镰刀与其他人融为一体，他感受到了与农民之间建立起的全新的兄弟之情。

花园里的长餐桌旁坐着的是各种旅居客人、已成年的女儿和由保姆陪着的年幼孩童。伯爵夫人为大家准备了由男仆准备的传统欧式晚餐，但是在田里劳动了一天的伯爵和他的女儿却只吃了一些粥和黑面包，喝的也只是些淡啤酒，与堆干草的农民的食物别无二致。当然，我们都已经习惯了那些劳动最辛苦的人在每天的工作结束是吃的是最粗糙最简单的食物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却并不经常与他们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并同时享用着由别人付出劳动而做成的精致食物。托尔斯泰只是吃着他自己的简单的晚餐，并没有对他的家人和其他客人的食物发表任何评论，并认为所有人都如他自身一样，都有办法在良心上过的去。

那天晚上托尔斯泰家中的所有人都对一个年轻的俄国间谍极为感兴趣，这个年轻人此前以乡村学校校长的伪装身份来到托尔斯泰家，就为获得一本被媒体审查禁止的《托尔斯泰论生命》。在与托尔斯泰促膝长

谈一夜后，这名间谍离开了托尔斯泰家，并带走了那本禁书的手稿，但是很不幸的是，他由于受到托尔斯泰观点的影响，在那之后不久就向政府全盘托出他的所作所为，并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尽管托尔斯泰认为将相信他的理念的人流放至西伯利亚是一件及其不公平的事，但他本人作为那本书的作者却仍旧逍遥法外，后来，他在致莫斯科报纸的一封公开信中也指出了这种矛盾。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理所当然地将话题导向了关于非居民制度的讨论，但奇怪的是，我对托尔斯泰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感到失望。在我看来，他用与他人同样冷漠的态度过于夸大了体力劳作和能够无视与他人之间的不同及良心上的不安的道德力量之间的差别。

在意识到了这种能够体现自身与伟大权威之间的差距的惭愧之感后，我想起了早期赫尔大厦居民们的信仰：无论定居点提供什么，都要以积极的形式展现出来；要认识到每个人，即使是最最卑鄙的人，身上都具有好的一面，我们不会反对任何人。我们经常会对这一理念有所背离，但难道这些案例没有显示出对于弱小的坦白吗？难道我们没有总是对不明智且无理的精力浪费存有敌意吗？

尽管气氛活泼真诚，那天晚饭时及随后时间里的谈话还是在一段时间内给我造成了些微的疑虑。难道托尔斯泰比生活需求更合乎逻辑吗？生活中的错误能够被减少到出现不求回报的劳动的程度吗？能够通过每个人仅仅工作至满足自己的需求，来纠正这些错误吗？如果一个人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生命，难道不是很容易就对此提出反驳吗？如果是伴随着生命本身所演绎出的不可避免的阴暗与愧疚的历史主义观点呢？史密斯小姐和我带着无法平复的情绪乘坐夜车回到了莫斯科，这种情绪通常是被决心努力探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最核心的本质时触动良知而引发的。大量关于存在感的问题在我们脑海中盘旋，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在幸福的时刻也转瞬即逝，而当时我们却被惊得目瞪口呆；这些问题一路无情地追逐着我们，掠过南俄的大片小麦平原、穿过华沙拥挤的平民

窟，最后来到农民和农妇们正在收割稻谷的德国风景明媚的土地。我还记得，当时看着眼前辛勤耕种的农民们，我将好奇地将托尔斯泰所倡导的田间劳动与路德所曾描述的收割土地的舒适感联系了起来，尽管被许多神学问题所困扰，路德却突然因为所涌现的对于面包的感激之情而将其淡忘，惊呼：

“金黄的玉米站在锥形的茎秆上笔直、挺拔、精致；温柔的大地再次将其哺育在上帝的眷顾之下”

至少耕种的平民能得到这种劳作的慰藉，或许他们是否知晓这种慰藉或是否仍旧极为困苦并不重要，只要他们能够持续自己的劳动。在神职人员使用这种他们所具有的神秘能力来抑制所有不能增强其教义的经验时，我从不允许自己回想起自己所熟知的事实——急迫且永无止境的劳作并不能使贫困人民获得任何乐趣，即使人类正遭受极为惨重的苦难，以及“面包是缓解悲痛的良药”。

我或许曾期望能够凭借最少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留守这种慰藉，接下来在德国度过的一个月的时间内，我阅读了所有被译成英文、德文和法文的托尔斯泰的作品，并暗自计划回到赫尔大厦后，每天早上要在我们的咖啡馆里新增添的面包店至少工作两个小时。尽管每天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是少的可怜的妥协，但是我很难每天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我小的时候曾经学过烘烤面包，并不仅仅是为了以后的居家生活做准备，同时因为我父亲的坚持。作为一个传统的作坊工人，他坚持他的每个女儿都必须在十二岁生日的时候独自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小麦面包，并且他对于面包的质量十分苛刻。还有什么比烤面包更能保持对我自身的培训和家庭传统的呢？我并不十分清楚我的行为是否能被主管赫尔大厦面包房的德国工会的面包师傅所接受，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主要的，我会想办法来解决的。无论是我在拜罗伊特^[13]坐下来聆听瓦格纳^[14]的《戒指》时，还是我已沦为“面包劳作”的追随者的时候，我始终秉持着

我要做这件事的信念，在整个回家的旅途中，在陆地上、在海上，从未动摇过，直到我真正回到芝加哥之后，整个计划在我看来突然变得荒谬至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每天早饭后，总是有一群人等着要见我，有成堆的信件等着回复，各种实际的需求和迫切的需要——这些都可以被搁在一边，好让我烤两个小时的面包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吗？

尽管我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但赫尔大厦显然是记录那些更为强悍的灵魂实践托尔斯泰的结论的最佳地点。或许，托尔斯泰聚居点的建立是大势所趋，尽管托尔斯泰总是坚持人们应该尽可能住得离自己的出生地近一点。一两年后史密斯小姐和我访问的南部某州的一个聚居点，向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关于托尔斯泰的地位的薄弱之处，和其奇怪而严肃的庄严感。英联邦的聚居者们信奉着一个简短的信条。他们认为，事实上，困难并不是总是真相的代表，还能够将道德信念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并且他们还表示，他们的目的是“在所有劳动形式中、在财富的使用中，遵守上帝的教诲”。

史密斯小姐和我拜访住了许多花甲老人的英联邦聚居区的那天，他们正为一位独腿老人的家庭建房子，他的妻子和九个孩子在一个礼拜前从阿肯色州凄凉地搭乘草原独轮车来到这里。由于这个家庭是这个聚集点里人口最多的家庭，他们的房子也将是这里最大的。我们十分惊讶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给予“他所有想要的”做法，我们询问道，这种只要有人申请就发放食物和住所，从不过问其宗教或生存能力的政策，会不会导致周围其他贫民院的居民涌入这个聚居点。我们得到的答案是，这种情况却是在冬天曾发生过，直到聚居地所提供的玉米粥和豇豆是在是太难吃了，以至于那些贫民都回去了，因为即使是南部最贫穷的贫民院也会时不时地供应一些培根肉，以防止聚居地居民经常得的败血症的爆发。因此贫民院的人所要面临的唯一一个难题就是让自己适应在这种极端贫困的环境，这种贫困十分艰苦，只有那些坚信正义的人才愿意去面对。田间和花园的工作是由一位编辑、一位教授、一位牧师和其他艺术家和

劳动人民共同完成的，其间种的水果将供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或是任何从阿肯萨州迁徙过来的家庭食用。聚居点的居民在家庭关系方面十分传统，他们与社会分裂只是因为与劳动和财富相关的传统的缘故。当参观结束，我们正向最近的一座城镇行驶时，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们邀请了聚居点主席的夫人作为客人与我们同行，想在酒店里请她共进晚餐，因为她曾跟我们讲述，在冬天里，她有时是如此渴望听到优美的音乐，似乎她确实像需要牛排充饥一样需要这些音乐，并在对话中不时发出少女般的惊叹。然而，当我们离开时，我们有着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次试验很明显已经告一段落，尽管其物质匮乏，但却又体现出了心态上的平和，这种平和来自于无论理智与否的生活的逻辑——来自看到他的方案真正被付诸实践后的狂热的喜悦。无论如何，我们最后到了南方城市中普通男女常去的地方，有那么一刻，它所拥有的大量的建筑、砖砌的坚固的交通、井井有条的街道，将富人与穷人齐齐隔开，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远没有那些我们身后的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小聚居地来得真实。我们反复互相说道，在生命中所遇到的所有的实际判断和决策中，我们必须与逻辑论证相分离；如果我们没遇到一件事情就停下来寻求逻辑论证的帮助，我们将一事无成；然而，尽管如此，当良心切实成为了一群人日常生活的主宰时，它就会强迫我们崇拜它，好似没有其他现代景象能够与之媲美一样。看起来这本是一件普通事件而已，一群人在他们迫切地尝试验证精神的力量，从而迷失了对生命中事实的认知。

我并不十分了解由莫德先生在柏利所创建的聚居点，那里有几名被俄国驱逐出境的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剧中其中，并且直至莫德先生从马尼托巴湖来到芝加哥，我们才又见到他，他此行的目的是护送第二批杜霍波尔教派的人^[15]，因为托尔斯泰追随者对托尔斯泰和其他基督教教义的不加抵制、全盘接受的态度，使这个教派对所有的托尔斯泰追随者都十分有兴趣。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书的完成和出版对他们来说益处极多，尽管这一举动违背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小说写作所下定的决心。在

这些杜霍波尔教派的人在加拿大定居之后，从《复活》一书中所获得的资金还剩下五百美元，这其中的一半被捐给了赫尔大厦。似乎这些钱只用来为那些亟需帮助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食物与居所也是可行的。

注释：

[1]本·帝勒特（Ben Tillet，1860-1943）：英国社会主义者、工会领导、政治家。

[2]约翰·戈斯特爵士（Sir John Gorst，1835-1916）：英国律师、政治家。戈斯特爵士曾在1885-1886年间担任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首席律师，并在1895-1902年间担任教育委员会副主席。

[3]詹姆斯·凯尔·哈迪（Keir Hardie，1856-1915）：英国工人领袖、英国第一位工人议员（1892）、下院第一位工党领袖（1906），忠诚的社会主义者。

[4]罗伯特·布拉奇福特（Robert Blatchford，1851-1943）：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家、记者、作家。布拉奇福特还是一位无神论者和优生学的反对者。

[5]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第二国际创始人。

[6]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世界著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萧伯纳的一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生，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言他“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由于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他没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而终生是一个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7]奥克塔维娅·希尔（Octavia Hill, 1838-1912）：英国社会改良运动者，其主要关注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城市，特别是伦敦，居民的福利。

[8]韦布夫妇（Mr.and Mrs.Sidney Webb）：以研究劳动关系而著称，是第一次尝试对工会进行分析和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著有《产业民主》。

[9]霍布森（John Hobson, 1858-1940）：英国政治思想家、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积极投身于英国社会改良运动；主张国家制定干涉计划，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干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个人自由。

[10]科罗连珂（Korolenko, 1853-1921）：俄国短篇小说作家、记者、人权活动家和人道主义者。

[11]艾尔默·莫德夫妇（Mr.and Mrs.Aylmer Maude）：托尔斯泰作品英文版翻译。

[12]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Yasnaya Polyana）：托尔斯泰的大半生都是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度过的，这里距莫斯科190公里，大约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1828年伟大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诞生在这里。19岁时他继承了这块土地，成为这里的主人。之后直到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病逝于梁赞的阿斯塔波瓦车站为止，他一直住在这里，当然他的许多主要作品也都是在这里完成的。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国立博物馆。

[13]拜罗伊特（Beyreuth）：德国东南部城市，位处菲希特尔山和弗兰克侏罗山之间的丘陵地上，美因河上源红美因河畔。

[14]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15]杜霍波尔派（Dukhobors）：俄罗斯正教会中的一个反国教派别，形成于18世纪。该派否认国家和国教会的权威，废除司祭和圣礼，唯一的仪式是唱祈祷颂诗，以口传《生命之书》赞美歌和箴言丰富个人直接启示。

第十三章 公共活动与调研

二十年前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时至今日依旧存在——街边人行道上摆放的大型木质垃圾箱，无人清理的垃圾日复一日地堆积着。垃圾收验系统不完善是整个城市都遇到的事情，并且在像我们这些地区里成为了最大的威胁，意大利和希腊的水果小贩丢弃的腐烂水果蔬菜使得垃圾数量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同时，拾荒者将城市里各处垃圾堆里的残渣剩饭挑出来放在肮脏的袋子里带回来进行进一步分拣清洗，也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

二十年前我们社区里的孩子们都是在这些大型的垃圾箱旁边玩耍，有事还甚至会跑到垃圾箱里面去。这些垃圾箱是蹒跚学步的孩童最先学会攀爬的东西；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来说，箱子庞大的体积和里面的东西在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中自然成为了可以利用的防御物和攻击物；最后，这些箱子还是那些心无旁骛的情侣们喃喃细语互诉衷肠的地点。我们有义务牢记，在赫尔大厦的居民意识到他们应该摒弃这些箱子并建立起一套更完善的垃圾收集系统之前，所有的孩子都会拣食里面的食物，其中所散发出的味道有一种奇怪而又强势的力量，萦绕在记忆的最深处。

即使是再有良知的芝加哥市民，如果他住的地方比较远，也很容易忽略畜舍和垃圾场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只是会偶尔想起这些地方的存在，但是对于安置点的居民来说，他们则是不得已地长期与这些地方为伍。在我们在霍尔斯特德大街上度过的前三年里，我们在赫尔大厦建起了一座小型的焚烧炉，并且多次向市政厅反应我们区的沉痾。我们与移民们进行了很多次谈话，向他们指出，尽管在他们故乡的乡村中，妇女只要打扫好自家的门前即可，不用去理会在空地上和阳光下慢慢腐烂的

垃圾，但是在拥挤的城市一隅，如果垃圾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和销毁，会导致经济公寓里的母亲目睹自己的孩子生病乃至死亡，因此，移民们不应该只保持自己房子的清洁，还应该帮助政府，保持整个城市的整洁。

也许我们的努力对于糟糕的状况确实起到了些许作用，但是还是令人难以忍受，到了第四个夏天，情况变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令人绝望，因为我意识到，如果这种令人作呕的味道不能被改善的话，我那柔弱的侄子就无法跟身为监护人的我一起居住在赫尔大厦里了。我应该对此感到羞愧，其他那些柔弱的、与家庭分开的——我不是指去了寄宿学校，而是永远离开我们的孩子没有促使我更早地采取行动。在最早来到赫尔大厦的居民的指引下，我们对城市垃圾收集系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从这一系统在其它区域内的效率，到城市不同区域内垃圾问题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赫尔大厦的女性俱乐部是一年前由一个幼儿园教师发起的母亲集会发展而来。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但是，那年夏天当我们坐下来跟她们讨论高死亡率的方式，在我们社区内还是第一次。在经过了幾次关于这个问题的俱乐部会议后，尽管存在着死亡率增长最高的地方是拥挤的外国人聚集点而不是一些爱尔兰裔美国人所居住的大街上这一事实，仍然有十二名成员联合居民共同对街道的状况展开了调查。在那年的八月和九月期间，赫尔大厦向卫生部所递交的关于违法违规的详实报告就多达一千零三十七份。对于那些洗了一天衣服，熨了一天衣服，又做了一顿热腾腾的晚饭的妇女俱乐部成员来说，在夏日的傍晚坐在自家的门阶上乘凉要比在又脏又乱的小巷中跑来跑去并与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们的垃圾箱而发生不愉快要舒服的多。在一年中最为炎热也最不怕人的天气里每周三次地做这件事情需要极为强大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信念。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女性坚持下来了，同时也有很多居民也坚持了下来，接连有三名监察员因为工作不到位而从我们社区被调走。但是死亡率仍然居高不

下，并且在那年的整个冬天里，状况都没有明显好转。大家都十分绝望，以至于来年春天我们获得了两个清除垃圾箱的市政合同时，我不得不在两位有名望的商人的支持下将第十九区清除垃圾箱的任务通过招标放出去。我文章的技术性受到了质疑，但是正是这件事使得市长任命我为社区的垃圾监察员。

这个职位的年薪只有一千美元，但是政客们对于丢失这一政治上“炙手可热”的职位也十分恼火。这个职位并不是什么肥差，不仅早上要六点钟起来查看早班状况；还要跟着那些装得满满的货车，看着里面的东西时不时地被颠出来；或者坚持合同方将货车的数量由9-13台增加至13-17台，尽管他再三向我解释他开出来的每一辆车都在赔钱，并且上一任的督察员都允许他只派出七台车；或者将草率的房东以没有提供合适的垃圾桶支架而将其告上法庭；或者逮捕试图将自己马厩里的废物放进垃圾车里的住户。

在两三位德高望重的居民的支持下，我们建起了六座单独的焚化炉，用柴油焚烧在巷子里收集到的垃圾。城里只有一家窗栓厂可以回收利用旧锡罐，而我们回收上来的锡罐则是这家工厂所能消耗掉的十倍以上——并且支付的费用极少。我们绝望地尝试聘请工人来收验动物的死尸，市里还为此向他们支付了巨额的费用，但是我们后来慢慢地发现，他们经常让警察急救车来做这些事情，并用货运车将这些尸体拉到印第安纳，低价出售给一家肥皂厂，而我们雇佣的合同方正是这家工厂最大的股东之一。可能我们工作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咋一条狭窄街道表面十八英寸下的一条便道，在发现这条通道后，我们成功地在市政建设记录中发现了相关信息。住在这条街上的意大利人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地兴趣，但却并未感到惊奇，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挖掘出那些被埋葬的城市。这条通道的发现成了我与承包这条街道垃圾问题的承包商之间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因为我在清除了表面的八英寸垃圾后，我坚持恢复这条通道的原貌是他的责任。最后还是市长亲自出面才解决了问题，市长准

许我将他撵进孩子们称之为我的“垃圾马车”的街道，并在这次争议中站在了我这一边。

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曾在芝加哥和匹兹堡做过十分优秀的志愿督查工作，后来成为了我的副手，并在随后的三年内以极为严格细致的态度完成了她的工作。在后两年中，她被调到了公众服务领域内工作，而对于伊利诺伊州政府在1895年的这一决定，许多市民是十分高兴的。

社区内许多外籍妇女对于这种走出去的男性化的工作方式感到震惊，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解释明白这种理念的皮毛——如果在公寓中照顾病人是一份女性化的工作的话，那么走出去到社区内防止“肮脏的疾病”到处蔓延也应该是一份女性化的工作。尽管一些女性十分热忱地对于逐步得到改善的环境表示肯定，并十分赞成她们家庭主妇的职责有逻辑地扩展到了相邻的小巷和街道中，她们还是十分肯定“这不是一份女性应该做的工作”。这种态度是有一天监察员在洗衣房外听到她们在里面面对这一问题的热切讨论才被发现的。一名员工在辞职的时候口无遮拦地表达了她对这个地方的看法，并用如下的言语来表达她的轻蔑：“我宁愿去做在这些小巷中的卖笑女郎也不愿再呆在这儿了。”

然而，工作八小时就可以得到八个小时的工资，无论个人“影响力”而一碗水端平的裁决方式、房东和房客之间共同承担义务，以及对双方都遵守法律约束的要求，或许是我们的工作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这种每天作为公职人员的一部分进行工作生活比许多关于公民意识的讲座要更具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毕竟我们更容易相信自己所看到的。详尽的监察和其他各种相关措施在极大程度上改善了社区的清洁度和舒适度，直至一天，我们区的死亡率从市内各区死亡率分布名单上的第三位降至了第七位，当我们将这一成就通报给妇女俱乐部的时候，经久不衰的掌声中记录了对于这一成就的真挚的参与感和“取得良好结

果”的公共精神。但是社区的清洁问题所获得的名声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全能的市议员感到了威胁；尽管我们无知地认为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安全无比，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办法，通过取消所有的相关职位阻碍了我们的发展。他向市议会提出了一项法令，将垃圾的收集与城市街道的清扫和维护结合在一起，由每个区的负责人来负责。当然，相关的办公室人员仍旧按照公务系统来配置，但是只招收那些通过了考试的男人。尽管后面一条规定后来为一名女性开了特例，但是这条规定仍实施了很长时间，足以将所有十九区的监察员摒弃在这之外。

当然，我们在监察方面的经验只能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从一开始就十分担忧的凄惨的住房状况有多糟糕。在世博会召开的那年夏天，再一次关于住房改革问题的公共演讲中，赫尔大厦被作为冷漠的封建地主而被提及：若干个小型租户和没有下水的畜舍占据着社区内的大块地方，而其紧邻地区都是出于类似的状况之中。这次演讲既没有省去对居住房屋的描述，也没有隐去主人的姓名。拥有这片房产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被这种公开的攻击方式所激怒，并立即着手调查租住房屋的状况。我们一起对所有房子和畜舍进行了详细的排查，面对我们调查所收集上来的结果，我不得不赞同他关于为南部意大利农民提供卫生设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的观点。但是他并不愿意整个地方始终处在这种可悲的状态中，最后他终于提出了个莽撞的建议来打破僵局，他愿意将整块土地无偿租给赫尔大厦使用，但是他在提出这个提议时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决定将租金收入用来改善卫生条件的话，无异于是将钱打了水漂。

尽管当我们提出房子的状况过于糟糕，我们没有能力承担起修缮的工作时，他却坚持为他的提议赌上一赌，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免费租约。最后我们提交了一份规划，表示将所有的房子拆掉，将整块土地变成操场，尽管谨慎的顾问们暗示我们如果曾出现过这种将每年两千美元左右的收入拒之门外的举动的话，将不利于赫尔大厦以后申请捐款支持。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是被认为不合适也比差劲的地主主义要好得多，因此，

那些状况最糟糕的房子被拆毁，状况较好的三所房子被出售并转移至街对面，但我们对这些房子的使用提出了谨慎的要求，决不能再次被用作旧货商店或是酒吧间，而一处公共操场终于修建了起来。赫尔大厦将负责这片操场十年的管理工作，并随后将其上交给城市操场委员会；开始时市里指派了一位警察来负责操场的总体秩序，后来这位警察也成为了大厦的一位得力助手。

在整整十五年的时间里，这位具有公共精神的地产主人始终为这片土地支付着各种税单，并在这片街道被出售的时候，尽全力确保了操场成为了附近一所学校的运动场。而另一方面，那些在拆毁房子前被依法驱逐的无依无靠的房客，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旧住处的怀念。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意大利马具工匠，他表示他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获得过如此的成就，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这么像意大利”。

早期的操场举办过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在五朔节^[1]的庆典上立起五朔节花柱，并选出五朔节皇后。我还记得有一年，五朔节皇后的美名被颁给了在街道和小巷中拾拣废纸数量最多的小姑娘。那年春天的时候，孩子们组成了小分队，发给每个成员一根长棍，棍子尖尖的一头可以将四处乱飞的纸片戳起来，并放在赫尔大厦小巷中的大纸盒中仔细清点。赢得桂冠的意大利小姑娘十分在意这份对于辛勤劳动的奖励，我们全都对街道的干净整洁十分渴望，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再次选出“爱与美的女王”时所带来的不协调。

在第二年年终时，汤恩比大厦的负责人及其夫人在结束他们的环球旅行返回英国前拜访了我们。他们曾在东伦敦居住过很多年，并因其所得到的改善而将此定义为公众运动。他们对于所看到的事实十分震惊——在一个仍旧十分具有创造力和希望的新国度里，竟少有人关注已经得到验证的改善方式的实施和实践；并且他们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找不到任何详细记录了英国城市状况研究的蓝皮书和政府报告。

他们是许多英国客人中的第一个，这些英国客人都表示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芝加哥所遇到的许多不幸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缺少公共精神，而是由于其政治体系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去期待任何一个不速之客在看到这些细节对于一个仍然年轻的城市来说是如此的不受重视、缺乏耐心去纠正，并仍旧相信以后问题会得到解决。最明显的问题是与那些移民人口的拥挤居住环境相关的问题，居民中有九成以上是来自于农村地区，并坚持在拥挤的租住区内进行各种各样的传统农业活动。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在详尽的城市法规规范下生活的客人来说，我们的一些做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允许希腊人在地下室宰杀绵羊、允许意大利妇女不仅可以在市内地区，还可以在孩童玩耍的院子里分拣从城市垃圾箱里捡回来的垃圾、允许移民面包师在人行道下方肮脏无比的地方不受干扰地为自己和邻居烤制面包。我记起约翰·伯恩斯对意大利聚居区进行的两次间隔了十三年的访问。在第二次访问中，他似乎对于某座房子始终由一位富裕的意大利人所拥有不曾变过这件事情感到十分难以置信。他十分清楚的记得区内每座房子的具体位置，以及前后住房之间的准确距离，并且他能马上问及我们是否像他十三年前所建议的那样为一个阴暗的门厅开了一面窗户。我们尽责地承认，尽管房东不允许我们在墙上修一扇窗户，但是我们向已经成立了十年之久的城市房屋协会提交了相关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一位赫尔大厦的居民在对芝加哥住房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后写出的，协会也据此对颁布了典型经济住房模式；委员会秘书尽职地对法案的实施进行若干年如一日的监督，以确保法案的正常运作不会由于市议会开了太多的特例而受到影响。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对于伯恩斯先生来说仍嫌缓慢，因为在芝加哥，实际的房屋状况并未得到很大变动，其所具有的各种特质早已在伦敦被认作是非法做法。直至今年，我们才得以向他汇报，如果他再次到我们这儿来视察的话，可以发现法律的约束力终于延伸至已有的房屋上，并且一队有良知的监察员在其领队极具效率的领导之下迅速地对大多数明目张胆地错误进行了纠正，同时，一群医生与护

士也尽全力追踪那些“白色灵车的足迹”。

对于现有法律仅有的几次连贯性执法和其先进性所起到的效果，经常使得赫尔大厦与周边的邻居关系紧张，至少是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记得与当地房东持续不断的争执之一就是他们总是将旧房子里的破东烂西拿出来，将房子重新标示成新的，以逃避建筑法令的约束；而另一名意大利邻居则陷入了无比的痛苦之中，因为他新开辟出来的后院小房竟然被宣布是违法建筑。似乎无论怎样也无法让他明白，房客的健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跟他不受影响的租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事实。

但是，拥挤住房这一在其他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城市中早已被禁止的住房方式，仍旧不时地在芝加哥引起各种问题；不可避免的寄宿生们挤在一间即使这个移民家庭独立居住仍嫌狭小的黑暗的经济住房内；与自己的父亲或是叔叔有犯罪关系的不良少女的数量多得令人惊讶；学生没有办法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读书学习，最后不得已在每天晚上走上街头闲逛；房屋数量不足以及人口过于密集造成了肺结核病的出现，并为其爆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一位以专家的角度看待肺结核问题、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帮助我们的住在附近的芝加哥医生的帮助下，赫尔大厦的一名居民就与肺结核相关的住房状况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其结果给人们带来的震惊不亚于纽约的“肺遮挡物”问题。

正是这些破败狭小的住房所带来的细微之处的灾祸才最具灾难性。在1902年的夏天爆发了一次伤寒疫情，在这次疫情中，尽管我们赫尔大厦的居住人数只占到了整个城市的三十六分之一，但却有六分之一的死亡病例是发生在我们这而的。两名赫尔大厦的居民对与疫情频发区毗邻的房子所使用的水管系统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发现，在所有感染人群中，有一名孀居的妇女已在区内独自居住在一座小而舒适的房子里。尽管她的四周已被意大利移民所包围，但她仍不愿在她的孩子毕业前出售自己的房产，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而与此同时，她又超然于四周的意

大利邻居，无论何种方式都无法使其为确保一个较好的经济房卫生环境做出任何共同努力。她的两个女儿念的都是东部的大学。一年六月，其中的一个女儿从学校毕业回来，而另一位则还有两年才能拿到学位，她们在暑假期间回到了这座一尘不染的小房子和她们具有自我牺牲奉献精神的母亲身边。两个女儿都得了伤寒，其中的一位还因此而丢了性命，因为母亲即使进了全力也无法将伤寒感染挡在自家房门外。整场悲剧或许较为客观地展示了将家庭与整个社区和社区利益隔离开的个人主义精神在此情此景之下的无能为力。

关于相邻的伤寒病例与不同的下水管道及非管道系统之间的关系的数据收集为大厦另一位居民，爱丽丝·汉密尔顿博士所做的细菌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汉密尔顿博士所研究的课题提出了这次疾病的爆发是由苍蝇传播的可能性。她的研究十分令人信服，以至于相关论文被收进科研数据库以支持这一理论，但是，这次调查不仅仅带来了理论上的成就，还产生了实际的作用。我们发现简易的卫生器具本身就可以大规模的传播传染病，而这些器具本身是不被允许继续使用的，除非监察员失职或是为要好的房东放宽了要求。

这种愤怒最终促成了公共服务委员会对卫生局进行了一次漫长却又牵动人心的审判，直至后来卫生局内二十四名工作人员中的十一名被撤职解雇。我们社区内的监察员是一名友善的老人，但他对这次的事情感到压力极大，并且十分不理解为什么当一名房东被强迫换上现代化设备的时候，他不能使用酌处权。如果他“十分贫穷”，或是“马上就要将房产出售”，或是“知道房子马上就要被拆除，用做工厂厂房”，为什么总是要有人“找他麻烦”呢？这位老人在审判结束后不久就过世了，但直至最后一刻，他仍认为受到了迫害，并且从未理解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对于市议会这次出现的贪污问题所导致的商业后果和所产生的愤慨之情感到震惊。赫尔大厦由于这次调查失去了一些大额捐助，尽管我们的日子因此而变得有些不好过，但是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我们还

出乎意料地借此揭露了水管工工会的贪污问题，但是由于一名工会成员的无畏的见证，这一审判并未获得成功。

当赫尔大厦的部分居民试图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可卡因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误解，此举使得我们与许多药剂师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我还记得一位住在社区边缘的意大利药剂师，后来会同另一位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委员一起找到赫尔大厦，想搞清楚赫尔大厦到底想要他怎么做，因为他彻彻底底地认为我们的这种做法绝不可能是出于无私的目的。由于现有法律的不完善，我们输掉了一场又一场的审判，在多次尝试对可卡因的销售进行更健全的法律规范后，一部新法案终于在1907年在多家机构的合作支持下得以通过。而那位从向男孩子销售可卡因的交易中获益匪浅的意大利药剂师从头至尾所感受到的只有愤怒与伤害。然而，关于开展这一运动的想法是通过不可争辩的事实盘踞在我的脑海中的——一名意大利男孩作为十七岁的毒品受害者而丢失了性命。他曾是我们幼儿园里漂亮快乐的孩童，是我们俱乐部里活泼的少年，但是后来，这些生机勃勃、欢乐愉悦和充满希望都逐渐地被蒙蔽，当我最后在葬礼上见到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将这具憔悴干瘪的身体与我所认识的人儿联系起来。

在与芝加哥医学会联合进行的关于助产士的调查中，我们站到了最令人尊敬的传统职业之一的对立面上。调查显示，需要有进一步的国家调控来帮助那些无知的母亲和无助的婴孩。难道这些就是旧传统与新事物之间永无止境的斗争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这些意料之外、意想不到的反对仅仅是旧式智慧中“毫无防范的辩解”的体现吗？或许更为微妙地，这是由于无私本身所具有的不会自我辩解的超级精密性，或是由于对公众观念的优越感。当然，我们所进行的部分调查并没有产生这种意外的结果，例如赫尔大厦的一名居民与教育委员会义务教育部门和访问护士协会通过进行的“关于旷课的深入调查”。布里顿女士作为大厦的居民曾在很多年里负责我们所组建的儿童俱乐部，她对三百户家庭进行了

详细的研究，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对孩子的习惯性逃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项调查促成了一次关于逃学的有趣的会议，该次会议由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召开，而我正好是该组织的一名成员。最终对逃学法案的执行产生了较为长远的影响，并得到了志愿机构的合作。

我们持续地在赫尔大厦内部进行小型的详尽调查，这些调查可能会迫使我们采取立即行动，如布里顿女士近期所进行的两个调查一样：一个是关于在新的书本从儿童俱乐部图书馆借来之前学生们的阅读状况，另一个调查是关于学校学生中肺结核的发病比例，随后我们在自己的阳台上建立起了一座示范性小型户外学校；赫尔大厦所进行的一些调查是纯粹的目的导向的，我们还曾试图测试工厂女工的疲劳程度，以确定劳动时间过长对肺结核恶化程度的影响，因为，女工中得病的数量令人惊奇地多。唯一一种能够科学地对此进行测量的仪器是测力器，芝加哥大学生理实验室将这台精密且昂贵的仪器友情出借给我们。我还清楚地记得从赫尔大厦出发走向满是女工的工厂时，我所组织的颇具气势的队伍，那家工厂的业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工厂里做测试；打头的是我们放着精密的仪器的手推货车，由一名焦虑的学生来看守，同时还有一名每天下午将要为女工进行测试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随后就是负责此次调查的大厦居民汉密尔顿博士，他身边陪着一名对设备如何正确安装十分感兴趣的科学家；我走在最后，再次与工厂的业主进行交流，确保他允许此次实验的进行。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准备的结果，却是仪器在一天结束时所测量出的疲劳度比早上开始工作时还要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女工们没有努力工作，或是并没有像她们所宣称的“累的像狗一样”，而是由于这台设备并不是发现这种区别的最佳仪器。

在赫尔大厦里有一家我们经营管理了多年的联邦邮局分局，最初我们申请这家分局是由于我们的邻居在向欧洲汇款时，每次都要交给中间人一大笔费用。邮局里的经验始终为促使我们建立邮政储蓄系统提供数据支持，因为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又一个一脸挫败的移民困惑地从窗口离

开，因为他们被告知美国的邮局不接受存款。

然而我们不断地发现，这些调查若想取得最佳效果，就得与其他事务一样，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公共部门或联邦本身相结合。当芝加哥安置委员会为报童的状况发愁时——因为报童属于商人范畴而不是受雇者，因此他们不受伊利诺伊州童工法的条例约束——他们联合了一项针对一千名报童的调查，这些报童在同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在大街上接受了调查采访。他们的学校及家庭背景很容易在随后得到确认，因为大多数孩子都住在附近的十个接受调查的安置点内。这次调查的结果报告中建议制定一项包含波士顿和布法罗等地法规特点的城市法案。尽管起草了这一法案，并且也在经过艰苦的努力后将其提交至了市议员的面前，但是若没有各报纸的支持，他们是不会将这一法案提交至市议会的。我们只能在1908年在召开的国家童工委员会年会上对此提出抗议，并且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这一会议也说明，有时全国性机构的影响力的加入可以更为有效地推进地方性决策。毫无疑问地，最有成果的关于伊利诺伊州法律的实施与地位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时候所进行的。伊利诺伊州孩子的需要被看做是整个国家孩子的需要，而伊利诺伊州的先进的卫生措施也被与其他州的措施相比较。

此后，赫尔大厦所进行的调查就与其他大型组织联合起来，无论是在1896年为五十人委员会所进行的关于酒馆的社会价值调查，还是在1909年为美国科学院所进行的关于婴儿死亡率与国籍间关系的调查。赫尔大厦在处理公众运动的问题上也使用了同样的做法，一些活动是由其他安置点的居民发起的，像芝加哥公民学校与慈善事业就是在曾担任芝加哥普膳堂负责人多年的格雷厄姆·泰勒博士的不懈努力之下而成立的。我们所有关于住房的近期调查都是在这所学校的调查部门的领导下完成的，许多参与到了这一部门工作中的赫尔大厦的居民都被当做是我们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以确保较好的住房条件能够在城市住宅协会的帮助下，并通过一位多年前曾在市里担任卫生监察员的居民的合作下实

现。

或许泰勒博士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安置点经验在公众事务中价值的极佳的例证，他所参与的多种公众活动成为了近期伊利诺伊州州长在委派项目时，被用作工伤保险，或称之为雇主责任法案的最佳实践方式，同时，他的影响力还确保了对职业病的调查的开展。对于职业病研究的工厂实地调查是由赫尔大厦的汉密尔顿博士负责完成的，她长期居住在工业社区的经历，以及她在科研领域内的造诣，都是她成为担任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的原因。

由此，安置点的价值也由具体形式逐步向抽象作用上转变，接下来的例证就可极为容易地展示这一点。许多年前，赫尔大厦的裁缝工会向我们请求合作，在男式大衣的不同部位标上标签，这样可以显示出付给做衣服的人的钱数；要为剪裁打上标签、再为扣眼打上标签、还要为收边打上标签，以及种种此类，而其结果总数要与衣服本身的销售价格相比较。很快我们就发现，没有办法确定这两者之间相差的那部分钱有多少用在了销售人员身上、又有多少用在了旅行推销员、房租和管理费用上，这件被标满了标签的可怜的衣服最终了无生机地挂在了衣橱里，好像对这次的尝试充满了失望之情。但是，手工工人想知道他的劳动与整个商品之间的关系的欲望不仅仅是极为合理的，还应成为所采取的任何改善其地位的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的基础。最开始是为了在缝纫行业中进行改革，所以赫尔大厦的居民们在1900年向联邦工业委员会提交证词，而随后，在一次工业展览中，各行业协会和其他具有公众精神的市民也极富热情地加入其中，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了劳工们的工作生存环境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举办这次展览的赌场大楼在展览举行的两周时间内每天都人满为患，显示出了如果能以图表的形式进行阐述，很多信息是很受欢迎的。随着对同一件事的展示效果由小及大，我还想列举芝加哥安置点大学的麦克道尔小姐和其他人尽全力敦促国会意识到对产业内妇女儿童的工作环境进行一次特殊调查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在自己所进行

的小规模调查中遇到了许多不可逾越的困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近邻大厦的范·德法特夫人和芝加哥大学的布雷肯里奇小姐所进行的相关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出，几乎没有办法将在畜舍内工作的女孩与她们在工厂内工作的姐妹们区分开，因为调查的目的是代表他们敦促特别立法的通过。

在美国睦邻运动的早期，很多居民对于接受慈善管理的方式十分不耐烦，并希望通过在产业社区内居住来寻找更具合作性并更为先进的方式来解决与产业失调关系极为密切的贫困问题。但是在整整二十年里，睦邻运动见证了那些慷慨的人们，凭借他们对于贫困的点滴知识，坚定不移地一点一点接受此前被看做是十分激进的方式。目前那游离于有组织的慈善之外的居民们在全国会议上找到了证明，在所有致力于减轻贫困的锲而不舍且足智多谋的努力中，总能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找到对应消除贫困的最有效的建议。在国会委员就儿童局的建立举行的听证会中，美国睦邻运动中的居民与慈善家一起，表达了这一不可或缺的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他们在收集和传播信息方面可促使以儿童的利益为核心的协调一致的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得以实现。

豪厄尔斯先生曾表示，我们都过于沉迷于小说的阅读，以至于丧失了以现实的目光看清生命的能力，因为我们总是不停地寻找着可能的浪漫。这种说法在美国睦邻运动的早期可能是极为中肯的，但是在后期时，我们总是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浪漫桥段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如果我可以阐述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段浪漫邂逅的话，我会向大家讲述在现代城市社区内所发现的国际主义迹象，史无前例地坚定、刚健：当一位南意大利天主教徒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被迫要与一名来自另一国籍、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奥地利犹太人交朋友时，国籍和信仰都是他们最具偏见的思想所在，他发现很难与这些奥地利犹太人保持联络，这段关系也最终逐步淡化直至不复存在。随后，他更改了自己的省籍，因为如果一个与他一同工作的宿敌能够变成朋友的话，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发生

的了。因此，后来当我成为国际和国内的和平运动成员时，我希望这种国际主义能够在所有美国移民城市内遍地开花，并可以被看做是促进和平的有效手段之一。我一开始在1904年于波士顿召开的大会上提出这一想法的时候还有着一点儿犹豫，但是威廉姆·詹姆斯教授对于这个提议的爽快接受让我每每想起都会感到十分愉悦。

我总是反对将“社会学实验室”这样的字眼放在我们身上，因为睦邻运动应该是一件比一个短语更具人性、更具自发性的事情，并且理所当然地，社区内的居民应该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同时他们的经历应该对他们的信念产生影响。

许多年前，芝加哥女性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中，一位最具才干的成员之一所讲述的故事吸引了我，并随后在我的一篇名为《汤恩比服务所自然发展的结果》的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这名女性所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她还是一名小女孩儿，在妈妈的花园中玩耍的时候，有一天，她发现了一只小蟾蜍，在她看来，这只小蟾蜍十分孤独寂寞，尽管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安慰它；后来，她不情愿地将它留下听天由命。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在花园的另一侧，她又发现了一只大蟾蜍，同样没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凭借着一颗温柔怜悯的心，他用一根棍子，耐心地、有技巧地将小蟾蜍赶过了整个院子，放到了大蟾蜍的身边；而就在这时，她见到了让她难以置信、极为恐怖的一幕，大蟾蜍张开大嘴将小蟾蜍吞了进去。这个故事的道德意义显然是针对那些没有住在“他们本该居住的地方”的人们，尽管我反驳道，这正是我们想要取得的结果——被吞噬被同化，最终融入人民的内部。

二十年后，我仍愿意以身证明，许多事情确实，在得到了业界认同多年之后，如预想般发生了。

注释：

[1]五朔节（May Day）：欧洲传统节日，通常在五月一日举行。

第十四章 公民合作

我们在赫尔大厦最先学到的东西就是私人慈善在处理数量巨大的城市内被剥夺遗产继承权的人的时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还很快地意识到有很多类型的悲剧会使得私人慈善家退缩，并且只会在那些向这些可悲的生命提供病房的乡村医院里，或是在为天花病人设置的被隔离起来的的城市医院内才可能得到照顾。

我曾听到一个伤心的母亲在见到自己犯了错的女儿最终回到了家，但却伤痕累累且身染疾病，以至于使她的家庭蒙羞时，大声的说道，“这个家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她只能去县医院的顶楼去住；他们必须照顾她”，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所有的权宜之计都被否决了之后。政府的这一职责很不幸地在世博会后爆发的天花疫情期间落在了我的身上，当时另一名大厦居民，凯利夫人，作为国家工厂监察员正全身心地专注在发现存在未经报告的天花病例的房屋，并烧毁从中流出来的衣服。最善于发现这些病例的负责人在疫情期间就住在了赫尔大厦，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暴露在感染源之中。另一名大厦居民，莱斯罗普小姐，作为国家慈善机构董事会成员，在城市西边草原边界上仓促建起的拥挤的隔离病房中走来走去。由于赫尔大厦已然暴露在了感染源之中，让那些来自卫生局的天花特派监察员在这里吃饭并在回到各自家中之前换身衣服是一件极为恰当的事情。所有的这些官员都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样的做法；就像其公共职责中就具有这样的约束，有责任承担危险且困难的事业，而私人慈善家在这些事务中往往无法大展拳脚；就如国家所代表的对于大众的同情要比那些独立的团体所表现出来的要复杂得多。

在我们在霍尔斯特德街上落脚的第二个冬天里，赫尔大厦的一名居

民收到了库克县代理邀请她担任县巡查员的通知。她每天早上都要向代理提交报告，所有距赫尔大厦十个街区以内的案例都供她参考以作研究之用。这就给了她一个合法的机会，去了解周围社区内最贫困的人群，并了解县里所采用的户外救援方式。委员们最开始对于这样一个巡查员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并断言女人只能做一个分发补给的“放煤管”，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变得对于她的建议和意见极为依赖。

在1983年，就是这位居民，茱莉亚·莱斯罗普小姐，接到州长委派，成为伊利诺伊州慈善委员会成员。她在这一职位上连任两届，并随后又接到第三届的再次委任通知。或许她在扩大并重组州内的慈善机构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通过她对于受益人的详细了解而得到的，她的经历显示出，只有在与贫苦大众长期生活在一起之后，才能够像她一样从居民的角度而不是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待公共机构。从那天之后，赫尔大厦的居民们开始花时间为县里和州立机构制定公务员的聘用方式；向州里为照顾癫痫病患者所设立的聚居点的建立提供服务；以及为其他许多介于慈善事业与立法之间的事业提供帮助。在这个两种事务类型的交界处，我们曾参与到了许多公民事业中去，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赫尔大厦并没有掌握这些事务的大权，而是时刻做好准备将其移交给更合适的人来继续完成。

斯塔尔小姐曾收集了一系列装裱起来的照片，大多数都是她开设的艺术班中的作品，并已成为赫尔大厦的学生借展的基础，并随后将其影响力扩大至了当地公立学校。应该说，此举是公立学校艺术学会在后来得以成立的核心影响，斯塔尔小姐担任了该学会的首任主席。

在最开始的两个夏天里，我们在自己房子的地下室里建造了三个浴缸，供邻居使用，这些浴缸也成为了芝加哥第一个建立在社区街道内并得到市卫生局许可的公共澡堂的雏形，并由此得到了一些建立公共澡堂的经验也同时饱受争议。建立这个澡堂的地点属于赫尔大厦的一个朋

友，他免费将这块地提供给市里进行使用，使得市里能够仅用一万美元就建立起首个公共澡堂。各公共机构纷纷表示出了极大地恐慌，认为没人会使用这一澡堂，并且现代廉租房中的浴缸经常被用作煤仓这个老生常谈的故事经常被讲给我们听。但是，我们也有无可辩驳的论据，在1892年，在四周方圆三英里的范围之内，只有这三个浴缸，而这种状况经常是经济住房居民抱怨的事情。公共浴室在短时间内人满为患的事实证实了我们的论点，就像之前我们关于移民们会对阅读的机遇反响强烈的论点，在公共图书馆委员会在赫尔大厦内设立了一间分支阅览室后得到了证实一样。

我们还很快地发现，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够像共同且持久地进行同一项工作那样在我们的邻里之间产生同志般的友爱之情，如共同铺路、齐心协力关闭一座赌场，或是让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复职等。

许多这些对于公民合作的早期尝试都是在赫尔大厦男性俱乐部的合作之下进行的，这个俱乐部是在1893年春天根据州立法令的规定而成立的，在体育馆里占据着一间俱乐部房间。这个俱乐部在早期时在区内的一次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并由此为自己取得了一个体面并具有政治力量的名声。后来，这个俱乐部在两个政治党派的摩擦中四分五裂，虽然到后来这个组织仍旧存在着，但却再也没有恢复其最初五年里所曾拥有过的威望。俱乐部早期的政治成就来源于赫尔大厦曾参与反对一位有权势的市议员的活动，这位议员曾在第十九区的议会办公室中任职超过二十年，尽管关于他腐败的事实臭名远扬，他仍紧紧地横亘在他的选民之中。

赫尔大厦不得不组织了三场反对他的活动。在第一场活动中，他仅仅是被我们“主日学”般的做法所逗乐，几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对赫尔大厦男性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入选市议员办公室，并成为他在市议会中的同事。然而，当赫尔大厦在第二年春天反对议员本身的再次竞选时，我

们在遇到了最为坚决且富有技巧的反抗。在这些活动中，我们毫无疑问地过于依赖我们理想化的诉求，因为我们并未能全面理解现实的因素，因为当政治在这里与就业和生存等问题直接挂钩的时候，这种政治争斗就通常会对所涉及的社区具有较大的影响。

我们很快发现，在十九区内，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他们的工作取决于市议员的好心。但是并没有公务员法则去遵守，没有手艺的选民可以去清扫街道、通下水道，但他们的工作与那些管理大桥或在市政厅办公室里工作的职责更为精细的选民一样有保障。市议员甚至幸运地在那些寻求特许经营公司中找到了选票；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邻居中有很多人都是有轨电车员工，为什么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大规模俱乐部其成员全都是接线员。我们那全能的市议员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固守自己的地盘。许多人都十分感激他在警察局和法院中所做的善举，因为在那一段日子里，爱尔兰选民经常挑事打破社区内的和平，而在少年法庭成立之前，男孩子经常因为琐事而被捕；除此以外，还有数百名选民对于他个人的仁慈心存感激，从拿到了免费执照的小商贩，到获得了去到纽约的火车通票的商人。在成功地对其大多数支持者留下了一个严肃的印象后，我们针对他组织了第三场运动，激起了他手下心腹的敌意，与先锋不可避免地感到有人要将其取而代之的敌意相类似，而对于这场改革运动受到了外界帮助的这种感觉更是加重了这种敌意。

这次活动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希望我们新的政治伙伴了解，赫尔大厦可以成为他们的办公室，而这种结果则引起了无休止的疑惑和不理解，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能试图去做那些市议员经常在做的出发点极好的事情。当他保护一个犯法者不受自己颁布的法令惩罚时，他的仁慈就显现出来了，不仅仅对他自己是这样的，所有的旁观者来说也是如此，就像一位有能力且亲切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样。而另一方面，赫尔大厦则坚持法律必须被遵守，看起来就像是对罪犯进行迫害。当然，我们从不担心我们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或是个人成就，但是为了培养较高的

政治道德水准，并同时不降低自己的标准，我们持续不断地与现有政治行为规则发生冲突。我们还偶然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我们的市议员是政治核心，同时还涉及银行业、教会牧师和记者代表，当我们循着线索追下去，并无知地将所发现的全都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为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反对的声音奠定了基石；其中作为引人注目的一次是芝加哥日报对赫尔大厦长达数月的攻击。这份报纸在此次事件之后已经停止发行。

在第三次活动中我收到了许多匿名信件，有些是来自猥琐的男人的，有些是来自总是与卖淫和最低级的政治挂钩的女人的，这些都是每个城市所徒劳地企图掩饰的东西。我还接到了市监狱中服刑犯人开的价，如果他们被释放，就可以“恰当地”投票；寄宿房老板也跟我有过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关于什么样的价钱才能让他们投票的话题；到处都弥漫着只有当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才会被激发出来的敌意。

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就会想起吉普林笔下在海上目睹了火山喷发的新闻记者，在那次奇遇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深海生物被喷到了海水表面，其中有巨大的白鳞，失聪且散发着麝香的味道，它临死前的挣扎搅得整片海水不得安宁。凭借着记者的本能，他们仔细地观察着这个神秘且不为人所知的生物；但是几天之后，当他们坐在从南安普顿驶向伦敦的舒适的二等车厢中，当他们在修葺过的篱墙和整洁的英伦村庄间穿行时，他们一致认为，这次的经历太过耸人听闻，不适合向英国公众公开，最后他们自己都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

在随后的若干年里，第十九区友善的邻里生活对我产生了如二等火车车厢般平复的效果，许多这些政治经历不仅仅变得遥不可及，甚至有些不真实。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并不是没有任何成就的；成就之一就是与区内更多的市民和一群优秀的年轻人迅速建立起了友谊，这群年轻人对赫尔大厦的忠诚至始至终都未曾变过；另一个成就就是在具有公众精

神的人群中所获得的认同感，这些人遍布全市，为反抗政治腐败而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并作出了他们认为是伟大的努力。我还记得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年轻教授，他和他的妻子住在赫尔大厦，在整个秋季和冬季中每天通勤很长的距离上班，就为了在来年春天能够作为第十九区的选民投票。他在投票点担任观察员，他的忠诚并没有换得很多回报，他切实地收到了攻击和殴打，在过去，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其他关于对我们的标准表示无条件忠诚的例证还有很多，但或许比这些都更具价值的是我们从其他芝加哥人那儿所获得的认同感。

直至今日，作为一名安置点居民所能理解并让地方政府关注到的就是，社区所需要的就是人民共同的需要，同时，所能做到的就是给予市政措施大力帮助，以满足所提出的需求，这才是所起到的最具价值的作用。为了说明我们为改善邻里的街道路面状况所做的第一次努力，我们发现，当我们确保一条街上大多数的业主都对新路面表示满意的时候，市议员总会按照某一个向他请求将评估下调的人的意愿，“好心地”重新检查整个规划。那条街在随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充斥着令人吃惊的潮湿、破旧的雪松木块，孩童会在冬天里滑动剩余的木块时由于飞速运动的木块掉进地上的洞里而陷入这些木块堆中，而其他的木块已经被抽走充作燃料了。然而，当我们能够显示出，街道的铺面由于附近工厂的重载货车而变成雪松木纸浆，而重新铺路的费用应该由专门经费拨出而不是由贫困的业主来支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全都联合起来要求对路面重新铺整的评估标准进行改革，同时，市议员本身有责任参与到这一受欢迎的运动中来。在连续两年的冬天里都在赫尔大厦开会的第十九区改良协会是首家由市民组成的能够对地方铺路状况造成影响的组织。他们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观察铺路状况，以确保他们用于铺路的钱花在了刀刃上。秉承着这种信念，房产的价值可以被提得更高，共同的目标将更多周围富裕的人团结起来，就像赫尔大厦的煤炭合作工业协会将贫困人民团结起来一样。

我还记得，在针对我们市议员所举行的第二次运动中，密歇根州州长平格里先生来到赫尔大厦参观。他表示，这种人的据点并不适合开始城市的重建；好的市议员应该首先从富有希望的区里选出，直到市议会里的大多数都是忠厚的人，让政治对于那些腐败的人不再有利可图。我们回答道，很难将芝加哥分为好区和坏区，但是一个新兴的组织，城市选民联盟，正试图向城市内的每个区内善意的选民传达关于各位候选人的准确信息，包括他们在重要事件上的关系、他们的过去和现状。我们的一个受托人在发起这个联盟的过程中十分积极，他总说，他在十九区的经历让他了解到了城市政治的和谐，并且，他始终将我们的活动当作是对那些住在腐败现象还不明显的区内、还未行动起来的市民的挑战。

当然，对于公民合作的需要体现在多个方面，而其中最斐然可观的就是在组织行动上，如果想要保护年轻人不受城市黑暗粗俗的危险的威胁，就要一刻不停地将这种组织行动进行下去。赫尔大厦和未成年人保护协会之间的合作最终变成了现实，而在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大势所趋。在我们发展初期的日子里，我们总能看到有很多的男孩子被捕，而我在警察局内具有启发性的经验则都与一名爱尔兰小伙子有关，这个小伙子的母亲在临终前托付我要“好好照顾他”。我们对于由小男孩儿组成的帮派十分苦恼，这些孩子通常由一个具有野心的领导聚集起来寻找旧铜废铁，有时还会闯入空门去偷水龙头或铅制水管，他们能在收废品的人那儿将这些东西卖个好价钱。他们拿着这样赚来的钱回去买香烟和啤酒，甚至只是糖果，他们通常会在小巷中偷偷地抽烟喝酒，但是也可能十分享受被人看到的激动，或是被“警察”怀疑的时候，在赫尔大厦的第三年里，一位居民在附近的警察局担任非政治性职位，至少，这位警官同意对那些由于琐事而被捕的每个少男少女们，都使用他自己的临时责任。

斯蒂文夫人从事相关工作已经好几年了，并且在1899年青少年法庭在库克郡成立的时候担任保释官员的职位。最开始，她是唯一一个假释

官员，但是在她在赫尔大厦去世时，她已经是六人小队的高级官员了。她所有的经历都使她十分适合与那些刚愎自用的孩童打交道。她在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了新英格兰的一家纺织厂做工，在那里，她由于“粗心大意”丢掉了自己右手的食指；似乎当时没人理解无忧无虑是童年的特权。后来，她成了一名排字工人，并且是率先加入印刷联盟的美国妇女之一，并在随后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始终保留着她的“工卡”。随着青少年法庭的发展，由具有公众意识的市民所组成的委员会，先是只能支付斯蒂文夫人的工资，到后来能够维持一个二十二人的队伍；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赫尔大厦的居民，并在很多年的时间里带了一队跟各种疾病作斗争的伤感的小孩子。当立法成熟，并确定了保释官员在县里办公室的地位后，我们发现，如何有效地从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中选出一位来承担这一微妙的工作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作为被公共服务委员会要求对保释官员进行首轮测试的五个人之一，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只是处在通过非政治方式选取公务员的初期，但是尽管考试死板不懂变通，但仍是我们实现政治复苏的希望。

在1907年，青少年法庭还驻扎在自己的新式法院大楼内，包含了一间少教所，并配备了一名称职能干的员工。市民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对这种结果负责，因此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法庭所记录的数量极大的青少年过失与犯罪状况。他们组织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协会的二十二名官员每周在赫尔大厦定期与各自的执行委员碰面，相互报告他们的发现，并探讨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影响的城市环境。

协会发现，有几种错误是儿童经常会犯的，并且一般的儿童无法抵御这种诱惑。协会收集到了数量庞大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显现出了对现有法规进行强化执行并确立新法规的必要性，但是这些数据同时体现出了各种其他的信息，如那些快乐地走在大街上的年轻人，通常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走向毁灭，这些年轻人就需要被守卫和保护。

协会在体贴且富于理解地对待城市中的年轻人方面所做的努力，会意料之外地将一些社会影响力纳入麾下。由于生存的基本需求是通过那些在工作中所赚到的钱来满足的，因此现代社会便假定，对于愉悦的渴望则应该被压缩至最小，以至于只有卑鄙可耻的行为才会产生快乐。然而，这种假定在未成年人保护协会所积极进行的测试面前不堪一击。在进行了多次起诉，并伴以数次走访之后，药剂师协会最后起诉了自己组织中那些销售带有不雅画面的明信片的成员；酒吧业主保护协会不仅拒绝包庇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饮品的成员，还主动地采取行动来杜绝这一销售行为；零售杂货协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商场经理协会不仅通过增加女服务员的数量来提高等候室的警觉性，同时，作为一家机构，他们也为协会做出了长期贡献；所有火车站内的特别观察员都同意不会逮捕擅自闯入的少年，而是向协会举报他们的行为；制作动画电影的工厂不仅主动将他们的影片交由一位志愿监察委员，同时还就新事物问题向其进行请教；如果演讲人风趣幽默又具有教育意义，五分钱戏院还会安排各种特技噱头来处理公共卫生和道德问题。

激发大家对于年轻人的保护欲并不算困难，毫无疑问，这些年轻人会去模仿许多酒吧招待或是台球室守卫的日常举止，如果他们没有给竞争对手任何优势地尽情享受。当这种困难通过对于法律公正的贯彻执行而得到了解决时，常常通过单纯而激发的简单的友善则如善意之火一般慢慢蔓延开来，从一个人影响至另一个人。毫无疑问地，在与未成年人保护协会相类似的其他事物中，最具价值的经验就是与那些意料之外的机构和组织进行友好而睿智的合作——无论是官方组织，还是商业机构，抑或是慈善组织。针对协会所提出的那些建议，城市中的不同地方开设了好几处社会服务中心、废弃的大楼被改造成为娱乐室、空置的场地变成了花园、远足爱好者组织了乡村远足、湖的前面建造起海滨浴场、公立学校向公众开放等。在多名具有公众精神的市民的努力之下，芝加哥青少年法庭除了详细研究已完结的案例之外，还与门诊医师和一家精神病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对于这些关注非正常孩童的仔细收集

到的数据来说未成年人保护协会希望能够及时地将生活在另一种环境下的有关正常儿童的信息传播出去。

对于将对这些青少年过失问题的解决方法应用到公立学校中并不是完全不可行的，这些问题通常与逃学和对教育的不适应息息相关，我的这种想法最终使我在1905年7月成为了芝加哥教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当时我所遇到的情况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六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使得整个经历极具戏剧化，但是总体的经验对于民主政府所遇到的困难和限制是极富启发性的，对于民主政府来说，在公民合作的大背景下而没有进行任何框架性的尝试是极为不公的。

然而，即使是最简洁的陈述，也需要对接下来的几年时光进行一个回顾。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被编入教师联合会的芝加哥学校老师，或者说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参与到了与教育局所进行的关于获得更充足的工资和在学校日常行为中具有更大的自主权这两个问题的争斗当中。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攻击了所有偷税者为自己辩护，从路人甲到最高法院全不放过。他们以一项错综复杂的调查作为契入点，并在调查中发现1899年，身价达2.35亿美元的各公共事业单位没有支付分文税款。教师联合会对此在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进行了立案起诉，最终的结果是州物税局败诉，并要求其对案件中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征税。尽管存在着这些辩护公司获得了联邦政府救济，并同时得到了从1900年起每年减免部分税收的法令这一事实，芝加哥教育局仍旧由此获得了超过25万美元的资金。尽管这一成就的获得与教师们独立且不懈的努力分不开，但让他们感到惊讶和屈辱的却是，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因此而出现任何上涨。因此，教师联合会将教育局告上法庭，理由是教育局三年前就承诺为他们涨工资，但却一直没有兑现。低级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联合会胜诉，但是教育局又针对此案件进行了上诉，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1905年，邓恩市长所委任的七名新成员正式到岗。保守的民众怀疑这些新成员只是教师联合会的傀儡而已。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

邓恩先生在担任法官的时候曾在一个案件中做出了对教师有利的判决，并且教师群体在他的市长竞选活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很明显，教师为了在教育局内能有自己的代表而进入了政治圈。当然，这些猜测只有在新的委员会投票宣布撤回教师团体落在上诉法庭的案件，并执行低级法院的判决时才得以证明。而另一方面，教师群体长期不懈地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权利，州物税局和立法机关都反对“将学校卷入政治斗争”当中，并宣布对于政客们的冷漠和贪婪的曝光对他们来说是受之无愧的训斥，正是这些政客将学校逼到了破产的边缘；他们还进一步坚持，税款的征收、办公室的租用，以及芝加哥公务员的退休金也都陷入了这一掣肘境地，这一点在他们来看至少已经成为了城市事务在民主和财团管理之间挣扎的最佳例证。学校董事会中新上任的委员们并不代表任何形式的统一政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新式教育的拥护者。这些教师自信他们的动机与帕克上校这样的教育家所倡导的理念完全相同，因此十分确信“新式教育”成员的计划必然与教师联合会的提案相吻合。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种状况就是邓恩市长整个任期的缩影，他对市政的管理完全是建立在“如果这些代表了社会理想和改革理念的市民能够被委以重任，公众福利就能够得以创建”这一理念之上的。

在我任职期间，曾多次与教师联合会的官员进行谈话，尽管我十分愿意与他们进行合作，以实现建立更好的退休金系统和其他事情的提案，但是我很少能够按照他们的意见行事，仅有一次，我曾试图去影响联合会的政策。当被扣发的工资最终交到提出诉讼的联合会代表手中，并分发给那些在这一长期法律斗争中遭受金钱和事业损失的成员时，我十分焦虑地认为，这些钱的分配应该涵盖所有曾遭遇工资被扣发的教师，尽管他们并不是联合会的成员。对于我来说，这是反驳关于联合会追逐私立的说法的最佳机遇，并可让公众记住大家为此所做出的长期努力，而作为具有奉献精神的公共服务的一种，存在于公众的记忆中才是最佳归属。但是毫无疑问，我对于这种利他主义的鼓吹十分容易，但让那些真正承担了其中的煎熬和负担的人去这样做，却很困难。

教师联合会所提出的第二个目标也同样伴随着许多压力与风波。在财政紧缩期间，这种政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教育委员会在进行首次教师工资大规模上涨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促进考核”的方法，这种考核大多数是关于学术问题的，并需要进行长期且严苛的准备。对此感到愤怒的教师提出了两点问题：首先，这种做法只是提高了教师作为一名学生的能力，而并未提高其职业技能，因此是十分不专业的；其次，此举为教师们已然忙碌不堪的生活增加了许多无法忍受其毫无必要的负担。而在另一方面，教育委员会也不无道理地主张，在庞大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教师正失去其包容性及开发的心态，许多教师已经明显地对其工作变得机械化并态度冷漠。保守的公众赞同这种促进考核，并将其作为提高教育水平的一种标志，同时，由于他们对教师联合会与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之间在邓恩市长当选前多年就已形成的附属关系而感受到的憎恶之情始终挥之不去，他们对于校长的同情也由此增加。

这个经常被谈及的教师与工会成员之间的附属关系，至少在表面上来看，只是与偷税企业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个策略而已。教师联合会赢得了他们与公众冷漠之间的第一个小斗争，而这种冷漠是由于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而其核心组成正是那些成功的商业人士。当他们发现自己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支持，以确保那些违规企业处于控制之中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转而向政治影响力寻求帮助，并将选票投给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这种附属关系并没有任何通常由此而联想到的邪恶的意义。教师联合会从没有从美国劳工联合会获得任何特许，并且其兴趣始终都集中在立法委员会身上。

但是，这种关于大多数小学教师与芝加哥学校委员会之间的差距的声明完全不足以达成任何目的，因为所遭遇的困难都十分顽固，并且还远未达到能够通过美国公立学校管理的长期努力来将自身从政治规则和对政治的利用中解脱的程度。在每座城市中，政客都花费了很多年的时

间安排自己的朋友去做教师和守卫； he 可以从每一份关于新建筑、煤炭供应或是新教科书采购的合同中获得回扣。在针对这种政治腐败的长期斗争中，一种始终被提倡的补救办法就是将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事务的决策权从委员会身上转移至校长身上。治愈“影响力”和腐败所带来的影响的办法之一就是“专家”的权威性。芝加哥教育委员会的规则和记录中，满是这一由诚实的人们所发起的长期而又忠诚的斗争，而很不幸地，这些人十分满意地止步于“高效的业务管理”这一理念。这些商人为有能力的校长提供高薪，并且通过州立法令确保其任期，这样就确保校长可以不必承受犹豫不决的政客的怒气了。他们还为教师入门标准和升职制定了客观的考核机制，他们还认为稳妥地管理学校是“校长的职责”。然而，所有的这些十分危险地将仅为管理层提供高薪的商业主义理念和低投入高回报的最终测试结合了起来。

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试图将公共学校从政治干涉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或者至少在芝加哥，在学校系统周围树立起来“以防骗子入侵”的防御高墙，很不幸地，对系统内部的教师拘束太紧，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自由空间，也因而变得更加渴望外面的阳光与空气。任何出于为这些教师着想而降低这些高墙的尝试都被看做是提供一种政客所不允许的机遇，而政客也经常通过展示事实来谴责这种相互结盟的行为。当邓恩市长在委员会中的成员试图为教师争取更多的自由时，我们通常会听到各种关于之前曾遇到过的难搞的政客的事迹作为警告，并且尽管长时间的斗争使得关注的重点变成了对所获成就的迟钝，但似乎让委员会将精力从这当中抽出用于其它新事务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所支持的校长与教师联合会之间的斗争的情形已经成为了效率与民主之间斗争的缩影；一方面，在大规模系统中极为必要但却承受压力的官僚主义的善意表现已经成为了不必要的自我张扬，而在另一方面，较为激进的自治需求被以自由的名义提了出来。争斗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夸大了境况的困难程度，同时，双方都相信自己是具有

强大的理论支持的。

当然，我本人在这场不必要的冲突中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在我担任学校管理委员会主席期间，大多数成员在我看来有时是令人恼怒地保守，而有时却令人沮丧地激进，而我当然是对这两种态度都不满意。毫无意外地，为减轻其负担而制定的、具有毋庸置疑的益处的教师强制学习计划，以及意图将工作重心由奖学金转移至职业工作上的各种计划，遭到了教师联合会最为强烈的抵制；并且当一份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计划最终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时，校长在具体执行该计划时却又极其不情愿。

最终，我终于相信，游击队员用永远也不会容忍对踏脚石的使用。当他们心爱的方案正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耐心去照看，并且他们宁愿放任自己的计划随波逐流，也不愿将其捞起放至岸上，即使是以极为三心二意的态度。在我加入学校管理委员会之前，我以为生活已经至少让我学到了一些来自不易的教训——现有的安排与所希望的改善需相互进行调节和协调；新事物若想持久，需至少看起来与旧事物相契合；但是在委员会里的经历使我了解到，所有这些努力都被斗争双方看成是妥协、不值得。大部分“邓恩”成员遭到非法解雇后，在法院判决的支持下复职，在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混乱及公众热情之中，我发觉自己并不属于任何阵营。在这次动乱爆发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失去了大多数热忱的同事，领先的商业俱乐部的代表接手了这一领域的管理，他们是真心地认为自己将学校从混乱的状况下解决了出来，而我却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承载了我们心血的提案被撤销。尽管新任主席在每次撤销提案的时候都严谨地给予我辩护的机会，但在这种正笼罩在所有“反叛者”所提出的提案上的骇人的环境中，这些提案的可取之处根本不可能得到认可。因此，在纽约这样的地方修建小型教室以避免过度拥挤、已然得到成功应用的对逃学教室的扩展、增加学校操场数量，以及许多其他我们所怀抱希望的计划提案被驳回或无限期地推迟执行。

邓恩市长所任命的成员最后对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抹黑，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研究案例；报纸曾持续不断地报道并强化商业化委员会的理念，并且一如既往地嘲弄为城市街道铁轨的所有权所制定的各种计划，而从一开始，所有新委员会在讨论教育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都沦为了他们嘲笑与讥讽的对象。一些议题十分冗长无序，遭到嘲弄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还有一些议题条理清晰安排妥当，并且其所涉及的教育问题是由德高望重的人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提出来的，而这些议题所遭受的嘲讽并不比其他的轻。我还记得一位大学教授的震惊和屈辱，这位教授同意在一次委员会会议中发言，而到了第二天，他毫无党派偏见、精心准备的论文被扭曲成了满篇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并且其内容与一篇不是由他本人，而是一位同时发表的关于试婚问题的虚假新闻报道紧密相连，以至于市里的一位知名牧师认为有义务进行一次布道宣讲，号召所有正直的人们联合抵制不道德的学校委员会向孩子们所灌输的思想。因为这位不知所措的教授是应我的邀请去演讲的，所以我努力寻找这一敌意的来源，但是，没有什么要比我从报纸主编和撰写报道的记者处得到的答案更险恶了，理由竟是因为公众期待从这些委员会身上获得“谈资”、因为所有曾与激进人员有过合作的，即使是短暂的合作，都要做好被这些报纸嘲弄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之前管理委员会所奉行的牵引政策是愚蠢且危险的。

由于各大报纸对于我还算尊敬，所以我得以再次记录我对于公开讨论所遇到的复杂困难的失望之情，民主政府应该是建立在各种不同政见可以被自由地讨论、每个政党都应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之上的。报纸的这种极端态度，毫无疑问地是与此前邓恩市长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曾针对建在学校操场上的一栋报社建筑租约的真实性所提请的诉讼有关。报社在当时赢得了这个案件，可能是出于怨恨，他们决定尽自己所能掣制学校管理委员会的事务。然而，我倾向于认为报社的做法真实地反映出了许多人民大众的想法，他们对这一观点的持续且盲目的坚持明确地反映出当一座城市的发展规模已经大到无法对公共事务进行口

头上的讨论时，所遇到的诸多政府管理难题之一。

在结束这一章的讲述前，不可不提及大家为芝加哥妇女获得城市权而做出的努力。在新城市宪章所带来的两段欢乐时光里，一个代表了广大妇女利益的机构向公众、向宪章大会、向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提出有关这个合理规定的请求。我当时作为一百多家女性机构的联合会主席，在整个社会活动期间，没有任何事情像这件事情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如此的具有说服力，以至于自于各种不同背景的女性代表机构都对这一提议做出响应。有一家由几百名路德会妇女^[4]所组成的教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因为斯堪的纳维亚妇女早在十七世纪时就获得了城市权，并认为美国的城市出奇的保守；工作的女性群体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她们是最能敏锐地感受到对城市权的需要的，因为她们需要为自己工作的地方保障最基本的卫生条件和关心，而这些对于那些工作的男性来说，通过投票就可以轻易获得；母亲联合会也同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她们对于干净的牛奶和延长幼儿园的开园时间最为感兴趣；拥有房产的妇女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她们在抗议不公税项方面是毫无影响力的；代表了职业妇女、高校学生和大学校友的各种组织机构也加入到了我们的团体中；甚至是对城市改革感兴趣的妇女俱乐部也加入了进来。尽管缺少传统的为妇女权利进行的大声疾呼，但是那些繁忙且有事业的女性所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表明，她们已经靠自己摸索到了需要城市权的帮助才能继续发展下去的程度。即使是那些被限制在最为基础最为传统的生活中的妇女，也是需要投票权的，这一事实在一群俄罗斯妇女和一群意大利妇女分别找到我的时候得到了证实，俄罗斯妇女向我询问，在新宪章实施之后她们能不能投票支持设立有顶棚的市场大厅，从而摆脱落在食物上的令人震惊的芝加哥污垢；而住在附近的意大利妇女则向我表示，如果她们有投票权的话，她们一定会为公共洗衣房投上一票的。这一切都是如此的人性化、如此具有自发性、如此的直接，看起来在公众所关心的始终被迫寻求其他解决方式的妇女问题已经等到了恰当的时机来表达其政治诉求。这些妇女从来没有想过

要取代男人的位置，也没想过要在男性主导的事务中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她们确实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务中，使用投票权更为直接地参与到公民生活中来。

几年前在芝加哥市立图书馆大楼内建立起来的市博物馆，是在一群在位于圣路易斯的世博会下属的社会经济、教育、卫生等部门担任审查员的妇女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明确地显示出将这些部门从现代城市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现代城市正不断地被迫扩大其活动疆界。

注释：

[1]路德教（Lutheran）：属于更正教之一，在欧洲语言中原为“路德宗”。因信义宗肯定“因信称义”，即认为人凭信心蒙恩而得称义和得救。

第十五章 社会俱乐部的价值

赫尔大厦成立早期，社会俱乐部是由说英语的年轻美国人组成的，俱乐部的发展非常迅速。成员们热切地需要社交生活，即便俱乐部管理上仍有缺陷他们也不会轻易离开。我记得有一位非常热情的领导者，她为俱乐部成员充满激情地朗诵希腊神话《安提戈涅》，因为她相信希腊诗人的伟大史诗最适合年轻人。一天晚上她来到俱乐部活动室时正赶上主席在在号召那些烦躁不安的俱乐部成员要遵守宣言的规则，“她马上就要讲完了，你们最好能保持安静，她能早点讲完，我们跳舞的时间就能多点。”也就是这位俱乐部领导者，她主动把四份剧本的拷贝借给四个俱乐部成员，一位小伙子真的把整个剧本的台词都背下来了。

年轻人热切希望自我提高，他们努力学习，激烈辩论，这些都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可是也就是这股潮流，导致早期俱乐部中最有希望的一个过早地夭折了。在长期的辩论中，女孩子们叽叽喳喳轻浮的表现令俱乐部中的二十名小伙子很不舒服，后来他们提议把其中最轻浮的三个女孩开除。在最后的投票决定中，那三个女孩求助于她们的几个朋友，他们是赫尔大厦男士俱乐部的成员，却与小伙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后来事情恶化到发生枪击事件。幸好没有开枪，不然就会酿成“恐怖事件”，不过事实上，我们真的很害怕类似的热血事件再次发生，虽然这些往往是为了保护妇女而引发的。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后，二十名小伙子与十七名姑娘组成了辩论俱乐部，不知道他们是否是真的头脑清醒，他们觉得自己的抱负与正直的想法没有得到赏识，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开除那些男士俱乐部中所谓的“强硬的”家伙是不对的，即那几个卷入热血事件的成员。他们终究在离赫尔大厦往西不到2000米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就这样他们与我们断了联系。脱离总部的俱乐部成员们邀请我参加他们在新地方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他们希望我可以评论现在的局

势，并且可以从赫尔大厦的观点来阐明上次的事件。我一直不能忘怀那晚我与这些年轻人之间的讨论，虽然我在从事安置点工作的生涯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从我的角度来看，躲避那些“强硬的人”，只意味着沉浸在追逐私利与个人提高的沾沾自喜中，而这些只会让自己陷入自以为是、无法取得成就的困境，这些并不是庭外和解要表达的含义。可是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有抱负的年轻人必须要有好名声，他们必须要与任何强硬的东西划清界限，这并不是单纯地坚持他们自己的道德理念。然而对于赫尔大厦的居民来说这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心胸更为开阔。我再三强调我们必然能从生活中明白对与错是最难区分，最为复杂的事，有时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最严重的错误的，我们也不会被所谓正确的事情的光环所迷惑，只有具备足够的耐心与一定的辨别能力才能找到真理。那些年轻人还是坚持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而我现在承认他们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当然俱乐部里经常会发生令人失望的事情，当成员们在政治上或财富上取得一定的成绩时，他们就很容易偏离俱乐部会议中所倡导的原则。有一位年轻人曾经是城市改革中众人看好的一颗新星，他却在改革过程中中途弃场，仅仅是因为市政厅向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职位；另一位年轻人听了一系列关于商业道德的讲座后，“成功地”让俱乐部得到客户定制服装的订单，而那些服装就来自于他负责展示的服装样品，那些服装稍作修改后，以原先价格的两倍卖给了客人。不管怎样，随着我们渐渐熟悉了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生活后，还是有很多事情令我们得到鼓舞，在所有的社会俱乐部中到处都是这些年轻人的身影。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因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工资不断上涨，或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取得了生意上的成功，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的富有的生活，这些现象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只有城市里的孩子才有这种极快的适应性，这也是他们的天赋，他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正是这样的环境赋予了他们这种天赋。女孩去城市工作后，熟悉了都市生活的模

式，她们就具备了非常明显的优势让自己的家庭走上富裕之路。

因此在赫尔大厦生活了二十年后，我见证了许多年轻人走向成功，我在市里或去外地旅行时，总会有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年轻律师、犹太教律法学者、成功的教师，为可爱的孩子们购买衣服的年轻妈妈们向我打招呼，这令我非常开心。“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以前参加过赫尔大厦俱乐部的。”我曾经问过一位年轻人，他在《芝加哥日报》有一个很好的职位，我问他赫尔大厦对他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他立即回答，“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书本与杂志，好像这世界上到处都是书本杂志。你还记得我在图书馆尽头的那张小圆桌边看了多少本书吗？赫尔大厦让人们知道阅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令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变得自信，我相信我能做好自己的事。”

在社会俱乐部的犹太小伙子们，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在学业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他们的父母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继续上大学或职业学院，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这些成绩的。取得巨大成就后，他们会不时回来看我们。我记得一位年轻人在西部几个州的大学举行的比赛中得到了演讲方面的奖项，之后他过来看我们，很骄傲地与我们说，他在我们的亨利克莱俱乐部中找到了自信心，另一位年轻人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学位，他告诉我们，那个夏天我为一群小伙子念罗伊斯^[1]的《现代哲学剖析》，当我说到赫伯特·斯宾塞^[2]并不是破解宇宙之谜的唯一之人时，这些小伙子觉得我的言辞太过尖刻。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就是在那个夏天，他下决心一定要上哈佛大学。偶尔也有学业上取得成就的年轻人闭口不谈他当初在赫尔大厦生活过的事情，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大多数人对赫尔大厦还是非常忠诚，就像他们忠于自己的家庭与传统观念一样。有时他们也会告诉我们，赫尔大厦帮助他们形成了有关辨别标准与行为准则的观念，使他们能更好地探知外部世界，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有很大的影响。一个由五位小伙子组成的俱乐部，其中五人在11年中一直在一起，他们一起进入芝加哥大学学

习，虽然这五人被其他人称为“智慧之人，”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一直不曾消失。

这些年轻人有着光明的前途，他们参加辩论与戏剧表演，参加在赫尔大厦举行的公立学校校友会，此外，还有几百名年轻人再次来到赫尔大厦，他们很坦率地表示要寻求那种所有年轻人都想追寻的乐趣与消遣方式，这些对于在工厂或商店度过漫长时间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权利。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珍惜以各种形式带给他们快乐的俱乐部，他们还组织了大型的舞蹈课。年复一年，这些活动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因此它们是很重要的，每年它们都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事情。圣帕特里克节^[3]来临之前的六个星期，大厦内的一小群居民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着手准备一次沙龙舞会，舞会的气氛异常热烈，到处弥漫着欢乐的情绪，就像是一次盛大的节日。父母们坐在走廊上观看，妈妈们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舞会的价值在于人们非常珍惜得到舞会邀请的机会；虽然参加舞会者的举止与舞姿与传统要求相差甚远，他们非常明白，这些年轻人的友谊是纯洁且安全的。

为了表明这种差异，我举个例子，在赫尔大厦成立早期，一个俱乐部里都是年轻人，他们组织了一次野餐活动，在野餐即将开始时，他们才发现俱乐部主席不能来参加野餐活动，后来一名俱乐部成员的妈妈自告奋勇地说她可以来负责此次活动。晚上活动结束后，他们回家了，虽然感到很累却很开心，他们给大家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每个男孩的手臂都小心翼翼地放在女孩的腰上，唯独没有放在那个骄傲的妈妈身上，她坐在最中间，脸上满是笑容。看到我们看照片时露出惊讶的表情，那位妈妈主动向我们解释，“你们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不过野餐活动真的很完美，”她说的是心里话。

虽然赫尔大厦举行了很多聚会与节日活动，我们每次都会介绍传统的风俗习惯，并要求人们能遵循，由于舞蹈课不仅能给人们带来快乐，

而且能让人们学到需要遵循的利益标准，因此得到了很高评价，赫尔大厦的居民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大家创造这种纯洁的娱乐方式，他们同时也得到了街区里一些年长妇女的帮助，这些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舞会经常在鲍恩大厅举行，休息室里提供各种饮料供人们选择。人们需要得到邀请才能参加赫尔大厦俱乐部主办的各种聚会，那些负责聚会的年轻人小心谨慎地为参加聚会的准入要求把关，因此当女儿参加我们举行的聚会时，即便是考虑最周到的母亲也会觉得很安全。每一次俱乐部举行欢庆活动，都必须要有俱乐部主席在场，不然活动就不能举办；年轻人是不被允许喝酒的；在舞会中，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兴起跳某种类型的舞，而这会被立刻严格禁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直坚持活动结束的时间赶早不赶晚。这些活动标准对于赫尔大厦的居民来说都是要遵守的准则，不过我希望我们没有那种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习气，年轻人从心底里是非常讨厌这种习气的，赫尔大厦居民自己组织的马蒂·格拉斯舞会^[4]及其它各种活动都是按照以上标准来举办的，而且都取得了成功。

我们相信举行舞会的标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赫尔大厦的居民们非常关心街区里众多的年轻人，有时那些年轻人太喜欢玩了，以至于不遵守舞会或其它娱乐性俱乐部所规定的准则，不过后来他们会发现，如果太过散漫，那么无论在哪里，得到的快乐都是很廉价的。

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恶意，但是他们不喜欢受拘束，很容易在公共舞厅里被坏人所伤害，至于在那些更隐蔽的场所，在喧闹的音乐与欢快的舞姿掩饰下，隐藏着种种邪念。去年一年中，25,000多名2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芝加哥青少年与城市法庭中受审，这个数字是总人口中大约每80个人就有一个，或是每52个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就有一个，这令我们感到很担忧。这些年轻人在城市狂欢作乐的霓虹灯下迷失了自己，他们过于放纵自己，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心痛。赫尔大厦俱乐部里年轻人

的处境就相对安全的多，经历很多事情后，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开放更多的小公园，市属健身房，学校的教室，让年轻人有地方进行娱乐活动，这样那些处于危险边缘的年轻人就能避免受到伤害，对于这写赫尔大厦的居民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比较随意的女孩认为如果自己住大房子，能弹钢琴，身上披金带银，她们就能得到向往已久的社交生活。我认识一个波希米亚女孩，她偷偷地把自己的加班工资都攒起来，攒到足够多的钱时，她租了一间有钢琴的房间，而且只租一个星期，这样小伙子去找她的时候，就会认为她是很有钱的，而她自己拥挤，凌乱不堪的家，当然是不能让小伙子去的。当然她无法深入了解那些男孩子，因为当他们发现她独处一室，他们的想法就会有所不同。

另一个女孩的父母都是美国人，她觉得在芝加哥会有更好的前途，年底时她发现，每天呆在仓库黑暗的角落里把那些运输的收据分门别类，这样的工作既不能让她变得富有，也不能令她成为别人的“焦点”，而以前她在乡下老家时，可是很引人注目的。她省吃俭用攒了15美元；用其中的5美元买了一条廉价的蓝宝石项链，然后她把剩下的10美元换成了一张10元面值的钞票。一天晚上，她自作聪明地耍了个小诡计，她与单位里的一位同事一起走路回家，告诉他自己很有钱，所以要戴上祖传的项链确保安全，她还让他看了放在手套里的10美元，说这是用来付公交车费的，然后她又带那个同事来到大草原大街^[5]的街区。在那里她欢快地与他说再见，然后沿着台阶往上跑去，走进前厅，直到那个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小伙子消失在街头，她才从里面出来。

可是服装问题比较麻烦，女孩子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她辛勤工作的父母对此非常惊愕，因为他们还在为房款按揭发愁，想不到女儿会不惜花钱打扮自己。有一个波兰女孩为了参加教堂举行的野餐会，打算买一条白色的裙子，她从老板放钱的抽屉里偷了5美元，她的父亲为此

非常生气，为了家庭的声誉，他把钱还给了老板，而且把女孩赶出家门，他不愿意自己家里出一个小偷，因为家里还有其他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她们的姐姐为了想把自己打扮的漂亮点而犯了错，炎热的夏日里，父母们每天都给另几个孩子穿颜色暗淡的粗布衣服。很多女孩在工作时把头饰与首饰放在衣袋或袜子里，因为她们只能在上班或下班路上穿戴它们。她们想寻求快乐，想找到自己心仪的伴侣，这种强烈的愿望有时令她们煞费心机，而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我记得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来自于户有名望的德国家庭，是家中的长女，我第一次看到她是春天的时候，她从有着高高烟囱的工厂里走出来，穿着蓝色的印花外套，她的眼睛是如此的湛蓝，华兹华斯^[6]的诗歌在她面前也会自己吟唱起来。她犹如生长在灰色岩石上的蓝菱花，在微风中摇曳。

一年后当我得知这名17岁女孩的消息时，我回想起最初见到她的那一幕，我的心不寒而栗。女孩在那家工厂工作了四年，后来她决定自己应当“享受生活。”为了不让父母生疑，她从放高利贷者那里借了30美元，像她那么漂亮的女孩，是无需什么担保的。每天早上她从家里出发，假装去上班。三个星期来，她每天都疯狂购物。上午她来到百货公司，并在那里吃中饭，还结识了一些不上路的朋友；下午她就来到剧院，在那里心满意足地坐上好几个小时，观看歌舞杂耍表演，直至快到工厂下班的时间才回家。每个周末她还是向父母上交与她工资金额相等的钱，可是当她把30美元挥霍殆尽后，她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去单调乏味的工厂上班了。她尝试过新生活后得出结论，在城市里活络一点的女孩还是有机会的。

不过还有很多女孩并不会让自己如此堕落，因为她们的母亲知道对好生活向往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所有的母亲都能明白这一点，那么就不会有这个可悲的数据了，有五分之四的妓女未满20岁。我们知道，婴儿的出生令母亲感到无比幸福，母亲想与宝宝玩耍的心情是无法抵制的，婴儿感受到母亲的这种心情是，就会产生“生存愿望”，而孤儿

院里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是因为他们没有母爱，从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生存愿望”。

同样道理，孩子的青春期犹如他们的第二次生命，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母爱，获得自己的“生存愿望”。年轻人需要关爱与理解，如果家庭能给予他们安全感与正统的教育，年轻人就能懂得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长大成人的女儿穿着优雅华丽的衣服，衣服需要小心维护，母亲们为了熨烫女儿的衣服一直忙到深夜，又为了有高贵的红色丝绒布艺来装饰客厅，不惜分期付款把它们买来，同时更小的孩子们还等着妈妈给他们买新鞋子，因此世上再也没有人比母亲更能懂得儿女的心了。这些母亲们显然明白在社交生活中得到快乐的前提是什么，她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实现它们，虽然同时还要养育其他年幼的孩子，有很大的生活压力。由此我们早就意识到沃尔特·惠特曼^[7]所说的真理，一户大家庭的主妇往往是最得以信赖的智慧源泉。

赫尔大厦女士俱乐部的成员们因为生活富足，有相对闲暇的时间，并有机会把家搬到各种诱惑较少的街区，赫尔大厦为了给心态浮躁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娱乐方式，她们很自然地对此提供帮助。很多情况下，她们通过在俱乐部的经历，也感受到了这种需求。一天，一位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告诉我，一位女士俱乐部的成员，她自己有一个大家庭，并且有一个很难养育的男孩，她自告奋勇地照顾一位受青少年法庭监护的未成年人，那个小孩住的地方离她家只有一个街区。6个月来，那位女士一直用心监督那个孩子，他再也没有犯过错。我向这位女士的成功表示祝贺，然而她却说自己觉得很惭愧，她其实早就应该监护那个孩子，因为她认识那个男孩的妈妈已经好几年了，那位妈妈每天傍晚5点离家去打扫市中心的一幢办公楼，一直到晚上11点钟回家，而她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刚好是男孩最容易有机会做坏事的时候。她说有一天俱乐部成员在为青少年法庭拘留室做枕套的时，她突然想到要拯救堕落的孩子，而最好的方式就是照看好那个男孩，她向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提出这个要求，

也就是这个时候，她开始把照看那个男孩作为自己的义务。每天她都邀请那个男孩去她家共进晚餐，这样她就能了解男孩子晚上的行踪，那是他最易犯错的时间段。如果她觉得她不能同意男孩子某个晚上的外出活动，她就会不露声色地把男孩留在她家过夜。她说那个男孩本身对她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好事多磨，就这样她成功地调教好了那个男孩。

这位女士的事例折射出人性中的共同点，当身边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职责与社会责任相联系的时候，我们能更容易注意到这些职责。当这位女士得知，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在倡导要教化那些堕落的男孩，要为他们提供一些合适的娱乐活动，要给他们提供成长与发展的机会，当她准备要参与这一活动时，她才发现了身边实实在在存在的事例，而之前她却从未认识到。

社会进步依赖于道德识别能力与责任感的提高，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很多事例。我曾任女士俱乐部总联盟会中的童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向全美所有俱乐部发送了一份计划书，让他们报告周边地区年龄在14岁以下的童工数字。一家佛罗里达州的俱乐部递交了计划书，里面所写的在白糖加工厂工作的古巴童工数字令人吃惊，同时该俱乐部成员还发了一封投诉信，说委员会发送那份计划书太晚了，如果他们能早点意识到那种情况，他们就可以向立法机构呈递一份议案，可是立法机构现在已经休会了。的确孩子们在糖厂工作好几年了，或许他们在俱乐部的女士们面前也出现过好几次了，可是那些女士却从未看见过他们，因此也不能保护他们，直到这些女士加入了俱乐部，而俱乐部又加入了联盟会，然后联盟会指定童工委员会向那些女士发送计划书。经过这些程序后，她们马上意识到必须要拯救这些儿童，而他们其实就在眼前，因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有了这样几次经历后，赫尔大厦女士俱乐部的成员们很快发现了现实生活中需要帮助的群体，并且为此开展了各种工作。

在俱乐部成立早期，另外成立了“一个社会延伸委员会。”每月该委员会为街区里的居民举办聚会，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居民生活在孤独中，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们显得闷闷不乐。有一个晚上委员会邀请意大利女性参加聚会，这个做法显然跨越了一个很明显的社会“鸿沟，”因为富有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与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无疑是两个有较大差别的社会阶层，在芝加哥，有很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都很大。意大利妇女们保留着东方人的传统习俗，她们几乎都是家庭主妇，每天目送丈夫上班。后来社会延伸委员会来到画室，发现里面满满地坐着意大利男人，他们好像更喜欢靠墙而坐。他们希望自己“能有更广的社交生活，”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做。那个晚上的聚会非常成功，这并不是因为委员会的工作有多么出色，而是意大利男人的表现非常好。

一对对舞伴跳着欢快的塔郎泰拉舞^[8]，仿佛忘却了疲倦；他们唱着那不勒斯歌曲；有一位意大利男人熟练地表演了有趣的戏法，这种场景经常可以在那不勒斯街头看到；他们给人们讲手上佩戴的圣特雅纳^[9]珊瑚戒指的历史故事；他们非常文雅地品尝着美国点心；聚会结束后，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对我说，“以前说起意大利人的时候，我对他们有诋毁的情绪，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他们其实与其他人一样，只是人们需要多花点周折才能发现这一点。因为意大利人搬到M街住了，我曾好几次让丈夫把家从那里搬走，不过现在我已经打消这个念头，我打算继续住在那里，好好地与他们中的几个做朋友。”听她说这些时，我觉得在她心目中，她曾经认为没有教养的意大利人很可能是有教养的人。认为意大利人没有教养，是对他们生活的狭隘看法，觉得他们不能适应着装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他们在一个新的被限制的区域中逐渐淡薄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有教养的意大利人则有可能成为世界居民，为他们通过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能以更开阔的心怀包容其他各种类型的人。我们把孩子们送去欧洲，希望他们能够抛开自己的狭隘思想，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同伴，这就犹如我们让孩子们上大学，他们就可以熟悉更多的

文化，对事物有更开阔的看法；因此很多事物也是一样的道理，就像那位女士俱乐部的成员，她的思想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社会延伸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俱乐部的前任主席，同时也是赫尔大厦的居民，他交友颇广，并且察觉到每座城市都有相当数量孤独的人。一个人如果不能与周围其他人建立真正的友谊，他的处境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是逐渐才认识到。或多或少我们更明白如果一个人处于偏僻地区，孤立于社会，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勃朗特三姐妹^[10]描述了居住在英格兰北部荒野地区的人们，他们的人性如此丑陋可怕，他们失去了人性的道德，只留下人性的野蛮；威尔金斯小姐^[11]描述了新英格兰村民由于寂寞孤独而产生了过度膨胀的欲望；不过那些城市里孤独者的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除了刚来到这里不久的孤身一人的年轻人外，刚从乡村搬来这里的家庭，也没有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还有其他很多人，出于性格及自卑的原因，没有与“周围的人”结交朋友，还有些人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心理已经受到伤害，在城市中他们没有与其他人，其它事有任何交集，就如住在偏远的乡村一样。如果他们一直住在租住公寓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其他人，那么他们的性格会变得更加冷漠，更加与外界格格不入，这与住在乡村里的独居者并无多大区别。

我能想到很多相似的事例；一位很有贵妇人风范的理发师，二十年来她都在理发店工作，对于店里的任何人，她从来都不曾透露自己的住处，当她发现别人对此感到很诧异时，她就会马上搬家，从来都没有一位邻居“迈入过她家一步”，她却对此很自豪，后来她得了哮喘，不得不寻求别人的帮助，自己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与别人交往时，她是最主动热情，最开心的一个。还有一名妇女，因为丈夫有赌博的恶习，家里变得穷困不堪，而她的家庭是很重视教育的，为了确保孩子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长期以来，她都尽力掩饰家里的情况。她有5个孩子，现在都已大学毕业了，他们不曾意识到他们的妈妈，在婚姻生活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是多么艰难多么孤独，而我们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那时候她开始后悔没让孩子们与别人多加相处，因为她发现由于孩子们小的时候缺少玩伴，他们以后结交朋友的能力就会大大削弱。她很高兴赫尔大厦为孩子们创造了与别人交流的机会，当然同时也是为她自己。

社会延伸委员会的领导者与芝加哥空置花园运动组织合作后，拥有了一个最活跃的“友好俱乐部”，该俱乐部的成员大多是开垦维护这些花园的人们。俱乐部举办的晚间聚会中，人们开始重新用以前的标准衡量别人，那就是每个人在每亩土地上种了多少土豆，而不是以哪个人穿了哪个品牌的衣服这种很空洞的世俗眼光来衡量。他们所得到了无穷无尽的欢愉及热情，他们跳木鞋舞，唱怀旧歌曲，这些都与俱乐部成员们之前疲惫不堪、苦于工作的面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当然其它的一些俱乐部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现象，比如希腊妇女俱乐部、意大利语俱乐部、作为社会性俱乐部，它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可以开展比较温和的社会活动，而那些较为活跃的俱乐部则把人们那种暂时性的躲避心理上升到社会需要社会关注的问题。

参加赫尔大厦女士俱乐部的经历还影响着俱乐部成员的家庭生活。丈夫们随妻子一起来参加年度冬至招待会，参加俱乐部音乐会与各项娱乐活动；小孩子们一起来参加5月派对，跳舞，玩游戏，不亦乐乎；如果俱乐部成员有正在上学的孩子，那么6月份的时候，无论他们是8年级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只要他们取得了好成绩，就可以得到俱乐部的奖励。

为了肯定俱乐部所做的努力，俱乐部主席申请建造了一幢房子，专门给俱乐部成员使用，其中有图书馆，有一个足够大的礼堂，可以在里面举办各种社交活动，不过鲍恩大厅经常被用来做其它用途。

正是在这位能干的主席领导下，俱乐部办得非常成功，而且与其它社会力量一起，为打造一个更美好的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与其它所有

的女士俱乐部一样，赫尔大厦俱乐部刚开始建立在自我提高的基础上。俱乐部最早的一位主席，即青少年法庭的第一位保释法官，她奠定了俱乐部今后发展的基础，她把自己的经历学识运用到俱乐部中，俱乐部图书馆中有她的纪念碑，上面所写的字里行间中，每位成员都能真正地理解其中的真理，体会到其中的悲伤情绪。

“看到的痛苦与悲伤越多，心肠就变的越柔软。”

俱乐部的每一位女性自己也亲身经历过相同的感受，佩勒姆女士是最后一任主席，她决心要帮助那些可怜无助的人，俱乐部开展了很多慈善活动，最早就是为那些贫穷多病的人捐献衣服，装衣服用的藤条箱通常都是满满的。要做到这些，必须了解城市的阴暗面，青少年犯罪往往是因此诱发的，同时也必须有足够的同情心，让其他人也产生共鸣，一起参与到慈善活动中，从而引起最佳的公众效应。后来任俱乐部主席的鲍恩女士就是这么做的，她是青少年保护协会的领导，她认识到群体的说教力量可以解决城市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不过要做到这点，必须了解城市中的阴暗面，而我们的俱乐部成员就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发社会责任感，并且善于与城市中其它很多公民与慈善组织合作，产生非常有效的社会效应。

只有当俱乐部成员切实表达他们的同情心与亲和力时，才能获得其它组织的认同，并得到经济与组织上的帮助，这对俱乐部是非常有益的。一些俱乐部成员每周都与鲍恩女士一起在赫尔大厦共进午餐，她们谈论的话题不仅有关于公众利益，有时还与专家们一起探讨问题，这些专家是她们长久以来在共同开展活动时认识的，她们还商讨俱乐部的一些内务，相比之下，这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俱乐部的价值还在于拓宽了人们的思想，人们本来可能只局限于某种观点，通过俱乐部的活动，体会到一种公民责任感，当然另一种俱乐部的形式就是为人们提供娱乐休闲方式与场所，因为有些人没有机

会尝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而俱乐部恰恰为他们的生活开启了一扇崭新有趣的窗户，为那些有抱负的人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赫尔大厦居民与其他人一起创建并领导了负责社交生活的整个组织，并且通过俱乐部成员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成绩。沃尔特·贝赞特先生曾经告诉我，在他心目中，赫尔大厦更像是一幢“快乐的宫殿”，它给人们带来的欢乐更甚于“英国的皇宫”，因为我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希望我不要让赫尔大厦太过教条化。他认为管理一所理工学院要比管理一家大型娱乐中心要容易得多，不过两者所带来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社会俱乐部为居住在城市不同区域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一种最为明智的交友方法是建立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原本互不认识的人们开始熟识，而且很多人开始第一次质疑我们当代的生活，因为他们由此发现了很多工业社会中的问题。赫尔大厦建立二十年来，来自赫尔大厦之外的几百人参与了管理俱乐部与各种课程的工作，而且越来越多的芝加哥市民认识到一些不利的社会现象，他们知道每个人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克服生活中的种种艰难与无奈，远离愚蠢与残酷的生活。在美国所有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市民意识到这点，由此新世界的公民不再对社会问题不闻不问，不再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世事，而新世界的公民，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这样的。我还记得一位英国人的经历，是位有头衔的英国女皇内阁成员，而且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受到了芝加哥人民的热情欢迎。在一次大型宴会上，他问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太太，每位租房的居民需要多少立方米的空气，租住房屋的法律到底是为什么而立；那位太太说她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后来坐在这个长方形餐桌上的客人都被问到这个问题，所有人都觉得很诧异，他们认为不需要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个英国人后来与我说，伦敦的大部分民众不会对那样的事漠不关心，他们有很强的公众意识，他们知道适宜的住房条件能保护公寓居住者，从而能保证工作者的活力与社

会生产率。5年后我再次遇见那位英国人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芝加哥人是否还是像以前那样对穷人的住房条件漠不关心。我像其他美国人在欧洲时的表现一样，马上反驳说我们国家的民主体系就是假定每个公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因此对于社会责任感，还是需要民众慢慢培养起来。他已经听惯了这样的话语，微笑着说我们的冷漠还是因为没有把社会问题放在心上。

赫尔大厦在社会层面所取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在二十年前的预期，所以我大胆地引用了古代的文章来作为本章的结尾。

美国大城市的各大区域里，各种社会组织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住在那里的很多人都非常穷，他们为生计所累，多数人没有自己的空闲时间，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做其它事情。他们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很多人与别人没有交往，没有朋友，他们也没有当地的风俗习惯可以沿袭，当然也没有公众意识，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对于这种情况，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的人接触过社会各个层面，也接受过相关培训，他们拥有豪宅，也喜欢帮助别人，这部分人住在城市里的其他区域。俱乐部的房子，图书馆，美术馆，半公众化的社交场所也都位于几个街区之外。有管理能力与商业头脑的人觉得把工人们分成各个派系对自己有利。不过工人们并不是以社会层面组织起来的；他们虽然居住在拥挤的出租房中，却孤立于社会之外。他们居住在较混乱的状态中，犹如工人在庞大的车间里做工，却没有一个车间主任或主管。他们的思想及社会资源都是非常狭隘有限的，并且彻底放弃了追求社交的乐趣。

通过传统习俗及社会能量可以令人取得进步，他们对此却一无所有。他们可以聚会的唯一地方是沙龙，理发师是他们唯一的主人；一个别具用心的政客可以左右一个地方的公众观点。能干文雅，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及良好教育背景的男士离他们远之又远。从我个人的观点看，那些躲的远远的男士其实并不是赢者。矛盾就是，当有教养的人们远离社

会的某一群体时，当所有的社会利益一直都只限于某些人时，年复一年，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社会大部分群体从来都没享受过社会利益，但是他们的内心是渴望拥有的，由于他们思想迟钝，行动愚昧，只有政治或慈善机构才能改变这一切。城市就这样被分成了贫富两个阶层：富裕阶层可以通过金钱来体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而贫困阶层只能通过大声抗议来要求自己相应的“权利”——这两个阶层都被一种模糊的正义感所驱使。如果某些区域孤立的人们能利用自己的社交能力彼此帮助，他们的力量就足以推动社会发展，从而使社交的快乐能合理地分配到某些人身上，而这种社会发展也能使许多应该得到社交快乐的人真正得到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样城市的这种分化也能比较合理地存在了。可是因为社会精神是以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来体现的，单单一种形式不足以令人们做到以上这些。

注释：

[1]乔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2]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他为人所共知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所提出一套的学说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教育及阶级斗争。

[3]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 Day）：3月17日，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这一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美国从1737年3月17日开始庆祝。

[4]马蒂·格拉斯舞会（Mardi Gras dance）：马蒂·格拉斯狂欢节每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举行，是全球最富盛名的10大狂欢节之一。如今马蒂·格拉斯狂欢节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展示多样民族风情的大舞台和一个人们共同参与并同享快乐的好机会。

[5]大草原大街（Prairie Avenue）：芝加哥南部的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街，在历史上大街从伊利诺伊州库克郡临南社区一直到城市的南边界并向外延伸。大街历史悠久，曾经是骑手和马拉货车的主要通道，在19世纪最后30年，大街有6个街区是芝加哥精英分子的住宅区此外有4个街区也住了很多的显赫家庭。

[6]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雪莱、拜伦齐名。

[7]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惠特曼是美国文坛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自由诗之父美誉。他的文作在当代实具争议性，尤其是他的著名诗集《草叶集》，曾因其对性的大胆描述而被归为淫秽。

[8]塔郎泰拉舞（the tarantella）：，意大利南部的一种轻快民间舞蹈。

[9]圣特雅纳（St.Januarius）：那不勒斯城市的保护神。

[10]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e sisters）：三姐妹以各自的文学成就创造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家族辉煌与奇迹。作品有《简·爱》，《呼啸山庄》，《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等。

[11]威尔金斯小姐（Miss Wilkins）：美国作家。在她的短篇故事中，她以现实主义和充满同情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新英格兰村民们的生活。

第十六章 赫尔大厦的艺术

赫尔大厦建成的第一幢建筑物中有一个美术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里面的灯光总是那么适宜，人们可以很舒服地欣赏画作，我们的首次借阅画展于1891年6月开展，主办人是来自伦敦的巴尼特夫妇。他们是一对极富同情心的夫妇，并促成了首次画展，我一想到这些总觉得很开心，他们为了让劳动人民有机会欣赏到最好的艺术，作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他们在托因比大厅举办了画展，而且还在一个工业区内成立了首家永久性的艺术展览馆。

赫尔大厦举办的第一次画展中不乏一些芝加哥的最好画作，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我们非常尽责地保护它们，防止火灾的发生，并且日夜派人监守。

美术馆建成后的两年里我们共举办了五次艺术展：两次油画展，一次传统的雕刻及蚀刻版画展，一次水彩画展，还有一次画展专门供公立学校挑选画作。这些展览出人意料地受到欢迎，评选最受欢迎的作品时，我们收到了好几千张选票。展览给人们带来的美感让人们忘却了烦恼的现实生活，使他们可以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因此展览对整个社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斯塔尔小姐一直认为，赫尔大厦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视艺术的，她觉得人们应该记住“人类的心灵是如此的饥渴，如果没有艺术的感化，将得不到慰藉及满足，如果一个人不屑于欣赏艺术，那么他的心灵将变得非常空虚。”

通过展览，我们悲哀地发现，年纪稍大的移民觉得在美国，他们无法得到艺术给人带来的慰藉；一位意大利人发现美国人如此喜欢画作时，他觉得非常惊讶，他很天真地说，他不知道除了钱之外，美国人还

会在乎其它东西，他觉得只有意大利人才懂得欣赏画作。

意大利人不知道市区还有一个公共美术馆，并且有人把画作视为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些都表明意大利聚居区是多么地与外界隔绝。

一位希腊人看到赫尔大厦里挂着一副古希腊卫城的照片时，他非常吃惊，因为他在芝加哥已经生活了13年，却从未见过任何美国人能懂得这种世界上最伟大的荣耀。离开希腊前，他以为美国人想看的应该是雅典的照片，由于他在大学里是学理科的，他准备了一本有彩色图片的书，并收集了一些照片，他觉得美国人会喜欢这些。他的水果摊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能碰到很多美国人，与他们聊天时，他都想把话题引到古希腊上，可是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由此他最后总结出“芝加哥人毫不知晓古代的事情。”

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每周日下午免费向公众开放之前，赫尔大厦一直都举办了艺术展。赫尔大厦还举办了各种聚会，每次聚会都会安排一名向导。后来即使没有举行聚会了，美术馆也逐渐在芝加哥名声鹊起，而芝加哥艺术学院在推广画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芝加哥人开始对艺术感兴趣了。

很早的时候赫尔大厦就设立了画室，并且在赫尔大厦居民本尼迪克特小姐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她自己是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老师。赫尔大厦的几幢建筑物里都设有画室，来自于意大利聚居区的艺术家们能在那里找到艺术灵感，犹如法国艺术家往往是在巴黎的拉丁区里找到灵感一样。这些艺术家在外国聚居区发现了很美的东西，然后他们就通过绘画，蚀刻画，平版印刷等艺术形式把这些很美的东西表现出来。在这些艺术家的课上，既有充满才气与天赋的年轻人，也有把画室作为逃避现实的绝佳去处的中年人；有一位带着4个小孩的寡妇，她平时靠教钢琴课所得的微薄收入补贴生活，6年来她却从未拉下过每周一次的绘画课，因为这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乐趣”，另一名女性，多年来为

了照顾生病的父亲，自己过早地衰老了，身体非常弱，她还是坚持每周在画室学习一个下午，她长年来被抑制的自我表达的欲望在画室里得到了释放。

致力于商业艺术的年轻人也在画室里上课，他们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是画室所取得的最令人满意的成绩。年轻的蚀刻画画家与平版印刷家们都为此由衷地感到高兴；平时不得不忙于画海报与其它插图的人同样有这种感觉。堆放在画室一角的一小堆石头，还有平版印刷家使用的手动操作印刷机，这些东西在很多课上都被用到过，而一些作品收藏家们也把非常漂亮的作品借给赫尔大厦作展览用。

不知不觉中，在画室里创造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在赫尔大厦建成的前十年中，大厦内就开设了一家手工艺作坊，管理者就是大厦的居民，同时他们也是芝加哥艺术与手工艺协会的成员。那里也是一所学校，人们在那里学习，然后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与所有的机会，把学到的知识物尽其用，而对于那些已经接受过系统培训的人，他们可以用木头或金属来表现自己最佳的创作灵感。我们很快发现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一件作品是非常困难的。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异常忙碌地工作。如果能有条不紊地用一张张纸把一块块肥皂包好，即使是重复性的工作，人们却也因为工作能做得比较细致而觉得高兴，可是当工作的数量多少与报酬相关时，速度成了被唯一追求的目标，本身在工作中可以得到的快乐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赫尔大厦作坊的做法刚好与之相反，在创作一件真正艺术品的过程中，人们始终保持着创作的热情；有一位年轻的俄国小伙子，与很多俄国人一样，为了使自己在职业上取得一定成就，他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即将学完夜校的法律课程。一直以来，他经常抽出时间到赫尔大厦的金属作坊观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一天晚上他突然来了兴致，脱掉外套，坐在长凳上开始工作，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心灵手巧的银匠。长久以

来，他一直没有开始创作，因为担心会影响他做律师的愿望，他希望可以“更像美国人”，在更高档的办公室里工作，而不是在作坊里。后来每周他都会抽两个晚上来作坊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与话语表明他已经释然，因为他曾经觉得自己不合适而放弃了这个工作，而现在他是一个非常自立的人，他可以用娴熟的技艺表达自己的心灵。

斯塔尔小姐最终发现自己不安于做一名大学艺术讲师，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手工艺品看上去没有美感，也没有表现出工匠在打造作品时所包含的兴趣。她在伦敦参加了科布登·桑德森先生教授的装订培训课程，学成后她在赫尔大厦成立了自己的装订室，并在那里向为数不多的学徒们教授设计，工艺，美感与整体设计方面的知识。

在赫尔大厦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每周日下午在大厦的休息室里都会举办音乐会，而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后来随着观众数量增多，改在面积更大的大厅里举办了。我们在此特别感谢芝加哥市的各位音乐家们。早期时候，威廉姆·汤姆林斯先生培训了很多大型的成人合唱团，他的助手则教儿童合唱团，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从而表明在我们这块邻近区域里，虽然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不多，可是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一直坚持下来，成为能够真正欣赏音乐的人。在早期的合唱团中，一位很具公德心的芝加哥市民设立了最佳劳动歌曲奖项，歌唱竞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报名参加比赛的信件都可以装满三个大桶了，作为一个裁判，我有点为难，他们的歌唱水平的确不怎么样，不过他们对此的热情却令人鼓舞。很显然美国的工人们还没有唱歌的习惯，不过我记得有一个在赫尔大厦排练唱歌的合唱团，他们在一次支持无烟煤罢工的大会上表演得非常出色，他们的歌声是多么轻快，“是谁发明了煤炭？是我们的上帝还是别人的呢？”

他们的歌声缓解了罢工的紧张局面。埃莉诺·史密斯小姐是赫尔大厦音乐学校校长，她用音乐来表达语言，她演绎了犹太人诗歌中“血汗

工厂”的场景，这出表演生动地展现了纽约血汗工厂中工人的迷茫与厌倦，当然也表现了所有机器工业中工人们所处的境地，第一句歌词是这样的：“我的耳边全是车轮的隆隆声，金属撞击发出的刺耳声音让我无法呼吸，在混乱中我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灵魂，在嘈杂声中我无法思考，无法感受。”

这个歌曲表达了工人对生活的悲叹，也表明工业给社会带来的失调状态的阶段里，劳动歌曲是多么匮乏，工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为了让附近的人们能够得到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音乐，我们尽力安排更多的音乐课程，这样至少可以让一些年轻人不至于对这门古老的艺术太过陌生；他们从而能学到一些音乐常识，经过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艺术能力，这样艺术才能真正表达人们的思想，并永远流传下去。

刚开始时我们只开设了音乐课，1893年时，位于僻静之处的赫尔大厦音乐学校成立了。学校的宗旨是为在规定人数内的孩子们上正规的音乐课。第一堂课上，孩子们先学习乐谱，然后再按个人的水平分成小组，通过这种方式，音乐学校就能通过孩子们，让移民重新听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歌曲。有一些民歌虽然没有纸面版本，但几百年来它们能代代流传，归功于它们永不磨灭的像诗歌般优美的旋律，这是世人一直以来都非常珍惜的；有一首俄国歌曲，歌曲里的年轻人在干活，他要挖一个洞，他觉得很枯燥乏味，又很困难，直到他铲到了一层红色的沙地，他就觉得不那么难挖了，而且红色的沙地让他想到了心上人的红头发，他的心情就变得更加轻快，从而曲调也上升到一个欢快的旋律。我又回想起孩子们唱那些老歌的时候，大人们听得非常投入，非常开心，而领唱者唱的赞美诗受到了大家回味无穷的欣赏，他的父亲也在现场聆听，他曾在犹太教堂工作过。

音乐学校举办独唱会与音乐会时，往往会吸引有很多观众，他们欣赏音乐带来的美感。圣诞节来临前的一个周日，有圣诞歌曲的表演，吸

引了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赫尔大厦有一个风琴纪念碑，在风琴深沉的曲调里，我们发现能引起广泛感染力的，能让人们忘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最强有力的方式就是音乐。

音乐学校的一些学生经过几年的深入学习，成为颇有造诣的音乐家，并且把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很有前途的音乐天才没落了，因为他们开始在工厂上班后，消耗了很多精力，而且工作也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他们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参加正规的音乐培训。这样的事例有很多：一位波希米亚女孩，为了赚钱补贴家用，6个月来频繁在歌舞杂耍表演中演出，她的嗓子因此受到伤害，后来她又去工厂加班加点工作，为了弥补歌舞杂耍表演失去的报酬；赫尔大厦在征得一个女孩的父母同意后，把她送到高中学习，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多加留意，才能发现完美的嗓音，可是这个女孩后来去烟草工厂工作，丢弃了自己的理想；第三个女孩从14岁开始就要养活她的几个妹妹，为了多赚点钱，她下班后到娱乐场所演唱到深夜，后来因为太过疲劳，严重影响了健康，她的音乐家梦想也随风而逝了；

另一个男孩的父母都是音乐爱好者，他们为他创造了每一个机会去学习音乐，甚至在他得肺结核的几年中，还创作了一些很优美欢快的歌曲，他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一名音乐老师或是作曲家，很不幸他还是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在赫尔大厦为他举行的小型追悼会上，孩子们唱着他的歌曲，“牧羊人的牧羊地是多么美丽啊，”人们很难相信这首描述真实田园生活的歌曲是由一位在拥挤的城市中度过童年时代的人创作的。

这个男孩的过早逝世仅仅是悲痛的开始，接下去的一年里，15个学生组成的班级里有6个很有潜力的学生也得了肺结核。8年来，15个孩子在音乐学校里度过了共同的光阴，机会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可是等他们到了可以工作的法定年龄后，只有少数人可以忍受长时间在浑浊的空气里工作后再学习音乐。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完全深陷在工厂的

生活中，他们对那种生活已经麻木了，直到有人真正遭遇不幸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每天都生活在悲剧中。一年里有两个男孩过世了，“看着这个可怜孩子的遗物，我感叹，又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了。”

长久以来人们经常都说，艺术是生存于吞噬自己后代的基础上的，而人们用种种事例证明了这个说法是合理的，可是当我们看着有艺术天赋的孩子被现代工业这个残忍的陌生人吞噬时，我们却毫无准备，心里的伤痕无法被抚平。现代工业对年轻人是那么冷酷无情，这对于孩子的母亲来说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因此当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开始工作，虽然还有一些幸运的年轻人得以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就意味着生活磨难的开始；我们为什么会容忍让如此珍贵的生命渐渐陨落，让他们去工厂工作难道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完美诠释吗？当我们无法提供可以航行的船只时，生命就永远地逝去了。

个人经历并不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向往，虽然每个人的生活是各不相同的。赫尔大厦居民明显区别于其它工业区居民的特点是，他们坚持去剧院观看演出。我第一次看见霍尔斯特德大街上排着长长的队伍，宝石剧院美术馆入口处那里都是等待观看下午2点开始的周日午场演出的小伙子与男孩们，虽然那时还只是中午时分。赫尔大厦建成的20年来，几乎每个周日下午都可以看到这个长长的队伍。赫尔大厦成立后的第一个周日夜晚，有一群小男孩坐在广场上，告诉我们“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说的就是指剧院的事，午场演出令他们大开眼界。

可是这些男孩子观看演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很难弄明白，因为他们更喜欢谈论在剧院看到的事情，而不太愿意为自己的生活筹划反思；小伙子们引用舞台上英雄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们的抱负；女孩子们则羞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浪漫的梦想，在她们心里留下的只有演出中跌宕起伏的一幕幕情节。所有年轻人都把每周一次在霍尔斯特德大街上的剧院观看演出当作自己开眼界的机会。最近人们把他们所观看的情节剧

称为“熊熊大火铸成的十条戒律。”

当然坏人的下场总是可悲的，而年轻英俊的英雄总能抱得美人归，他们的妻子通常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可是这些并没有表现十条戒律要说明的道德观，它们表现的仅仅是生活的表面。

然而剧院还是为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让他们知道世界是有次序的，有美好的东西存在的，即使最差劲的导演也会把这个主题发挥地淋漓尽致，因为现实生活的确太让人迷茫了，因此这些年轻人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放任堕落。这一点可以从最平凡的年轻人身上反映出来。住到霍尔斯特德大街的第二年时就有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意大利聚居区发生了一件事，那里的男人总是吹嘘他们能保护好自己的女儿，能让她们远离城市生活的危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直到有险恶的意大利人开始做“人贩子”生意。赫尔大厦居民知道关于第一个走失的意大利女孩的事，她被剧中的情节与人物深深吸引，以致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她总是在剧院门口的大幅海报前逗留。她后来与一位演员私奔，三个月后，她心力憔悴的妈妈收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她穿着男人的衣服，应该就是在歌舞杂耍表演中拍的。她的家人当作她已经死了，还为她办了追悼会，从此在意大利聚居区她的名字再没有被提起过。还有两个女孩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见识舞台上演绎的生活，她们的父母还是非常清醒，认为她们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他们不同意女孩再去观看演出，不给她们零花钱。实在没有办法了，这对姐妹想出一个主意，她们中一人假装牙齿痛，当她去附近牙医处拔牙时，另一个女孩偷走了医生放在桌上的金皇冠，这样每天晚上她们下班回家的路上，就有钱去看歌舞杂耍表演了。很显然，在她们期待即将拥有的快乐时，根本就没想到她们的做法是多么错误，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痛苦。就当她们把偷来的金皇冠卖给当铺老板时，这对姐妹被警察逮捕了。

后来美国所有拥挤的城市里都出现了5美分票价剧院，看演出非常

盛行，以致全国每天都有225万人观看。而在这之前，没有钱的孩子们非常想去剧院看演出，他们的这种强烈愿望导致了小偷小摸行为急剧增多，因为在表演快要结束时，两个孩子只要5分钱就可以进去看了。赫尔大厦的居民对于这种模仿秀能这么流行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在电影审阅制度及5分钱剧院政策出台之前，我们在赫尔大厦安排播放动画片。因为反响较好，动画片才一直得以播放下去。不过很显然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或者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青少年保护协会的指导方针实施下去。

然而早在5美分剧院开始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戏剧可以给人们带来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观看赫尔大厦的剧目，那么我们也将变得很落伍，跟不上时代的节拍，因为戏剧不仅是一种娱乐与教育方式，也是年轻人需要表现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载体。

赫尔大厦剧院建成前，我们已经开始安排戏剧表演了，最初是在休息室里，后来改到体育馆中。由年轻人组成的俱乐部乐此不疲地排练节目，为戏剧表演做充分的准备，我们也发现年纪大点的人也同样对戏剧有很大的热情，有表演的天赋。我们很快发现感恩节最受欢迎的活动就是舞台上有关“朝圣之父”^[1]的戏剧，后来我们把当时的爱国主义与浓厚的宗教信仰情绪归功于戏剧的效应。

最早几年的圣诞庆祝活动中，我们安排了朗费罗^[2]的《金色传奇》，演员的表演真实地反映了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我记得有一位扮演牧羊人的盲人，在最后一场表演时说，“善良的心（他对我称呼），为了听人们说这些话，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多的演出机会，我想我能永远记住它们。我现在听力已经不是很好了，不过对于不同人说的话，我还是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内容。”他的这番话替我们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自己没法这样说出来，其他人的感受让我们觉得很温暖，我们因此得到了友谊；每出真心演绎的戏

剧表明了我们很明智地处理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些令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变得更坚强。

赫尔大厦居民区里的移民们把我们小小的舞台物尽其用，他们通过那些不朽的戏剧重现了他们祖国的历史，而这些本来在他们离开祖国，来到新世界的时候，可能将永远消失。

赫尔大厦附近一个较大的希腊聚居区中的居民，他们觉得美国人不会关注希腊的历史及经典作品，而从欧洲东南部其它国家来的移民在这方面则非常无知，这令他们觉得更加困惑。所以当他们发现有机会可以用古希腊文来演绎希腊戏剧时，他们是非常开心的。专家们帮助他们解决了舞台与排演方面的难题，他们在赫尔大厦舞台上重现了索福克勒斯[3]的《埃阿斯》[4]。这对于全体演员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为“无知的美国人”展现了“希腊的荣耀。”该剧的编剧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原文改编了这出戏剧，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他也是充满喜悦，因为他知道把对希腊诗人的热爱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对观众还是演员都是相同的。最近希腊人协助一位对希腊文化感兴趣的人创造了戏剧《伊莱克特拉》[5]除此之外，还有立陶宛人，俄罗斯的其他民族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在赫尔大厦舞台上表演了很多出戏剧，通过这种形式，他们自己好像也参加了正在火热进行的俄国大革命，并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移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在美国的地位。我记得我们街区里的一位意大利剧作家写了一出戏剧，内容是关于已经美国化的儿子们与来自农村的年迈的父母之间不可协调的鸿沟，戏剧如此感人，以致观众里年长的意大利人都落泪了。这是否说明当一个人发现别人也有类似的遭遇时，他们的心里能稍微好受一点？还是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并且伤心地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最坏的人？

通过戏剧表演这种活动，人们希望能够因此懂得生活的内涵，可是一旦当人们投入到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再想那么做就很难了，不过睦邻

中心能够坚持不懈地为此而努力的话，人们还是有机会可以那么做的。

《大西洋月刊》上有一个关于劳动人民的故事，作者将它改编成剧本，并且在赫尔大厦的舞台上进行了演出。这出小型戏剧说的是一名属于工会的男人，他表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烈士般的壮举，而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非工会的力量才能使人们有这种举动。工会成员，雇主及一些公众评论员观看了这出戏剧。他们一致认为剧中主人公所说的话非常具有道德上的美感，他是这样说的，“只有经历了最大的痛苦，才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有圣人才能掌控世界---如果工会能够一直发挥它的作用，我们也能像圣人那样赢得胜利，”他的话没留有丝毫余地，所以他会言出必行，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戏剧艺术通过业余性的演出公司，逐渐在赫尔大厦成长发展，其中有一个公司与赫尔大厦合作的时间长达15年。戏剧社成员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曾经在社会俱乐部组织的演出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可是现在他们只有在缺人的情况下才参加表演。有的成员的艺术水平已经达到专业水准，也有好几家公司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不过还是没有人专门去从事舞台表演的工作。他们演绎了各种类型的戏剧，既有情景剧也有喜剧，包括乔治·萧伯纳^[6]，亨利克·约翰·易卜生^[7]，高尔斯华绥^[8]的作品。其中喜剧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演员们发自内心地展现了弥漫于当代生活中的欺骗与虚伪，并且把矛头指向种种社会与家庭问题。通过戏剧表演，舞台成为体现社会公正性的前沿阵地。

我一直认为舞台所带来的教育意义比单纯上课要好很多，很多道德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被很好的坚持下来，可是当它们通过舞台形式表现出来时，就能用非常自然的形式产生它们的教育意义。戏剧有可能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繁琐冗长的说教，可是当戏剧以现实生活为素材来演绎时，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1900年一个美丽的夏日，我在奥伯阿默高^[9]观看戏剧《基督受难

日》时，我感受到戏剧无比强大的力量，它们是诠释道德真理的完美平台。每一幕中农民说的话都出自正规版本的《福音诗》中，却能表达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含义。他们明确表明反对那个年轻的老师，因为他阻碍商人在寺庙里做生意，还有一个原因是法利赛人^[10]也依赖于他们的帮助。他们面临的问题都出奇地相似，他们想问激进派的祖先，究竟是谁不顾一切妨碍别人的既定利益，是谁规定做生意需要遵循怎样的道德，是谁把诚实的商人们称做“一窝小偷”，并且侮辱整个市场。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发现掌控各方面势力的教堂与州政府对此同样持反对态度。他们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相信那个事件，由于他们所拥有至高的财富及地位，人们觉得他们说的都是正确的，以致最后所有的听众都觉得那个年轻的煽动者应该被处死，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最高利益。而这些思想淳朴的农民很直白地说，是金钱促使煽动者最亲密的朋友背叛了他。那个恶棍叛徒被金钱迷惑了，在金钱的驱逐下，他完全丧失了头脑，那个夏天我看了整整一天，露天舞台的后面是若隐若现的山脉，山峦起伏，景色优美，当夜幕降临时，山峰消失在柔和的灯光中，而我的心中满是疑问。通过把耶稣的生活戏剧化，是否要比单纯的说教“按照他的意志去做”那样更能表达其中的含义呢？

第二天早晨农民演员们在祈祷，好似耶稣时代的生活一样，他们以自己的率直虔诚出演了这出现代戏剧，即使哈纳克^[11]能做的也只是向他在柏林的资深同事提一些建议。奥伯阿默高的民众与芝加哥城里成千上万的移民的情况很相似，他们自身都经历了生活的艰辛，观看演出时，我的思绪飞回到了芝加哥，我为自己的努力一无所获感到自责。

当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把道德上升到这种高度的，赫尔大厦小剧院的发展并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志，而是依赖于居民们发自内心的热情与坚持不懈的努力，年复一年，好几位艺术家一直都孜孜不倦地为此贡献他们的力量。赫尔大厦的艺术团体早已培养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戏剧团体，给人们以礼仪与道德上的熏陶，这比其它任何方式都更为直观有

效。他们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适合各个年龄层次观众的戏剧，从而使各种类型的戏剧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主题，如孩子们喜爱的童话剧《白雪公主》，《穿靴子的猫》，小伙子们喜欢的英雄剧《威廉·退尔》^[12]，《约翰王》^[13]，《瓦特·泰勒》^[14]，还有很多年轻人向往的生活都可以从浪漫剧与喜剧中找到，剧中富丽堂皇的布景，精致的生活，都是吸引他们的地方。几名犹太男孩把《约瑟夫》^[15]的故事，王后以斯帖^[16]的故事都改编成了戏剧。

他们对故事的原意把握地很好，并且利用自己的犹太法典的知识布置舞台。就是同一个俱乐部的那些男孩子们，他们可以非常轻松愉悦地上演一出非常成功的喜剧，而且在5年后，上演了相对严肃的关于现代工业状况的戏剧。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成员们经常租用赫尔大厦剧院的场地，用依地语^[17]与英语出演戏剧，把联盟的宣传内容转化成舞台对白。就是通过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以及之后在全国不同区域开展起来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赫尔大厦剧院最后才回归于它最初在社区中所处的位置。

在赫尔大厦小小的舞台上也能诠释戏剧的真谛。有一个芝加哥团体，他们发现很难利用专业剧院来开展活动，于是某个冬天里，他们一周两次在赫尔大厦剧院里演出易卜生与古代法国的喜剧。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访问令我们想到要把舞台好好布置一下，于是有一大片树林映衬着蓝色的天空，虽然一看就知道是模拟的仿造物，可是我们一直把它保留了下来，这也算是我们还算是成功的尝试的见证吧。

我们小小的门厅里挂着的都是赫尔大厦艺术家们创作的海报，这些海报非常地吸引人，而且他们自己用彩色油漆装扮了舞台，用自己缝制的戏服，创造了极具诱人的舞台效果。赫尔大厦的艺术家们以瓦格纳^[18]风格表演了好几出戏剧；一位居民编写了《巨人的节日》^[19]，另一位居民则为戏剧作曲；音乐学校的成员演唱了戏剧表演中的歌曲，而戏

剧委员会负责舞台场景的布置，那些小小的褐色巨人在他们明亮的洞穴中自由地进出，好似他们已经在体育馆里接受过此类训练了。

在每年的赫尔大厦年度展会上，都会有类似的综合演出，人们努力营造出欢快的节日气氛，每周晚上来赫尔大厦的人数达到了9000人。年度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男孩俱乐部的铜管乐队，这让我们非常吃惊。铜管乐队庞大的规模与宏伟的声音吸引了全场，也许男孩们童真般的热情表达了那些年纪较大的人们一直以来所抑制的情绪。

我们小剧院的舞台上已经演绎了来自各个国家英雄们的形象。7年前的一个早春，我们决定在剧院的墙壁上画上壁画，我们觉得壁画上的人物不应是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英雄，而是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当代英雄。除了赫尔大厦的艺术家们，还有几位居住在临时居住区的艺术家，他们都热情地投入到这个壁画创作中。第一幅壁画是托尔斯泰正在耕地的场景，这是由格拉斯哥学院的一位艺术家创作的，接下来一幅是年轻的林肯在第一次感受到“极度不公正的事情”后，在密西西比河上使劲地划平底船。这幅画是芝加哥的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创作的。围绕着这两位英雄的画像，墙上满满的都是他们不朽的名言。

关于还有两堵墙上应该画哪个英雄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25位在赫尔大厦和平相处了十多年的居民突然因为各自所崇拜的英雄不同而分裂成好几个派别。每一派别都拿出他们各自的画，画上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正在做最具英雄意义的壮举，每幅画都得到了居民的热情支持，每一派别都是以英雄的国籍来区分的。来自希腊的艺术家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完成了英雄雅典娜的头像；另一幅画上则是年轻的大卫在伯利恒照看父亲的羊群，一边陶醉地弹奏着自己的竖琴。圣弗朗西斯正在给麻风病人洗脚；小奴隶帕特里克带他的主人穿过爱尔兰的沼泽地，令他们脱离了险境；诗人汉斯·萨克斯^[20]正在给鞋子染

色；圣女贞德^[21]面对慈祥的贵宾，诧异万分，手里的纺锤也掉了。这些画都得到了各居住区居民的热情追捧，如果只选其中两幅画，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然而热情的居民希望能选择与已经画好的两个英雄是同时期的画作，他们推选的画面有，威廉·莫里斯^[22]在织布机旁的那幅画，沃尔特·惠特曼在马路上徒步行走，巴斯德^[23]在实验室里工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24]在战场上搜寻受伤的战士。可是除了社会主义者，人们对威廉·莫里斯并不熟悉，而沃尔特·惠特曼的名气似乎也不是很大；大家觉得巴斯德只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身上却缺乏能激起人们热爱的浪漫气息，在首次投票选举时，大家觉得温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看上去更像是在掠夺亡者，而不是在帮助伤员。”这样的话语表明了人们对画作选举的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马上采取办法，尽力把本地的英雄选出来，比如那位在我们社区居住了很多年的消防局长---如果艺术并不总是能反映宗教思想，却能永远赋予我们为正义而战的强烈愿望，我以这么长的篇幅说了这件事，就是为了表明这个意思。

当我们都精疲力竭，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引用了华兹华斯^[25]的诗句，虽然不是非常地吻合我们迫切的要求，可是它能充满激情地表达我们的信念，它所表达的精神能有效地把居住在这个“特殊区域”的居民团结起来，我们选择了与两位英雄相关的一系列风景画。我们所珍视的风景壁画中，起伏的山峦散发出和平的气息。可是当有来访者看了剧院一侧之后，转向另一侧看时，他们显露出困惑的表情，我们不得不觉得这些画的主题并不是紧密相连的。

尽管壁画装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项工作中却很自然地融入了我们想尽最大努力把赫尔大厦装扮得漂亮一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外在表现则是我们想在大厦中留下某些东西，能引起人们对社区生活的怀念及向往。

当赫尔大厦不断扩大，不断成熟，并且拥有一些逐渐成长起来的团体时，我们努力把赫尔大厦打造成内外兼容的一个实体。有一排小型的经典造型的喷泉，透过清澈的水柱，我们仿佛看到了历史再现，不过对于意大利移民，他们却觉得有无法逾越的距离与障碍，他们对这种典型的风景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因为在意大利已经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作品，就如经典艺术是没有信仰之分的，人们不会对此产生一定的情绪反应，也如但丁^[26]的诗歌可以把物质与精神上的东西如此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

也许赫尔大厦居民为前拉斐尔派^[27]所做的早期贡献是，他们认为首先是英语为母语的诗人与画家显示了“外在事物可以表述情感的意义”，这同时也说明辉煌的艺术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注释：

^[1]朝圣之父（the Pilgrim Fathers）：英国1620年前到达北美洲的清教徒前辈移民。

^[2]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美国诗人、翻译家。

^[3]索福克勒斯（希腊语：Σοφοκλης，前496年—前406年）：古希腊剧作家，希腊古典时期三大悲剧家之一。

^[4]埃阿斯（Ajax）：《荷马史诗》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荷马史诗》中，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战士（也是一个国王，埃亚希德王朝的末裔），参加了著名的特洛伊战役，他的勇猛仅次于阿喀琉斯，在诸英雄中名列第二。

^[5]伊莱克特拉（Electra）：女子名，希腊语，含义是“光明的或灿烂的”。

[6]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英国剧作家、文艺评论家、费边社会主义者，荣获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

[7]亨利克·约翰·易卜生（挪威语：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生于挪威希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8]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曾获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

[9]奥伯阿默高（Oberammergau）：德国慕尼黑西南的村镇，以每十年举行一次上演耶稣受难剧著称。

[10]法利赛人（the Pharisees）：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该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

[11]哈纳克（Adolf Harnack, 1851-1930）：德国新教神学家，教会史家。生于爱沙尼亚道帕特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先后任教于莱比锡、吉森、马堡和柏林大学。

[12]《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德国伟大的诗人和戏剧作家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这部作品以十三世纪瑞士农民团结起来反抗奥地利暴政的故事为题材，歌颂了瑞士人民反抗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精神。

[13]约翰王（King John）：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

[14]瓦特·泰勒（Wat Tyler）：1381年由泥瓦匠瓦特·泰勒和穷教士约翰·保尔领导的英国农民反封建起义。

[15]约瑟夫（Joseph）：犹太人历史学家的名字，他编写了神殿在

公元70年被毁灭的历史。

[16]以斯帖（Esther，希伯来语）：《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的女主角，是公元前五世纪中期的人物，是古代波斯的王后，她是一名美丽善良的犹太女英雄，她为了挽救在波斯境内的犹太人的性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当时波斯王的面前揭露了阴谋家，当时波斯宰相哈曼的阴谋，使得哈曼获得被绞死的下场，粉碎了哈曼阴谋消灭波斯境内犹太人的罪恶计划。

[17]依地语（Yiddish）：犹太使用的国际语。

[18]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19]巨人（Troll），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一种长相丑陋、爱恶作剧、令人讨厌的巨人。

[20]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德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民众诗人、工匠歌手。

[21]贞德（法语：Jeanne d'Arc 或Jeanne la Pucelle，1412-1431）：被称为“奥尔良的少女”和“圣女贞德”，法国民族英雄、军事家，天主教會的“圣女”。

[22]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手工艺艺术家，设计师。

[23]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

[24]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

护理学先驱、妇女护士职业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25]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雪莱、拜伦齐名，代表作有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长诗《序曲》（Prelude）、《漫游》（Excursion）。曾当上桂冠诗人，湖畔诗人之一，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

[26]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中世纪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以史诗《神曲》留名后世。

[27]前拉斐尔派（the pre-Raphaelites）：1848年开始的一个艺术团体，由3名年轻的英国画家所发起——约翰·艾佛雷特·米莱、但丁·加百利·罗塞蒂和威廉·霍尔曼·亨特，前拉斐尔派常被看作是艺术中的前卫派。

第十七章 俄国革命带来的影响

赫尔大厦的居民对于俄国革命并不陌生，他们见到过很多与之有关的事件；芝加哥社区有一户人家的接纳并收养了他们的亲戚，就是父母双双在基希讷乌^[1]大屠杀中被杀害的孩子们；一名俄国妇女泪流满面，夹杂着愤怒与怜悯，她让人看一下她妹妹背上的伤疤；一个女孩从哥萨克士兵的鞭子下逃离；一个好学的年轻女子突然从赫尔大厦的教室里消失了，她为了能探望在狱中的哥哥而回到了基辅，希望能挣钱买些有营养的食物给他吃，防止他感染肺结核；我们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最新示威反抗大会，大会演讲中不断有人说，他们的儿子已经牺牲了，不断有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之情。在那样的时刻，美国人才深深意识到他们对现代史上最恐怖的悲剧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处于同一时代的最珍贵的生命的消失是多么的冷漠。当杰出的俄国革命家来到芝加哥，他们让我深深觉得他们所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就像最伟大的烈士那样，为革命抛洒热血，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有时这些革命家向聚集在俄国聚居区外的观众发表演讲，有时候被烈士壮举所深深触动的美国市民，也聚集在芝加哥一些大型的礼堂里，挤得满满一堂，倾听他们的演讲。最为显著的是一位俄国杜马成员与一位最资深出色的俄国革命家发表的演说；另一次较为著名的会议是由贝雷希古夫斯基女士^[2]演讲的，她后来在圣彼得与圣保罗城堡的监狱中郁郁终生。在俄国革命家所开展的杰出活动中，克鲁鲍特金王子^[3]，他自己更愿意被称作彼得·克鲁鲍特金，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当他来到美国做演讲时，全国民众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且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与敬仰；他在芝加哥时来到赫尔大厦访问，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他把自己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在年轻时代也写过一些激进的文章，可是两年后，当麦金利^[4]总统被刺杀的消息传来时，这位和善学者的来访

却成为一家报刊攻击赫尔大厦的缘由，这家报刊完全不知道克鲁鲍特金王子在赫尔大厦为芝加哥艺术与手工艺协会做演讲时，是为他的著作《田野，工厂与车间》做详细的讲解，他也在伊利诺伊与威斯康星州里大学里做过演讲，听众们是芝加哥文学与科学团体的代表们。

因此这些机构与团体没有被视作与无政府主义有关联。麦金利总统被刺后，一份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报刊编辑马上被逮捕并拘禁起来，由于这起事件，赫尔大厦无疑被推到了峰尖浪口。接下来全国性的灾难就开始了，刺杀者听了无政府主义的演讲后，受之影响，也发表了公开声明，芝加哥城里每一个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都被逮捕了，因为当局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发现那个已经被传播得很广的阴谋。因为怀疑编辑有涉案的文学作品，警察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编辑的妻子与女儿也被带到警局接受审讯，他自己与儿子，还有另几名无政府主义者嫌疑人被关押在市政厅地下室废弃的牢房里。那个时期，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情绪与他们对国家首领受袭后所表现出来的无比恐慌程度，的确是非常的强大，由于发生了反政府的犯罪事件，令所有遵纪守法的公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畏缩情绪。毫无疑问这种恐慌与畏缩来自于人们的自身经历；政府的最早形式就暗示了他们对外来人的强烈抵制情绪，但是政府没有对政府成员采取必要的保护，而是在叛国者谋杀了政府人员后，立即将他们处死。那种毫无缘由的憎恨与草率的处罚在政府人员被袭击后就产生了。麦金利总统遇刺后，这种憎恨与处罚的心态在芝加哥城中上涨到了顶点，那些被关押在陈旧的，以前几乎无人住过的牢房里不幸的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不能见律师，被“单独禁闭”。我与那位编辑及他的家人只见过一面，就是在克鲁鲍特金王子在赫尔大厦的那段时间，他们来看过克鲁鲍特金王子好几次。编辑是一位沉稳，有书生意气的人，他以巴枯宁^[5]与赫伯特·斯宾塞^[6]的哲学理论为指导，质疑当前的社会次序，然而他被儿子的激进行为所震惊，同时又从妻子与女儿那种德国式的家庭生活中得到由衷的欣慰。

以前曾经寻求过编辑帮助的那些势利的朋友说：“你看看，因为你自吹自擂那些教条教规，现在都变成怎样了；政府不会允许你请律师，也不会接受你的保释请求，对于你们这些人，政府不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虽然罪孽最深重的犯人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可能是我对社会上这种激烈情绪有些过度反应，可是对于这些话，我真的无法忍受。人们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感染后，总是很在意法制社会所带来的荣耀感。我认为他们可以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刺杀者最终也可以为自己找一位律师，一个人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与他在法律上是否可以享有一定的权利是无关的！我的意见被人反驳，说这只是理论上的，而事实上，这些人仍然被严格隔离，除了警察，不能见任何人，而这些警察则不断地吓唬他们，跟他们说一些关于众口铄金的罪行，还威胁他们说要处以死刑。

我们是在周六夜里说了这些话，然后警局领导与一位同样为局势感到焦虑的朋友一起去了市长那里，而我在周日早上也赶紧去了市长家里，请求他能以法律的名义来处理，以免引起社会的恐慌。我们为此进行了争论，说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其他所有人，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律要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市长以一个成功政客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听了我们的叙述。他坚持说不会被处死他们，而且现在也允许他们与某些人见面；然而市长还是不同意让他们请律师，如果我自愿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并保证以公正的立场去探望他们的话，市长愿意立刻为我写一封准入函。如果这是一个陷阱，那么我就迅速落入了这个陷阱中，半小时后我已经走在市政厅地下室的走廊上，在警察的警戒线包围中，我与消沉失意的编辑交谈。警方告诉我让编辑从牢房出来是很不安全的。在被押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编辑已经变得极其消瘦憔悴，他看到我马上询问他妻子与女儿的着落，因为自从看到她们也被逮捕后，他就再也无法得知她们的消息。当他得知人们不仅相信他的证词，关于自己从未见过刺杀者，而且认为他是一个愚笨的家伙，全国警方合力进行了网罗式的调查后，也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阴谋，公众渐渐地相信他其实并未被牵扯任何政治或社会联系中，逮捕他只是一种卑鄙

的手段，他才慢慢地平静下来我与他的整个谈话非常简单，我以前曾经与很多关在监狱里的落寞的犯人交谈过，可是这一次，无论从谈话的目的还是性质来说，都有别于之前的那些交谈。我回到赫尔大厦时，那里早已挤满了记者，我很快就发现，无论我是否帮助过一位兄弟摆脱了困境，我自己却已深深陷入了困境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面对了来自于公众的犀利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的影响久久不能消失。我每天早上打开信箱，里面不乏是表示抗议与指责的信件，这令我覺得非常恐怖，不过其中也有些信件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封来自一位我从未见面过的联邦法官的信件，还有一封来自与一位著名的宪法学教授的信件，他们认为我的明智举动维护了法律在恐慌时期的效力，他们就此向我表示祝贺。

虽然也有一两位热情的青年在报纸上撰文公开支持我，为强加在我头上的“无政府主义同谋”的罪名辩护，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仅用语言来辩解是无用的。我对于无政府主义争论的唯一回应，就是要让法律的保护效应能在每一位公民的身上体现出来，公民关于政府的理论在恐慌时期也能反映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才能变成法律与次序的守卫者，犹如中世纪的行会雇用武装人员保护他们能够顺利开展自己的活动，并且最后通过完全掌控武器，成为城市的统治者。当时我坚信，只有当公众在进行了愚昧的活动，他们才能被判有罪，睦邻中心这一团体的人们自身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他们明确表明，那些几近发狂的，气馁的人所做的零星努力是不足以保卫任何一个社区的，只有当每一位公民都具用同等的权力与保障时，才能保卫社区。

那段时间人们说了很多，写了很多，还是不足以促使有爱国心的公民能够耐心地去理解并转移这些零星的反政府暴力活动。我们不清楚那些活动是否是由那些气馁的，还未被同化的移民开展的，其实他们不应该做此类活动，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果我们很草率地认为无政府主义理论是他们进行此类活动的唯一原因，那么我们是不想认真处理并解决这个局面了。如果不能正确诊断病

情，那么即使治疗也是无效的，病人所遭受的可怕疾病会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当关于总统行刺者卑鄙生活的细节被公布于众时，要在美国城市中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而那些专门为不幸者辩解及安慰他们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衰败迹象的表现。难道生长在美国城市的孩子们就得不到好的照顾，无法获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了吗？他们在生活中遭受到的伤害无法从宗教信仰上寻求有效的治疗，当他们第一次听说如何处理生活中犯下的罪行时，不管这些罪行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还是暴力事件，他们难道需要表现出知道解脱的办法是什么吗？

人们相信只有友谊才能瓦解那些进行破坏活动的目的，那些破坏活动是由一些几近疯狂的人以正义的名义所进行的，当一位年长的无政府主义者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时，我才明白这一点。他是一名来自德国的修鞋匠，他的修鞋生涯波折起伏，不过他始终坚守在自己小小的修鞋铺里，那是位于芝加哥的一条大马路上，他这样做是由他自己的想法决定的，同时他宁可选择在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内忍受贫穷，也不愿在纪律严明的工头监管下去拿较高的工资。麦金利总统的刺杀者在行刺前几天，走遍了芝加哥的大街小巷，寻找他所能找到的无政府主义者，问他们索要所谓的“密码”。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没有什么密码，他们很不耐烦地让他离开，有些人流露出厌恶的情绪，他们把他视为不正常的人，经常“说要搞些什么运动，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运动到底是什么。”刺杀者也来到了德国修鞋匠那里，修鞋匠对待他的态度与别人一样，不过他在刺杀事件发生后，告诉警方刺杀者曾去过他那里，他觉得自己没有利用那次见到他的机会来阻挡他行刺的计划，他对此深感后悔。所有心理学家都研究过人在孤独状态下的事例，他们明白唯一能够阻止在脑海中一直浮现的不可告人的念头的办法，就是要通过亲切的举止来引导当事人坦白自己的动机，这样今后才有可能把潜在的刺杀者带入正轨，从而避免他们做出可怕的举止，修鞋匠与心理学家一样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修鞋匠还是处于深深的自责中，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候的一件事；好多年前在德国，一位热情的年轻人刚刚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哲学，他认为教堂与国家一样，要对人类的受压迫负责，并且最好通过当着公众的面，处死一名牧师或神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得到解决；由于他的内心一直有这种想法，一年来他都随身携带枪支，不过在一个美好的夏夜，当他觉得很无助时，他向一位朋友坦白了自己的计划，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实施那个计划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了，他已经感到那种想法是最为荒谬的。最后他说：“那个可怜的家伙与我一起坐在长凳上；那时候如果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兄弟，现在看看这儿，你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令你胡说八道的？告诉我吧。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我自己也曾年轻过，鲁莽过，愚蠢过，’如果他与我说出他的计划，他就不会再去做了。国家也就能避免一起恐怖事件。”他说完后，摇摇满是银发的头，叹了口气，好像他无法忍受这件事---这是一起可以避免的恐怖事件；他“本来真的会去做那么可怕的事，”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让人难以承受。

睦邻中心致力于向一些人解释美国的各个机构制度，他们或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或是因为一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对这些概念觉得模糊不清，睦邻中心通过这种方式，激起公众的责任感，可是对于睦邻中心想努力去理解并减轻他们痛苦的这种热情与睦邻中心本身所具有的态度，忧虑的社区民众是无法区别这两者的。在公众恐慌时期，每个有正义感的公民的义务就是要站出来对丑恶的事情进行强烈指责，如果睦邻中心觉得某个事件需要用法律来澄清，但是还未达到可以公开指责的程度时，那时候睦邻中心的态度就是要支持无政府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公众就会陷入如中世纪时候的那种迷茫中——人们出于对异教徒的最初印象而向他们提供食宿，因为人们知道，无政府主义者聚集的地方，每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个人觉得不仅在芝加哥，而且在全世界每个地方，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形式正在渐渐消失；

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报刊杂志都已停刊，美国曾经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再信奉它。至于那些还在继续展开活动的团体也分裂成好几派，半数以上的人把自己称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称呼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些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组织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这是理想社会实现之前的必经阶段，因此他们请求那些正统社会主义者能认可他们。因为政治混乱，人们开始怀疑社会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从而要求进行最基本的保护，这就涉及到人们必须非常明智地思考如何面对这种挑战。

赫尔大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否取得了成功，是否不会动摇人们对美国法律制度的信心，而为逃避国外政府压迫的难民们是非常相信美国的法律制度的，因此我对此无法回答。

为了追求对“外国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明智的政策，6年之后，赫尔大厦与他们的联系又开始了。这其实是与俄国大革命紧密相关的，不过涉及到的是革命中最普通的一员。一天清晨，一个名为阿费尔布赫的年轻俄国犹太人出现在芝加哥警察局长的家里，他去他家的目的并不明确。因为最近在丹佛刚刚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为凶手，因此人们提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为之色变，那个警察局长觉得站在他家门厅里的那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是要刺杀他的无政府主义者，赶紧喊人来救他。出于恐惧与自卫，他们枪杀了年轻的阿费尔布赫。阿费尔布赫的国籍被公布后，位于芝加哥西部的俄国犹太人聚居区的人们对此事深感愤怒。他们马上明白这件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心理充满了不详的预感，因为他的俄国身份，无论他做的是对是错，已经激起了人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憎恨。

赫尔大厦的居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要弄清楚事情发生的原委，在最终观点出来之前，要通过一切方法获取相关信息，因为那些遵守法律的俄国聚居区居民已被人们所憎恨。芝加哥警方决心要揭露一起无政府主

义的阴谋，他们采用最激进的方式搜查俄国犹太人聚居区，那里的人们太熟悉这种方式了，因为俄国警察就是这样做的。警方对阿费尔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断言不管是真是假，我们觉得以这种方式对待聚居区的人们，是一件最为不幸的事。当芝加哥警方彻底搜查了他们所能找到的聚居区中的每一个印刷室时，当他们突袭了一家餐厅，因为他们觉得这家餐厅以成本价向失业者提供食物是非常可疑的，当他们搜查民居，想发现是否有关于革命的报纸或照片时，当他们掠夺图书馆，把里面包括莎士比亚，赫伯特·斯宾塞的书搬到市政厅时，当他们拘捕了阿费尔布赫的两个朋友，把他们48小时关押在警察局里，当他们残酷无情地折磨阿费尔布赫的妹妹奥尔加，让她坦白罪行时——所有这些举动让人觉得他们与俄国警察的做法没有两样，让人心寒，俄国聚居区的人们对美国感到失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旧痛新伤所深深激怒了。年长的人们质问，难道宪法不能阻止警方的这种野蛮行为了吗，热血充沛的年轻人立即呼吁，对付警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反抗，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人们已经知道，在他乡异国没有任何地位，没有受到保护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异常艰难，就如那些在欧洲的穷人的一样；政治机构说要保护他们都是一派胡言。

每个睦邻中心都开设了有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课程，详细解释美国各个机构的准则，这些做法都是民众非常支持的。不过睦邻中心更清楚地知道，虽然这些课程与演讲是很有用的，可是如果要更直观地让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让人们明白自治的宪法基础，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当前的局势来说明这些问题。外国聚居区的人们在某个特定阶段所遭受到的事情，让他们觉得愤怒，觉得自己被误解，这些从一定程度上明确表明了合乎宪法的权利，却也让人们对这个问题感到更加迷惑。

政府对俄国聚居区的人们所做的一切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如果政府想再现自己公正合理与忠诚的形象，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政府对

难民们的所作所为，将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正在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阿费尔布赫事件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并且在避免引起误解的前提上，说明政府能保障宪法权利，能遏制并预防官僚主义，能代表所有民众的意愿，而不是少数统治阶层的意愿，以上这一切都必须以不再发生官方侵略为前提。阿费尔布赫事件为政府提供了一个表现他们决心的机会，因为俄国聚居区的人们正需要他们的这种表现；因为这些人以前曾居住的俄国，是一个独裁主义盛行的国家，政府就是官僚主义的代名词。与俄国聚居区相邻的睦邻中心里的居民们认为，尽可能让相关法律价值体现出来，让美国国家机构足够强大，即使局面非常紧张，大众的情绪很恐慌，也不会垮台，这是一种公共情绪的明显表现。

很多俄国人认为阿费尔布赫事件将为引渡条例的应用拉开序幕，对国内外有恐怖嫌疑的革命分子进行引渡。1908年，一位居住在芝加哥的名为鲁多维茨的俄国人被引渡回国。在美国专员主持的首次听证会上，通过了有利于俄国政府的一项裁决，虽然后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全部该项裁决无效。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照顾美国人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表示对俄国难民的同情，政府召开了一系列的公共会议，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参与讨论引渡条例应该怎样操作，而15年前我们在反对批准引渡条例的会议上曾经慷慨陈词。

对于那些不熟悉俄国聚居区的人，他们无法意识到这项引渡条例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恐惧。在反对引渡政策的运动中，我们筹集了一些资金用来租用礼堂与印刷传单，而我则负责管理这些资金，那时我有很多机会可以与俄国聚居区的成员交谈。一名老人说话的时候使劲拉扯自己的头发与胡子，他说如果引渡条例生效的话，他的儿子，孙子们都要被遣送回俄国了；而事实上，聚居区里所有年轻人都有可能被引渡回去，因为每个俄国青年都是热情高涨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革命分子。

以文明标榜自己的独裁政府，通过世人从未见过的，用民主政府最原始，最大胆的方式，用自己的独裁方法，成功地让自己保持文明政府的形象，人们难道不会嘲笑这个将会对国家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吗？由于愚昧无知，恐慌害怕而产生了不公正的现象，最终导致了怪异的结果！

如果华盛顿国务院没有推翻芝加哥联邦政府的决定，那么美国政府真的会把成千上万名年轻的热情澎湃的难民们重新推向俄国独裁政府的魔爪中。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拿破仑所说的“唤醒公民道德”，这个行为也许意义重大，公众觉得要恪守我们自己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上的；在19世纪中期的革命浪潮中，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来自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6]，来自德国的卡尔·舒茨[7]及其他很多精英分子，他们都为推动了美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位杰出的德国学者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写了一篇文章，关于1848年时他的一些朋友们以自己英勇的却不成熟的计划，梦想统一德国，建立一个宪法政府。他在文章结尾写道：“虽然他们并没有做错事，但他们的生活已经毁灭，要么被关在监狱里，要么一无所有，穷困潦倒，他们在我心中一直是最伟大的人物。他们是时代的先驱；只是1871年并不是合适的时机，在那个悲惨的年代里，德国失去了他最好的儿子。”

在俄国，当时机成熟时，那些伟大的力量就能重新打造出当代的新生活，卡米洛[8]，俾斯麦[9]在建立第一任国家政府时，他们追求的公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由怀有崇高理想的俄国革命家们所体现出来的，由于缺乏同情心与理解，我们是怀着懊悔的心情去回首那个“悲惨年代”的。

要真正理解伟大的俄国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著名的革命家格尔舒尼，他躲在装满白菜的桶里，从西伯利亚的一个堡垒下滚下来才得以逃出困境，而那个地方就是他自己任总指挥的战地，他一路从满洲，中国，再来到旧金山，然后在他返回俄国的途中，在芝加哥停留了几天，我还记得他来我们这里时的情形。3个月后就传来了他的死讯，后来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起与他的谈话，都发现他的话让人充满了敬意。在一位战友的请求下，格尔舒尼把在西伯利亚法庭审讯时候作的那次著名的演讲又重讲了一次。由于法庭代表了他以前曾反抗过的政府，他告诉法庭他能够原谅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与不公正的行为，但又一样他不能原谅；成千上百个与他一样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伤害生物而成为素食者，即使当孩子们犯错时，他们也不打他们一下，他们对被抛弃者与被压迫者充满了同情，为了安慰与鼓舞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他们与之同住了好几个星期，--就是这些人被恐怖主义所迫害，最后被“处死”，这种做法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10]所说的“暗杀”行为，对于那些官员的行径，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俄国政府。

这也许是争论的焦点所在，他的话令我想到，社会要原谅这些革命家所做过的事是很困难的，这个社会习惯于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那些缺乏良心与约束的人必然会模仿这种方式；如果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用这种自以为正当的方法，因为他们是公正无私的，是高尚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将是人类所能做的最可怕的事。犹如对待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他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对听众说，如果说托尔斯泰主义非常适合俄国，他然后用手指着自己薄薄的夏装说，就像他们也适合西伯利亚的冬天一样。当时我相信，现在也相信，那就是当超越现有政府的底线来表达正义时，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并且会不可避免地遭受灾难性的结局，虽然是高尚的理想促成这种冒险的行为，然而可悲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于革命者使用武力，俄国政府雇佣内奸的行为更令人费解。弗

拉基米尔被著名的间谍阿泽夫出卖后，来到芝加哥，他的心里满是对俄国政府的不解，为什么政府会让一个忠诚的官员与一位皇室成员被暴力所害，难道这就是对革命者的羞辱与惩罚，对间谍的嘉奖吗？

因为对俄国政府的做法进行了公开讨论，睦邻中心也遭受到很多非议。高尔基^[6]在美国访问时掀起了公众极大的热情，在此期间，不同的三个俄国委员会来到赫尔大厦，他们要求我至少要让一家芝加哥报社刊登他们的观点，就是沙皇的手下已经让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基的个人生活上，并且成功编造了舆论，即高尔基拜访美国的动机已经被发现并挫败；高尔基与沙皇底下最恶毒的臣民暗结珠胎，他最善于给那些恶毒的人披上令人同情的外衣，他根本不能在美国人民面前发表演讲，也找不到可以逃避的地方。

我告诉其中的两个俄国委员会，在公众的情绪消褪之前，是不可能做这些恶毒的攻击的；可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另一个委员会来了，我说我会尽力在芝加哥的报纸上刊登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那些文章早些时候在杂志上发表过，意在解释当前的局势，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所著名大学的一位很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另一些是熟知俄国形势的政治评论家。

我希望能有一份全球性的报纸，能感受到俄国，波兰与芬兰的众多读者希望伸张正义的强烈愿望，我想把此作为自己的义务，或者至少要把那些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再重新刊登在报纸上。就在同一个周日的晚上，我与另一名居民一起来到报社，可是报社负责人说我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相关的文章被新闻界业内人士称作“是碰不得的东西。”不过他答应可以刊登一篇我自己写的并署名的文章。我拒绝了这个建议，我对他说，我已经看到很多可怜的妇女为养活她们的孩子所做的努力，所以我写不出任何文章来为婚姻关系的瓦解做出合理的解释，即使俄国委员会对高尔基的攻击性描述是正确的，

我也不会做的。我们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报社，因为要为移民们争取一次演讲的努力又落空了。

我本来以为那件事就此结束了，没想到几个月后，一篇以该事件为主题的文章被刊登出来，里面尽可能地用邪恶的笔调杜撰事实，这令我无比惊恐。杜恩市长指控其中的一份芝加哥报社，他认为这是对他所任命的芝加哥学校委员会的严重攻击，因为我就是该委员会的一员。该事件不断扩大并造成恶劣的影响，考虑到我的观点与影响，该事件作为一个证据被递交到大陪审团。虽然该证据没有被采用，杜恩市长连任竞选活动的组织者为了表明“保护受压迫的人”是如何被诋毁的，重新搬出这个事件。我在这里引用这个事件，是为了表明人们是如何聪明地运用这种老道的方法来遏制宗教上，教育上，社会改革上的一些激进事件，引起人们对“妓女与罪人”的厌恶，从而维护一定的思想准则。

如果被压迫者是个完人，那么要保护他们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人们往往觉得被压迫者好像是合乎情理的，好像又是做错事的人，不过更多的时候，人们觉得被压迫者做的不对；也许被压迫者并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那种顽固的，要受到深刻谴责的人，可是对于那些无法通过合理的途径理解被压迫者的人，他们所得到的都是被添油加醋过的信息，而那些被压迫者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上述所描述的人。赫尔大厦被人们所误解，我们感到并不奇怪，每当有不幸的意外事件发生时，我们就会遭受到攻击，比如当一名意大利移民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谋杀了一位牧师后，赫大厦就受到了非议。虽然那些恶毒的人并不在芝加哥，更不可能在赫尔大厦，有一位芝加哥牧师，他是意大利乔尔丹诺·布鲁诺^[7]俱乐部成员，他说自己参加俱乐部后才知道了人们对教堂的憎恨，他也是赫尔大厦的居民，俱乐部虽然在赫尔大厦有活动室，成员们却很少在那里聚集。这个俱乐部起源于古代意大利民众联合起来反对教皇统治，现在在芝加哥所发生的事与之非常相似。有一位意大利居民是一家报纸的编辑，他代表的是当代的意大利，因此与芝加哥的那个牧师在观点方面

有严重分歧，第一件事是关于是否以加里波第^[8]来命名社区的一所公立学校，这件事是教堂所不能容忍的，还有很多在反教权论中涉及到的问题，虽然政府也参与到这种神学难题中，可是矛盾还是无法解决。他们之间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是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不过这种矛盾的缘由与说明的问题是很明显的，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发展方向上，赫尔大厦与他们都是没有关联的。

那个牧师曾在罗马住了好几年，我经常与他谈论意大利的政治问题，我相信他知道乔尔丹诺·布鲁诺俱乐部存在的原因。很幸运在报纸上的那些攻击来袭时，我们与社区里牧师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相互合作，一同帮助那些可怜无助的人时，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谦恭有礼。参与赫尔大厦各个俱乐部与课程的成千上百名虔诚的人们，为这件事深感悲痛，不过他们宽慰我们，说这只是一个误解。复活节很快就来到了，我信箱里满满的复活节卡片里，不乏有一些攻击我的信件，这也不足为奇了。

赫尔大厦附近的居民们遇到困难时，睦邻中心就是这样参与其中的，他们以自己的经历，生动地唤起了人们对现代国际主义的意识。赫尔大厦对俄国革命表示了同情之心，却遭到非议与反对，然而当时的局面还是那么紧张，睦邻中心还是需要去做些什么的，同时也为了解释赫尔大厦所受到的遭遇。一位芝加哥妇女退出了我们的大型年度捐助会，因为她觉得赫尔大厦为俄国难民辩解过，而她在欧洲时，曾非常熟悉俄国贵族，并且从他们那里得知进行俄国革命是完全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必要的。

类似反对赫尔大厦的情绪是否不可避免，是否表明赫尔大厦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这些我们没有必要去谈论。很多次我都想到自知犯错的埃米尔^[9]所做的坦白：“要真正做到表里如一不是那么容易的。”

注释：

[1]基希讷乌（Chisinau/kishinev）：摩尔多瓦的首都，位于摩尔多瓦中部，座落在德涅斯特河支流贝克河畔，有500多年的历史，人口78.1万。

[2]加塞林·贝雷希古夫斯基（Catherine Breshkovsky）：俄国革命祖母，贵族出身。

[3]彼得·克鲁鲍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俄国社会学家。

[4]米哈伊尔·巴枯宁（俄语：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1814-1876）：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

[5]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进化论的早期倡导者，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6]玛克西姆·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英译Maksim Gorky, 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7]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

[8]朱塞佩·加里波第（意大利语：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及军人。

[9]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 1881-1948）：德国作家，以撰写通俗传记而享有国际声誉。

第十八章 教育制度社会化

我们的教育制度更侧重能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而不是能对社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对于这个现象，我在好几年前写的文章里已经做过分析了，我从中节选了一些写在本书里，以此说明赫尔大厦在教育方面所做的一些早期的努力：

在睦邻中心施教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方法，因为那里的人们以前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们自身的学习能力也较弱，因此他们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过程。当每个人都能伸出友谊之手，怀着一颗关爱的心时，人们能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智慧的人必须把自己的知识传递给别人，让别人也喜爱胡恶习并受到知识的熏陶，只有这样，智慧才能表现出它真正的含义。马志尼^[1]是民主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看到欧洲南部农民所处的状况时，非常悲痛，他说：“在人的一生中，教育并不单单是人们得以生存下去的一种必要手段；教育是人类代代传下去，得以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的必要手段。当好几代人都无法接受教育时，就如意大利农民那样，我们觉得‘他们就像是野外的动物；只有采用武力才能被控制。’”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觉得没有必要让他们接受教育，让他们保持原样的做法才是有道德的。我们很愚蠢地被这种思想所影响，觉得长期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是有它的原因的。睦邻中心对这种带有偏见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反抗。

为了表明这一观点，赫尔大厦一成立，我们就开设了“大学推广课程”，任课老师包括35位大学老师，他们中的很多人连续几年都为学生们上课。在芝加哥，赫尔大厦的此类课程早于大学推广与普通推广课程就成立了，授课内容生动形象，老的赫尔大厦宽敞的教室里挤满了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他们与大厦居民之间的关系犹如宾客关系，每当

学期结束时，大厦居民为学生和老师举行招待会，这通常是那个季节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在这种融洽的社会关系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配合这些课程，在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赫尔大厦夏季学校在罗克福德大学里成立了。十年来总共有100名女性每年在那里学习6个星期，授课老师则多为男性，学生里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小伙子住在大学体育馆里。学生们在室外学习鸟类与植物学，阅读严肃的文学巨著，在石头河上做着小船游玩，学习之余学生们自己动手做家务，在毕业典礼上，学生们穿戴的帽子与衣服颜色各异，颇具风格，这段大学生活赋予学生们无比珍贵的友谊。

老师与学生们每周都付3美元，因为除了食物所需的费用外，我们很少有其它的指出，所以夏季学校在财政上没有什么问题。举办夏季学校这样的计划是很容易实现的，并且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在那些风景优美的大学校园里，多举办类似的夏季学校是可以推广的，在两个月的暑假中，几百名学生只需交付相当便宜的住宿费，就能非常舒适的在大学校园里享受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

刚开始的几年里，每周四晚上都会在社区举办一场公共演讲，这成为所有居民所期待的一件事，赫尔大厦也成为早期大学推广中心之一，推广中心最早与一家独立社会团体合办，后来与芝加哥大学合作。有一位赫尔大厦的赞助者，发现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开展的非常好，他资助在市中心举办三场讲座，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去听。赞助者看到听讲座者大部分都是工人，觉得很欣慰，因为之前工人们所希望的是党派人士来做经济学方面的讲座，而且工人们一向来对考试，学分之类都漠不关心。工人们也不喜欢学术性太强的关于正反方面的分析，不喜欢太正规的学术讲座，他们更喜欢“随性学习”。

冬季时每周日晚上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及其他热心贡献自己能力的人

来赫尔大厦做演讲，他们的演讲图文并茂，穿插生动的事例，因此来听演讲的人非常多，能容纳750人的鲍恩大厅都显得太小。这些讲座的内容各不相同，不过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其中之一是关于欧洲各国的首都及它们的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听众们是如此专注，恍如投身其中，当他们听到奥地利的斯拉夫籍国民对国家产生的怨恨之情时，底下有不断的窃窃私语与嘘声，当他们听到一个波兰英雄在经受磨难后终于取得胜利，底下爆发出阵阵掌声。

虽然周日的夜间课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要寻找合适的讲座并不容易。有一系列关于天文学的讲座是通过幻灯片来展示的，刚开始的那一周吸引了很多听众，他们希望能够知晓神秘的宇宙，及地球与太空的关系，后来他们发现讲座说的是对星尘的光谱分析，或是银河系的最新理论时，他们就渐渐地失去了兴趣。演讲者在授课之前做了很多研究，并且向给听众带来所讲主题的最新发现，在演讲过程中又运用很多专业术语，这些对听众来说有点难以接受并理解。当然也有非常好的讲座：我们在有机体的进化过程这一主题上，开展了12次非常精彩的讲座，虽然演讲者还没有评上教授，他只是一位大学讲师，他在演讲时，充满了对所讲内容的激情。很幸运，越来越多的演讲者所讲的内容都非常真实清晰，非常有价值，为了能准确生动地表现演讲内容，他们采用了所有最为直接的表述方式。

有时候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却让一些学术上的败类去教授与人类幸福息息相关的内容，那些人为听众推荐了很多书本、图片、幻灯片，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听众能更好地学习，而是为了自己能从中牟利，在这种情况下，听众无疑是得不到任何精神食粮的。其中一个睦邻中心很快发现思想简单的人们感兴趣的都是一些主题大而沉重的内容，赫尔大厦居民也曾试着做一些关于世界历史方面的演讲，首先是星云系的假设，然后接着展开了总共25场讲座！

紧接着就有人对此发表了草率的评论，他们希望能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尽快告诉其他人，那些年长的有学识的老师心里非常明白，当他们开始讲解人类发展史的时候，像猴子一样的小丑已经等不及在舞台上表演了。当时我希望我的第一次欧洲之旅能令我更好地理解杰出人类发展史的完整面貌。在圣地，人们向圣人表达自己的敬仰；在旅游胜地，矗立着英雄的雕像；在葬礼吹响哀曲的铜号上，是岁月留下的印痕——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达到顶峰，梦想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追寻正义。我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一名赫尔大厦男孩俱乐部的成员，他以前被误认为是小偷的同伙而被关押在警察局三天，他告诉我在那三天里，他“想起了冉·阿让^[2]因为追求正义，却一直被警察所追捕”；“能关于冉·阿让的演讲中所用到的图片，我一直都在看，由此我想如果他那么多年里都继续追求他的理想，那么我在牢里三天就受不了了，是不是太奇怪了。”

可是这些非常正当的举动却被人别有用心地渲染成截然相反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关于在纽约进行的一起恶性谋杀案的审讯，还有谋杀案的所有细节描述。有天晚上我在街上看到几个在上班的女孩，她们聚在一起看报纸，谈论着照片上女主角的衣服，羡慕她的美貌，当然也对那位不幸的女主角“表示同情。”审讯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位我认识多年的妇女与我聊起她的女儿，她很难为情的说她的女儿竟然在模仿纽约案件中那个恶毒女孩的穿着，女儿甚至公然对她说，“如果哪一天我也在法庭接受审讯了，我也要穿得像伊夫林那样，并且像她那样，以纯洁，美丽的面貌面对那些原告。”

如果在某个周日的下午，人们去赫尔大厦附近的移民聚居区，拜访某一户人家，就会发现全家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报纸的周日专刊，报纸里有各种吸引人的新闻，即使那些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报纸增刊中的彩色图片看懂一些好笑的故事，或者根据黑白图示，看懂凶犯作案的线路。

有时生活本身也能给我们上很好的课，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多是让人觉得悲伤。几年前芝加哥的货车司机举行罢工时，阶级矛盾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我曾经去探望住在附近社区的一名男孩，他在给工会开运煤车时，受伤非常严重。我快到他的家时，一大群男孩女孩围住我，有的孩子年纪还非常小，他们告诉我“杰克拒绝参加罢工”这个重大的消息，我后来没法走进那名男孩的家。我告诉这些孩子们，男孩的妈妈是我的朋友，她对于儿子是怎么受伤的情况一无所知。可是聚集在男孩家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我放弃了再向他们解释的念头，直接走到男孩家里，对他妈妈说：“不要出来。不然你也会受伤的。”当然我自己并没有受伤，不过这起事件在我心中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是我对附近社区的孩子们所有的印象中最让人心痛的一次。这些孩子们之后上的课如果都是关于忠诚与同志友谊的话，能扭转那种阶级对抗的情绪吗？再怎么这件事在满是痛恨情绪与斗争的芝加哥城里，真的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因此赫尔大厦的居民们更加强调文学作品能给予的鼓舞人心的事，能给人的心灵以慰藉的事，这种精神能给予人们明确的阶级引导，我们应该把它作为精神食粮长期阅读。赫尔大厦的莎士比亚俱乐部已经持续半了16年，在俱乐部的活动中，成员们欣赏了各种莎士比亚作品的出色演绎，既有学者，也有演员。我还记得有一位最早的俱乐部成员，她说在工厂里缝衣服的时候，她的思绪里也满满地都是莎翁笔下的人物，除此之外，别无它物。

艺术的作用就是，让工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充实，能令他们的思想能驾奴于单调乏味的工作之上，能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而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好地体现了艺术的这些作用。斯塔尔小姐开设的但丁与布朗宁作品的课程持续了很多年，人们对这些伟大作品的热情一直非常高涨。我记得在莱思罗普小姐组织的柏拉图俱乐部中，约翰·杜威作了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系列讲座，听众是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们大多来自附近的社区，他们“要做的努力是去做我们曾害怕去做的事，思考我们没

有思考过的内容。”我们非常珍惜这种类型的课程，并且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离开他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去大学学习，然而赫尔大厦的居民越来越意识到，睦邻中心在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应该与正统的大学一样，而是要根据当前局势，有针对性地给人以思想与学术上的教育。他们觉得应该倡导的文化，不应该把人们都变成同一类庸俗之人，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能力，与各种类型的人都能建立联系，能理解其他所有人，并能通过自己拥有的历史知识来诠释自己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

几年来，几百名移民参加了赫尔大厦开设的英语课，他们中有好几十人都用英语写了很多文章，以此来表达移民们的希望与梦想。

一名年轻的波希米亚人用英语写了一些系列戏剧；一名年轻的俄国人用英语写了很多篇散文，表达了自己与维特相比有过之而不及的烦恼，是年轻人一直以来对社会上公然存在的错误现象表示的反抗；俄国移民为了逃避俄国政府的压迫与不公平的对待来到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自由，然而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对犹太赎罪日的描述是那么细腻，甚至于一个普通美国人都知道要在新生活中继续保持自己祖国的传统是多么困难，那种经历是以古典的方式来描述的，对历史不了解的人会觉得难以理解。

有一名年轻的俄国犹太人用自己的笔调来描述旧时犹太法典学者的内心世界，她的叔叔或父亲在精神上一直以来都被那种可怕的事情所萦绕，即使后来他们来到美国，每天接触的人都是异常忙碌，加班加点的工人，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们的懒散与那些工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然看过她的文章的人，没有人能够真正看见一位老人，面对着他那本破旧不堪的书本，双膝下跪，披着披肩，在默默地祈祷，却不明白祈祷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可是另一方面，被人们普遍称赞的美国年轻人，他们想拥有自己美

好的生活，可是他们也经历一段悲哀的时期，因为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把他们的思想栓上了枷锁，令他们变成没有自己思想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从未受过教育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也对他们产生误解。虽然他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知识，可是这些知识在他们生命的旅程中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也从未因具有知识而感到快乐过。

睦邻中心的老师尽力运用最合适的教学方式，能让学生们很快理解所学内容，在这里我要向我们的教育部主任，兰兹伯格小姐表示我的敬意，还有每年冬天都来赫尔大厦给新来移民上英语课的许许多多的人们，我对他们表示非常感谢。移民们只要稍微懂一些英语，他们在工厂找到工作的机会就会多一些，不至于找不到工作，懂得英语对移民们来说还关系到生命，他们只有看得懂操作说明，才能避免被吊车砸到。

为了让更多人受到教育，赫尔大厦的各类课程开设后发展迅速，有烹饪课，裁缝课与制帽课。一名上此类课程的女孩经常说，他“希望明年冬天能与一名工人结婚，”因为她在工厂工作的时间太长了，对于家庭是怎样的几乎没有什么概念。有时候上课的学生里也有在工厂上班的已婚妇女。有一位妇女不大会做菜，两年后她的丈夫无法再忍受这个，威胁说要抛弃他，去可以吃上“好吃的菜”的地方，这名妇女哭着与我说起这些，我建议她参加赫尔大厦的烹饪课程，6个月后，她告诉我他们夫妻和好了，幸福如初。

这类课程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家庭技能类的培训，第二个是职业类的，为了能让贫穷的女帽与裁缝学徒们尽快掌握技能，让她们能尽快用学到的技能赚钱养家。

职业型的课程一开始就与赫尔大厦男孩俱乐部开展合作。由我们一位赞助者资助，于三年前落成的男孩俱乐部大厦面积宽敞，里面有设备齐全的作坊，有木工，铁艺，铜艺，锡匠，商业摄影，印刷，电信，电工等等。这些作坊里往往都挤满了男孩子，他们希望能掌握其中一门技

能，将来能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作坊里一周两次由心灵手巧的工人们给学生上课，很显然，他们要比那些严格的专业老师教的更好。这些课程为人们提供了职业培训，也令人们发现自己的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少走弯路。工厂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没有接受前期培训，去那里上班的男孩们肯定会变得很迷惑。用教学的专业术语来说，他们在刚进工厂的那段时间里，已经没有“正常反应的能力”，自信心也受到打击，对他们的前途有害无益。

在芝加哥，学校与工厂实践相结合的最佳例子就是，在赫尔大厦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里，好几年来都在那里开展课程，在建筑淡季时，砖匠学徒每天在那里学习8小时。这种早期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成功，后来在辛辛那提，匹兹堡及芝加哥市内都发展起来，在这种教学模式中，两组男孩轮流在工厂工作或在学校学习，周期都是一个月，通过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能很好的掌握这种现代工业中复杂的工艺。

不过也有一些男孩，他们对于这种学习工作的生活缺乏耐心，觉得课程太紧张，就很容易被外面的诱惑所吸引。

有时候，男孩们在赫尔大厦开设的课程中呆上好几个礼拜，因为他们觉得在门垫下面装防盗装置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不过学习是需要付出努力，需要持之以恒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即使是很简单的技能，老师也要很谨慎地用合适的方式教学生们。一个游手好闲的男孩被木刻课深深吸引了，可是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运用一些简单的计算，他被这个难倒了，竟然匆匆离开教室，从此再没有回来过。很显然他遇到了他的大难题：数学，所以他只好逃离。另一方面，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情况，男孩们非常想抓住这样的上课机会，却没有成功。最近一个10岁的男孩因为逃学而被抓，可是事情的真相是他在市中心的一幢大楼里，每天都好几个小时在那里看别人怎么铺电线，他又在公共图书馆里泡上很长时间，“阅读电学方面的书。”

还有一个男孩很早就辍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在一次工厂事故中失去了双腿，这个男孩找不到地方可以“学习机械。”人们说他年纪太小不适合做机械方面的活，所以四年来他只能做跑腿的活，他每次都把工资分文不少地交给父母，用作家庭开销。第四年年底，这个男孩离家出走了，他为残疾的父亲感到痛苦，他可怜的妈妈每天帮别人洗衣服，用来维持生活。这个男孩去了肯萨斯城，希望“那里的人不会介意自己的年纪。”六周后他回来了，他觉得很对不起妈妈，同时他心里有着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够学习技能，因此他向青少年保护协会寻求帮助。他们为这个男孩找到了一份在机械车间的活，并且安排他去上夜校。

赫尔大厦男孩俱乐部的1500名成员中，有几百个人只想参加娱乐性的活动，很多年纪大点的男孩们就只想打保龄球与台球。相对于那些很容易就可以在俱乐部之外找到的娱乐项目，经过严密筹划的各种锦标赛与比赛无疑比它们更上了一个台阶。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大多都是在赫尔大厦体育馆里举行的，运动激起了人们的无比热情。

18年来，赫尔大厦的体育馆都没有空下来过，人们在那里上各种各样的课，参加很受欢迎的舞会，而每周六晚上在体育馆举行的体育比赛则成为周边社区的一则重头戏。睦邻中心尽力促成这种类型的体育运动，因为体育可以塑造性格，在训练时可能需要在生活上有一定的节制，也不能随自己冲动，而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的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这样才不会违反比赛规则。看到那些小伙子瘦长的身体做出有韵律的动作，“他们的动作如此完美无缺，如果有上帝派来的信使，就会推荐他们去希腊参加奥运会，”人们用这种非常朴实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步伐是那么矫健。”可是当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得奖回来后，他们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把欧芹，一首赞美诗及带给家庭与城市的名气，当出自赫尔大厦体育馆的男人与男孩们捧着奖杯与金牌回来时，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取得巨大的成功后，可能会走上专职运动员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上充满了赌博与搏斗。我想坦白地说，有很

多杂技表演者每年冬天都在我们的体育馆训练，因此我对他们是非常熟悉的，也由此让我对杂技这个职业有了更高的看法。长时间从事案头工作，在工厂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更需要时间锻炼身体，因此他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体育运动。

希腊移民组织了大型课程，希望能用他们所有的知识可以重练古代摔跤，当一名希腊人代表整个城市得到了摔跤比赛第一名，如果他要把那块奖牌放在赫尔大厦奖杯陈列柜里，那么他肯定要说那句他熟记在心的，庄严的并令人陶醉的话。

由于希腊小伙子们的原因，赫尔大厦最后取消了对军训的限制。如果体育比赛是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所要击败的是侵略者而不是本国的暴君，由于当代希腊年轻人从心底是讨厌土耳其人的，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就冲在这场战争的最前线。每个小伙子都觉得，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到祖国，迎战希腊的宿敌。由于心中有这样真诚的想法，我们当然不忍心拒绝他们在男孩俱乐部大楼或是体育馆中进行军训，后来我们很开心地看到这一活动成为希腊教育协会的一部分。

赫尔大厦同意但不倡导军训活动，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经历，那就是“哥伦比亚卫士队”与夏季世界博览会组委会。虽然赫尔大厦方队也与其他队伍一样进行了集训，他们更热切地希望有一次军训。这个要求不但动摇了我的准则，而且我们觉得刚好可以满足一下他们想体验的那种男孩军团里的军事生活。哥伦比亚卫士队表面上是为了打扫肮脏的马路与街道，我向男孩们建议使用带有下水道清理铲，它们的刀片窄而长，把手很短，在大小，重量与外观上与手枪很相像，因此一般的军训队都可以用这种工具。当我在体育馆向大家解释，如果军训的目的是为了清扫细菌繁殖的污垢，要比为了准备战争要高尚的多；当我匆忙把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改编成现代社会拯救处于危险境地的悲惨大众时，操练队往前走了几步，当我决定离开时，教练抱怨说，我们的队伍首先会感到害

羞，接着就会变得意志消沉，最后就拒绝前进了。

自从那次愚蠢的失败经历后，我偶尔在赫尔大厦储藏室看到一个下水道清理铲，因为长度不够，无法用来清理下水道，而当初买这些东西的目的，现在看来真的是很不明智。我只能希望这样东西能预示和平，战争与武器将从我们眼前消失，我们所需要的是能拯救公民灵魂的工具。

在这章结束之前，我还是有必要再重申一下，赫尔大厦可以说是一个社会与教育活动中心，居民们因此在教育方面受益匪浅。

赫尔大厦里有一部分居民对慈善事业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还有一些居民在移民们寻求他们的帮助时，他们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自己从旅行与阅读中获得的能力，为提高移民们的精神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记得有一位居民刚从西西里岛回来，他在法庭上为人辩解，说在古代，被抛弃的女性可以用硬币边缘刮负情郎的脸颊，这令法官非常地迷惑不解。虽然那个被起诉的西西里人应该受到惩罚，那起事件作为伤害罪被判不成立，这次辩解令很多西西里人都感恩不尽。的确有很多次赫尔大厦的居民碰到过种种丑恶的事情，令他们的一片热心遭受非议。这些事情让他们觉得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心态上，是不能承受之重，以致后来渐渐失去了热忱去实现更多有意义的目标。

也许是因为这种普遍的情绪，也许睦邻中心本身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人们不再坚持追求真理，而是更安于在睦邻中心度过每天的平静生活。“好人总是很快乐的，除非他遇到了坏人，”这句话可能也不完全正确，不过睦邻中心向世人证明，一个人并不是非得变得无情无礼，他才能快乐，也不是非得装的很严肃，才表明自己很聪明。当赫尔大厦从赌博协会赎回台球桌，把人们从公共舞厅里吸引到赫尔大厦的舞会中，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有一个正直的生活，让人们的性格具有吸引力，

而这些目的，不是周边所有的社区都能想到的。

纵观赫尔大厦的发展历史，很多人会问赫尔大厦居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那么他们的宗教信仰都是各不相同的，他们的内在思想也是各具特色，就像在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这样的回答也许还不足以让人们相信。波尔克大街上一幢男性居民居住的房子对外开放后，里面的居民人数达到了20名，我们就每周日晚上去为他们提供家务方面的服务，我们希望以此表明我们在道德上都是一致的，虽然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尽相同。当高教会派^[3]的居民作晚祷的时候，我们都虔诚地跪在地上，当新教会的居民开始做祈祷时，我们开始磕头，当一位居民朗读她最喜欢的柏拉图的文章时，另一位居民朗读阿布特·沃格勒^[4]的文章时，我们都非常安静的聆听，一直到天亮，不过那年冬天快要结束时，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需要宗教团体，之后朗诵俱乐部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我曾与牛津大厦的门卫讨论过这件事，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专为居民所作的晚间祈祷，是位于睦邻中心顶层的小教堂里。

那里所有的居民都是高教会派，对他们来说，这个仪式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且神圣的一部分。我告诉门卫，赫尔大厦的居民不再一起做祷告，因为居民中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罗马天主教徒，有的是英国牧师，有的是反国教者，还有不可知论者，所以我们无法一起做祷告，门卫说，与宗教信仰各异的人工作肯定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只有在晚间祈祷时才能解决一些难题，因为那时候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居民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我告诉他这种宗教信仰多样性是每股睦邻中心的特征之一，就如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因此睦邻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由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

一位智者曾告诉我们，“人类总是喜欢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并希望自己能生活这样的世界里，”不过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世界是不容易

的，相对来说，人们更容易找到一个充满智慧的，有美感的，有道德的，充满实际意义的世界。当然如果一个世界在以上四个方面都是非常完美，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睦邻中心就是以上述四方面为目标而努力的，它通过对自身经历的反馈，来实现自己的作用。因为有了这四个目标，睦邻中心把兴趣思想各异的居民聚集在一起，他们以赫尔大厦为基地，持之以恒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有40位居民组成的工作成员，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意与职业，他们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开展睦邻中心的工作。这种特性除了让工作保持持续性外，还有另外的好处。目前的工作人员中，大多数人已经在赫尔大厦住了12年以上，他们分别是城市俱乐部秘书，两位在职医生，几位律师，新闻工作者，商人，老师，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公民与博爱学院的讲师，青少年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移民保护联盟的工作人员，一位访问护士，一位卫生检查员，等等。

在共同居住的那些年里，我们制定了一个居住计划，通过该计划，租住赫尔大厦公寓的家庭与个人可以使用由他们自己打理的中心厨房与餐厅；他们很多人每周都会在画室与作坊里工作好几个小时；大厦提供剧院与休息室，作为社会组织的使用场地；赫尔大厦总共13幢楼都由一个中央电厂供电供热。在那些年里，我们经历了普通人的各种生活；在那里举行了葬礼，婚礼，洗礼，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回忆。每位居民都及时交付自己的费用，居民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学教授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人们以自己真诚的心，在社区里结交了真正的朋友。社区的居民通过参与各种团体，进行了各种睦邻中心急需的改革，使自己被整个社区所熟悉，并体现了自己对整个城市的贡献。

睦邻中心的生活令我们明白“人性是如此的柔韧，”在合适的城市与教育条件下，人们在道德上所体现出来的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不过为了实现相应的条件，睦邻中心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其中即需要激进派，也需要保守派，从任何事的性质来看，睦邻中心的合作伙伴不局限于单

一的党派或经济学派。

有识之人认为合理正直的东西，睦邻中心都会给予重视，不过中心认为，必须大部分公众也是那么认为的，虽然他们因为工作辛劳，薪酬地下，不能享受到那些东西。不过我们认为，人们无论贵贱，都能享受美和愉悦，“文明带给人类的成果”是通过生活中更好更自由的方面来表现的，而这些必须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里，这些美好的东西不应只局限于某一类人。

睦邻中心开展的教育活动，与慈善活动，公民活动及其它社会活动一样，是实现民主的各个表现途径，也是睦邻中心存在的真谛。

如果你不知道都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

【奥丁读书小站】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

注释：

[1]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2]冉·阿让（Jean Valjean）：《悲惨世界》的一个角色，一个伐木工人的儿子，他从小就成了孤儿，由姐姐抚养成人。在他17岁那年，姐夫不幸去世了。就这样，冉·阿让担起了抚养姐姐7个孩子的重任。他身体非常强壮，但是他发现如果继续干目前所从事的职业，难以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面包。

[3]高教会派（High-Church）：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派别之一。专指

英格兰教会和英国国教会中的信徒。与“低教会派”对立。

[4]阿布特·沃格勒（Abt Vogler, 1749-1814）：德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指挥家，风琴演奏家。